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Yongnian Zheng

政治与社会译丛

郑永年 著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既然国家重建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就会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强烈动机。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向公众参与开放，因此社会团体必须找到替代的方式来影响国家重建过程。当失势的工人和农民求助于“行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知识分子则利用自己的武器即“知识”去实现目标。

本章集中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国家重建过程——通过想象和表达国家重建的不同话语。尽管国家仍然对学术自由实施着控制，但还是有产生这些话语的空间。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改革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但大部分人并不确定它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空间，并且为大众提供了一些认识上的图谱。不用说，不同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也广泛地批评政府并挑战其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的兴起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本章试图详细描述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中的最重要景象。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

先后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1995—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3部。其中,英文著作5部、中文著作8部。英文著作包括《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e Internet,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的事实联邦主义:改革与中央地方关系的动力》(*De Facto Federalism in China: Reforms and Dynamics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世界科技书局,2007);《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和《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现代化、认同及其国际关系》(*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等。主编学术著作11部,主要包括《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中国和新世界秩序》(*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和《中国的开放社会》(*China's Opening Society*)等。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和《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ISBN 978-7-213-04004-7



9 787213 040047 >

定价: 34.00元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郑永年 著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y Yongnian Zheng first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4

© Yongnian Zheng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 郑永年著;郁建兴,何子英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3

(政治与社会译丛. 第2辑)

ISBN 978-7-213-04004-7

I. 全… II. ①郑… ②郁… ③何… III. ①国际化—影响—经济发展—研究—中国②国际化—影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0044号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06-104号

| | |
|------|---|
| 书 名 |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
| 作 者 | 郑永年 著 郁建兴 何子英 译 |
| 出版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
| 电脑制版 |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
| 印 张 | 16.5 |
| 字 数 | 26.5万 |
| 插 页 | 2 |
| 版 次 | 200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213-04004-7 |
| 定 价 | 34.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政治与社会译丛编辑委员会

第二辑主编 郑永年

编委会成员 朱光磊 张小劲 张 静 林尚立
郁建兴 周光辉 周晓虹 郑永年
黄 平 景跃进 刘亚伟

出版者言

出版本辑“政治与社会译丛”是基于我们对出版职责和中国现实的思考。出版者承担着推动知识的引介、传播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创新之职能，自然地，面对生活，我们应该永远在场，永远开放，永远创造。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她过去经历了什么，她正在面对什么，她将走向哪里，这是每一个关心、热爱中国的人都应思考的。事实上，这不仅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关注，也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而吸引了世界各地学者的目光，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正呈日渐繁荣之势，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也涌现了许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潜心研究并撰写出来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我们引进并出版这些著作，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唯有进一步打开视界，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并在和其他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重塑包括学术在内的自身文化的品格。

本辑译丛所选书目是经编委会和出版者反复商讨、比较后确定的。这些著作研究立场客观，议题重大，视角新颖，体现了众位学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中国问题的准确把握，相信读者会从中获益匪浅。当然，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思维定势，局限与偏见难以避免，读者很可能与我们一样对某些观点难以认同；同时，中国社会变化急速而深刻，相关著作中涉及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问题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论断，也许已经或正在由改革所解决和修正。以上两点，读者诸君不可不察。

上述文字，算是出版者的不算多余的“多余的话”。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年春

译丛第二辑序

译丛第一辑序曾指出,译丛的总体目标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寻找和确立一个反思自身现代性的“他者”,在了解“他者”的过程中,认清和确立自身。那么,更进一步,通过认识他者眼中的“我”来认清自身,是不是一条更便捷的路径呢?在确定译丛第二辑书目之时,编委就这样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当代中国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呈现日益繁荣的趋势。诸多因素促成了这种繁荣。随着中国内部的发展和外部影响力的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有机分子。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已不能忽视中国因素,都需要深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作为对外政策基础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现状。了解中国的需求使得西方各国对中国研究进行大量的资助。从学术进步来说,中国的转型已经为海外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实验室。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为他们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素材。欧洲的转型产生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韦伯和杜尔凯姆。中国的大转型可说是一个迥异于西方世界的绝好实验室,提炼自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很多理论框架和范畴都可在此接受检验,或被证伪,或得到拓展充实。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转型现象,那么其说服力就成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研究的学术兴趣已经越出中国问题专家这一群体,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在研究群体中,最值得指出的是,游学海外的具有中国背景的学者成长得很快,并且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的研究往往是他们在西方接受的社会科学训练和他们的中国经验的对话

结果。这种对话是海外学者本身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国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变化也同样重要。传统的汉学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汉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基本上没有把中国研究整合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与传统汉学不同,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大都基于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的同时努力把中国研究整合到一般社会科学中去。社会科学和中国研究的整合正把海外的中国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所有这些因素的驱使下,不断有优秀著作和论文问世。

返回到国内,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激增,诸种论争近年来愈渐尖锐,改革似乎到了“行路难,多歧路”的困难阶段。改革之初,我们或许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行进到今天,不对过去的历史和当下所面临的复杂现实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认识,那显然会迷失未来的方向。人的理性固然非常有限,而人类的发展也极少遵照人的理性前进。然而,反思过去,尽可能地理解历史,发现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模式或规律,使社会尽可能地朝着我们加以认同的方向走去,正是社会科学家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此种背景下,引进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优秀成果无疑是一件急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任何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孤立进行,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既然中国已经是全球社会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内部发展必然要关切外部世界的境况。西方中国研究往往采取比较的视角,就是把中国置于国际的环境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研究对中国自身的发展取向具有参考价值。就学术进步来说,海外当代中国研究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真正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各方面也在热议如何争取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但所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说,中国的学术不能自说自话,如果海外不接受中国的话语,那么就很难在国际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也就是说,中国的话语权必须是在和海外的互相交流和互相辩驳中发生和发展的。而引进海外的中国研究作品当是最有效率的一个途径。

我们也相信,本土研究和域外学术是长短互见的。国内学者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有着无可匹敌的现场面对研究对象的优势和资料获取上的便利,能切身感受变化的细节和活生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亲历者的地位也可能导致研究者被自身情感所左右,为利益所羁绊,为其所处时代的“迷雾”所蒙蔽,以至于不能跳出一时一地的障碍,发现问题并理性地把握事物的客观性。反过来,域外学者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容易持比较中立、客观的态度来对待研究对象;

更重要的是,受西方深厚的学术传统的熏陶,他们崇尚科学的认知模式,重视经验、崇尚分析、善于系统化,其分析方式、审视的角度和力度往往是国内学者所缺失的。但同样,由于文化和历史的隔膜,他们也可能无法完全理解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经验和境遇;他们在分析时所持的预设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适用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不过从学术进步的视角来说,学术范式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源自于不同范式间的交流和冲突。本土学术范式的进步需要海外学术范式,正如海外学术范式的进步也离不开本土范式一样。

所以,我们一方面期待在此译介的著作能开阔国内读者的视界,增加读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希望我们的读者能随时用批判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些著作,在审视和追问中超越西方理论框架,真正逼近中国的经验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和提升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建立真正有活力的中国现代学术乃至社会科学。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谓任重道远,需要学术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郑永年

2008年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

译者序

2002年11月,我在景色宜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第一次见到郑永年教授。当时,他告诉我,他正在做一项关于中国国家重建问题的研究。由于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之际,我们的话题更多的是围绕领导人和政策的延续与变动。2004年,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书店里看到了刚刚出版的《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我的记忆一下子被拨动了。我当即买下了这本书,试图借此连接起2002年的会见,认真领会郑永年教授的真知灼见。

多年来,我较为关注西方福利国家及其转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注是我研究黑格尔、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延伸。在英国期间,我专程拜访了慕名已久的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教授。在兰卡斯特小镇(杰索普教授任教于兰卡斯特大学)等火车的时间里,我在书店买到了曾经因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国家建构》(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该书中文版于2005年由中国台北时报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强国论》,中国大陆版则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国家构建》)。

之所以把郑永年教授的书与福山的书放在一起回忆,是因为这两本书较大地影响了我对中国国家建构论题的关注。此前,我承担过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研究课题,也在这些课题研究中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关怀,但这些关怀常常只是隐含其中,并没有得到直接表达;更由于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我考虑较多的是西方福利国家治理、社会政策等的中国适用性。2004年出版的这两本书给了我很大

的启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无疑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但它是一个独特的重要研究领域。相应地，由于现有的政治学范畴、方法、分析框架等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运用这些范畴、方法、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问题，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界定一系列清晰的范畴、方法、分析框架，使之成为经验观察中有用的工具，并指出使用这些概念工具的限度，当是研究中国国家建构问题的重要内容。

因为9·11事件的发生，福山在新书中不再宣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为历史的终点，而重新认识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性。相比较而言，《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直接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福山在《国家建构》中开篇就指出，在当今世界的某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孱弱、无能乃至无政府状态，已成为导致包括贫穷、艾滋病、人口贩卖和恐怖主义等世界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冷战结束后，遍布世界各地的长期孱弱、积弊难返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无法发展自身经济，无法保障自身国家的安全，甚至还成为恐怖分子藏身之所，进而威胁国际秩序。冷战后的重大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其他国际危机，从索马里、海地、科索沃、刚果、东帝汶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几乎都是国家治理失败的记录。郑永年教授则小心地把中国与上述发展中国家区分出来。他说：“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详细考察了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之后，他展开了一系列极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如何兼容的？中国领导人如何付出巨大努力去确立一种与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如何重构官僚体制？中国如何通过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国家？中国领导人如何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考虑来自社会的声音，不同社会力量又如何以不同方式参与国家建构过程？全球化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怎样的挑战？等等。这部著作成书于党的十六大之后，如今已是十七大在即。这些问题仍然还是当代中国鲜活的真实问题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正在路上。关于当代中国的全球化话语，只有包括了这些问题的讨论，才是完整的。

阅读这部著作，我深切感受到郑永年教授将拳拳的赤子之心融于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中。在以往的讨论中，很多学者都曾经指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受到

了全球化的极大影响,但是很少有人说明这些影响是什么,会以何种方式出现。这部著作对这些影响进行了细致分析。在以往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将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线性关系,即将全球化作为影响中国变革的一个常量。这部著作把两者处理为一种表征关系,即不只是全球化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中国的政治秩序变迁本身也属于全球化过程。我以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思维方式。此外,书中提出的诸多判断,如关于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契合点,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关于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与建设现代化经济国家的关系,关于党的自身变革与法治的国家治理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即使是对着墨较少的公民社会发展与国家建构的关系,书中也有不少精辟论述。比如,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保守主义取向做出了判断,指出争辩中的新左派(与保守主义某种程度上重合)与新自由主义(80年代自由主义的复活)的“政治意义在于,两者分别获得了来自社会、经济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派代表了新兴富裕阶级的利益,而新左派则代表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但事实上,新自由派和新左派都不愿把自己与任何社会力量完全结合。然而,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迅速推动着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相应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联想到今年夏天因《读书》杂志更换主编而引发的广泛争论,书中的很多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解释的有效性。

出于对这部著作及其论题的激赏,我在把它推荐给朋友、学生阅读之余,萌生了翻译它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王利波编辑的大力支持,她将它列入正在精心打造的“政治与社会”译丛。我邀请了博士研究生何子英同学与我合作。子英君高度认同这一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不辞辛苦,常常提前完成他所承担的分工任务。而我由于杂事繁多,进展较慢。今年夏天,我客居美国凤凰城。凤凰城酷热无比,我每天蜗居于斗室之中,全心全意,终于把全书译校完毕。基于不同语言、文化等表达上的差异,我对原著中的一些段落、词句作了改动,书中的一些观点、判断,亦有可商之处,相信读者诸君能够予以辨识。

在完成译事之际,我要感谢王利波编辑对这一选题的慨然接纳,以及对我推迟交稿所表现的宽容。我要特别感谢原书作者郑永年教授,他在百忙之中多次回答了我们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今年5月,他应我的邀请出席了在浙江大学举行的“地方政府创新与公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并且发表了主题

演讲。不仅如此,他还在浙江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全校公开演讲,展示了政治学家的风采,受到了热烈欢迎。事实上,他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精彩专栏文章已经让许多中国读者认识了他。我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既能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郑永年教授,同时也能促成一种机缘,一种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缘。

郁建兴

2007年8月28日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英文版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管许多国家从资本、人才、科技知识和其他资源——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事业所需的资源——空前的全球流动中获益,但全球化也带来了大量不可预知的后果。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非常乐观,认为全球化预示了全球民主运动的肇端,它将给全球共同体带来更美好的前景和更大的繁荣。然而,1997年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动荡,引发了人们对这种乐观信念的修正。由资本急剧而大量的流动所引发的后果笼罩着全世界,同时全世界还面临着另一种灾祸——全球恐怖主义。在美国发生的9·11袭击事件是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在东南亚开始肆虐的预兆。就本质而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就像物理学揭示的那样,全球化过程中的每一个行动或新发展都有着它自身的反作用或后果。

本书试图考察在亚洲背景下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许多年来,亚洲国家成为学术探讨的焦点。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促使我反思全球化及其对亚洲社会中的民族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在向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动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恐怖主义在许多亚洲国家的扩散。我相信,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化时代被整合成世界共同体的一部分,那么民族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好的结果,同时又使其消极后果最小化。民族国家该怎样去实现这个目标?亚洲各国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全球化。本书讨论的是全球化与中国的问题。

除了共产主义遗产,中国在应对全球化时并没有与其他民族国家有特别的不同。世界已经见证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且反全球化成为这种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担心全球化将削弱民族国家

政府管理国内事务的权力,并且担心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上失去其作为独特民族国家的身份。事实上,在中国之外,许多学者和评论员都质疑中国能否在全球化中生存。一些人认为,中国正在经受严重的治理危机,另一些人甚至预警它已经接近崩溃。

我们需要对全球化的影响做更具体的考察。当学者们关注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时,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影响上。虽然许多学者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极大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并不打算详细说明这些影响是什么,会以何种方式出现。本书试图考察中国是如何调整自身以应对全球化的。

在其他方面,全球化同样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中国的领导者把全球化视为重建中国国家的独特机遇。改革开放以来,领导人竭尽全力地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国领导人是怎样积极地把国家推向全球化的呢?我发现在中国领导人中盛行着一种独特的心态。民族主义指向建立一个强大而富裕的中国,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也承认这样一种目标只能通过把国家整合进全球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在后毛泽东时代,这种心态深深根植于中国的领导人当中。尽管上层领导人之间常常发生痛苦的政治斗争,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对全球化深刻的意识形态认同,使领导人竭力把资本主义合法化为一种建设一个繁荣而强大国家的手段。领导人也重建了官僚体制、经济制度和其他主要的国家制度。制度重建已经使中国能够应对全球化。当人们过早地认为中国将在全球共同体的巨大整合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时,我们必须理性地回答,中国在全球化中获益匪浅的同时,又是如何减轻其负面作用的。

通过具体考察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本书试图实现三个主要目标:评估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严重程度;考察中国应对这些问题的能力;指出全球化的未来挑战。首先,我发现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产生的更多的是机遇而非危机。全球化当然给中国制造了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中的很大部分是过渡性的。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自身的机遇。那种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中国崩溃的观点,并没有让人信服的根据。我的第二个发现是,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共产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身的转型。第三,我发现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中国的国家而言的。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需要法治基础的国家治理。全球化促使中国不断地使自身理性化和制度化,并且在许多方面,国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也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主入党,但是党如何让自己遵从法治,以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受益于许多人。首先要感谢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的同事们。王赓武所长不断为我提供强大的知识和精神支持。他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使我能够超越对全球化的纯粹经济计算,而辨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长期影响。黄朝翰教授是研究主任兼经济学家,我分享了他关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制度影响的观点。其他许多同事也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支持着我。当我发表关于这个方案的最初计划和思想时,他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我还要特别感谢刘志强、何包钢、蓝平儿、邹克渊、赖洪义和郎友兴。

多年来,东亚所邀请了许多海外学者来访问或参加会议。这些学者频繁的访问为本所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而我从这些交流中获益匪浅。我也因此能够就这个研究项目和世界不同地方的学者们讨论许多问题。在他们之中,我要感谢 Peter Katzenstein、Andrew Walder、Lynn White、Gilbert Rozman、Kjeld Eric Brodsgaard、吴国光、裴敏欣、孔庆江、Ignatius Wibowo、王红缨、赵建明、陈维星、萧功秦、郑世平和钟扬。在过去的两年中,我还受益于几次讨论国家建构的专题研讨会,并且要感谢王绍光、朱云汉、胡鞍钢、周建明、崔之元、史天健、汪晖、王希和曹锦清。Lye Liang Fook、Sarah Chan 和 Wong Chee Kong 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帮助。东亚所图书馆的许多图书管理员为我提供了研究所需的资料信息。

我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Marigold Acland、Amanda Pinches 以及 Carla Taines,他们为我提供了有效的编辑支持和指导。我要特别感谢 Acland 为书稿最初的评论到最后的出版所做的工作。

第七章的早期版本曾经以郑永年“中国的国家重建、大众抗议和集体行动”(“State Rebuilding, Popular Protest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hina”)为名,发表于《日本政治科学杂志》(*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2年第3期。此处重印已得到授权。

目 录

| | |
|------|---|
| 图表目录 | 5 |
| 译者序 | 1 |
| 英文版序 | 5 |

第一章 全球化：国家衰弱还是国家重建？

| | |
|---------|----|
| 中国的全球化 | 2 |
| 信息社会的兴起 | 7 |
| 中国国家的弱化 | 11 |
| 全球化与国家 | 14 |
| 本书论题 | 19 |
| 本书结构 | 20 |

第二章 国家、领导集体与全球化

| | |
|-------------|----|
| 学术背景：国家与全球化 | 23 |
| 全球化与国家的重塑 | 26 |
|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 33 |

第三章 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有选择的输入

| | |
|----------------|----|
| 作为一种心态的全球主义 | 42 |
| 作为有选择的输入的全球主义 | 44 |
| 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历史遗产 | 44 |
| 改革、合法性与有选择的输入 | 55 |
| 民族主义、有选择的输入与创新 | 60 |

第四章 权力、利益与资本主义的正当性： 建构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 | |
|-------------------|----|
| 对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热望 | 65 |
| 经济发展与政治利益 | 68 |
|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 | 71 |
| 政治秩序受到怎样的影响 | 75 |
| 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的反对 | 79 |
| 建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 83 |
| 结论 | 86 |

第五章 官僚机构改革与适应市场

| | |
|-------------------------|-----|
| 重组官僚机构的动力 | 89 |
| 官僚机构改革:一个回顾 | 90 |
| 朱镕基领导下市场导向的机构建设 | 98 |
| 小型国务院(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的发展 | 104 |
| 结论 | 108 |

第六章 建立一个现代经济国家:税收、 金融与企业制度

| | |
|-------------|-----|
| 税收改革与税制 | 110 |
| 金融自由与集权 | 119 |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128 |
| 经济国家主义与国家建构 | 133 |

第七章 国家重建、大众抗议与集体行动

| | |
|--------------|-----|
| 国家建构与社会运动 | 137 |
| 中国的国家重建及其不满者 | 139 |

| | |
|--------------------------------|------------|
| 社会抗议的兴起:农民与工人 | 147 |
| 结论 | 160 |
| 第八章 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 |
| 1989年后知识分子话语的兴起 | 162 |
| 新自由派的话语 | 166 |
| 新左派的话语 | 174 |
| 结论 | 184 |
| 第九章 全球化与走向法治的国家治理? | |
| 法治抑或法制 | 189 |
| 党与法治 | 193 |
| 党与治理危机 | 195 |
| 回归传统? | 198 |
| 结论 | 200 |
| 参考文献 | 202 |
| 索引 | 223 |

图表目录

图示

| | | |
|-----|-----------------------------|----|
| 1.1 | 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88—2000 | 5 |
| 1.2 | 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1992—2000 | 6 |
| 1.3 | 出口、进口与贸易平衡,1990—2000 | 7 |
| 5.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机构改革走势图,1980—1998 | 99 |

表格

| | | |
|-----|--------------------------|----|
| 1.1 | 中国的经济增长 | 4 |
| 1.2 | 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量,1978—2000 | 8 |
| 1.3 | 中国市内电话装机容量,1985—2000 | 9 |
| 1.4 | 普及率与密度,1985—2000 | 10 |
| 1.5 | 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1988—2000 | 11 |
| 1.6 | 中国网络用户数量,1995—2000 | 11 |
| 1.7 | 中国的走私形势,1979—1998 | 13 |
| 1.8 | 1998年海关截获的主要走私物品 | 14 |
| 4.1 | 中国的工业总产量,1980—1998 | 71 |
| 4.2 | 中国私有部门的发展,1989—1997 | 72 |
| 4.3 | 私营企业与个体企业的税收贡献,1986—1998 | 74 |
| 4.4 |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背景(1) | 75 |
| 4.5 |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背景(2) | 76 |
| 4.6 | 影响私营企业的关键政治因素 | 78 |
| 4.7 | 对私营企业影响最大的社会问题 | 78 |
| 4.8 | 私营部门在政治组织中的代表 | 79 |
| 4.9 | 私营企业主对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价 | 79 |
| 5.1 | 1982年的国务院各部委 | 91 |
| 5.2 | 1988年的国务院各部委 | 95 |
| 5.3 | 1993年的国务院各部委 | 97 |

6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 | | |
|-----|-------------------------------|-----|
| 5.4 | 1998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 101 |
| 5.5 | 1992 年经济贸易办公室的成员 | 105 |
| 5.6 | 1993 年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106 |
| 5.7 | 1998 年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108 |
| 6.1 | 中央政府与各省间财政收支比例安排的变化,1981—1990 | 117 |
| 6.2 | 1991 年的省际间收支差别 | 117 |
| 6.3 | 1994 年分税制下的税收基础 | 119 |
| 6.4 | 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的税收与支出 | 120 |
| 6.5 | 国有企业的利润与税款,1978—1994 | 129 |
| 7.1 |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受益者与受损者的认知 | 143 |
| 7.2 |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状况比较 | 144 |
| 7.3 | 中国城市不断扩大的不平等,1990—1998 | 145 |
| 7.4 | 20 世纪 90 年代领导干部腐败的加重 | 147 |
| 7.5 | 省市预算收入的比重 | 152 |
| 7.6 | 1998 年安徽省乡镇与农村的平均债务 | 155 |
| 7.7 | 劳动纠纷事件 | 157 |
| 7.8 | 国有企业的亏损 | 158 |

第一章 全球化：国家衰弱还是国家重建？

1

全球化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去把握它们，中国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在过去的20多年中急剧地全球化了。当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中国的大门时，没人想到中国会迈着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步伐与世界其他地区融为一体。这个国家经历了“从自力更生和怀疑的政策向开放和接轨的政策”的转变。^①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主要的世界和区域性组织的成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共同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个正在急剧全球化的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促使学者、政策顾问和决策者之类的人们密切关注中国的全球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②

中国迅猛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驱动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非法的”，只是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才被合法化。全球化给

^①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a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v.

^② Zalmay M. 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9);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 S. - 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1997);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 Stuart Harris and Gary Klintworth (eds.), *China as a Great Power, Myth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and Michael D. Swaine,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各方面都带来了突变。然而,中国国家看起来仍然保留着传统列宁主义的形式。就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方面而言,这产生了许多问题,如:资本主义是如何推动全球化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资本主义这种使国家全球化的方式合法化?中国国家是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中国国家能否容纳全球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经济全球化将给中国带来政治民主吗?

本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考察全球化对中国国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国家对全球化的回应。我感兴趣的是探索全球化如何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国家变革,亦即重塑它们的国家体系的机遇。

2 全球化削弱了中国国家在一些领域的权力,国家时而有意识、时而无意识地回应着其权力的衰弱。中国国家并不仅仅扮演消防队的角色,只是被动地回应着经济变革和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相反,国家主动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重构国家体系。这些有意识的行动不仅使得中国国家现代化,而且也增强了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权力。

本导论旨在为读者提供理解后面章节的一些背景。它首先考察了中国全球化的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且表明全球化如何在许多关键领域挑战着中国国家。随后,依据大量关于全球化的文献,我讨论了有关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的一些主要观点;最后,是对后面章节的概述。

中国的全球化

从经济上说,中国的全球化是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改革”和“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逐渐地,国际接轨或全球化成了推动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种重要力量。^①在改革派领导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合法化后,全球化趋势变得不可扭转。全球化不仅产生了其自身的动力^②;更重要的是,改革派领导人倾向于高度依赖全球化来克服国内改革的困难。^③

^① 关于中国不断与世界发生相互作用对国内经济改革产生的影响,参见 Thomas G. 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关于中国的国内利益如何追逐全球化,参见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中国与美国签订的 WTO 协议尤其说明了这一点,参见 Harry Hongyi Lai, “Behind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 2 (2001), pp. 237—255。

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始于农业改革。改革直接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巨大增长,农民收入急速提高。农业生产的增长,为非农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农业盈余。反过来,这导致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兴盛,而它们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①

农业部门一完成初步改革,领导人就转向城市工业部门改革。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工业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一项关于对外贸易制度的修订结束了国家贸易公司对进出口商业事务的垄断,数千家中国公司被允许进行国际贸易。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部分沿海城市的开放,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后者为针对外资企业的许多优惠政策所吸引。^②

1989年事件导致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反响。中央领导层围绕改革方向展开争论,党内的保守派尤其是意识形态家们占据了优势,公开质疑经济改革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然而,通过指出国家从全球化最初阶段中获得的收益,邓小平仍然得以使改革过程再次合法化。邓小平通过一次高姿态的南巡,重新获得了新的改革的主动权。南方,包括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在经济改革方面已经远远领先于北方,并且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南方繁荣的经济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1989年之后的严厉政策,此时,南方更倾向于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以便实现高经济增长。

邓小平南巡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因为它结束了关于中国发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长期意识形态争论。^③除了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改革贸易体制这些重大进步外,在邓小平南巡之前,全球化过程仍然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管理。除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之外,进口还服从于计划和特权的

① 关于乡镇企业的起源与发展,参见 William A. Byrd and Lin Qingsong 编,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tin L. Weizman and Chenggang Xu, *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Lond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rogram, 1992); Christopher Findlay, Andrew Watson, and Harry X. Wu (eds.), *R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94); John Wong, Rong Ma and Mu Yang (eds.), *China's Rural Entrepreneurs: Ten Case Studi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Chen Hongyi, *The Institutional of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Market Liberalization, Contractual Form Innovation and Privatization* (Aldershot: Ashgate, 2000)。

② George T. Cr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monk: M. E. Sharpe, 1990)。

③ 关于邓小平南巡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参见黄朝翰和郑永年编,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1)。

表 1.1 中国的经济增长

| | 1978—1999 | 1978—1991 | 1991—1999 | 1991—1996 |
|----------------------------|------------|------------|-----------|-----------|
| GDP 增长 (%) | 9.6 | 9.0 | 10.5 | 12.0 |
| 固定资产投资 (%) | 20.3 * | 17.9 * | 23.7 | 32.6 |
|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 (US\$ billion) | 306 * * | 23.3 * * | 28.7 | 156 |
| 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 | 30.0 * * * | 28.2 * * * | 32.3 | 57.0 |
| 出口总额 (US\$ billion) | 1625 | 466 | 1231 | 669 |
| 出口增长 (%) | 15.5 | 16.6 | 13.3 | 16.0 |

* 起始年是 1980 年。 * * 起始年是 1979 年。 * * * 起始年是 1983 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1999 年的数据来自新华社，2000 年 3 月 6 日。

控制，并且必须由专门的国家贸易公司掌控。出口也受到严格的管制。更严重的是外汇体制的僵硬，这扩大了官方汇率与决定于“交换中心”的平行汇率之间的鸿沟。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核心是，在由局部改革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导向的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学习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概念成为 1992 年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从那时起，资本主义作为国家全球化和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方式，开始合法化。

邓小平的南巡引发了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和中国全球化的加速。如表 1.1 所示，在 1991—1999 年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达到 10.5%，而南巡讲话之前的 1978—1991 年间年均增长仅为 9%。1978 年后，中国的大部分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推动的，在 1978—1999 年之间投资额年均稳定增长 20.3%。但是，南巡之后投资增长得更快：在 1991—1999 年之间年均增长了 23.7%，而在 1978—1991 年之间年均只有 17.9%。

高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80% 锐减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26.5%。^① 依据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1999 年的研究报告，商品价格中的 85%、劳动力市场中的 65%、农业中的 66%、工业中的 50% 和对外贸易中的 54% 由市场调节。^② 另一份国家工商管理局的报告则显示，到 1999

① *China Economic News* (香港), no. 39, (October 11, 1999, p. 1.

② *China Economic News* (香港), no. 33, August 30, 1999, pp. 2—3.

年中期，私营企业的数量增加到 128 万家，雇佣了 1784 万名工人，拥有注册资金 8177 亿元人民币。^①

南巡最让人信服的经济作用是，1992 年以后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爆炸式增长。中国成为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适合外商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从 1988 年到 2000 年，实际的或被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以 23% 的年平均率增长，总额达到 3390 亿美元（参见图 1.1）。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显著的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资企业几乎占中国总出口额的一半。如图 1.2 表明，2000 年外资企业占中国总出口额的 48%，而 1992 年只占 20%。^②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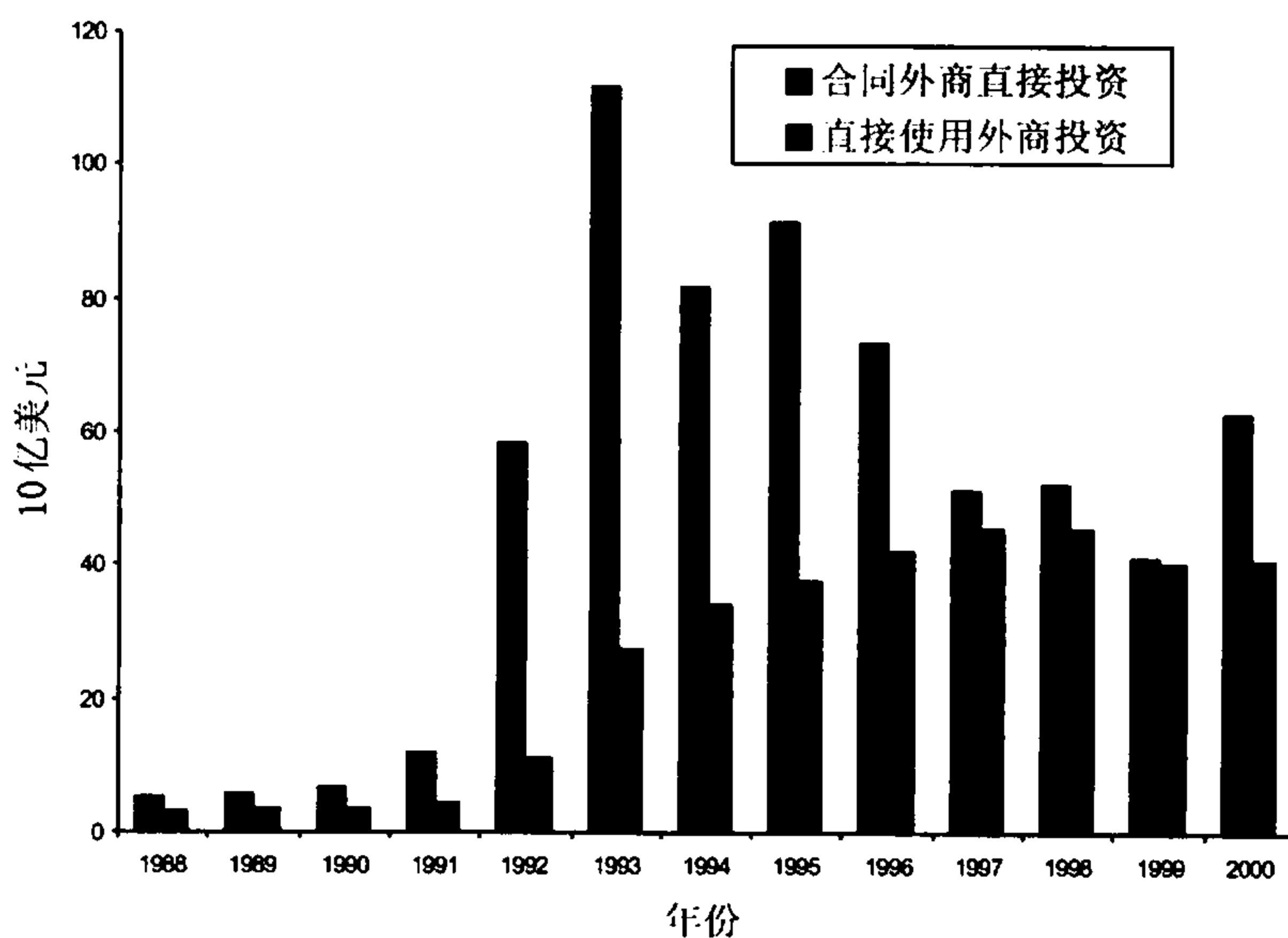


图 1.1 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88—2000

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

① *China Economic News* (香港), no. 38, October 4, 1999, p. 6.

② John Wong and Sarah Chan, "China's Rapidly Changing Export Structure",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85,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pril 9, 2001, p.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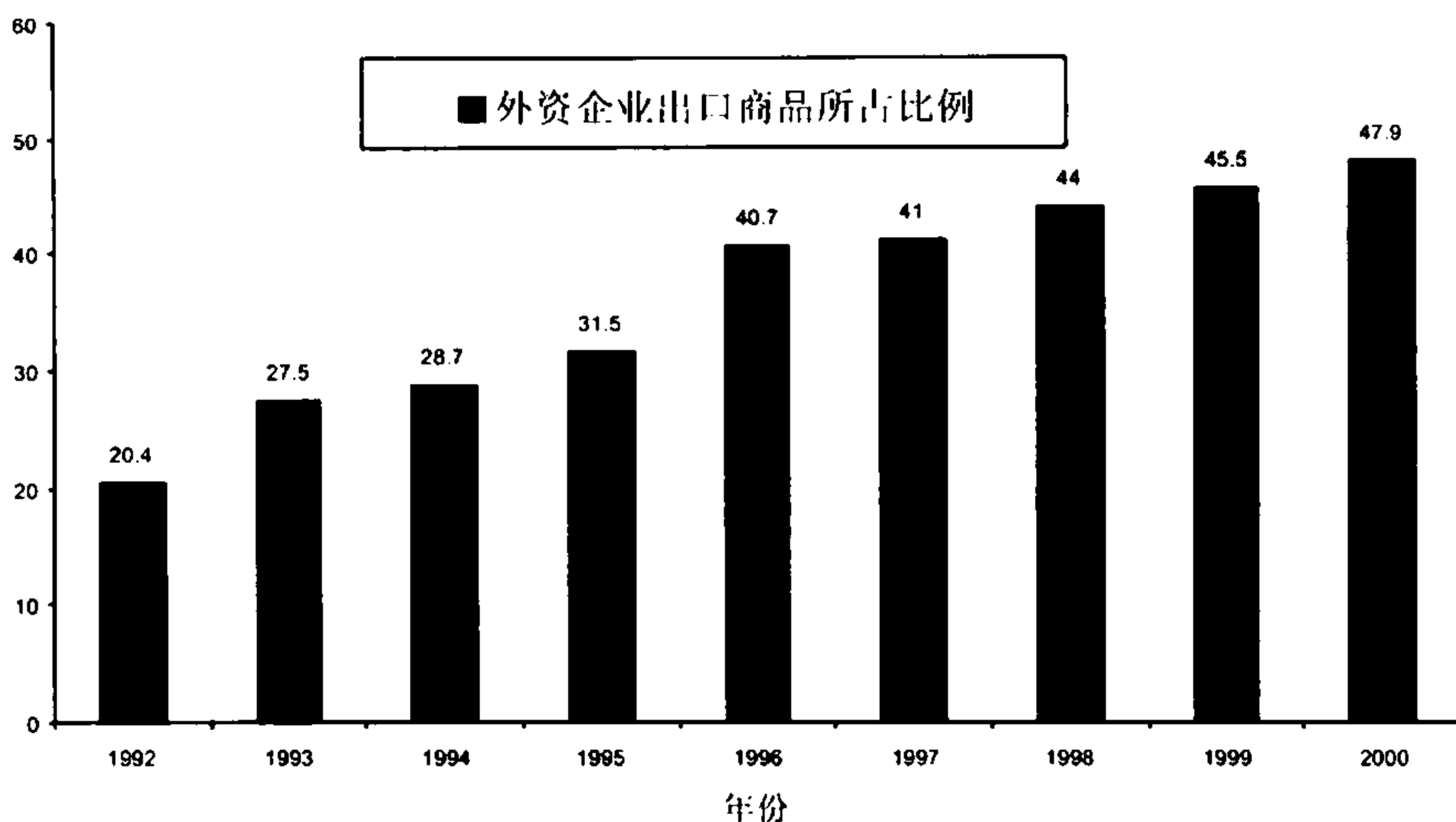


图 1.2 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的贡献, 1992—2000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版以及《中国海关年鉴》(每月进出口), 2000年12月。

6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大国。中国的出口以每年 17% 的比率增长, 从 1979 年的 137 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2492 亿美元。作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结果, 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出口都陷入负增长的境地。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停滞不前, 相比于 1997 年的 21%, 1998 年只增长了 0.5%。但是, 中国出口增长在 1999 年快速反弹了 6 个百分点, 随后在 2000 年达到了让人吃惊的两位数增长率, 为 28% (参见图 1.3)。2001 年初, 中国成为世界第九大出口国。^①

随着外贸的急速增长, 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世界更加开放。1990 年, 中国与世界的商品贸易结算开始走向盈余, 并在 1998 年实现顺差超过 430 亿美元。1993 年以后的 6 年中, 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中国吸引了所有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左右。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1999 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了 1500 亿美元。^②

^① John Wong and Sarah Chan, "China's Rapidly Changing Export Structure",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85,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pril 9, 2001, p. 1.

^② Lu Ding,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Xiaoping's 1992 *Nanrun*", 载于黄朝翰和郑永年编, *The Nanr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pp. 5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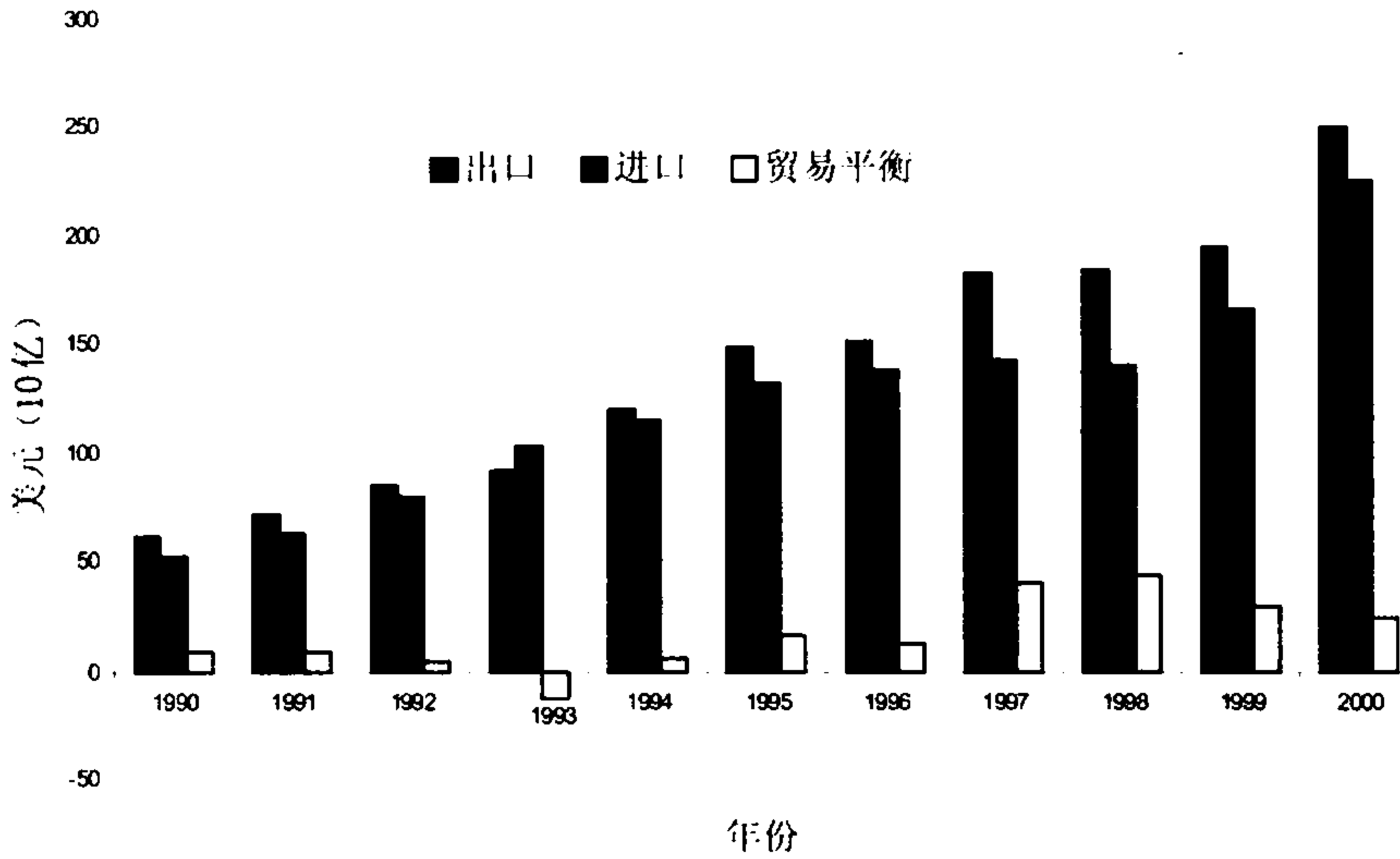


图 1.3 出口、进口与贸易平衡, 1990—2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9 年版；《中国海关统计》（月进出口），2000 年 12 月。

信息社会的兴起

7

中国的全球化不仅为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所推动，而且也为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所推动。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就已开始着力构建一个信息社会，以刺激经济增长。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是令人吃惊的。电话装机容量在 1997 年达到 1 亿门，而 1994 年只有 5000 万门。固定电话的用户数量在 1992 年达到 1000 万，1996 年冲破 5000 万，1999 年达到 1 亿——七年中增长了 10 倍（见表 1.2）。

截至 2000 年，就网络能力和用户数量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电信市场，建立了 1.7 亿条电信线路，拥有 1.44 亿固定电话用户（见表 1.3）。电信渗透率（每 100 个人中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总数）达到 18%，同时电信密度（每 100 个居民主要电话线的数目）达到 12%（见表 1.4）。

表 1.2 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量, 1978—2000

| 年份 | 固定电话用户 | |
|------|---------------|-------|
| | 固定电话用户的数目(百万) | 变化(%) |
| 1978 | 1.925 | |
| 1979 | 2.033 | 5.61 |
| 1980 | 2.141 | 5.31 |
| 1981 | 2.221 | 3.74 |
| 1982 | 2.343 | 5.49 |
| 1983 | 2.508 | 7.04 |
| 1984 | 2.775 | 10.65 |
| 1985 | 3.120 | 12.43 |
| 1986 | 3.504 | 12.31 |
| 1987 | 3.907 | 11.50 |
| 1988 | 4.727 | 20.99 |
| 1989 | 5.680 | 20.16 |
| 1990 | 6.850 | 20.60 |
| 1991 | 8.451 | 23.37 |
| 1992 | 11.469 | 35.71 |
| 1993 | 17.332 | 51.12 |
| 1994 | 27.295 | 57.48 |
| 1995 | 40.706 | 49.13 |
| 1996 | 54.947 | 34.99 |
| 1997 | 70.310 | 27.96 |
| 1998 | 87.421 | 24.34 |
| 1999 | 108.716 | 24.36 |
| 2000 | 144.000 | 32.46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各卷。2000年的数据参看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website, <http://www.mii.gov.cn/>。

移动电话用户数的扩大也推动了中国的电信增长。移动电话用户的数量在1994年仅有100万,在1996年达到500万,在1998年是2000万,到2000年突破了8000万(见表1.5),6年中增长了80倍。在2000年末,中国拥有比日本还多的移动电话用户,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移动电话市场。大约有30%的中国用户借助无线应用协议(WAP)利用移动电话上网。^① 这

^① “Don’t Stifle China’s IT Revolut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8, 2000; 以及 “China Succeeds Japan As Largest Cellphone Market in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 News Service*, August 22, 2000。另外参见 *China Daily*, August 10, 2000。

表 1.3 中国市内电话装机容量,1985—2000

| 年份 | 市内电话装机容量 | |
|------|----------|-------|
| | 线路(百万) | 变化(%) |
| 1985 | 6.134 | |
| 1986 | 6.724 | 9.62 |
| 1987 | 7.739 | 15.10 |
| 1988 | 8.872 | 14.64 |
| 1989 | 10.347 | 16.63 |
| 1990 | 12.318 | 19.05 |
| 1991 | 14.922 | 21.14 |
| 1992 | 19.151 | 28.34 |
| 1993 | 30.408 | 58.78 |
| 1994 | 49.262 | 62.00 |
| 1995 | 72.036 | 46.23 |
| 1996 | 92.912 | 28.98 |
| 1997 | 112.692 | 21.29 |
| 1998 | 138.237 | 22.67 |
| 1999 | 153.461 | 11.01 |
| 2000 | 179.000 | 16.64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各卷。2000年的数据参看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website, <http://www.mii.gov.cn/>。

种增长使信号编号容量从 5000 万扩大到 5 亿左右，否则难以满足这个国家在 2010 年的需求。^①

电信产业的迅猛发展为网络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表 1.6 表明了中国网络部门的快速扩张，电信服务商如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提供了像无线应用协议(WAP)这样的网络服务。

网络社会和信息技术(IT)的兴起也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出现。在 21 世纪初，中国已经跟上了信息技术革命无情的全球化进程。自中国政府开始改革和自由化以来，中国的 IT 产业就以平均每年 30% 左右的速度急剧增长。^② 1999 年一年，IT 总销售额提高了 16.2 个百分点，达到 1720 亿元人民币(208

^① *China Daily*, July 22, 1999.

^② Y. J. Mo,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s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此文发表于 2000 年 6 月 28—29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关于"China's WTO Acc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Northeast Asia"的会议。

表 1.4 普及率与密度,1985—2000

| 年份 | 普及率 | 密度 |
|------|-------|-------|
| 1985 | 0.60 | |
| 1986 | 0.67 | — |
| 1987 | 0.75 | — |
| 1988 | 0.86 | — |
| 1989 | 0.98 | — |
| 1990 | 1.11 | — |
| 1991 | 1.29 | — |
| 1992 | 1.61 | — |
| 1993 | 2.20 | — |
| 1994 | 3.20 | — |
| 1995 | 4.66 | 3.36 |
| 1996 | 6.33 | 4.49 |
| 1997 | 8.11 | 5.68 |
| 1998 | 10.53 | 7.00 |
| 1999 | 13.00 | 8.64 |
| 2000 | 18.00 | 12.00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各卷。2000年的普及率按中国总人口的每一百人使用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来计算。关于2000年的密度,参看“China Telecom IPO faces crucial te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April 2001)。

8 亿美元)。^① 在2000年中期,登记注册的网络用户数量达到1690万人,其中有14%的用户开始试用电子商务。^②

中国IT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为新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1999年,在中国市场售出的个人电脑总数达到490万台。登记在册的国内电脑硬件销售量比1998年增长了13%,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软件和信息产品销售总额总数达到415亿元,增长了27.5%。同时,电信产品销售总额在1999年达到1000亿元;同年,电信业总营业额增长了24%,突破2400亿元。^③

^① “China IT Industry Sales Reached US\$ 21 Billion in 1999”, *Chinaonline*, February 1, 2000, <http://www.Chinaonline.com>.

^② “War on Net Hots U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2, 2000; and “E-Commerce in China: The CCIDnet Survey”, *CCIDnet.com*, April 27, 2000, <http://www.ccidnet.com>.

^③ “China’s Information Industry Booming in 1999”, *Chinaonline*, February 1, 2000, <http://www.chinaonline.com>.

表 1.5 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1988—2000

11

| 年份 | 移动电话用户 | |
|------|----------|--------|
| | 用户数目(百万) | 变化(%) |
| 1988 | 0.0032 | |
| 1989 | 0.0098 | 206.25 |
| 1990 | 0.0183 | 86.73 |
| 1991 | 0.0475 | 159.56 |
| 1992 | 0.177 | 272.63 |
| 1993 | 0.639 | 261.01 |
| 1994 | 1.568 | 145.38 |
| 1995 | 3.629 | 131.44 |
| 1996 | 6.853 | 88.84 |
| 1997 | 13.233 | 93.10 |
| 1998 | 23.863 | 80.33 |
| 1999 | 43.300 | 81.45 |
| 2000 | 85.260 | 96.91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各卷。2000年的数据，参看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website, <http://www.mii.gov.cn/>。

表 1.6 中国网络用户数量,1995—2000

| 年份 | 网络用户 | |
|------|----------|--------|
| | 用户数目(百万) | 变化(%) |
| 1995 | 0.0072 | |
| 1996 | 0.0357 | 394.27 |
| 1997 | 0.1602 | 349.22 |
| 1998 | 0.6768 | 322.58 |
| 1999 | 3.0145 | 345.44 |
| 2000 | 9.1300 | 202.87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各卷。2000年的数据，参看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website, <http://www.mii.gov.cn/>。

中国国家的弱化

9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但中国国家也经受着诸多曾经预料到的和未曾预料到的社会、政治后果。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部门和非国有

部门,都面临着国内工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巨大压力。在众多问题之中,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已经造成国有企业大量工人下岗,这还不包括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中国努力应对 WTO 的挑战时,失业大军也正在增长。急剧的经济变革和全球化导致了王绍光所谓的“分配冲突”。^① 各种社会团体和各地区,从全球化中获得的益处是极不平衡的。分配冲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们有助于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参见第七章)。

- 10 经济转型也削弱了国家的伦理基础,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减弱。当中国在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时,它也不经意地引起了许多严重问题。政府与商业的紧密联系,导致党政官员腐败行为蔓延。^② 官员腐败的许多形式,都与全球化密切关联。走私就是一例。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走私已经非常普遍,超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参见表 1.7)。走私破坏了中国的经济,也减少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走私物品包括药物、伪劣产品、工业原材料(如水泥、钢铁、石油等)、消费品和日用品等(参见表 1.8)。
- 12 大量的走私货物打击了已付关税商品的价格。走私使消费者受益了,却减少了政府税收,损害了通常由关税来保护的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走私倾向于团体化,企业直接卷入走私或者中介活动,或者伪造证书。走私者也是组织化的专业人员。使用方法包括假造关税证明、伪造批准证书或封条。即便走私者被抓获,他们也能够获得可靠的证明,或者恐吓、阻碍调查人员。^③

走私的严重性最终导致中央政府对沿海各省的走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严厉打击,如 1998 年在广东和福建。^④ 随后,中国总理朱镕基甚至警告说,反走私是一个生死问题。朱镕基指出:

- 13 如果走私不能制止,它不仅将对改革开放政策产生影响,而且会破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党。因此,反走私不仅是一项重要

① 王绍光,“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WTO Membe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25 (2000), pp. 373—405.

② 对中国腐败的评论,参见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③ *China Daily*, October 26, 1998.

④ 郑永年、邹克渊, *Toward More Effective Governance: China’s Politics in 1998*, London a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表 1.7 中国的走私形势,1979—1998

| | 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 | 查获的物品价值(亿元) | 每起走私案的平均价值(亿元) |
|------|-----------|-------------|----------------|
| 1979 | 13422 | 0.07 | 0.05 |
| 1980 | 36616 | 0.51 | 0.14 |
| 1981 | 34870 | 1.06 | 0.30 |
| 1982 | 32507 | 1.02 | 0.31 |
| 1983 | 33220 | 0.59 | 0.17 |
| 1984 | 27162 | 1.36 | 0.50 |
| 1985 | 23545 | 7.09 | 3.00 |
| 1986 | 18453 | 6.11 | 3.31 |
| 1987 | 13018 | 1.67 | 1.28 |
| 1988 | 10206 | 2.34 | 2.29 |
| 1989 | 11960 | 5.58 | 4.67 |
| 1990 | 11676 | 6.01 | 5.15 |
| 1991 | 13321 | 7.13 | 5.35 |
| 1992 | 9954 | 13.18 | 13.24 |
| 1993 | 6962 | 23.00 | 33.93 |
| 1994 | 6614 | 22.88 | 34.59 |
| 1995 | 5832 | 44.30 | 75.96 |
| 1996 | 6130 | 92.89 | 151.33 |
| 1997 | 7285 | 67.35 | 92.70 |
| 1998 | 8361 | 154.00 | 183.75 |

来源:《经济日报》,1999年1月26日。

的经济斗争,而且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斗争。^①

经济转型和全球化也导致了分权以及伴随而来的重大政治后果。分权意味着国家把权力归还给社会。新社会组织已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于整个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和省级的层面上,已经有16万个政府登记注册的民间社团,包括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各地的社会组织。^②民间社团的出现表明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重建。一个初生的自发的社会秩序,已经对既存政治秩序构成了重要的政治挑战。经济全球化和IT革命直接推进了中国

^① 《明报》,香港,1998年1月8日。

^② 陈冬东,《中国社会团体组织大全》,3卷,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表 1.8 1998 年海关截获的主要走私物品

| 走私物品 | 走私案件 | 案值(万元) | 查获物品数量 | 占总案值(%) |
|--------|------|---------|-----------|---------|
| 移动通信设备 | 28 | 394013 | 2497(台) | 37.4 |
| 化工原料 | 368 | 170954 | 914489(吨) | 16.23 |
| 食用油 | 41 | 96994 | 147842(吨) | 9.21 |
| 化纤 | 182 | 92153 | 737107(吨) | 8.75 |
| 计算机 | 11 | 70792 | 43163(台) | 6.72 |
| 成品油 | 151 | 53198 | 318029(吨) | 5.05 |
| 香烟 | 57 | 52416 | 23662(箱) | 4.98 |
| 汽车 | 169 | 45601 | 3887(辆) | 4.33 |
| 羊毛 | 32 | 38432 | 9272(吨) | 3.65 |
| 钢材 | 59 | 38248 | 165094(吨) | 3.63 |
| 总计 | 1098 | 1052801 | | 100.0 |

来源:《经济日报》,1999年1月26日。

14 的经济转型,也为新的社团活动形式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媒介。互联网成为公民讨论的论坛。中国具有丰富的网站、聊天室、非正式电子邮件的交换和编目,人们可以在网上就当代政治和社会事件展开公开讨论。公民如今可以表达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不管政府许可与否。换句话说,IT革命创造了新的政治参与工具。更重要的是,如后面将要讨论的,全球化和IT革命为社会运动,尤其是宗教运动提供了工具和资源(第七章)。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带来的挑战的清单也变得越来越长。总的来说,中国的全球化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已经释放了许多力量,而这些力量常常超出了国家的控制。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当我的研究围绕着这个问题来组织时,发现将它置于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家这个学术背景下来讨论是有益的。

全球化与国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急剧的全球化重新引起学者们对国家角色的学术关注。“国家的未来是什么?”已成为一个时令话题。^①关于全球化对国家的

^①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Daedalus*, 124: 2 (Spring 1995).

影响,学者们彼此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权力,甚至会导致国家消亡。

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是这种争论的主要来源。在这些学者当中,彼得·伊文斯(Peter Evans)所谓的“国家衰落的话语”,已经变得非常流行,^①尤其是在西欧的学者当中,民族国家的墓志铭已经获得了大多数的政治支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已经为全球化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证据。^②

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世界体系理论,把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张。资本主义没有边界,正如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注意到的那样。^③ 马克思预期欧洲经济将成为真正的全球体系,在很多方面它已经如此。^④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⑤ 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中,国家扮演着支撑性的角色。而许多当代学者则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销蚀。在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看来,资本可以到达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出于成本还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活动,无论是税收还是调节,都将受到不愿“吓跑全球经济”的限制。^⑥ 结果,“在全球经济当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变成不合自然规律的、甚至是无法忍受的交易单位”^⑦。马修·霍斯曼(Mathew Horsman)和安德罗·马歇尔(Andrew Marshall)甚至提出民族国家将终结,“在跨国经济中,因公司的自主运作,国家变得边缘化了”^⑧。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则更直接地指出,“国

①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1997), pp. 62–82.

② Michael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载于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编,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7.

③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④ Eric J. Hobsbawn,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5.

⑤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⑥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p. 75.

⑦ 同上, p. 5. 另参见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Water B. Wriston, *The Twilight of Sovereign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2.

⑧ Mathew Horsman and Andrew Marshall, *After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p. 235.

家权威向上、向侧面、向下泄漏”，并且在一些事件中“干脆消失”。^①

国家的销蚀，产生于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市场与国家的相互作用。通过生产、贸易、金融的跨国网络的建立，经济全球化造成了经济的“去国家化”。^②由于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外国投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急剧扩大，使得这种去国家化得以发生。^③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资本如今变得如此的具有流动性，因而市场将保障金融资产的拥有者在各地获得大致相等的、风险可控的实际回报。哪个国家如果提供了比较低的回报，就将经历资本的外流以及汇率的急剧贬值。实际上，如今已不可能回到由经济调控者控制汇兑的时代。^④金融和公司的全球化产生了另一负面影响，即政府对公司税收的减少，因为全球公司学会了如何避税。

通过跨国公司，国外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这给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强加了一些限制。“民族”企业的身份意义以及来自这种身份的忠诚正在消失。跨国公司对贸易流动的统治，已经改变了“出口”和“进口”的意义。资本的流动性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一起巧妙地改变了民族经济政策的性质。

贸易领域发生的大量变化，也正在对经济主权产生严重的影响。实质性的贸易分割，如今成为产业内贸易而非产业间贸易，这常常归功于跨国公司内部的专业化。在大部分的经济当中，“国家”出口与“外国”进口的纠结不再可能为贸易政策的目的而解开。除了切除民族身份意义的核心之外，通过新闻、娱乐和广告，贸易服务也可以铸造文化价值观和提供信息。当经济体系通过贸易和投资而变得越来越深地互相融入时，传统的、明晰的贸易壁垒消失了。

当发生在跨国层面上的私人交易日益创造出财富和权力时，国家变得难以维持作为全球层面上优越行为体的旧形象。^⑤当跨国经济活动对国内发展越来越重要时，国家必须放弃对这些全球行为体的控制权力。经济合作与发

① Susan Strange, "The Defective State", *Daedalus*,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124: 2 (Spring 1995), p. 56.

②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 p. 3.

③ Vicent Cable, "The Diminished Nation-State: A Study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 *Daedalus*,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124: 2 (Spring 1995), p. 23—53.

④ 同上, pp. 27—28.

⑤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1997), p. 65.

展组织(OECD)公共管理服务局(PUMA)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现在已很少有纯粹的“国内”问题。^①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国家与跨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正如斯特兰奇所指出的，也影响了国家与其他国内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威的不对称不断扩大。国家也许承受着某些权威的丧失，但那些丧失是对市场而言的，并不是对其他国家的丧失。进一步说，一些针对轻度政治敏感事务的权力，已从民族国家转移至各种各样的国际权威，既包括国家间机构，也包括私人的和商业的组织(向上和向侧面转移)。在许多国家，权威已经从中央权威“向下”转移至地方和地区权威。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结果，就是产生了这样一些政治权威的重要责任，它们是具有有限领土的国家体系所无法充分履行的。^②

16

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强调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本质，并由此强调全球化在世界政治中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按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说法，全球化产生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国家体系，在其中，跨国规制和组织获得了影响力。^③詹姆斯·罗西瑙(James Rosenau)认为，急剧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迫使政府和社会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国际与国内、外部与内部之间的明确区分已不复存在。^④ 尽管国家仍然可以宣称其对国家领土边界内发生的事务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权威，但国家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际治理机构不断扩张的权限，以及来自国际法的义务的约束。^⑤ 新自由主义者相信，伴随着急剧的经济全球化，一个超越所有民族国家之上的全球自由主义规制将确立起来。这个全球规制的基础是一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标准和共享的假设。虽然它发源于西方，体现的是盎格鲁-美利坚的意识形态规则，并且借助西方权力

① The OECD 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 *Globalization: Wh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overnment?* Paris: OECD, 1996.

② 同上。另参见 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0.

④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 p. 8.

来进行扩张,但一旦确立,它可以自己发挥功能。这主要是根源于经济全球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规制,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协调就会非常困难,因为自私的民族国家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经济灾难。

17 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在关税总协定和现在的世贸组织中所表明自由主义国际规制,对塑造民族国家在国内和国际领域两方面的角色而言,已经变得极端重要。这个规制中的大量被认可的正式游戏规则,每个国家都必须加以承认,否则就得冒成为经济遗弃者的危险。因为存在这样的规制,人们可以独立于民族国家主权而寻求经济利润。结果,正如伊文斯所指出,“试图改进地方经济状况的积极努力,将冒着被责难的风险,这些责难不仅来自于强有力的私人行为体,而且来自于全球领导权”,因此任何国家干预将变成“极具风险的主张”。^① 这种全球规制的功能发挥仍然依赖于民族国家,但是国家权威的行为必须与这种全球规制的规则 and 标准相符合。全球的意识形态共识,常常贴着“华盛顿共识”的标签,进一步加强了这样一种观念:单个国家作为经济要素的行为越少,世界就会变得越好。^②

民族国家权力的衰弱也可以通过考察全球化对国内政治尤其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来理解。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认为,全球化已经在全球市场与国内社会稳定之间制造出三种紧张关系的来源。^③ 首先,它降低了贸易和投资的壁垒,加深了团体间的不对称:一些可以跨越国际边界而另外一些则不可以,由此从根本上变革了雇佣关系。其次,全球化造成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关于国内标准及体现它们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当产品的生产科技变得标准化并散播于国际层面时,具有不同价值、标准、制度和集体偏爱的国家开始为类似的本国产品领先市场而相互竞争。最后,全球化给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服务制造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整个战后时期,社会保障是国家的核心功能之一,它有助于维持社会凝聚力和持续自由化所需的国内政治支持。所有这些趋势可能导致以民族国家名义进行统治的政府权威的丧失。国家不能以公民预期的方式保护他们,也不再能够依赖公民的忠诚。

^①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1997), p. 72.

^② “华盛顿共识”是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使用的术语,指经济改革的那些国家要接受的十项政策。参见 John Williamson 编,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③ 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权力对国内社会力量的控制。全球化给民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制造了困难，正如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权力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样。在权威主义国家，这种权力尤其脆弱。权威主义国家常常对国内经济事务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并由此控制从事这些经济事务的人民。但是，全球化创造了超越国家控制的经济部门。无疑，与这个部门相关联的人民也超越了国家的控制。而且，全球化也创造了国际公民社会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不受民族国家的边界的限制，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控制范围。^① 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国内和国际的）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民族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能变成“解决公共福利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手段，从而可能会使国家在政治上过时，正如全球市场使国家在经济上过时一样”^②。

18

本书论题

如同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国家将会消亡吗？本项研究揭示了中国国家的一种不同发展方向。经济转型和全球化无疑已经挑战了国家权力，然而，中国国家依然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在推动全球化和经济转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国家远非坐以待毙，它非常强有力地回应着全球化及其后果。虽然国家权力在某些传统领域遭到削弱，但在另外一些新领域却得到了增强或巩固。国家对全球化的这种反应导致了中国国家体系的急剧转型。

我的研究并不想对全球化与国家权力做一个“成本—收益”式分析。全球化在某些情形中可能削弱了国家权力，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中则可能是增强了国家权力，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回应全球化。我的研究只对“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国家转型”感兴趣。全球化为中国领导人重建国家体系创造了机会。我认为，中国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已经有意识地回应了全球化及其后果。随着改革措施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国家不仅可以在全球化中存活下来，而且可以

^① 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的考察，参见 John Boli and George M. Thomas 编，*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1997), pp. 78—79.

借助外部压力来推动自身的转型。全球化由此为国家变得更现代化创造了动力。

19 这里必须附加一个重要的说明。由于许多原因,我的研究更关注于中国国家而非中国共产党。首先,中国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尽管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学者们传统上把中国国家视为“党领导下的国家”(party-state),但国家与政党仍可以视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① 其次,如同后面将要看到的,尽管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影响,但中国国家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党的意识形态以容纳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全球化的)更多反应来自于中国国家。第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的是中国的国家改革,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把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改革导向了政治自由化阶段,直到发生1989年事件。由于1989年事件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再提出“党政分开”的问题。党的领导人江泽民认识到,作为政府最终的权力源泉,中国共产党应该成为政治稳定的最终保证者,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切失误的纠正者。^② 因此,所有被实施的措施实际上都是指向改革国家,而改革政党的重大措施并未实施过。

尽管如此,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全球化没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挑战。实际上,党在实现自身转型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党有关的那些问题将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予以考察。在最大程度上,聚焦于中国国家将使读者发现,当中国共产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因缺乏党的转型,中国国家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变得困难起来。

本书结构

本书由九章组成。在导论之后,第二章将提供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即国家中心的全球化研究方法。全球化被定义为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的过

^① 如郑世平,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对此的分析,参见郑永年,“Political Incrementalism: Political Lessons from China’s 20 Years of Reform”,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 6 (1999), pp. 1157—1177。

程,如国家建构观念。^①正是国家选择了一些西方产品,借以重建国家并使其变得更加现代化。作为国家的代表,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我将讨论与全球化、国家、领导人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三章集中考察了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推动中国领导人接受全球化和重建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承诺。显然,后毛泽东时代见证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看起来似乎是全球主义的反面。中国民族主义的许多方面,看起来似乎都是在诅咒全球化。这一章将讨论民族主义是如何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适应全球主义的,并且领导人是如何通过中国民族主义的渲染来为全球化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这种正当性辩护是重要的;没有它,全球化就会失去合法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也成为领导人“选择”西方国家产品时进行抉择的一个重大制约。

20

第四章描述了领导人如何付出巨大努力去确立一种与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政治秩序。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与毛泽东时代的旧政治秩序并不相容。当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壮大,并开始向政治领域渗透时,尽管有来自内部的反对意见,但领导人非常坚定地改变了旧的国家结构,以便容纳新的社会力量。

第五章考察了领导人如何重构中国的官僚体制,这不仅是为了适应市场,而且也是为了进一步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四次政府机构改革浪潮的比较,可以表明应该如何使官僚体制变得更加合理。我的重点是1998年朱镕基的改革,因为这次改革直接指向促进中国的市场发展。这次重构想让官僚体制适应市场,更重要的是,它增强了国家领导市场的权力。

第六章讨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经济国家的过程。当中国国家促进了市场发展时,它也试图建立一种能发挥市场功能的制度框架。我考察了三个案例,如税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企业制度改革。在众多的目标之中,建立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国家,是为了增强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能力。

第七章和第八章把焦点从国家转向社会。全球化不仅影响了中国国家,也影响了中国社会。虽然中国国家的自主性非常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可以随意地重建国家。相反,不同社会力量试图以不同方式参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领导人必须考虑社会的声音。

^① 受 Bertrand Badie 启发,我用“国家产品”来替代“国家建构观念”。参见 Badie,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第七章讨论了中国农民和城市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它表明了全球化和国家重建如何影响了农民和城市居民,而他们又是如何回应国家的。第八章考察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试图在国家建构上“说话”。全球化和社会经济转型,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不同阵营。在这些阵营中,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知识分子当中的两个主要流派。两个阵营的学者围绕着国家建构争夺话语上的支配地位。

- 21 在结论性的第九章,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化能够促使中国领导人去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吗?在中国语境下,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应该遵循国际规则 and 标准(与国际接轨)。换句话说,全球化是民族国家间制度、规则和标准的普世化过程。这一章表明,在中国国家努力建构一个基于法治的治理结构时,它还需要恰当处理国家与党的关系。

第二章 国家、领导集体与全球化

22

许多学者非常悲观地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一些人甚至预言民族国家行将消亡。然而,我们如果考察了中国国家如何回应全球化,那么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全球化会削弱还是增强国家权力,取决于国家如何回应全球化。

这一章首先给出关于国家与全球化关系的学术背景。国家在这里被当成一个独立的变量。我试图表明,就国家本身而言,它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并且是这个过程的主要推动力。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西方式的现代国家已经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在回顾了学术背景之后,本章将为本书的研究确立一个理论框架。

学术背景:国家与全球化

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都把国家权力的销蚀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但是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受到批评。在米歇尔·曼(Michael Mann)看来,由于他们低估了政治权力关系,所以极易受到批评。曼指出:“稍具历史意识,他们就夸大民族国家在过去有多么强大;稍具全球变化意识,他们就夸大民族国家在当前是多么衰弱;稍具多元意识,他们就低估国家间关系。”^①

^① Michael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载于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编,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9.

曼观察到,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变革,看来似乎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北半球最发达的民族国家,而成功的经济发展却壮大了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在北半球,军国主义和“设重防的地缘政治”的衰弱,已经销蚀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核心,而认同政治实际上也许壮大了民族国家。这些形态是极其多样化、矛盾性的,并且未来过于模糊,以至于不允许我们简单地认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体系是壮大还是削弱。^①

伊文斯也认为,全球化过程有助于我们察觉到国家权威的“蒸发”,但是情况却远比学者们感知到的更为复杂。国家并不简单地因越来越依赖于跨国贸易这个事实而销蚀。相反,初步考察一下那些取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在那里,高度的国家性正是它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竞争优势。东亚的事实尤其如此,在这些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正是国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伊文斯指出,

东亚的成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有效参与全球化经济,可以通过限制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来充分实现。东亚国家表明,更广泛的国家干预也许是成功地参与全球市场的最佳手段……东亚揭示了高度的国家性与获得全球经济中的成功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可能性。^②

更重要的是,国家不会容许其权力的衰弱。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机构,国家将为其生存而斗争。销蚀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件。伊文斯认为,

危险的不是国家将作为一种边缘制度而终结,而是构造国家角色的更残忍、更具压制性的方式将被作为避免公共机构崩溃的唯一方式来接受。对销蚀的全神贯注,削弱了对提高国家能力的可能办法的积极考虑,以至于不再能有效地满足它们面临的新需求。^③

文森特·凯伯(Vicent Cable)也指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衰弱,两者并

① Michael Mann,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② 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1997), p. 70.

③ 同上, p. 64.

不存在直接联系。^① 国内的决策与政治已经国际化了,而同时外交政策屈从于不断增长的国内压力。一方面,国家丧失了对区域和全球机构以及对市场的主权;另一方面,国家却也获得了新的控制领域,试图借此提升民族国家的竞争力。当科技变革从一个方向推动时,也许社会和政治的力量从另一个方向拉住了。

较具批判性的学者们还质疑了全球化本身。对他们而言,全球化是一个神话。^② 与世界帝国的时代相比,国际经济在其地理范围内已经变得更少全球意义。在琳达·韦斯(Linda Weiss)看来,只要现实地评估全球化,就不会得出全球化导致了民族国家权力衰弱的结论。^③ 韦斯认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府的自主和权力的影响,并不像许多评论者所说的那么严重。事实上,政府已经在使自身适应不断变动的贸易和投资形态,并且在一些案例中,像日本、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提高了国际化水平。

24

罗伯特·魏德(Robert Wade)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民族国家的消亡被夸大了。魏德认为,在大部分国家的生产中,国内消费占据了很高的比例。这些国家拥有与国民生产相对应的高水平的进出口,在进口和再出口上拥有大量的商品贸易。真正的国际公司只有少数几个,大量存在的是以一国为基础并且在其他国家具有生产和分配机构的公司。当政府决定吸引内部投资时,它们常常利用出口加工特区或经济特区。这些地区存在着不同水平的税收、调控和劳工权利。^④

对现实主义者来说,全球化并不会导致一个弱化国家中心的世界秩序。民族国家的政府并不是国际化的被动牺牲品,它们恰恰是国际化的主要创制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把国际化视为美国在“二战”后创设的多

① Vicent Cable, "The Diminished Nation-State: A Study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 *Daedalus*,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124: 2 (Spring 1995), p. 24.

② P. Hirst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③ Linda Weiss,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1998.

④ Robert Wade, "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Reports of the De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载于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编,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0-88.

边经济秩序的副产品,这种秩序为民族国家经济的自由化创造了推动力。^①当新自由主义者看到经济全球化及其相互依赖性导致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时,现实主义者则看到了相反的趋势。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经济活动经历了重大的区域化,世界经济逐步发展出三大金融贸易集团,它们是欧洲、亚太和北美。^②此外,国际化并未减轻南北的不平等。相反,随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边缘化的加剧,贸易和投资流入富裕的北半球,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被排斥更加强化了。^③

这样的不平等促成了原教旨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的发展,而非全球文明的出现,并且世界碎片化为文明集团与文化、种族群体。^④文化的同化以及全球文化的观念更显得只是一种神话。全球不平等的深化、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政治以及“文明的冲突”,都暴露出全球治理的虚幻本质。现实主义者由此拒绝这样一种流行的神话,即认为如今的全球治理渐渐侵蚀了国家政府或国家主权的权力。^⑤

25 全球化与国家的重塑

无疑,国家承受着来自于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机构,即便在急剧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也不可能消失。国家生存下来的关键在于它有能力创制一种角色,这种角色既要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力量,又要适应由认同政治所造成的内在张力。换句话说,重要的是考察国家为了适应全球化及其后果是如何实现自身转型的。在考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概述

^①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另见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 如 W. Ruijgrok and R. van Tulder,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5, 以及 R. Boyer and D. Drache 编, *States Against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③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F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9, p. 6.

^④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⑤ Stephen Krasn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t Statehood”, 载于 R. H. Jackson and A. James 编,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1-321.

一下现代(西方)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是如何转型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现代(西方)国家

当我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常常指的是发源于西方、随后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不提及现代西方国家,就几乎不可能谈论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正如法国学者贝特朗·贝蒂(Bertrand Badie)所表明的,全球化是一个政治秩序西方化的过程——“国际体系的建立,趋向于规则、价值和目标的统一,同时主张以它为中心整合全人类”^①。由此,在我们讨论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国家之前,讨论现代国家是什么以及它如何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马克斯·韦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国家的理想类型定义:一种组织,在一个既定的领土内,由国家领导人(行政权威)所领导和协调的大量机构组成,它有能力或权威制定和执行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并为社会其他组织制定规则提供参数,只要有必要就可以使用暴力。^②换句话说,通过主张主权、领土、合法性、民主之间适当的对称和对应,现代国家将自身同过去所有的政治组织形式区别开来。主权的概念寄托着这样一种独特的主张,即在限定的界限内正确行使政治权力。^③它指明了共同体内部的政治权威,它在特定的领土内具有决定规则、法规和政策框架的权利,并且依据它们进行统治。

更具体地,在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等人看来,现代国家具有以下独一无二的特征。首先,当所有国家提出领土要求时,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内,确切的国界才逐渐固定下来。其次,只有在人民的“约定”下,民族国家内部权力与权威的所有竞争对手都瓦解之后,暴力和强制手段的垄断权才成为可能。第三,现代国家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主权政治秩序,它是法律限定的权力

26

^① Bertrand Badie,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Claudia Royal 译,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

^②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 关于韦伯的最初定义,参见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 156.

^③ Q.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 2; 以及 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chapter 2.

结构,具有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最高管辖权。第四,现代国家获得了公民的忠诚,并声明自己是合法的,因为它体现和代表了公民的需求、意愿和利益。^①特别是欧洲和北美的现代民族国家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由主义民主制意味着影响共同体的决策是由代议组织作出的,它们在选举过程中被挑选出来,在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在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域中,自由主义民主制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一组规则和制度,所有这些规则和制度都是它成功发挥功能所必需的条件。^②

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本质上,现代民族国家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巨大变革。在现代国家发轫之前,多民族的帝国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政治组织盛行于不同地区,如部落、城邦国家和封建领地等。现代国家是一个政治创造,它解决了所有这些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所面临的困境。

现代国家首先要归功于绝对主义的兴起,这包括了一种基于大量元素的国家形式的发展:较小和较弱的政治单元,被吸收进较大和较强的政治结构当中;对一个统一的疆域的强有力统治;在整个疆域内强制实施的严密的法律和秩序系统;由一个单一的主权领袖实施更统一的、集权的和精心设计的统治;出现了少数几个国家,它们彼此进行着“永无止境的、竞争的、危险的权力斗争”^③。这些变化标志着公共权威在上述方面的实质性增强。

27 绝对主义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里列出这个过程的简单框架。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两个转变:绝对主义国家培育了资产阶级;而正在兴起的商业阶级反过来成功地驯服了君主制国家。他们成功地挑战了贵族关于政府是一种出身特权的主张,并且慢慢地用“政府是拥有财产的平民的天然领地”原则取而代之。随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资产阶级国家创造了工人阶级。最终,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制造的压力下,西方民主制的合法性变得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政府的代表者必须由法律上平等的公民选

^①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hapter 1.

^② Robert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21, 223.

^③ G.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60-61. 另请参见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p. 36.

举出来。^①

国家与国家的全球化

要考察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国家,我们必须考察国家是如何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化不是一种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它只是在最近几十年中加快了步伐。事实上,在全球化之初,现代国家就是这个过程的关键成员。^② 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扩张主义国家和帝国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创造区域的和全球的联系,它们也是改变全球化历史形式的重要因素。前现代国家的不同类型创造了独特的领土空间形式,从松散的疆界到严格组织起来的边界,它们塑造并调解着区域与全球的关系、网络和流动的类型。然而,现代国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化的本质、形式与前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统治的中心变成了民族国家的政府,它们具有既定领土范围内的主权、自主性和独特的责任形式。

学者们已经指出了欧洲绝对主义在现代政治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③ 绝对主义促成了国家建构过程的启动,它开始缩减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并且扩大了民族国家间的差异,这即是说,它有助于铸造具有较明显的、不断意识到的认同感——民族认同——的政治共同体。^④ 此外,国家主权的发展是相互认同进程的核心,国家借此承认彼此在各自领土和共同体内的管辖权。主权原则表明所有国家拥有自我决定的平等权利,这在国家间的正式活动中成为最高原则。^⑤

世界体系主要由欧洲国家的扩张而形成。欧洲的扩张导致了古老的、非

^①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 Reinhard Bendix,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T. H. Marshall,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1964.

^② 这一论述基于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一书第一章。

^③ 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p. 15—41; Michael Mann, *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s 12—15.

^④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9.

^⑤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欧洲的国家间关系类型的瓦解。现代国家体系的欧洲特征,如政治权力的集权、国家行政的扩张、领土的统治、外交制度、正规的常备军的出现,这些都成为全球秩序的普遍特征。其主要动力是欧洲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能力——通过能够进行远航的陆军和海军。

28 现代国家促进了全球化过程。全球化转而对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球化导致了民族融合还是民族纷争,这是学者们围绕全球化争执不休的问题。随着近几十年来全球化的加速,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①许多人认为全球化能够把现代国家同质化。无疑,现在的民族国家在许多不曾预料到的方面表现出结构上的相似,并且以不曾预料到的相同方式变化着。现代国家的同质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约翰·梅耶(John Meyer)及其同事所认为的那样,民族国家是抽象的或想象的共同体,取之于居于世界层面的模式。^②在梅耶及其同事看来,当代民族国家的许多特征起源于世界通行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凭借全球的文化联系过程而被建构并传播。它们所体现的这些模式和目标是高度理性化的、清晰的,常常令人惊讶的一致。遍及全球的模式为地方行为规定了程序并使其合法化,塑造了民族国家以及其他民族、地方行动者在理性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的结构与政策——商业、政治、教育、医疗、科学,甚至家庭和信仰。^③

经验证据似乎确证了民族融合的论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民主发展出现过三次浪潮。^④第一次浪潮发生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第二次浪潮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第三次浪潮是从1974年至今。第三次浪潮在全世界把自由民主制作为民族国家的主导形式巩固下来。在1974年,至少有68%的国家可以合理地称之为权威主义国家;但到1995年底,有近75%的国家确立了竞争选举的程序,并且正式承诺保证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⑤

^① 如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编,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John W. Meyer,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载于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编,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p. 84—92.

^③ 同上。

^④ Samuel S.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⑤ D. Potter, et al.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 9.

这种观点的一个更乐观主义的版本则说,除了西方模式,即自由民主制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意味着整个世界将通过确立自由民主制而融合起来,并且这种政治体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果。^①福山还认为,中央计划不能产生增长,而增长有益于民主。在他看来,科技推动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大量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奉行普遍平等权利的自由政权的孵化器。除了民主资本主义之外,世界上的发达经济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模式。^②

现代自由民主制将成为国家的最终形式吗?所有民族国家都将西化吗? 29
对此,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亨廷顿观察到,在民主的第三次浪潮之下涌动着把世界碎片化为文明集团和文化、种族群体的暗流。他甚至认为西方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普世的。^③福山也承认,亚洲国家不可能发展成欧洲或者北美那样的民主模式。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根深蒂固的特性,这极有可能将它们引向沿自身轨道发展的道路。^④

全球化将导致民族经济体系的国际融合吗?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少争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就认为科技进步将导致民族差异的消失。^⑤对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而言,这种融合却不是由于科技进步的过程,而是因为国际竞争、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民族国家国内经济规制的解除等所产生的影响。^⑥

在全球化导致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被同化的地方,民族融合尤其明显。为什么民族融合是必然的?在那些主张民族融合的人看来,这是因为:

最佳实践的竞争、模仿和传播,贸易和资本的流动性自然运转,产生

①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② Francis Fukuyama, *Trus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 4.

③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④ Francis Fukuyama,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6:2 (1995), p. 33.

⑤ 如 Charles A. Myers,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以及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⑥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p. 5.

了国家间生产结构的融合以及经济、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融合。多样性存在于每一个国家之中,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历史遗产。但是这种区别随着时间而褪色,让位于共同的经济结构,后者的有效性和普世性在市场上产生了较优越的力量。^①

30 全球化也在后发展中国家中导致了民族经济的融合。一个国家必须接受最初形成于发达工业国家的市场普遍规则和结构,而且事实上,如果它们拒绝这些规则和结构的话,就将被抛出全球化过程之外,并且依然落后。事实上,在维持与英美市场模式不同的经济体系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困难。这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当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援助时,它们必须接受一组有关经济政策、治理和公共支出的行为列表,这些列表要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这些国家应该如何运行的理念。其他国家也承受着来自贷款者和投资者的压力,它们必须变革会计制度和披露程序,并且必须使国外投资者更容易进出市场。大量资金和商品在全世界的自由流动,已经把这些国家置于普遍的压力之下。

另一方面,许多学者并不相信全球化将使民族差异消失,他们为民族分歧辩护。^②虽然贸易、资本流动、新通讯技术以及去规制化水平的提升减少了民族多样性,但它们并没有使这些多样性消失。在面对全球化时,经济活动的民族模式仍然非常具有弹性。在形成民族经济体系时,民族文化和民族制度仍然是重要的因素,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后发展中国家。

此外,全球化也遭到了民族国家的抵抗,全球化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在许多国家,全球化在民族政治中已经产生了对抗性反应和抵抗。围绕着某一社会自身或者其他社会的国内制度和实践是否必须重构以符合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模式,民族国家间展开了新的政治斗争。由此,“(民族)融合的未来可能由不断增长的对于变革的政治抵抗所型构,它们被视为对外部压力做出的回应”^③。

① Bergo and Dore(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p. 1.

② 同上。

③ 同上, p. 23。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

同样地,全球化对中国国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应对全球化及其后果,中国国家必须接受市场力量,并且接受国际协商的规则和制度。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在国家体系中引入重大变革。这些变革无疑推动着中国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家开始变得更加具有西方特征。然而,所有这些变革是否使中国的国家西化了?学者们对此存在着争论。除了引入西方国家产品以便使国家更现代化之外,领导人也常常借助于国家自身的传统来服务于其目标,诸如儒家价值和共产主义遗产等传统因素,已经被整合进现代制度当中,现代制度的作用常常采取了传统的形式。结果,中国国家与现代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中国,融合与分歧是并存着的。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把国家融合进更西方的形式当中,同时又要维持其中国特征或中国性?在我看来,中国的民族融合与分歧不仅仅是民族文化和制度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回应全球化及其后果的结果。民族文化和民族制度在塑造中国国家形式上是重要的,但是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国家体系的现代化变得不可避免时,领导人在重构国家形式上的选择,是新民族主义、文化认同政治、政权维系以及中国共产党权力垄断的一种反映。结果,当全球化变成不可逆转的趋势时,中国国家也展现出它的中国性。

31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实践以及法规和经济理论,已经从欧洲或北美的海岸移植到世界其他地区。西方的殖民和征服成为西方国家扩张的向量。然而,正如贝蒂所指出,现代“政治模式不必然是有意识输出的,这种输出也不是西方战略或者阴谋的一部分”^①。换句话说,西方政治模式传播开来并具有全球性,是因为其他国家的输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具有极大的动力“输入”西方的国家形式。全球化由西方创始并推动。不参与这个过程,发展中国家将更加外围化和边缘化。“输入”西方国家政治产品不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举措,而且是试图使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中心化”的一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西方国家成为中国的榜样,因为现代西方国家通常意味着强大、富裕、理性和高效。

^① Badic,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p. 7.

假定民族趋同化与民族差异化是中国领导人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本研究试图探讨作为全球化过程中的行动者,如中国领导人,与作为全球化产物的中国的新国家形式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工作,本研究将表明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积极地回应全球化的,他们又面临着怎样的制约。它也将说明中国的民族背景如何影响了全球化的结果。

作为全球化行为体的中国国家

32 在思考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时,大部分学者聚焦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当这样的研究向读者表明全球化如何获得动力、如何对西方发达国家产生重大影响时,它们并没有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回应全球化。本研究试图探讨的是后者,如全球化如何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重塑国家体系的机会。

全球化引发了中国的国家转型。同样地,中国的全球化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国际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化导致了中国国家与国际的融合,因为领导人必须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推动的全球化。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国家也已经审慎地扩大了它的差异,以便容纳全球化及其后果并在其中生存。全球化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复杂并且更加难以统治,常常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面对这些挑战和大量的实际难题,领导人不能随意地使国家西化;相反,必须借助传统手段来克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结果,全球化在使中国国家变得更现代化的同时,又维持了它的中国性。

本研究采用国家中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国家转型。我认为国家仍然重要。全球化及其伴随的外部力量已经使国家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当市场力量和跨国公司施加了新的压力时——这些压力侵蚀了国家原来掌握的一些权力,它们也深化和强化了提高国家能力的实践。国家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弹性,甚至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完整无缺地坚持了下来。^①

国家是如何决策以促进和容纳社会经济变革的?在对此问题的各种回答之中,两种理论脱颖而出并成为解释国家行为最流行的理论,它们是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理论与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理论。

^① Kjeld Eric Brodsgaard and Susan Young, "Introduction: State Capacity in East Asian", 载于 Kjeld Eric Brodsgaard and Susan Young 编, *State Capacity in East Asian: Japan, Taiwan, China, and Viet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另可参见 Peter Dauvergne 编,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Asia-Pacific Societies*, Sydney: Allen & Unwin, 1988, p. 16.

根据社会中心的方法,国家和领导人是反应性的。社会输入到国家,政策选择是一个因变量。来自社会的需求创造了政策的供给。社会中心的力量包括来自(无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还是依附理论所谓的)阶级;来自(多元主义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所谓的)利益集团;来自政党和选民。^①另一方面,国家中心的方法则把国家视为具有自身目标的主体。国家是自主的,政策精英是积极的参与者。国家中心的力量包括通过技术专家治国的方法扩大民族福利的“慈善”政府、官僚政治以及代表国家利益的决策者。这种方法由赛达·斯科波尔(Theda Skocpol)等人重新发现,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在他们看来,国家既不是整个社会和各种利益集团斗争“平台”的消极代理机构,如自由多元主义理论认为的,也不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如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相反,国家是一个动态的独立力量。^②

33

社会中心与国家中心两种方法所表明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观念分离。这种分离在理论上是有用的,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学者们试图对国家与社会做出某种一致的理论概括的话。然而,它也引发了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③国家在或大或小程度上自主于社会并拥有特殊利益,由此它能够制定和执行政策,但这是如何发生的?运用哪种机制来执行政策?政策在什么基础上并由什么人来制定?一个如此独立于社会、如此自主的国家,如何获得充分的信息,并且让社会认可其政策?

这些反思引导琼·米格代尔(Joel Migdal)等学者提出了“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方法,他们承认国家是镶嵌在社会中的,并且国家与社会在共同的转型过程中不断进行相互作用。^④伊文斯进一步认为,国家结构也是社会组织,它们需要分解开来,并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分析。^⑤另外,我们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命题:国家远非一个抽象的实体;国家所做的同时也是人民所

① 对此更加综合性的考察,参见 Merilee S. Grindle and John W. Thomas, *Public Choices and Policy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ter 1.

② Peter B. Evans, D. Ruesch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Andrew Vincent, *Theories of the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③ Kjeld Eric Brodsgaard and Susan Young, "Introduction: State Capacity in East Asian", p. 3.

④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⑤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做的；一些国家的工作人员——个体的政策制定者、官僚、行政人员，他们拥有比他人更大的权力。^①

从逻辑上讲，政策制定者或国家工作人员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扮演着最关键的角色。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家—社会关系的背景下制定和执行政策。社会的压力和约束以及历史、文化、国际的背景都是政策创制的核心变量，不仅因为它们塑造了做出权威决策的那些人的洞察力、选择和行为，也因为它们影响了那些决策的结果。但是，我们说决策受社会力量的影响，并不是说政策精英的有效选择完全决定于社会阶级、有组织的集团、国际行为体的利益或国际经济条件，或者决定于政策选择所处的历史和文化。正如梅里利·格林德尔 (Merilee Grindle) 和约翰·托马斯 (John Thomas) 所指出，虽然这些因素决定了选择的外部边界，但政策制定者拥有机动的空间与能力去影响政策创制的内容、时机和程序。^② 由此，在考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时，我们需要考察政策精英的洞察力和行为以及他们遇到的约束。只有通过关注决策者的感知、动力、价值观、技能和时机以及决策过程的特点对决策产生的影响，我们才能够完全理解政策创制。^③

如何来定义中国的国家？中国国家已被人们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④ 本研究集中于国家的领导人方面。由于本研究集中于领导人在领导中国国家转型中的作用，因此我把中国国家定义为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简单地说，这表明在中国，技术专家占据着政治体系的高层领导地位。^⑤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被西方视为利维坦式的国家、官僚国家或者派系

① Gerald M. Meier, "Policy Lessons and Policy Formation", 载于 Meier 编, *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San Francisco, CA: ICS Press, 1991, p. 8.

② Merilee S. Grindle and John W. Thomas, *Public Choices and Policy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ter 1.

③ 同上, p. 19.

④ David Shambaugh (e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Vivienne Shu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a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⑤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集体的专家治国性质，可参见 Hong Yo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以及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国家。利维坦式的国家或官僚国家常常被视为掠夺性国家,为了独裁政府、政策精英或官僚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公民的利益,而派系国家只是回报国家内部各个政治派系的利益。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远离了利维坦式的国家或派系国家。在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中,受过技术训练的政治领导人,凭借他们拥有的专门的知识以及在主要政治、经济机构中的职位进行统治。

中国技术专家治理型的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掌权后成为事实。所谓技术专家治国的运动,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于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当中,中国的领导集体班子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 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标志着邓小平领导权的确立。在这次会议期间,许多技术治理专家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从那时起,虽然主要领导人因痛苦的权力政治起起落落,但是技术专家治国运动的势头得到了保存。多年来,治国的技术专家们逐渐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取代了革命干部。到 1997 年的十五大,这个运动达到巅峰。在那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 7 位常委以及政治局 24 位成员中的 18 位都是技术专家。新的领导人由此被称为“成熟的技术专家治理型领导人”^①。

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技术专家治理型国家已经产生了一种由“具有相同社会背景、相同教育、相同意识形态的一组专家”^②所组成的政治体系。这样的国家对政策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因为它倾向于否认政治利益集团的重要性,并且主张受过治理技术训练的专家们应该站在其他社会和政治组织之上为中国决策。技术专家治理型国家的兴起,是对毛泽东时代精英录用政策的修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个主题是“红”与“专”之间的冲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发动了改造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斗争浪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在邓小平掌权后,这种精英录用政策得到纠正,因为过去的政策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领导人开始褒扬“专”而贬抑“红”。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专”必须置于整个体系的核心。

35

而且,技术专家治理型国家的兴起也是去政治化的产物。改革之前的政

^①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xxxviii, 3 (March 1998), pp. 231–264.

^② Ezra Suleiman, *Politics, Power and Bureaucracy in France: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74.

治动荡,起源于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和大众动员。动员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政治化。与之形成对比,党和政府重新录用治国技术专家则有助于决策过程的去政治化,因为与政治家追求权力和利益不同,治国技术专家更关注理性思考、目标导向和问题解决。^① 由此,技术专家治理型国家有助于减弱意识形态在决策中的掣肘。随着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权威的基础需要重新定义。老一辈革命家求助于他们的领袖魅力、革命忠诚和意识形态,借此动员大众,但是新的领导人不具备这样的权力资源,因此转向求助于更世俗和更实用主义的政治权威形式。对治国技术专家而言,意识形态不能当做教条,它不能对直接的政治、经济问题提供明确而可靠的解决手段。即使难以将政治归纳为技术解决手段,但至少治国技术专家对现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由于这种实用主义,治国技术专家能够克服困难而达成一致。^② 他们可以:

甚至就实际效果而非意识形态价值来评估政治决策。在设计政策选项时,每个选项都只包含不同的成本、收益和可行性,这种思考方式把官僚政治中的技术专家导向妥协与商谈。^③

在讨论决策动机时,传统观点常常从自我利益是所有政治行为的基础这种狭隘的假设出发。这种假设通常把政策制定者概念化为只受维持权力的欲望所驱动的“寻租者”,从而导致对政策精英理性认识公共利益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着眼于公共利益行事的潜在能力得出悲观的结论。相反,本研究把中国技术专家型高层领导人界定为具有“整体利益”者,以与狭隘集团利益形成对比。^④ 正如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指出,每个地方的国家仍然是

① Ernst B. Has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 Ezra Suleiman, *Politics, Power and Bureaucracy in France*, p. 380.

③ Hong Yo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p. 404.

④ 关于“泛利”概念的讨论,参见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本质性变量。^① 在中国尤其如此。缺乏民主和合法的反对力量,列宁主义式的国家只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负责,虽然这种国家常常表现为“掠夺之手”,但是它的“泛利”性使它可以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提供“帮助之手”。如我将要表明的那样,高层领导人的自我利益虽然是重要的,但领导人能够在民族长远利益问题上达成一致。

36

全球化:输入与创新

要回应全球化不断产生的压力,中国技术专家型领导人除了“输入”西方国家形式之外,没有别的更多选择。领导人必须“借入”西方的国家形式,甚至在这种做法遭到严厉谴责,面临来自保守派和社会的强大抵抗时,也必须如此。从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重建国家体系的努力中,领导人学到了许多东西。问题不是领导人是否“输入”西方的国家形式,而是领导人为什么要有选择地“输入”西方产品(拼搭西方国家的积木),以及随后如何有策略地寻求把这些“输入”部分整合进现存国家体系之中。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中国技术专家型领导人如何做出选择,必须理解他们的动机和回报、希望与预期以及制约等。换句话说,他们的选择是有意识决策的结果。正如后面将表明的,领导人不仅能够从“输入”那种国家形式的过程中获利,而且重要的是,在这样做时,领导人也能够实现这种国家形式。他们意识到,这种国家形式是中国权力与财富的基础。另外,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的产品也有助于政权的巩固。

选择西方产品或者“输入”西方的国家形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处于适应逻辑与创新逻辑的撕扯之中。西方产品的输入必须是有选择的,其过程是渐进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是“错误的”。输入必须结合着创新,这既是领导人又是社会的利益所在。换句话说,在“输入”国家时,中国领导人必须同时实现各种目标,亦即应对全球化的压力,实现社会的利益,满足统治精英的利益,以及最终变革国家体制。

这些目标将如何实现?“输入”国家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领导人的策略。

37

^① 参见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另可参见 Olson, “Big Bills Left on the Sidewalk: Why Some Nations Are Rich, and Others Poor”, 以及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载于 Olson and Statu Kahkonen 编, *A Not-So-Dismal Science: A Broader View of Economics and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7--60, 119-137.

他们的策略选择又取决于他们对全球化、认同政治、精英间权力关系的政治背景、改革派领导人与西方国家“输入”之前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政治联盟以及现存国家的发展方式等问题的认知。我将在后面描述和分析中国领导人“输入”和“创新”国家的过程。在思考输入与创新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的主导者与成果时,我们可以给出一些一般性的要点。

首先,当“输入”国家是为了回应全球化及其后果时,中国领导人必须避免全球化引发的革命。一场革命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正如1911年的共和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样。一场革命可能破坏传统的政治秩序,并由此为领导人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提供先决条件。但是,一场革命并不是中国领导人想要的。“输入”国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家,而是要改革它。它是向旧政治秩序引入新的变革,并在内部创造一些张力,最终为新国家提供制度空间的一种手段。

其次,在输入国家过程中,产生了一批促进者。输入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输入阶级以及新一代的西化精英,他们从他们的西方教育经历和感知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全球化由此产生了自身的动力。在输入国家的过程中,新的阶级和西化精英成为支持改革派领导人的重要力量。然而,改革派领导人必须谨慎地从他们身上获取政治支持。在借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和效能理念时,新的阶级与西化的精英们也在寻求自身的权力。当全球化为这个新阶级和精英集团带来大量利益时,它同时也把其他的社会和政治集团置于不利的地位。由此,许多有利于这个新阶级和精英的国家政策,可能会产生两个阶级和其他集团之间的政治张力,由此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第三,输入过程引起了抗议,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抗议者可能来自体制之内,即那些权力地位被全球化破坏了的人;也可能来自体制之外,即那些利益受到全球化威胁的社会团体及其成员。抗议者自身拥有抗议的合法性资源。他们可能吁求认同政治以反对输入国家。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这尤其是事实。他们声称要做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传人,并创造出话语来对抗国家的“西化”(第八章)。

全球化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力量,由此需要改革派领导人采取保守主义的全球化策略。领导人必须通过声称能够代表各方利益而把政治风险最小化。一方面,领导人必须使国家体系适应新的条件,以便开发出额外的资源,提高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领导人还必须把现代性表达为中立和普遍的范畴,由此可以适应任何文化。通过这种做法,领导人期望可以克服社会和政治的对

抗,并按自己的蓝图建设现代国家。

领导人在“输入”国家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不同社会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背景下,输入得以实现。同时,当输入使得中国国家更加现代化(西化)时,政治输入过程也保留了中国国家的中国性。事实上,有选择地输入西方产品,在许多方面突出并增强了国家的中国性。

第三章 全球主义、民族主义和有选择的输入

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中国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把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决策，那么理解决策者的感受是极为重要的。这一章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要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我将考察中国领导人是如何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其全球主义(Globalism)世界观的，并将考察为什么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在变革国家时要选择西方国家的经济产品而非政治产品。

要积极推动全球化过程，中国领导人必须克服强大的社会抵抗。没有来自高层领导人强大和果断的政治创制，中国不会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这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奠定了基础。为什么中国国家在推动全球化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领导角色？在领导人选择这样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理性计算？我认为，在中国领导人决定“输入”西方国家产品的背后，隐藏着他们诸如全球主义的心态或心理。在“输入”何物以重建国家体系上，中国领导集体在达成基本共识时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本章聚焦于中国领导集体的这种新心态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演变，尽管也稍稍论及这种心态在此前时代中的演变过程。

作为一种心态的全球主义

在讨论中国的全球化时，学者们常常提及的，要么是经济一体化，要么是制度一体化，也就是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经济，或者中国如何做出巨大努力参与

或推动参与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① 经济一体化常常由中国的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来衡量,而制度一体化则常常由中国对现存国际规则和标准的接受程度来衡量。^② 这些方面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但它们却很少能够告诉我们中国的全球化及其对世界体制的融入如何影响了它的国家体系。换句话说,关于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任何考察,以及关于制度一体化如何影响中国的对外行为的任何考察,都不能揭示中国国家体系实际变革的更多内涵。全球化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了大量的压力,使他们在国家体系中引入变革,但全球化却不会自动地影响国家体系。国家体系如何变革,这取决于领导人的作为。

为了回应全球化,中国领导人必须引入各种改革,以便变革国家体系。进行何种改革,不仅取决于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感知,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考虑,即某种改革措施会削弱还是增强执政党的权力。由此,与那些以经济和制度一体化来界定全球化的做法不同,本研究更进一步探讨了全球化如何影响着中国领导人在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时做出的选择。

在政治领导人(决定)“输入”之前,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必须考虑他们如何来为自身和公众论证这种输入的正当性。这是全球主义背后的政治背景。“全球主义”这个术语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定义。例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全球主义是一种世界状态,包括了洲际间相互依赖的网

① 如 Nicholas R. Lard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Thomas G. 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关于外国投资与对外贸易的讨论,参见 Nicholas R. Lardy,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Lardy,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Lardy,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North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George T. Cr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关于制度整合的讨论,参见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a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a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络”^①。全球主义具有不同的向度,包括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以及社会、文化的全球主义。^② 由于本章聚焦于全球化概念,我将全球主义视为中国领导人关于全球化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不仅使他们能够接受全球化的事实,也鼓励他们通过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来改革国家体系。

作为一种心态的全球主义是动态的,它依据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替而变化。不同心态间也存在着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这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如何理解全球化对中国国家产生的影响、他们的权力考虑和政权合法性的需要。

作为有选择的输入的全球主义

41 中国的急剧全球化已经严重挑战了国家权力。但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中国领导人并不求助于民族主义,动员公众感情来反对全球化。相反,领导人积极但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虽然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的输入已成功启动,但在政治领域,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对西方国家民主成果的“输入”一直比较缓慢。

由此,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产品的全盘输入。在处理输入的西方产品时,领导人也谨慎地考虑了它们对中国的适用性。这就引发我们去追问:在决定输入哪些西方国家产品时,是什么影响了中国领导人的选择?为什么领导人如此积极地输入经济产品,却拒绝民主产品呢?对输入产品又有怎样的创新?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分析作为一种心态的全球主义。

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历史遗产

在政治上,中国领导人决定输入哪些西方国家产品以及如何创新输入产品,都要以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考虑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民族主义如何可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推动领导人接受和鼓励全球化?换句话说,中国领导人如何调和了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这两个看似相互

^①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Affairs*, no. 118 (Spring 2000), p. 105. 另参见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Longman, 2000.

^② Keohane and Nye, “Globalization”, p. 107.

矛盾的“主义”？要考察这两种力量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心态，回顾中国的现代历史是有用的。

政治动员与认同建构

无疑，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处于张力之中。民族主义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在其中，个体感觉到每个人都对其民族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世俗忠诚。^①另一方面，正如上面定义的，全球主义意味着领导人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以之取代中国的旧东西或者重构中国国家的意愿。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学者们热议的研究课题。^②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在其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种主要论点。第一，民族主义被中国共产党用来回应对毛泽东主义信仰的衰弱，并且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另一意识形态。第二，排外主义是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种尽管不同但却强硬的向西方说“不”声音的兴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力量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引发的激动和狂暴的反应，这些看起来都确证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上述特征。不管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是什么，所有这些学者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民族主义成为抵抗全球化的强大力量，尤其是以西化角度来定义的全球化。

42

确实，中国民族主义的排外性质很难否认。从晚清开始，中国民族主义所有派别的共同目标就是复兴民族自豪感、民族权力、民族繁荣，这些远远高于其他事情。要实现这个目标，排外主义就成为所有态度中最重要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在讲到民族主义时就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简洁地描述为“促

^① Carlton J. H.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Hans Kohn,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1944, 以及 Hans Koh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2; Anthony D. Smith,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② 如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编,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王康武,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Leid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6. 王康武,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赵穗生,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 (Spring 2000), pp. 1–33; 赵穗生, “Chinese Intellectuals' Quest for National Greatness and Nationalistic Writing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2 (December 1997), pp. 725–745; 以及郑永年,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进中国的繁荣,保持民族的威望”,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①排外主义无疑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主题。事实上,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外战争以及彼此的权力斗争中常常被动员起来。在毛泽东时代,它也被动员起来推动国内经济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只有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掌权并且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民族主义才不再被动员起来。^②

然而,经过20世纪80年代十年的沉默之后,民族主义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复活。这一波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全球化意味着什么?王赓武(Wang Gungwu)认为这种新民族主义有许多面相。其中,

最普遍的方面涉及政体问题,强调主权的恢复、领土统一和民族自尊。另一个是文明方面。它强调道德秩序和传统价值观的保存或重新发现。并且,它还有保守的一面,怀念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和统治,向往伟大帝国的繁荣过去。^③

43 我把民族主义定义为两个方面:作为一种认同,以及作为一种制度。民族主义涉及民族以及“民族”观念如何具体化为制度。它是一种认同,亦即人民对其民族性的意识和情感。然而,民族主义最终必须表达为制度,即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只有当它组织为民族国家时才变得重要。^④由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目标是重建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因此它可以理解为“复兴主义(restoration)”与全球主义并存,国家建构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联系着全球主义,否则,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可能难以建构起来。当民族主义试图创造民族认同感、培育民族共同体时,全球主义意欲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来强化民族主义的制度基础。

有许多因素促成了现代中国这种民族认同的复兴。首先,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作为对国外势力的外部威胁的一种反应而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民族认

^① 引自王赓武,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Leid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6, p. 10.

^② 廖广生(Kuang-Sheng Liao),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860—1980: Linkage Betwee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③ 王赓武,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 8.

^④ 郑永年,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p. x.

同意味着民族的自我意识,它需要区别于其他民族共同体。外部威胁形成了我们/他们的二元区分。

民族主义要复兴中国的主权、繁荣和权力。当这种复兴看起来被外部势力所阻碍时,民族主义就很容易被激发。整个现代时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领导人发现,对于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甚至对于民族存活下来而言,民族主义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情感不仅存在于保守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当中,后者并不认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中国的复兴取决于中国伟大传统的重新发现;而且存在于从早期自强者到当代政治领导人的改革派之中,他们强烈地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从而再次强大起来。两个派别的争论常常白热化,并且激化了他们的政治冲突。然而,双方都承认外国威胁是实在的,由此民族主义是保卫中国的必要条件。

在早期学者中,梁启超是认为中国不具备民族认同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梁启超注意到,传统中国的帝国体系尽管是高度集权的,但它并不发挥现代国家的作用。中国人民是爱国的,但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民族认同非常脆弱。在梁启超看来,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首先就必须创造强烈的民族认同。^①

是孙中山清楚地说明,通过向人民表明中国怎样遭受着列强的威胁,可以建立起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弱小起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权力竞争所造成的毒害。战争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冲突,反抗帝国主义的唯一道路是复兴中国失去的民族主义,并且“利用我们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人类反对不公正而斗争;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②。孙中山非常庄严地预言,如果中国不能找到一些手段来复兴已经丧失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不但会亡国,而且也许会亡种。^③

44

这个失去了的民族主义如何复兴呢?孙中山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有几条道路。首先,必须唤醒四亿中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中国面临着来自外国强权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与人口的急剧增长。在他看来,一个没有外国敌人和外部危险的民族常常会毁灭,面临许多苦难,反而会使一个民族复兴。换句话说,

^① Joseph L. Levenson, *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②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287 - 288.

^③ 同上。

如果一个民族认为没有外部危险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外国人不敢来侵犯,那么保卫国家就会是不必要的,像这样的民族必定灭亡。因此,“逼到无可避免的时候,当发奋起来和敌人拼一死命”^①。

复兴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方法是团结。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民族共同体。如果中国人能够团结起来形成共同体,那么对他们来说复兴民族主义应该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说:“如果全国人民能够在他们家族群体基础上建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那么不管外国给我们带来何种压力,我们都将毫不畏惧。”^②

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致力于驱除外国势力并重建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国家,以此来复兴中国主权。这些成为国民党的目标。1923年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声明:

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③

1924年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声明:

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④

这也是1926—1928年北伐的目标。在《北伐宣言》中,国民党宣称,虽然北伐是为了讨伐军阀促成国家统一,但是其最终目标是要把帝国主义列强驱逐出中国。^⑤

45 毛泽东和孙中山尽管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但是毛泽东接受了孙中山的帝国主义观。1939年,毛泽东认为通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

① 《三民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页。

② 引自廖广生, *Anti 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p. 14.

③ 《中国国民党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2页。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⑤ 廖广生, *Anti 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p. 83.

强控制了所有重要的通商口岸,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操控了工业,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列强给军阀提供了大量军火和大批军事顾问来帮助他们进行军阀混战。通过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帝国主义列强执行着一种文化侵略政策。^①

然而,在将中国的弱小归因于帝国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看到了其国内根源,即中国的封建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②。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家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是中国革命的根源。

当民族主义者围绕怎样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民族国家而意见相左时,我们不难看到,在应对外国帝国主义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转而选择了一种更激进的道路。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接受了从西方输入的不同意识形态,部分原因在于通过声称他们比别的集团更加民族主义并且由此更加反对帝国主义,他们更容易吸引追随者。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尤其显得真实。正如王赓武所指出的,

每一派的领导人必须比其对手更加民族主义。事实上,蒋介石浪费了比共产主义者更多的优势,人民认为他对日本太过软弱,而共产主义力量把自己描绘得很好,尽管他们有着显然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但却被视为致力于中国伟大复兴的真正的民族主义者。^③

西方国家产品的输入

尽管中国领导人具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他们也表现出同样强烈的意愿——通过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来学习西方。围绕着“民族精华”这个概念产生了大量争议,并且不同的民族主义概念导致了民族主义与

^①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630页。

^②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③ 王赓武,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 15.

西化之间不同程度的矛盾。^① 一些人拒绝全盘西化,其他人则试图把中国传统装扮得更像西方,还有些人则试图有选择地装扮。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学理式争议,但像孙中山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成功地调和了民族主义与西化,并且试图表明它们之间并无本质性矛盾。在他 1896 年写给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的信中,孙中山概括了他复兴民族主义的主题,

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躋,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②

通过“追随西方道路”来“复兴古代秩序”,这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改革派官员的主流情感。但是怎样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王赓武观察到,

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内,都不存在对“中国应该现代化”这个理念的根本抵抗。利用现代学校和学院,以欧洲、美国和日本为学习榜样,这些声音回响了整个世纪。^③

甚至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必须变成国际主义者。毛泽东以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态度闻名于世,但是他也知道,中国除了“输入”西方国家产品并随后对之“创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不用说,毛泽东对西方产品的观点整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与孙中山一样,毛泽东成功地调和了民族主义(或者他所说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且真诚地相信一个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者。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

^① 对此的简要讨论,参见 Benjamin I. Schwartz, “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urth and After”, 载于 John K. Fairbank 编,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06—450.

^② 《复翟理斯函》,载于《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46 页。

^③ 王赓武,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2000, p. 4.

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①

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如何在中国精英的心态中协调起来?要对此做出描述,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持传统中国儒学观点的政治精英是如何看待输入的民族主义的。儒家学说常常被当成一种普世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儒家高度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文化意识的主要形式——一种对普世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伦理价值的认同。不考虑其民族疆界,儒家学说被描绘为一种普世伦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通过教育、德行和善政可以为任何民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把民族国家视为共同体的最终目标。但有趣的是,当从西方输入了民族主义时,儒家精英迅速接受了这个概念。

47

王赓武在对中国民族主义与儒家学说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区分了四个历史阶段,并发现这两种“主义”并不必然相互矛盾。在19世纪90年代至1925年的第一阶段,许多儒家代表人物自身准备接受民族主义的新力量,而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也受过儒家经典学说的良好教育。他们由衷地相信,两者能够有效地互相支持,复兴中国力量以反抗外敌,即西方和日本的扩张主义帝国。在1925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第二阶段,由于激进地接受了现代西方观念,不仅包括科学技术,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现代化,儒家学说被边缘化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接受民族主义的同时,围绕中国应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国民党)还是革命社会主义(共产党)来寻求变革和更新的问题,两党展开了斗争。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儒家学说受到了严重打击。在第四个阶段,从邓小平掌权开始,传统的教条主义已经得到不断修正,儒家学说开始逐渐复兴。^②在儒家学说与民族主义不再必然冲突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接受全球主义时没有显示出很大困难。对儒家精英和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都可作为建设一个能够勇敢地抵抗西方的强大中国的手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于《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王赓武, *Nationalism and Confucianism*, Singapore: Unipress, 1996, pp. 7-8.

这在输入西方国家产品的问题上尤其如此。长期以来,民族主义与西化几乎成为中国精英的同义词。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国家,他们必须输入西方国家产品。像冯桂芬、张之洞这些早期的改革者,强调在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现代西方政治秩序之间寻求平衡。但事实是清王朝未能抵抗外国势力,这破坏了知识分子和官员将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等量齐观的信心。清王朝倒台后,向西方学习的话语开始激进起来,并被西化的话语所取代。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复兴‘民族精华’的观点受到挑战,或多或少被所有反对民族主义政府的人所抛弃”^①。

48 有关向西方学习的价值论战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潮。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向西方学习能使中国变得强大,另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是接连的军事战败以及在世界体系中的屈辱和不平等地位。由于主流的西方模式广泛地被中国领导人看成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的剥削制度,因此他们开始寻求其他选择。他们向西方寻找一种比传统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更有用的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可能会帮助中国勇敢地抵抗西方。这些替代选择包括了西方流行的各种“主义”,如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没有哪个主义能够向领导人提供一种可行的道路去复兴中国的财富和权力。只有那种新生的和输入的民族主义同时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接受,因而得以存活下来,并在中国的伟大复兴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主义变成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根基时,它也受到了其他主义的深刻影响,这些主义也能推动中国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来说,面对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中国除了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②

在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概念和民族国家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中国民族国家西化的过程。中国输入民族主义,部分是因为欧洲模式的民族国家打败了传统的中国国家,部分是因为欧洲民族主义在其原初意义上类似于儒家学说。换句话说,一些人肯定民族主义是因为它可以壮大民族国家,而另一些人则是由于它的科学精神、工商企业、政治思想和实践而肯定它。欧洲民族主义,尤其是法国版本的民族主义,强调人民主权

^① 王赓武,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 19.

^② 关于中国的强国情结的讨论,参见郑永年,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Chapter 2.

以及所有人在形成民族意志时的普遍合作,强调普遍人性和自由进步的理性信仰。这种法国式民族主义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权宣言》不仅适用于法国人民,也适用于全人类。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接受所有这些价值观时不存在很大困难。然而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为了表达和支持这些价值观,一个像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的民族国家如何建立起来?

在整个现代时期,中国民族主义者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该向西方学习,而是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不向西方学习将会让中国面临灭种的危险。那学习什么呢?除了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改革派领导人之间不存在是否要输入西方国家产品的问题。但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要输入什么,随后是怎样输入。这涉及一个艰巨而复杂的政治过程。

49

在19世纪后期,当中国领导人开始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时,他们发现首先必须输入西方的军事产品。这种需求滋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那时国际体系的特征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列强与美国几乎总是以其取得战争胜利的能力为国力的衡量尺度。^①自然地,中国领导人把西方强权国家首先视为具有强大军队的军事力量。这样一种认知使得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中国要在国外获得尊重,要保卫自己,就必须增强军事力量。由此,军事现代化被赋予了最高的优先性。

中国在建设现代军事力量方面尽管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是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还是被打败了。中国从这次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教训是,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仅凭军事现代化是无法挽救中国的。这将中国领导人引向输入西方国家的其他产品。^②为了发展国民经济,现代企业和商业组织被建立起来,政府自身也以不同形式参与经济活动。但是,中国政治领导人最感兴趣的却是西方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

在孙中山的早期政治生涯中,他看到了输入西方民主制国家的价值。西欧和北美的多党制是西方国家几个最重要的产品之一,这引起了孙中山的兴趣。他真诚地相信这种现代制度将帮助中国实现人民主权——通过向中国人

^①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②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中国知识分子与领导人关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上的变化。参见郑永年,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1.

民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他曾说“本总理向来主张以党治国”^①。但是很快他发现,这种观念太过于理想主义,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不可能实现。1911年的共和革命没有帮助中国建成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这种新的民主政治安排“没有实现统一和秩序,更不用说合法性了。代议制政府很快堕落为敌视人民参与和对外政策无力的独裁政府”^②。

50 在共和失败之后,孙中山认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过程必须划分为几个阶段。在他看来,中国在其稀薄的空气中难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由于中国还不存在一个国家,因此主张以党治国的可能性还为时尚早。更确切地说,在孙中山看来,中国革命首先必须正视中国的政治现实,其特征是政治混乱和社会落后。孙中山主张:“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③

俄国共产党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促使孙中山从西欧和北美转向关注俄国。从俄国的经验中,孙中山形成了他的国家建构策略,也就是“以党建国”。^④ 俄国把党置于国家之上的事实,使孙中山相信俄国模式比欧洲或美国模式更适于中国的国家建构。依据孙中山的策略,国民党在1924年进行了改组,变得高度的组织化和集权化。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坚持了孙中山概括的方针,利用党来恢复统一与秩序,结束外国屈辱,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失地,最后复兴中国业已逝去了的伟大。

无疑,蒋介石推行的蓝衣社和新生活运动等许多国家建构计划都是准法西斯主义的。^⑤ 然而,在抗日战争之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失败了。这个结果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强调其在抵抗日本时比国民党更加民族主义,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在向大众传播其民族国家观点时比国民党更有能力。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国民党把重点放在对城市地区的控制上,没有认识到“在农村占

①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载于《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② Michael H. Hunt,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Late Qing-Republic Crisis”, 载于 Dittmer and Kim 编,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p. 68.

③ 《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载于《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104页。

④ Ssu-yu Teng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65.

⑤ Arif Dirlik,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y*, 34: 4 (August 1975), pp. 945—980.

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城市的势力范围与西方相比要更受限制,当然在西方,这种城市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①。国民党极为倚重的地方精英不能实现对农民生活的根本性变革。国民党政权下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建构策略并未触动农村。

另一方面,通过将干部和官员送到农村,共产党成功地将其民族国家的理想传播给中国农民。农民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并把共产党推上了权力的宝座。^② 然而,同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继承了孙中山的遗产,并接受了列宁主义式党的领导与国家合而为一的政治结构。唯一的差别是共产党抛弃了孙中山关于经济建设的策略,进一步废除了资本主义因素,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就如同它的近邻俄国所做的那样。

改革、合法性与有选择的输入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政治精英试图通过输入外国产品来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常常非常努力并非常急切地试图找到一条捷径来复兴中国的尊严,他们相信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才能获得尊严。^③ 而且精英们对现代国家的认知也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多大变化——一个现代国家应该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追求财富和权力,并且为人民服务。

51

这仍然是后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则。“向西方学习,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仍然是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的目标。但是,当前民族主义的复兴不再是由外国干预的传统威胁所引发。过去,民族主义兴起于中国的战败,并被中国领导人用来建立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新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国,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国,不再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民族主义还复兴了呢?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议程中,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又是如何调和起来的呢?

^① Joseph B. R. Whitney, *China: Area,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0, p. 71.

^②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③ 王赓武,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2000.

在民族主义的当代复兴不再由外国干预的传统威胁所激发的时候,它仍有一个外部性维度:由中国全方位向国际关系开放所激发。虽然中国被迫在现代向外部世界开放,但后毛泽东时代的开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此中国得以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仍然在不断地努力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然而,这些努力的首要推动力已经完全不同。在近代,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中国将被外国帝国主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后毛泽东时代,寻求政治合法性取代了国外威胁,成为支撑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首要因素。换句话说,后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是在国内而非国外。这个差异导致中国领导人在决定输入哪些西方国家产品时改变了其优先考虑。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发展主义

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新基础成为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改革的主题之一。当各种改革措施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实施时,一个重要的主题始终存在并未发生变化,这就是所有改革必须能加强或增强这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邓小平掌权时,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辨认出政治合法性的三个主要来源:经济发展、稳定、国家统一。邓小平把经济改革和发展视为对付内外部不断增长的压力的最重要手段,这反过来有助于增强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此外,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了实现国内稳定,领导人必须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防止发生任何动乱,在国际上,它必须采取“右倾”的国际策略以便求得和平环境。

在各种考虑之中,中国共产党最优先考虑的是国家统一,领导人时刻准备着不惜任何代价向国家分裂开战。但是,对邓小平而言,国内发展和国家统一是不可分割的。国家统一的问题可以通过国内发展来解决。国家统一依赖于快速发展是否能够实现。

20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失败

当邓小平把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称为第二次革命时,他并不打算破坏列宁主义的旧体制,更不用说推翻它。相反,他的意思是旧体制需要改革,要确立新的经济、政治秩序,从而中国可以对内寻求经济发展,对外扩大国际

影响。^① 在邓小平掌权时,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国家。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浪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种国家本质上是低效的。在政治上,它不再能够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同时在经济上,它也未向人民提供福利。不仅社会成员,而且党政官员都失去了对国家的信任,一种国家认同危机在中国社会中蔓延。邓小平和其他高层政治领导相信这种认同危机根源于中国的不发达和落后。众所周知,领导集体因此采取了一种强硬姿态反对破坏稳定的支持民主运动,同时执行一种优惠政策,以鼓励城乡的以活力为导向的改革运动。

领导集体与各种社会团体对政治改革的预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对这些社会团体,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政治改革意味着中国应追随西方的民主化道路,如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多党制和表达自由。^② 但对领导集体,尤其是邓小平本人来说,政治改革仅仅意味着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在他著名的政治改革谈话中,邓小平把党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归结为中国的政治体制。^③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开始极力强调政治改革。在一些场合,他讨论了政治改革为什么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是重要的。在邓小平看来,政治改革是必然的,因为:首先,所有来自改革运动的经济成就必须由政治改革来保障;其次,所有阻碍经济改革的障碍必须由政治改革来消除。他表明政治改革必须是指向民主化的,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④。

我们不能怀疑领导人对政治改革必要性的诚意。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时,政治改革就是领导集体议程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在随后的年月里,围绕中

53

①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第113—114页。

②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ndrew J. Nathan,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emma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85.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 邓小平的很多讲话简略地谈到了政治改革与民主的问题,如参见《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国将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和怎样执行改革政策,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物展开了有活力的讨论。^①

不管领导集体预期的是怎样的政治改革,有一点可以肯定:政治改革的启动应该自上而下,并受领导集体的管理。领导集体鼓励社会团体参与有关政治改革的热烈讨论,但是并不允许政治改革的社会话语变成公共话语,更不用说影响领导集体的决策。无论何时,都必须维持社会政治秩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增长为基础的合法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退出历史舞台。对新的领导人来说,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变得更为重要。第二代领导人能够以领袖个人魅力以及个别领导人的革命功绩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资格。然而,第三代领导人并没有超越由邓小平设定的发展主义框架。

中国领导人把 1989 年事件视为 1987 年十三大后放松政治控制的后果。这种理解导致领导人加强了政治控制。由此,领导人在开创任何新的政治改革时变得更为谨慎。

54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知。苏联和东欧的激进民主化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苏东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从那时起,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没有人敢再采纳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创议。

政权生存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初领导人的最高优先考虑。邓小平非常现实地得出结论,苏联和东欧人民权力的兴起归结于经济改革的失败,归结于政治空间的过度开放。前者导致人民丧失了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信心,导致这种政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资源,而后者给人民最初批评进而推翻党和政府提供了合法渠道。

要避免政权崩溃的命运,中国领导人必须实现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它要推动激进的经济改革,这将使政府能够不断为人民提供经济福利,由此扩大政治合法性资源。其次,它不推动任何政治改革,由此控制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或者表达政治需求的机会。在中国的内外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领导人来

^① 吴国光具体描述了这个历史阶段。参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1997 年版。

说是一个严峻的提示：经济改革将导致社会力量的兴起。而常常正是中国领导人给社会力量提供了机会，使其在政治上强大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人将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相反，领导人必须调整政治体制，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和经济形势。然而，这种调整是自主的，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的外部输入。

激进的经济改革是怎样开始的？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一次高姿态的南巡。在这次南巡中，邓小平围绕改革开放政策作出了多次讲话。邓小平史无前例的创议具有全国性影响。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领导人修订了党章，邓小平理论成为核心。十四大结束了对姓资姓社的官方争论。1997年的十五大进一步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国家目标正式合法化（详细内容见第四章）。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导致中国改革模式的形成，即“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①。这个模式尽管受到了大量批评，但是为政权提供了强大的合法性基础。

首先，领导人强调改革政策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好处。正如第一章讨论的，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增长，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绩效更是惊人。惊人的经济绩效给领导人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稳固基础。快速发展不仅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行列。国家尽管正经受着不同社会群体和地区间严重的收入分化，但大多数国民从各种改革政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同时，民众也不断提高了对国家经济成就的自豪感。改革以及随后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再现在全球事务上的古老辉煌提供了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快速发展使许多人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这在20世纪还是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感情表达在电视节目《河殇》中，与之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感情表达在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上，这是多大的变化啊！^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表现出极大的意愿，它们要利用这样的民众情感来增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

其次，江泽民及其同僚们已经设法解决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从而增强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领导人强调了稳定的两个功能：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稳定是政权实行威权统治的正当证明。“稳定”的效用是随时间变化而变

^①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② 郑永年,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化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党的领导人在证明稳定是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试图利用东亚发展模式来为他们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而采取的手段辩护,他们相信,正是稳定帮助东亚国家获得了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许多社会团体对此仍表示怀疑。他们相信,在强调稳定时,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只是在试图维持其威权统治。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当政府不断强调稳定的重要性时,新生的社会力量则吁求政治改革,实现政治过程向公众参与开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这些力量不断演变为某种社会运动,正如 1989 年事件表明的那样。

56 没有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将面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不断扩大的压力。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环境。政治稳定的必要性似乎被中国外部发生的事件“自然而然”地证明是正当的。激进的政治改革将推动中国不可避免地沿着前苏联的道路行进,这样的观点并不牵强。权威主义统治更加变成经济持续进步的可以接受的代价。领导人当然欢迎人民对稳定的期望,并且抓住任何一个机会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国家带来稳定并保证持续的经济增长。事实上,领导人相信,随着政权能够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经济福利,权威主义统治看来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国家统一问题也被用来增强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分别与英国和葡萄牙达成了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的协议。而实现回归是在江泽民任期内。新的领导人重复其为统一中国所付出的努力。国家统一已经成为最敏感的问题,它能容易地唤起爱国主义情感。^① 由此,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对增强江泽民领导权威的有利影响不可低估。

民族主义、有选择的输入与创新

成功的经济开端导致了输入西方国家产品的浪潮。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始终有其独特性,但是支撑经济活动的显然是西方的经济制度形式。

正如在第二章中简要描述的那样,经济改革不是没有其独特挑战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中央权力在有关金融、税收和关键决策领域的明显

^① 王康武,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削弱。在较大程度上,经济改革越成功,对当前政治体制造成的压力就越大。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它要清除自身的僵硬和低效,要从中央计划的“死手(dead hand)”转向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新结合。中央控制的放松释放了比预期还多得多的活力。增长也是不平衡的,有利的沿海地区比相对被忽视的内地发展得更快。许多政府部门未能跟上变革的速度。此外,快速发展有利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大胆的人,但很不幸也带来了贪婪和腐败。由此,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心态是对发展方向很敏感,极大地质疑增长,甚至怀念过去,因为在那个时候事情更确定、更可预料。这些期望无疑向领导人提出了严峻挑战。

57

如何应对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挑战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的不同说法。热点讨论兴起于社会团体之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尽管有来自政府的严密控制(第八章)。这些讨论与一个世纪前当中国面临外国帝国主义挑战时激发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之处。也不存在多少可替代的观点,不过是一些观点比另外一些更具有现实性罢了。

在中国领导人中,一些人认为国家必须回归到计划得更好、控制得更严密的过去,从而把中国从道德失范中挽救出来,权力必须更加集中,从而使中央政府能够纠正内地与沿海之间不断扩大的不平衡。一些人甚至呼吁回归传统价值观,以便与快速传播的西方思想进行斗争。

更现实的改革派领导人较少被道德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呼吁所吸引。重要的是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来支撑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转型。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多少选择。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建构不再有效,因为所有因素都已经在不变的政治体制下发生了变化。激进的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较为可行的替代选择是回归到自愿地、有选择地追随西方道路,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以及复兴中华文明的手段,正如李鸿章、孙中山等人过去所主张的那样。

输入必须有选择,对输入产品的创新也是必要的。一些因素促成了这样的立场。首先,对领导人来说,输入不能破坏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西方国家产品的输入,应该增强而不是削弱中国国家。领导人期望的是改变政治合法性的制度基础,而不是改变统治者。

第二,激进的输入在今天已经逐渐失去市场,因为不存在严峻的外部威胁。全球主义发生于一个与外国帝国主义时代极不相同的时代。中国的民族

主义见证着从追求权力和财富到表达权力和财富的大转型。^① 在整个现代，中国领导人从未停止把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作为救国进而建立一个强大民族国家的首要手段。然而，这个过程常常发生于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之时。作为一个结果，民族主义情感的一面变得重要，排外主义成为不同阶段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主题。当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仍然追求着权力和财富时，民族主义取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如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现其权力和财富。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也带来了大量问题。当然，领导人在选择输入哪些西方国家产品时变得更加自信。输入不仅被用来解决国家遇到的问题，而且用来为新兴经济活动和社会转型建立一个制度框架。更重要的是，它还被用来为中国表达其权力和财富建立一个制度。

可以理解的是，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在使中国国家西化，而是在复兴中国。王赓武观察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残留的希望存活于此，即今日中国的经济实验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体制生存，而且是这一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如果不是全世界的话。^②

在历史上，中国在许多世纪中成为其邻居的榜样。随着中国不断增长的权力和财富，“中国人因此自然而然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再次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③。

如果只是输入西方国家产品而不创新的话，成为一种榜样的目标当然也会使中国人民对领导人感到气馁。虽然资本主义手段已经被用来发展市场经济，但领导人却一直不愿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合法化。相反，他们坚持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这不是因为中国领导人要隐藏其窘境——资本主义^④如今已经蔓延整个国家，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现代经济或者用语错误。相反，这个概念是精心制作出来服务于政权的民族主义目标的。在考虑了解决基本生计问题的各种经济方案后，中国领导人试图发展出一种途径来

^① 参见郑永年，《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根源、过程和前景》，载于林佳龙、郑永年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台北：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版，第 21—40 页。

^② 王赓武，《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p. 20。

^③ 王赓武，《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 36。

^④ 此处及下文中的“资本主义”当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来理解。译者注

使中国置于在全球事务中扮演正确角色的地位。^①

邓小平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固有矛盾,两者都可以理解为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手段。同样,对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或者输入与创新之间也不存在固有的矛盾。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要把中国政治秩序西方化,而是要为变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提供制度基础。借用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处理外部世界事务的准则,在解释后毛泽东时代全球化如何在中国展开时,它仍然是贴切的。

59

^① 王赓武, *The Chinese Way*, p. 21.

第四章 权力、利益与资本主义的正当性^①： 建构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我在此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因为他们是全球化和最好的论述者；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论述常常被中国的官方学者所引用，用来证明中国的全球化以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当性。^③ 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谷源祥的分析，虽然从马克思开始，全球化就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但这不能视为全球化只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① 联系本章所论内容，此处及下文中“资本主义的正当性”一词似应改为“市场经济的正当性”。——译者注

② 《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 页。

③ 我说的“官方学者”指的是那些在政府中任职和为政府服务的人。

也是全球主义者。^① 这就是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时所主张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②

由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联，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正当性的证明也就与对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证明联系在一起。没有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证明，领导人也不会以如此激进的方式推动国家的全球化，更不用说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来重建中国的国家体系了。尽管领导人和人民尚未就中国是否应该以资本主义方式全球化这一问题达成一致，但他们已经决定推动中国的全球化，并且付出了极大努力来推动这个过程。

61

第三章讨论了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为什么以及如何在中国取得了协调共存，并且讨论了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如何推动领导人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在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这个目标。现在党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正当性，而且开始追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际一体化。这种转变是相当激进的，需要深入考察中国领导人意识形态正当性的证明和寻求政治合法性的考虑，才能得到解释。

这一章集中考察在推动中国领导人把资本主义合法化为一种追求财富和权力的手段时，政治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我的观点是，当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两者证明了输入西方国家产品的正当性时，正是政治促使领导人在政治上证明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支撑中国领导人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是他们的动机，他们要维持体制并进而确立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对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热望

邓小平南巡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作为 1989 年事件的后果，政府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出路”，以便指导民众激情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当 1989 年事件表明社会成员追求政治利益要付出巨大代价时，经济“出路”的开放引导他们认识到从政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更加有益。

^① 谷源祥，《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载于教育部编，《五个当代讲稿》，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 页。

^②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于《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用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术语来说,这个策略是要把人民的“公共行动”(要求政治改革)转向“私人利益”(经济活动)。^①这种经济“出路”的政治意义促使领导人将资本主义去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策略导致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62 利益是推动或可以推动行为者活动的根本动力。^②“利益”激发了行为,但行为者对“利益”的定义是不同的:利益可以包括尊重、荣誉、尊严、晚节、经济利益,等等。^③尽管存在多种可能的“利益”定义,但本研究把“利益”理解为“私人财富的合理追求与积累”^④。一种利益驱使的行为,其特征是自我中心,亦即“行为者主要关心的是任何有意图的行为对自身的结果”,以及理性计算,亦即“有计划地努力去估计预期成本、收益、满意度和可能性”^⑤。

创造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很多政治上的好处。首先,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比建立在其他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素(如各种形式的激情)之上的社会秩序更容易治理,因为受利益导向的个人行为比受情感导向的行为更可预见。如赫希曼所指出,“一个人们在其中理性地追求私人利益的世界……较之一个人们在其中互相竞争尊重和荣誉的世界更可预测,从而更可治理”^⑥。第二,在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个人行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可预期的。当个人追求“单一的物质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不会有剧烈的变化。

第三,经济发展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结合,可以使个人行为不断趋向和平。赫希曼这样评论所谓法国术语“商业”(doux commerce):“商业常常是强有力的文明化的推动力,它在贸易社会内部及其之间传播了节俭、廉洁以及类似的美德。”^⑦这一论题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得到了

① Albert O. Hirschman, *Shifting Involvement: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这一部分主要参考 Hirschman,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Hirschman,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From Euphemism to Tautology”, 以及“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载于 Hirschman,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5–55, and pp. 105–141.

③ Hirschman,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From Euphemism to Tautology”, p. 35.

④ 同上, p. 43.

⑤ 同上, p. 36.

⑥ 同上, p. 42.

⑦ 同上, p. 43.

充分的表达。孟德斯鸠断言：“无论何地，如果人们的行为方式是温和的，那么那里就会有商业；无论何地，如果有商业，那里的人们行为方式就会是温和的。这是个一般的规则。商业……软化野蛮的行为方式，使其变得温和，如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那样。”^①

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商业”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民主社会，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政体，如君主政体，甚至专制政体。经济发展能够软化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使用，能够消除掌权者的专断和权威主义的决策方式，从而导致政体变迁。在孟德斯鸠看来，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一些新的经济制度的出现，国家的一些传统权力，例如“随意攫取财产和贬值的权力”，将被大量剥夺。此外，经济发展也会赋予人民权力。商业和机械制造业的进步会推动自由精神的广泛传播。这是因为商业和机械制造业增强了一些社会团体求诸集体行动来反对压迫和管理不善的能力。^②

63

最后，很多学者发现，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会软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亚当·斯密就认为，经济发展以及个人对财富和利益的追求，能够形成一个自发的社会秩序。依据他的说法，市场交易能够产生“事物完善自身的自然进步”，因为它引导个人以理性的方式进行消费和生产。自由的市场交易因此保证消费者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去推进一种目标，而该目标并非个人意图的一部分”^③。换句话说，市场产生了“公共利益”，包括国民财富、没有强制性的社会；当个人有选择和动力去进行理性选择的时候，选择和合作的自由就产生了。^④

的确，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带来的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促使中国领导人去证明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人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但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也随即产生了现存政治秩序与正在出现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个矛盾转而给建立一种适应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新政治秩序带来了压力。

① 引自 Hirschman,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p. 107. 关于孟德斯鸠思想的讨论, 还可参见 Stephen Rosow, "Commerce, Power and Justice: Montesquieu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Politics*, 46: 3 (1984), pp. 346—367.

② Hirschman,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pp. 89—93.

③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43, 456.

④ 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达了类似的思想, 参见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经济发展与政治利益

在改革以前,中国被看作一个依凭政治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依据主要领导人对于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认知而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武器来实现。正如弗朗兹·舒曼(Franz Schurmann)在20世纪60年代正确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的中国像是一个由不同材料的砖瓦筑成的巨大建筑。不论它们怎样结合在一起,它站立了起来。凝聚它们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①。

毛泽东基于自身的社会乌托邦理想,发动了诸多政治试验来改造中国,尤其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其目标在于摧毁所有可能的私人领域,把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化。极权主义的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强制性的制度机构被用来消灭私人领域和管理公共空间。^② 各种各样的组织手段,如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和其他大量的群众组织,把中国建成了一个类似于“军营”的社会。^③

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党领导下的国家得以动员大量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舞台,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权力来源,以便完成深刻的社会工程任务,如土地改革、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党治国家的触及面被缩小了。如徐维恩(Vivienne Shue)指出,高度组织起来的和有效的党治国家逐渐退化成这样一种政体,它着迷于意识形态,在党治国家系统中缺乏有活力的社会基础,并且最终在合法或有效

^①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

^② 邹谠(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③ 关于户口制度的讨论,参进程铁军(Tiejun Cheng)和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 载于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编,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77, pp. 23—50。中国城市的所有组织,如企业、零售店、医院、学校、公社、政府机构,都称为“单位”。一般说来,单位有三种类型:(1)企业单位,包括从事获利行为的所有单位;(2)非赢利单位,包括科学、教育、专业、文化、体育和卫生组织;(3)行政单位或政府机构。关于单位制度的讨论,可参见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J. Perry编,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pp. 3—7。关于“军营社会”的讨论,参见Gregory J. Kasza, *The Conscript Society: Administered Mass Organ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治理上变得越来越困难。^①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这成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通过扩展市场空间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③ 但直到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领导人才把资本主义合法化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

为什么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把资本主义经济合法化呢? 在 1949 年后三十年痛苦而不稳定的实践中,许多领导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学习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党对马克思描述的 19 世纪资本主义有着清楚的认识,但改革开放让党政官员看到了在美国和日本之外,中国大陆的邻居特别是“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领导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如何帮助这些经济体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而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目标。^④ 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中国想要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彻底变革经济体制。这就是领导人决定实行经济改革的动机。当时,许多社会团体,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公开倡导资本主义,真诚地相信资本主义能够为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富强国家铺平道路。鼓舞中国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它们对中国也是相当友好的,它们相信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最终会导致中国的双重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从政治权威主义转向民主。

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革命派领导人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有

65

①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载于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编,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5—88.

② 197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就官方而言,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型的经济改革和改革开放的政策。

③ 关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讨论,参见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王赓武,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⑤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观点,参见 Yan Sun, *The Chinese Reassessment of Socialism, 1976—199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式进行试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愿把资本主义合法化。^①只是在他们看到市场经济并没有损害他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社会主义制度后,他们才愿意赋予资本主义合法性。这个过程可以从官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定义的变化中看出。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领导人把中国的经济制度界定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市场经济在这里并没有获得多少理论上的合法性。五年后,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的经济制度被领导人界定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在1989年事件后,资本主义遭到了严厉批判。保守派领导人把这一事件看作资本主义观念和实践蔓延的产物。^②

为什么在邓小平南巡后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除了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政权生存与政治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外,邓小平决定发展市场经济无疑是导致这种巨大变革的重要原因。邓小平以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的务实作风而闻名。他并不特别反对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毛泽东强调把“道德”或“美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毛泽东倾向于用政治手段来组织社会,而邓小平更赞成用经济手段。尽管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把“小康”设定为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之后,他才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道路。^③

当然这并不能充分解释邓小平为什么要如此艰苦地说服领导集体把资本主义合法化,为什么党要接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内强烈反对的资本主义。这里涉及两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第一,政权的政治利益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得到重建,重建的需要首先为邓小平本人所察觉,随后被新的领导集体所接受。第二,政治利益的重建为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意识形态合理性。换句话说,邓小平相信党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同时

① 王康武讨论了领导集体为什么要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词而非资本主义,参见王康武,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 1*。

② 参见 Yan Sun, *The Chinese Reassessment of Socialism, 1976--1992*。

③ 黄朝翰,“Xiao-kang: Deng Xiaoping'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arget for China”,载于王康武和黄朝翰编,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998, pp. 211-226。

表 4.1 中国的工业总产值,1980—1998

| 年份 | 国有企业(%) | 集体企业(%) | 个体企业(%) | 其他经济 类型企业(%) | 总产值(%) |
|------|---------|---------|---------|-----------------|--------|
| 1980 | 76.0 | 23.5 | 0 | 0.5 | 100 |
| 1985 | 64.9 | 32.1 | 1.9 | 1.2 | 100 |
| 1990 | 54.6 | 35.6 | 5.4 | 4.4 | 100 |
| 1991 | 56.2 | 33.0 | 4.8 | 6.0 | 100 |
| 1992 | 51.5 | 35.1 | 5.8 | 7.6 | 100 |
| 1993 | 47.0 | 34.0 | 8.0 | 11.1 | 100 |
| 1994 | 37.3 | 37.7 | 10.1 | 14.8 | 100 |
| 1995 | 34.0 | 36.6 | 12.9 | 16.6 | 100 |
| 1996 | 33.7 | 36.5 | 14.4 | 15.4 | 100 |
| 1997 | 29.8 | 35.9 | 16.9 | 17.4 | 100 |
| 1998 | 26.5 | 36.0 | 16.0 | 21.5 | 100 |

来源：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3 页。

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①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党及其领导人有意识追求的结果。领导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还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的政治结果。推动领导人上述有意识追求的，正是由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中国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产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没有这一危机，资本主义不会被合法化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不会党的意识形态中合法化。没有领导人有意识的追求，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出来；而没有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十年来的相对和平稳定是不可能的。

经济发展创造出了巨大的政治收益，不仅因为它提高了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国家空间的结构。有意识地追求经济增长，导致了

^①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于《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73 页。

表 4.2 中国私有部门的发展, 1989—1997

67

| | 私营企业* | | | | 个体企业* | | | |
|------|---------|-------|------------|-----------|------------|-----------|-----------|-----------|
| | 数量 | 变化(%) | 雇工 (百万) | 变化 (%) | 数量 (百万) | 变化 (%) | 雇工 (万) | 变化 (%) |
| 1989 | 90581 | | 1.6 | | 12.5 | | 19.4 | |
| 1990 | 98141 | 8.3 | 1.7 | 3.7 | 13.3 | 6.5 | 20.9 | 7.8 |
| 1991 | 107843 | 9.9 | 1.8 | 8.2 | 14.2 | 6.7 | 22.6 | 7.9 |
| 1992 | 139633 | 29.5 | 2.3 | 26.1 | 15.3 | 8.3 | 24.7 | 9.3 |
| 1993 | 237919 | 70.4 | 3.7 | 60.8 | 17.7 | 15.2 | 29.4 | 19.1 |
| 1994 | 432240 | 81.7 | 6.5 | 73.3 | 21.9 | 23.8 | 37.8 | 28.5 |
| 1995 | 654531 | 51.4 | 9.6 | 47.5 | 25.3 | 15.6 | 46.2 | 22.2 |
| 1996 | 819252 | 25.2 | 11.7 | 22.2 | 27.1 | 7.0 | 50.2 | 8.7 |
| 1997 | 960726 | 17.3 | 13.5 | 15.2 | 28.5 | 5.4 | 54.4 | 8.5 |
| 1998 | 1200978 | 25.0 | 17.09 | 26.7 | n. a | n. a | n. a | n. a |
| 1999 | 1508857 | 25.6 | 20.22 | 18.1 | | | | |

* 依据中国官方的定义,“私营企业”是指雇佣 8 人以上的企业,而“个体企业”是指少于 8 人的企业。每年雇工的百分比变化也许并不太精确。

资料来源:改编自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66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02 页。

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出现,^①这个社会秩序又反过来促成了私人领域的兴起和扩展。^②

我们可以从表 4.1 和表 4.2 中看出,私人领域的急剧扩张体现在国有部

① 这里不是充分讨论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兴起的地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术语,如利益和阶层越来越被中国学者用来分析邓小平南巡以后的中国社会。参见朱光磊,《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陆学艺、景天魁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秦少相、贾健,《社会新群体探密: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关于社会团体不断增长的自主性的讨论,参见王颖、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3 年版。另参见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编,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编,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Gordon White,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门的衰退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上。从表 4.1 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55% 下降到了 1998 年的 27%,同期,个体企业的占有额从 5% 提高到了 16%。包括个体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其他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已经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

私有部门的经济重要性日益上升。例如,1996 年,私有部门占零售总额的 4%,但到 1999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13.5%。同期,来自私有部门的工商税收从占全国总额的 1% 上升到了 2.6%。^① 私有部门对地方各级税收资源的贡献也变得更加重要。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省一级,私有部门所缴税额已经占了总税额的 10%,在地区级,占了 20%,在县级,占了 30%。^② 例如,1996 年,浙江省的私有部门缴纳了 44 亿元的工商税,相当于该省工商税总额的 13.4%。在一些富裕地区的乡镇,私有部门所缴税额相当于乡镇总税收的 60%。^③

68

尽管私有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增加了,但这个部门向国家缴纳税额的积极性并不高。例如,1999 年,私有部门占零售总额的 13.5%,但它对全国工商税的贡献只有 2.6%。低税收贡献也反映在表 4.3 中。从 1986—1992 年,私有部门对税收的贡献与其工业总产值相当,但从 1992 年以来,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例如,1998 年,私有部门对税收的贡献只有 7%,而它们所产出的工业总产值占了 17%。^④

私人领域的快速发展破坏了改革以前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经济产生以后,户籍制度已经逐渐解体。随着人们可以从市场上得到日常生活必需品,国家不再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从内地到沿海、从小城镇到大城市的流动。地区间激烈的经济竞争进一步破坏了户籍制度。为了吸引人才,许多城市实质性地放松了原来的户籍制度限制,大量聘用外地人才。^⑤

69

在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的解体导致了社会经济的混乱,但在中国,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私人领域的

① 李强:《关于私营经济的若干资料》,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 年第 5 期,第 18—19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19 页。

④ 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9 页。

⑤ Hein Mallee,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under Reform", 载于 Alan Hunter and Kim-kwong Chan 编,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6。

表 4.3 私营企业与个体企业的税收贡献,1986—1998

| | 纳税额 (亿元) | 占财政收入 比重(%) | 占 GDP 比重(%) | 占工业总产值 比重(%) |
|------|-------------|----------------|----------------|-----------------|
| 1986 | 4.93 | 2.32 | 0.48 | 2.76 |
| 1990 | 14.57 | 4.96 | 0.79 | 5.39 |
| 1991 | 17.42 | 5.53 | 0.81 | 4.83 |
| 1992 | 20.33 | 5.84 | 0.76 | 5.80 |
| 1993 | 29.34 | 6.75 | 0.85 | 7.98 |
| 1994 | 37.03 | 7.10 | 0.79 | 10.09 |
| 1995 | 42.96 | 6.88 | 0.73 | 12.86 |
| 1996 | 46.96 | 6.34 | 0.69 | 15.48 |
| 1997 | 56.79 | 6.56 | 0.76 | 17.92 |
| 1998 | 70.00 | 7.09 | 0.89 | 17.11 |

来源: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0 页。

产生和发展,正是使中国和这些国家区别开来的根本原因。尽管私人领域的兴起仅限于非政治领域,但这种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一,它为社会成员退出公共领域提供了“出路”。没有这一私人“出路”,社会成员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争斗。当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为获胜而努力——有时不惜任何代价——争斗时,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冲突就会增加。私人领域的扩张大大减弱了政治冲突的强度,从而减轻了党和政府的政治负担。

第二,私人领域的存在,使以下情形成为可能:如果社会成员不想参与政治,他们可以保持一种“非政治性”。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里,政治上的冷漠即使有可能,也包含着很大的政治代价。因为所有经济利益都是通过政治手段分配的,因而社会成员忽视政治要自担风险。相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仅容许人们不必过度关心政治,而且鼓励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上。换句话说,政治冷漠不再包含政治风险,政治冷漠的公民可以从市场上得到生活必需品。

第三,由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产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更稳定和更可预期的步伐向前推进。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下,任何政治变化都会影响经济活动。在最糟的情况下,经济活动还可能被政治原则所操控。但在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下,经济活动较少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经济活动具有它们自身的动力。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一种自然本能的力量来抵抗

表 4.4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背景(1) (%)

| 原职业 | 1988 年前开业 | 1989--1992 年开业 | 1992 年已经开业 | 合计 |
|--------|-----------|----------------|------------|------|
| 专业技术人员 | 1.9 | 4.3 | 4.9 | 4.6 |
| 党政干部 | 19.8 | 16.0 | 25.5 | 25.5 |
| 工人 | 13.2 | 8.6 | 10.8 | 10.7 |
| 农民 | 20.8 | 17.9 | 15.8 | 16.7 |
| 家族企业主 | 35.8 | 46.3 | 36.9 | 38.2 |
| 其他 | 8.5 | 6.8 | 6.1 | 6.5 |
| 总计 | 100 | 100 | 100 | 100 |

来源：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3 页。

政治变迁的冲击。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调节会有所减少，但确实使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任何决策都越来越要以经济考量为基础，或者要以有利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为基础。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

政治秩序受到怎样的影响

起初，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在增强党治国家的合法性上是有利的。但是，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利益社会也形成了自身的动力，其结果超出了中国领导人的预期。特别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破坏着现行的政治秩序，给领导人制造出政治改革的压力。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私人领域变得比公共领域更有利可图。新生的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和党政官员。这在邓小平南巡以后更是如此。当时，改革派领导人容许甚至鼓励党政官员投身于商业活动，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下海”浪潮。^① 如表 4.4 所表明，1992 年，党政官员是成立私营企业的第二大群体(25.5%)，仅次于民营企业所有者(36.9%)。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私营企业中，党政官员变成最大的群体，如表 4.5 所表明的。

^① 黄朝翰，“The Xia Hai Phenomenon in China”，*Ritsumeik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 6 (March 1994), pp. 1—10.

表 4.5 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背景(2)(%)

| | 1993 调查 | | | 1995 调查 | | |
|------------------|---------|------|------|---------|------|------|
| | 城市 | 农村 | 合计 | 城市 | 农村 | 合计 |
| 专业技术人员 | 3.9 | 1.6 | 3.3 | 4.1 | 2.3 | 3.3 |
| 城市中国国家部门和集体部门的干部 | 43.2 | 16.6 | 36.3 | 33.2 | 11.8 | 24.0 |
| 农村干部 | 4.1 | 16.9 | 7.5 | 3.5 | 11.2 | 6.8 |
| 非国家部门的干部 | 11.2 | 17.9 | 13.0 | 11.0 | 17.9 | 14.0 |
| 农民 | 4.4 | 16.3 | 7.5 | 6.3 | 17.3 | 11.0 |
| 工人 | 22.9 | 11.4 | 19.7 | 21.7 | 17.5 | 19.9 |
| 小个体企业主 | 8.8 | 18.2 | 11.2 | 15.8 | 18.1 | 16.8 |
| 无业 | 1.5 | 1.0 | 1.4 | 4.5 | 3.8 | 4.2 |

来源:刘兆佳编:《市场、阶级与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 2000 年版,第 328 页。

改革派领导人通过鼓励党政官员下海经商,寻求减少实施激进经济改革政策的政治阻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第一,很多人才,特别是那些大力推动市场改革的人才,离开国有部门而投身私人领域。因为这些人参与了新的经济活动形式,所以非常了解如何通过市场运作来获利。这些人的“流失”实际上削弱了领导人队伍。第二,党政官员的下海经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使用公共权力来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机会。如很多党政官员想方设法和私营部门建立“关系”。^① 根据 1993 年的一份调查,当私营企业家被问到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时,他们的回答如下:专业人士(16.6%);政府官员(24.4%);国有企业官员(18%);工人(1.3%);农民(3.7%);专业艺人(6.4%);服务行业人员(9.5%);小企业主(8.9%);其他(2.9%)。根据这一研究,党政官员和私营企业建立“关系”的目标包括:(1)为他们自己和家人争取经济利益;(2)寻找“下海”的机会,即离开政府部门去经商;(3)寻求私营部门的政治支持,因为这个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②

72 当公共权力被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且越来越严峻。以往,党政干部的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

① 李强,《关于私营经济的若干资料》,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 年第 5 期,第 23 页。

② 引自李强,《关于私营经济的若干资料》,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 年第 5 期,第 23-24 页。

“金钱”已经替代了政治忠诚。腐败不仅破坏了政府的效能,而且破坏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再次摆在了党和政府的面前。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也导致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不能发挥管制党政官员日常生活的主要作用,更不用说对社会成员了。事实上,为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领导人降低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官方意识形态从进攻性姿态转向防御性姿态,也即从作为控制党政干部、指导决策的手段,转变为给党和政府的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的手段。这种转型没有错,领导人和国家都从中获益匪浅。但是,它也产生了未曾预料到的后果。

最严重的威胁是党面临着新兴社会力量要成为政治秩序一部分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努力建立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其目的是鼓励人民从政治利益中抽身出来,转而投身经济利益。这种策略相当成功。在20世纪90年代初,党把资本主义合法化后,社会成员致力于发财致富,政治激情衰减。党和政府的政治压力也减小了。在一定程度上,政府从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合法性。但是合法性的增加是以政治冷漠为代价的。虽然政治冷漠减少了政府的政治压力,但也相应地使现行政治秩序越来越不适应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正在产生的社会秩序仍然要整合进现行的政治秩序,此间存在着巨大风险。这个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经济利益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秩序的利益不会变化。一旦这个社会秩序开始要求分享政治空间时,这个政权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新生的社会秩序有着要求分享政治空间的强烈动机,因为政府政策对其兴衰具有影响。表4.6陈述了1995年和1997年两次对全国商人的调查结果。税收政策、信贷政策、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整和工商管理,被视为是对其商业活动最具影响的政治因素。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希望能参与决策或者至少能够对决策有些影响。而且,私营部门不仅受相关的政府政策影响,也受中国盛行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如表4.7表明的,“权钱交易”、“每况愈下的公共秩序”和“乱收费”已经对私营部门产生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要改变这种社会和政治实践不是易事,需要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73

事实上,私营企业主一直致力于参与政治过程,尤其是地方政治。没有系统的国家统计数据可用来表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程度。但是表4.8表明了20世纪90年代初私营企业主参与地方政治的快速增长。根据1993年的一份调查,平均每一位私营企业主是2.75个组织的成员,如私营企业家协会、

表 4.6 影响私营企业的关键政治因素

| | 1995(%) | 1997(%) |
|-----------|---------|---------|
| 有关产权的法律保护 | 5.1 | 4.1 |
| 政府宣传 | 5.0 | 6.0 |
| 税收政策 | 18.8 | n. a |
| 信贷政策 | 31.8 | 27.2 |
|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 | 23.6 | 17.9 |
| 工商管理 | 2.6 | 31.9 |
| 户口制度 | 0.6 | 5.2 |
| 所有制性质 | 5.0 | 0.4 |
| 其他 | 7.5 | 7.2 |
| 合计 | 100 | 100 |

来源: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0 页。

表 4.7 对私营企业影响最大的社会问题

| | 1995(%) | 1997(%) |
|-------------|---------|---------|
| 分配不公 | 5.1 | 9.9 |
| 权钱交易 | 37.3 | 37.6 |
| 治安恶化 | 20.6 | 41.1 |
|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 31.4 | 6.3 |
| 政府、军队人员经商 | 2.6 | 3.9 |
| 其他 | 8.1 | 1.3 |
| 合计 | 100 | 100 |

来源: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48 页。

74 行业协会、民主党派、共青团,甚至是中国共产党。近 84% 的私营企业家认为他们有必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①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私营企业主影响中国政治过程的另一方式。依据各种调查,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了党。1993 年,在所有私营企业主中,13% 是中共党员,这个比重在 1995 年增加到 17%,1997 年是 16.6%。到 2000 年,比重更增加到近 20%,远远高于其他社会团体,包括工人和农民。^②

① 李强,《关于私营经济的若干资料》,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 年第 5 期,第 27 页。

② 同上,第 26 页。

表 4.8 私营部门在政治组织中的代表

| 年份 |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 中的代表 | 县级以上政治协商会议 中的委员 | 群众代表组织* |
|------|--------------------|--------------------|---------|
| 1990 | 5114 | 7238 | 4603 |
| 1994 | 7296 | 11721 | 7671 |
| 变化 | 42% | 62% | 67% |

* 如共青团、妇联。

来源：《中国工商时报》，1996年4月29日。

表 4.9 私营企业主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自我评价

| | 经济地位 | 社会地位 | 政治地位 |
|------|------|------|------|
| 1993 | 4.5 | 4.0 | 4.6 |
| 1995 | 4.5 | 4.2 | 5.1 |
| 1997 | 4.7 | 4.6 | 5.7 |

表中 1 为最高,10 为最低。

来源：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3 页。

75

私营企业主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参与仍然非常有限。例如，九届全国政协(1998年)2000多名委员中，只有46位是私营企业家。^①较低的政治参与引起了这个团体的不满。如表4.9显示的，私营企业主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评价是一致的，都认为他们的政治地位状况在恶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政治地位的自我评价在1997年达到最低点，而正是在那一年，私营企业被中国宪法正式合法化。^②

对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的反対

私营企业主强烈要求政治参与，并实际地渗透进中国的政治过程，尤其在

① 参见姜南扬，《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载于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17页。

② 邹克渊和郑永年，“China's Thir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 Assessment”，载于A. J. De Roo and R. W. Jagtenberg 编，《Yearbook Law and Legal Practice in East Asia》，vol. 4, 1999. The Hague, London and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p. 29—42.

地方层面,这引起了中国左派的担心,如一些老的意识形态家。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前,左派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警告来自新兴企业家阶级的政治威胁。他们担心随着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掌握政治权力,这种发展会改变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如广为传播的《万言书》所指出,

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其中,国有企业不但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而且]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①

76 尽管有来自左派的异议和政治反对,但1997年党的十五大还是进一步将私有部门合法化了,并且在次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为私有财产权提供宪法保护。一旦私有财产权被合法化并给予了宪法保护,那么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是否可以与其他传统的统治阶级如工人、农民一样享有政治权力?2001年,即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左派再次发动了一场斗争来反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在这些反对声音中,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左派期刊《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了一篇长文。^②

与其他左派人士一样,林炎志认为中国已然形成新资产阶级,成为中国共产党权威的严重政治挑战。在他看来,这种新阶级的形成可以用国家统计数据来判定,也可以用其组织来判定。据统计数据,这种新阶级的规模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了旧的资产阶级。例如,2000年,中国的私营企业达到176万户,比1956年多10倍;雇工2011万人,比1956年多7倍;资产总额达13307.7亿

^①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亚洲周刊》,香港,1996年1月14日,第23页。

^② 参见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第2—11页。

元,比1956年多三四十倍。^①另外,这个新阶级在全国和地方层面上拥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拥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代言人,如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拥有宣传机构,如具有自由倾向的报纸杂志。^②

林炎志认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但其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许多新资本家是先前的党政干部,他们在走进商业世界后丧失了党性。这个新阶级如同旧中国和马克思描述的旧世界中的那些先辈一样,是剥削者。^③最可怕的是,它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在旧中国,资产阶级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中国的资本家也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为中国共产党联合这个阶级为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提供了可能。但是在今天,新兴的资产阶级没有经历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他们中的许多人事实上把社会主义制度视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试图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由此,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和驾驭”这个新阶级。

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和驾驭这个新兴阶级呢?关键是要使新资产阶级“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④。林炎志指出,

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是驾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驾驭资产阶级的关键,是党内没有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党内没有资产阶级的关键,是认清新资产阶级。[黑体为原书所强调]^⑤

特别是,要采取两个主要措施来增强党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和驾驭”。第一,党必须“牢固树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国有经济能够引导、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黑体为原书所强调]”^⑥。其次,党必须保持其纯洁性。林炎志认为:

共产党不能吸收资本家入党,党内不能有资产阶级代理人。有组织上的纯洁性,才有认识的彻底性,才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党才有凝聚力

^① 这个数据排除了那些少于8个雇工的私营企业。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第3页。

^② 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第3页。

^③ 同上,第5-6页。

^④ 同上,第5页。

^⑤ 同上,第7页。

^⑥ 同上,第7页。

和战斗力,才能有本事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

在林炎志看来,资本家人党将对党造成大量的负面影响,党的生存会受到威胁。党将面临三个主要威胁。第一,资本家人党会导致党的多元化。他声称,

党内阶级成分的多元化,就意味着政治多元、思想多元在党内获得了相应的组织基础。多元的政党必定会分裂……(只有)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元成分和多个阶级。^② [黑体为原书所强调]

第二,资本家人党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剥削制度。林炎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一旦这种剥削制度合法化了,中国共产党就会完全变质。据他说,“这些人如果真入了党,其能量首先会用于在党内争夺领导权,改变党的性质。并且,这种改变会具有不可逆性”^③。第三,党将脱离工人与农民。这两个传统的领导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如果给予资本家强大的经济权力,一旦他们入了党,工人和农民就会附属于资本家。结果,中国共产党除了放弃领导权,别无选择。^④

同样地,其时浙江省也很抵制私营企业主入党。浙江是少数几个私有部门飞速发展的省份之一,私有部门在地方经济甚至地方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这种立场表明党的领导人对私有部门政治作用的想法并未达成一致。

78

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在党内成为极具争议的问题。私有部门在1989年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私营企业主不仅出钱,而且还承担了领导作用。^⑤ 在平息1989年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在1989年8月28日发表了一个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第9号文件),阐明“我们

① 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第7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同上,第9页。

⑤ 参见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①。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是这个规定的主要倡导者。^② 1989年8月21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意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③

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私有部门迅猛发展。更重要的是,“下海”浪潮把许多党政干部推向经商并成为资本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加入了党。党内的自由派建议党应该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从而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例如,原河北省副省长郭世昌在一次经济改革会议上提出,“民营经济是我省经济今后强劲发展的动力所在,各有关部门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④。中共著名理论家李君如认为,党应该使私营企业主的资格合法化。^⑤ 这些自由派的观点引起了左派的强烈不满。

建构一个新的政治秩序

新的领导人不仅努力把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和制度化,而且努力寻求一种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能够与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相适应。虽然党领导下的国家已努力有选择地把一些社会团体整合进政权当中,并且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不会容忍任何团体对其权威进行直接的民主挑战。当局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亲民主派组建反对党的尝试所作出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毫不妥协的立场。亲民主派在1998年短短的几个月里,在

79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1989年8月28日),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6页。

② 值得指出的是,12年之后的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明确倡导吸引私营企业主入党。这体现出党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译者注

③ 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页。

④ 引自《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第35—39页。

⑤ 同上,第29—31页。

全国 31 个省的 23 个省份和主要城市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有 14 个省市的筹备委员会提交了注册申请。^① 如果某种民主运动潜在地构成严重的政治挑战,当局会立即粉碎它。只要党领导下的国家“拒绝”直接面对民主挑战,那么它与这些新兴力量之间将一直没有关系。

有关部门采取的粗暴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容纳任何新兴的社会力量。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党的领导人做出很大的努力,试图调整中国的政治体制以适应这个国家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这种反应可以通过概述中国宪法的变化来说明。

中国宪法的变化以两种方式出现:宪法本身的完全变化(1954—1982 年),或者宪法的修正(1982—1999 年)。当政治条件发生变化时,旧宪法有可能被新宪法取代。因此,1975 年宪法被称为“文化大革命宪法”,1978 年宪法是“四个现代化宪法”,1982 年宪法是“改革开放宪法”。同样,宪法的每一次修正都受到领导人需要调整政治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形势的政治考量的激励。这里有必要简要考察一下宪法在关于私营部门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即 1954 年宪法,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第 1 条)。就经济制度来说,宪法规定,国家的目标在于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应当占主导地位,同时其他部门如集体所有制、个体企业、私营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也是容许并存的(第 5 条、第 10 条)。进而,宪法也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存款、财产和其他形式的生产要素(第 11 条),保护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 12 条)。但是,国家有权根据法律和条规征集甚至没收土地及其他形式的生产资料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第 13 条),任何人不可以利用其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第 14 条)。宪法也宣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第 101 条)。

随后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如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几乎完全破坏了 1954 年宪法。1975 年,“四人帮”控制下的党的领导集体起草了一个新宪

^① John Pomfret, “Why ‘Beijing Spring’ Cooled: Dissidents Overstepp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4 January 1999, pp. 1, 7. 起初,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允许民主党成员递交申请。随后,中央政府取缔了民主党,重要的党员被捕入狱,判刑长达 10 至 13 年。这次事件的案例研究,参见萧功秦,《从“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看后邓时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EAI Working Paper*,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1 January 2002。

法。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规定的许多关于公民权利的条款，同时增加了一些条款来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支持党和造反成为宪法承认的公民权利。修正后的宪法条款从原来的106条减少到30条。

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领导下的党的领导集体于1978年对宪法进行了修正。这次修正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的一些条款，宪法总条款增加到60条，但这部宪法总体上还是以1975年宪法为基础的。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宪法认为用物质刺激来推动四个现代化是合法的。

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后，党的领导集体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即1982年宪法。新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几乎所有条款，并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从1954年宪法的106条增加到138条）以满足新的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尽管1982年宪法仍然强调公有制占中国经济的主导地位，但也承认城乡个体经济活动是公有制的补充（第11条）。后来出现的“私营企业”（即雇佣8个工人以上的企业）还没有被合法化。

1988年制定了1982年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其中，修正案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做出了两个重大调整。第一，第11条增加了一些内容：

国家容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11条第三款）

第二，第10条第四款作了修正：国家承认“土地使用权可以根据法律条规进行转让”。这一变化意义重大，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把雇佣、资本积累、土地商业化和其他新兴经济因素合法化了。五年后也就是1993年，第二个宪法修正案出台。1993年修正案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81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官方对市场经济的正式承认引发了新老左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党的领导人奋力前进。1997年党的十五大宣布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制（关于细节，参见第六章）。在1993年宪法修正案基础上，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又一个宪法修正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首次给私营经济提供宪法保护。^①

^① 参见邹克渊和郑永年，“China's Thir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 Assessment”。

尽管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还需要很长时间,但20世纪90年代的宪法变化表明,党的领导集体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来调整国家政治制度,这不仅是为了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为了接纳新的经济制度。

在市场经济被宪法合法化后,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启动接纳资本家的政治步骤。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概念。根据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要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①。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上,江泽民进一步宣布党将从非国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的专家中吸纳党员。江泽民指出,阶级构成的变化已经在中国成为现实,只有从这些社会团体中吸收精英入党,才能进一步振兴党。^② 在传统上,中国共产党声称代表着五个主要团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大多数党员都来自于这些团体。通过允许资本家入党,领导人试图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确立或至少容纳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党的领导集体修改了党章,确立“三个代表”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此次修改把允许资本家入党正式合法化了。^③

82 结论

建构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本章试图分析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政治后果。在1989年事件后,领导集体精心建立起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个秩序带来了十年的国家稳定和快速发展。随着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形成,社会成员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私人经济领域。这不仅是因为私人领域有利可图,而且因为公共政治领域风险太大,如1989年事件所显示的那样。当政治激情转变为经济激情,结果就是政治冷漠。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政权的政治负担大大减少。同时,集中于私人经济领域也产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自身动力,这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

然而,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随时会对这个政权产生一些始料不

① 《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③ 新华社消息,2002年11月18日。

及的政治影响。领导人目的明确地把人民引向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用经济激情来取代政治激情。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人成功了。但随后,现行政治秩序越来越不适应这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这里的危险在于,一旦人们满足了经济激情,他们将为自己要求一个政治角色。当政权从经济发展中享受到政治收益时,它同时也面临着这种发展引发的政治后果。

国家现在不可能再回归到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一旦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政权存活的手段,领导人再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实际上,正在出现的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能从根本上导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灭。领导人能够做的只是重建政治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和正在变化的现实。领导人的当前努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考虑应该如何代表新兴阶级和社会团体的利益。但党能否通过接纳新兴社会阶级而实现自身的转型,这仍有待观察(参见第九章)。

第五章 官僚机构改革与适应市场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市场经济。然而,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套适应市场导向的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在整个改革阶段,中国领导人为建立一个不仅支持而且刺激市场增长的制度付出了巨大努力。经济制度的建设有很多方面。在本章和下章中,我将给出一些案例研究来表明领导人是如何重构或重建国家经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我关注的焦点是 20 世纪 90 年代。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改革的特征是激进的放权,全国性的机构建设并没有得到优先考虑,大部分机构重组或重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朱镕基掌控全国经济改革之后发生的。^①

本章集中在国家经济机构的重构上。首先描述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国家经济制度改革的整个图景,讨论了多次机构改革的成败。随后具体讨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成立。国家经贸委是朱镕基于 1993 年初成立的,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俨然成为中国最重要和最强大的经济机构。这个机构被视为小型国务院,在其中,朱镕基制定和实施了经济改革政策。国家经贸委的案例研究表明了朱镕基是如何实施激进的重组,以便为增长着的市场经济建立一个制度框架的。

^①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及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重组官僚机构的动力

在中国重组官僚机构,从根本上说是努力使官僚制国家机构理性化,从而变得更有效。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解释了中国自1978年到1982年官僚机构改革的脉络,指出这些改革试图削减甚至消除诸如低效、功能失常、冗员、腐败等缺点。^①而且,每次重组官僚机构的更重要目的,是为不断发展着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提供制度基础。“不断发展着的市场导向的经济”这个词突出了两点。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一夜建成的,而是渐进发展的。其次,在建立市场经济时,中国领导人或制度设计者受到计划和重构国家官僚机构的限制。官僚机构重组屈从于官僚利益以及他们的抵抗。自从实行改革政策以来,虽然重组官僚机构的每位设计者都声明重组是要把国家官僚体制变得更理性化,是为了提高效率,但每次重组的结果很不相同。组织人员、结构与运行不仅在很多问题上影响了公共政策结果,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承担这种结果的政治权力分配。重组常常变成一种政治博弈。

84

每次官僚机构的重构,也都服从于个人的权力利益。民主社会的权力博弈是通过政党政治和公开的大众选举进行的。但在中国,权力分配由机构重构来实行。每位领导人需要有自己的机构工具来实施自己治理官僚体制的理念,并执行他的政策。

约翰·伯恩斯发现,中国每次重大的官僚机构改革常常伴随着新的“候任总理”的产生而发生。^②虽然领导人集体设计官僚制改革,但“候任总理”在计划这种重构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被挑选的候任总理必须考虑如何利用这种重构来巩固和加强他的权力。虽然被挑选的总理并没有多大的自由空间来改变国家官僚制的结构,也即国务院,因为其他领导人也要在重构计划上表态,但他有权建立新机构来制定和实施那些表达自己的而非其他领导人取向的政策。因此,在赵紫阳(1982—1987年)和李鹏(1988—1992年)时期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朱镕基时期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些机构不仅实施新一届政府制定的新政策,而且不断为其主要支持者建立组织权力基础。

^① John P. Burns, "Reforming China's Bureaucracy, 1979—1982", *Asian Survey*, xxiii: 6 (June 1983), pp. 692—722.

^② 根据中国宪法,总理由国家主席任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批准中国共产党的决定。

85 官僚机构改革：一个回顾

从194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努力要提高国家官僚体制的功能、效率或可信度。由于中国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官僚机器在前改革时代特别不稳定。从1978年以来，党的工作重心从政治运动转向经济发展，国家官僚体制的改革相应地从服务于“革命”任务转向服务于“改革”目标。

我们可以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过程划分为两个不同阶段，一前一后都伴随着国家的经济转型。第一阶段是邓小平的改革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7年，其间每次改革都体现出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第二阶段是从1998年至今，由朱镕基总理主持，其特征是服务于市场经济。

1982年赵紫阳的重组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政府官员重返政坛。伴随着这些人的复出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增加了许多部门。1978年的国务院只有76个机构，到1981年已达到100个。

当领导人于1982年开始雄心勃勃地实施官僚机构改革计划时，其目的是要提高国家机构的效率和反应。改革受到地方、单位和部门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在那一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改革提案，将副总理的人数从18个削减到3个，将机构数量从100个（52个部委）削减到61个（43个部委）。

总体而言，1982年改革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杂。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为了适应意识形态的变化。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大，领导人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即以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为补充。

表5.1列出了1982年重组前后的部委。一方面，一些部委被设计出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这些部委要么是通过撤销，要么是通过合并而产生。例如，国家经济委员会取代了五个国家委员会、国务院的一个工作组以及五个国家总局，成为管理市场经济的强大委员会，与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旧的计划经济的标志形成制衡。商业部也取代了两个部和另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另一方面，许多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的部委依然不变，或

表 5.1 1982 年的国务院各部委

86

| 改革前:52 个 | 改革后:43 个 |
|----------------|-------------|
| 外交部 | 外交部 |
| 国防部 | 国防部 |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 国家经济委员会 | |
| 国家农业委员会 | |
|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 |
|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 | |
| 国家能源委员会 | |
| 国务院财贸小组 | 国家经济委员会 |
| 国家标准总局 | |
| 国家计量总局 | |
|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 | |
| 专利局 | |
| 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 | |
| —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 公安部 | 公安部 |
| 民政部 | 民政部 |
| 司法部 | 司法部 |
| 财政部 | 财政部 |
|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国人民银行 |
| 中国农业银行 | |
|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中国银行) | (取消) |
|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 |
| 商业部 | |
|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 商业部 |
| 粮食部 | |
| 对外贸易部 | |
| 对外经济联络部 | 对外经济贸易部 |
| 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 | |
| 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 |
| 农业部 | |
| 农垦部 | 农牧渔业部 |
| 国家水产总局 | |

87

续表

| 改革前:52个 | 改革后:43个 |
|-------------|-----------|
| 林业部 | 林业部 |
| 水利部 | 水利电力部 |
| 电子工业部 | |
| 国家建筑工程总局 | |
|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 |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
| 国家测绘总局 | |
| 地质部 | 地质矿产部 |
| 冶金工业部 | 冶金工业部 |
| 第一机械工业部 | |
| 农业机械部 | |
| 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 | 机械工业部 |
| 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 | |
| 第二机械工业部 | 核工业部 |
| 第三机械工业部 | 航空工业部 |
| 第四机械工业部 | |
| 国家广播电视工业总局 | 电子工业部 |
| 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 | |
| 第五机械工业部 | 兵器工业部 |
| 第六机械工业部 | (取消) |
| 第七机械工业部 | 航天工业部 |
| 煤炭工业部 | 煤炭工业部 |
| 石油工业部 | 石油工业部 |
| 化学工业部 | 化学工业部 |
| 纺织工业部 | 纺织工业部 |
| 轻工业部 | 轻工业部 |
| 铁道部 | 铁道部 |
| 交通部 | 交通部 |
| 邮电部 | 邮电部 |
| 国家劳动总局 | |
| 国家人事局 | |
| 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 | 劳动人事部 |
| 国家编制委员会 | |
| 中央广播事业局 | 广播电视部 |
| 教育部 | 教育部 |
| 卫生部 | 卫生部 |

续表

| 改革前:52 个 | 改革后:43 个 |
|-----------|-----------|
| 文化部 | |
|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 |
| 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 | 文化部 |
| 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 |
|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 |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来源:苏尚尧、韩文伟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3—82 页。

者没有重大调整,或者只是改变了名称(如冶金工业部、核工业部、地质矿产部)。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新建的,由赵紫阳总理领导。赵紫阳需要自己的机构来设计经济体制改革,以便发展市场经济因素。这个委员会成为他任期内的智囊团和权力基础。

89

新一届政府保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扩大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它吸收了五个被废除了的委员会的部分计划和政策协调功能——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家能源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务院财贸小组。但是,长期的基本建设计划归属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同时基本建设工程管理则由一个新部门来执行,即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原基本建设委员会下面的 100 多个工厂直接归属这个新部门。这些变革使国家经济委员会对农业、工业、基本建设、铁路运输、财政金融事务、对外贸易的一些方面以及起草年度国家经济计划负责。

国家委员会的精简(削减到 7 个)只是 1982 年改革计划的一部分。1982 年 3 月,赵紫阳宣布国务院部委的数量将从 52 个减到 39 个,但到 5 月份,他修正了这个数字,上升为 41 个,到 1982 年年底上升到 43 个。这表明他受到了一些部门的抵抗。尽管如此,这些改革精简了国务院近 17000 名工作人员。^①

^① John P. Burns, "Reforming China's Bureaucracy, 1979 -1982", *Asian Survey*, xxiii: 6 (June 1983), pp. 692 - 722.

尽管赵紫阳不能完全改变计划体制,但他创造了许多新机构。原来建立的机构和新建立的机构之间需要很长时间来彼此适应。例如,1983年增设了审计署和国家安全部,1986年增设了监察部和其他国家总局。同时,撤销了机械工业部、兵器工业部,设立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

重组后的国务院机构有61个,其中有43个部委。但五年后,机构数量再次增加到72个,其中部委45个。从1981年的100个机构到1982年的61个,再到1987年的72个,改组经历了从精简到再扩张的循环。

1988年李鹏的重组

90 198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大,党的领导人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概念,强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在党的意识形态里被赋予了与计划经济同等的地位。李鹏成为这次大会挑选的总理,这表明他会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理。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为1988年的重组创造了政治环境。然而,1988年改组的策划者却采取了保守的立场,这严重影响了改组的性质。当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已经遇到了严峻挑战,保守派势力开始抬头。领导集体中的保守派也进一步强大起来。

表5.2显示出1988年改组后各部委的变化。能源部的组建合并了三个部门。大部分被废除的部门成为国有企业,如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这也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举措。但物资部的组建却是倒退到计划经济。这个部门负责编制指令性计划物资的分配计划,组织指令性物资和重要物资的订货等。^①

1988年一个特别重要的合并改组发生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它被具有1300名工作人员的超大规模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接管。国家经济委员会从1979年建立以来,着力于扩大企业自主性,而国家计划委员会则始终不懈地支持计划经济。在国家经济委员会被归入国家计划委员会之时,改革浪潮失去了最高层机构的倡导者。

^① 苏尚尧、韩文伟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1949—1990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

表 5.2 1988 年的国务院各部委

91

| | |
|------------------------|-----------------|
| 改革前:45 个 | 改革后:41 个 |
| 外交部 | 外交部 |
| 国防部 | 国防部 |
|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委员会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 国家教育委员会(1985) | 国家教育委员会 |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 |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 公安部 | 公安部 |
| 国家安全部 | 国家安全部 |
| 监察部(1986) | 监察部 |
| 民政部 | 民政部 |
| 司法部 | 司法部 |
| 财政部 | 财政部 |
| 劳动人事部 | 劳动部 |
| — | 人事部 |
|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 建设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
| 煤炭工业部 石油工业部 核工业部 | 能源部 |
|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 电子工业部 | 机械电子工业部 |
| 航空工业部 航天工业部 | 航空航天部 |
| 地质矿产部 | 地质矿产部 |
| 冶金工业部 | 冶金工业部 |
| 化学工业部 | 化学工业部 |
| 轻工业部 国家烟草专卖局 | 轻工业部 |
| 纺织工业部 | 纺织工业部 |
| 铁道部 | 铁道部 |
| 交通部 | 交通部 |
| 邮电部 | 邮电部 |

92

续表

| 改革前:45 个 | 改革后:41 个 |
|-----------|-----------|
| 水利电力部 | 水利部 |
| 农牧渔业部 | 农业部 |
| 林业部 | 林业部 |
| 商业部 | 商业部 |
| 对外经济贸易部 | 对外经济贸易部 |
| — | 物资部 |
| 新华社 | (取消) |
| 文化部 | 文化部 |
| 广播电影电视部 | 广播电影电视部 |
| 卫生部 | 卫生部 |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国人民银行 |
| 审计署 | 审计署 |

来源:改编自乌杰编:《中国政府与机构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93—395 页。

1993 年李鹏的重组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并将之确立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依据高层的政治方向,新一轮的官僚机构改组浪潮开始发动,试图通过调整国家官僚机构体系来满足市场经济的要求。十四大决定由李鹏连任总理。李鹏负责了 1993 年的改组。

93 人们本来预期邓小平南巡后的改组会是激烈的,大多数支撑计划经济的国家机构应该会被废除,而一些支持和推动市场经济的新机构会被组建起来。但是这些预期的变革并未出现。

表 5.3 表明,1993 改组后的官僚制结构并没有多大变化。一些部门撤销了,另一些则一分为二。能源部扩张成两个部门(煤炭部和电力部)。机械部与电子工业部也同样不断扩张。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方面,唯一显著的发展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建立,由新任命的副总理朱镕基领导。这个委员会后来成为朱镕基实施激进经济改革的组织基础。

表 5.3 1993 年的国务院各部委

94

| 改革前:41 个 | 改革后:40 个 |
|-------------|-------------|
| 外交部 | 外交部 |
| 国防部 | 国防部 |
| |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
| 国家教育委员会 | 国家教育委员会 |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 公安部 | 公安部 |
| 国家安全部 | 国家安全部 |
| 监察部 | 监察部 |
| 民政部 | 民政部 |
| 司法部 | 司法部 |
| 财政部 | 财政部 |
| 劳动部 | 劳动部 |
| 人事部 | 人事部 |
| 建设部 | 建设部 |
| 能源部 | (取消) |
| | 电力工业部 |
| | 煤炭工业部 |
| 机械电子工业部 | (取消) |
| | 机械工业部 |
| | 电子工业部 |
| 航空航天工业部 | (取消) |
| 地质矿产部 | 地质矿产部 |
| 冶金工业部 | 冶金工业部 |
| 化学工业部 | 化学工业部 |
| 轻工业部 | (取消) |
| 纺织工业部 | (取消) |
| 铁道部 | 铁道部 |
| 交通部 | 交通部 |
| 邮电部 | 邮电部 |
| 水利部 | 水利部 |
| 农业部 | 农业部 |

95

续表

| 改革前:41 个 | 改革后:40 个 |
|-----------|-----------|
| 林业部 | 林业部 |
| 商业部 | (取消) |
| 对外经济贸易部 | 对外经济贸易部 |
| | 国内贸易部 |
| 物资部 | (取消) |
| 文化部 | 文化部 |
| 广播电影电视部 | 广播电影电视部 |
| 卫生部 | 卫生部 |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国人民银行 |
| 审计署 | 审计署 |

来源:改编自乌杰编:《中国政府与机构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14—421 页。

朱镕基领导下市场导向的机构建设

领导人是重要的。在改组国家官僚体制时,每位领导人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相似的约束,但实际结果却非常不同。这些不同显现出个别领导人对市场经济的认可程度及其权力扩张的程度。

邓小平曾经描述过政策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①

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地从计划经济演化而来。领导人的干预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还是不改革,两种决定都有政治风险。不管领导人做什么,都会影响到现行的权力、利益分配。在最高层,邓小平本人在推进市场导

^① 引自《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 年 6 月 9 日),载于《人民日报》,2000 年 7 月 1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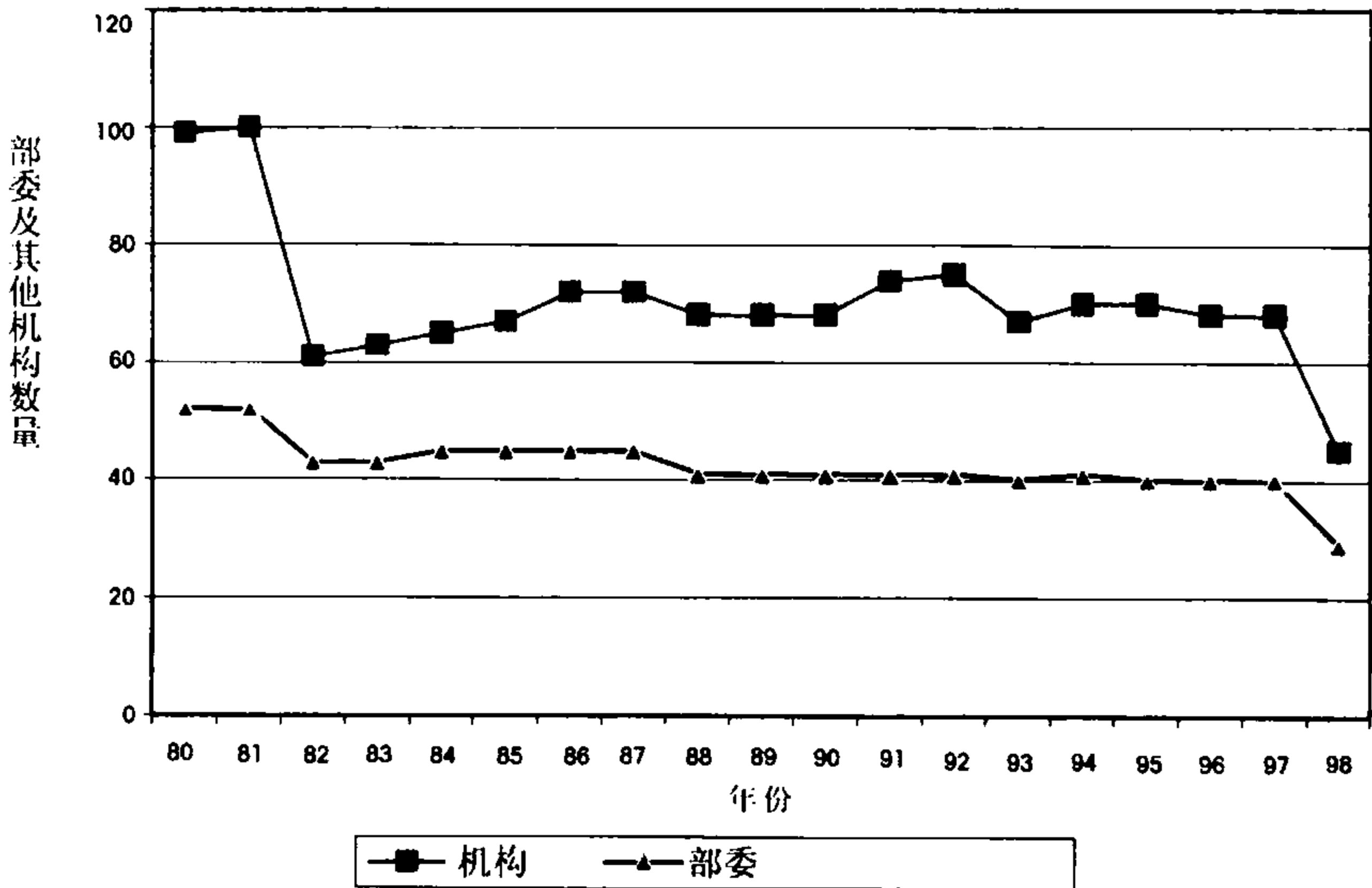


图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机构改革走势图, 1980—1998

向的经济改革、把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多年的国家机构改组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在不同领导人领导下,其发展是不平衡的。

图 5.1 显示出了改组的趋势。两次最激进的变化分别发生于 1981—1982 年和 1997—1998 年。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改组之后,国家机构的数目相对维持不变,直到朱镕基于 1997—1998 年开始改革。事实上,两次改组计划都被视为中国国家体制改革的里程碑。但是,这两次改组之间也有不同之处。前一次改革是通过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运行机制来实现,同时把旧结构的大部分完整保留下来。与之相比,后一次改革的特征是重建机构的结构来适应市场经济。我首先对 1993 年的改组作一个概述,然后讨论朱镕基在建立一个中国版的“国际贸易产业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即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上付出的努力。

1998 年的机构建设

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宣布新一届政府将把国有企业改革置于政治议程之首。在那次会议上,朱镕基成为下一届全国人民代

- 97 表大会(1998年)挑选的国务院总理人选,这意味着朱镕基将成为1998年国家官僚体制改组的主要设计者。如预期的那样,在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朱镕基宣布他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将首先致力于改革和重组国务院及其各部门。按照朱镕基的计划,现有的40个部委将削减到29个,即精简28%。国家公务员的数量将从现有的800万人精简掉一半。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样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还是首次。

适应市场

表5.4显示出1998年改革前后的国务院的结构。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些主要的变化。首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得到了重建。这个委员会在1982年设立,旨在规划中国的经济改革,随后成为国务院下面一个重要的正式机构。事实上,赵紫阳、李铁映、李鹏、陈锦华都作为主任在此机构工作过,这表明了该委员会的重要性。但是,1988年之后,这个委员会在方向上变得非常保守。在朱镕基作为副总理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他不能也不曾利用这个委员会来创设和执行他的改革政策。在朱镕基成为总理之后,他决定绕过这个委员会,尽管不能完全忽视它。这个委员会并不是作为一个正式机构而重组的,它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高层顾问机构。朱镕基成为主任,许多部长是其成员。

第二个重大变化发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取消,只是名字改成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是旧的计划经济的标志,改革它并不容易。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它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尽管还拖延着。大部分领导人在这个委员会如何演化、行使何种功能等问题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李鹏和姚依林时期,其地位得到增强。在朱镕基时期,其重要性再次减弱,随着名字的变化,它降低为一个关注中国长期发展计划的研究机构。

第三,各部门的部长数量从12个削减为3个——与先前的改革努力相比,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政企分开计划中的一个要素,政企分开这个目标被改革派领导人视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据此,建立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新机构,就是为了处理就业问题,以及设计一个更有效的社会保障计划来帮助那些失业者。

表 5.4 1998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98

| 改革前:40 个 | 改革后:29 个 |
|-----------|-----------|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 科学技术部 |
| 国家教育委员会 | 教育部 |
| 外交部 | 外交部 |
| 国防部 | 国防部 |
|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
| 电子部 | |
| 煤炭工业部 | |
| 冶金工业部 | |
| 机械工业部 | |
| 化学工业部 |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 国内贸易部 | |
| 国家纺织工业局 | |
| 国家轻工业局 | |
|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 |
| 化学工业总公司 | |
| 电子工业部 | |
| 邮电部 | 信息产业部 |
| 广播电影电视部 | |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
| 公安部 | 公安部 |
| 国家安全部 | 国家安全部 |
| 监察部 | 监察部 |
| 民政部 | 民政部 |
| 司法部 | 司法部 |
| 人事部 | 人事部 |
| 财政部 | 财政部 |
| 建设部 | 建设部 |
| 铁道部 | 铁道部 |
| 交通部 | 交通部 |
| 水利部 | 水利部 |
| 农业部 | 农业部 |
|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
| 文化部 | 文化部 |
| 卫生部 | 卫生部 |

99

续表

| | |
|--|-------------|
| 改革前:40 个 | 改革后:29 个 |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
|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国人民银行 |
| 审计署 | 审计署 |
|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国家计委国防司 军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 |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
| 劳动部 人事部社会保险职能 民政部农村社会保险职能 卫生部公费医疗管理职能 |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
| 地质矿产部 国家土地管理局 国家海洋局 国家测绘局 | 国土资源部 |
| 林业部 | (取消) |
|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 (取消) |
|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取消) | |

来源:改编自《瞭望》编辑部编,《国务院机构改革概览》,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10 页。

100 切断军队与商业的联系

第四,一个特别重要的改革措施是朱镕基实行了军队的去商业化。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从军事企业中接管了一些政府功能,并且从 1949 年以来首次由一位文官,财政部前副部长刘积斌出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刘积斌的任命完全是朱镕基支持的,标志着朱镕基决心切断军队与商业的联系。

从很早开始,中国军队就参与各种类型的商业活动,如粮食生产、设备修理、运输、采矿、服务以及其他军队所需日常用品的供应。^①许多企业由总后勤部及其地方单位管理,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也管理着自己的企业。

由于经济改革,军队与商业的联系有所增加。军队作为企业角色的扩张

^① 张震龙编,《军队生产经营管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16 页。

最初可归因为预算的限制。^① 这些商业企业的最初目的是为军队需求服务,促进自给自足,它们的活动几乎完全受到军队的限制。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其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广泛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商业活动的军队,包括采矿、制鞋和服装生产、药物和化学品制造、饭店和度假村、房地产、机械工业、运输、通信技术。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的几个公司出现组建企业集团的趋向,军队的商业网络延伸到了整个中国,甚至国外。到 20 世纪 90 年代,军队所有的公司向美国的鱼类食品加工公司出售了以千吨计的白鱼。据报道,解放军所有或控制的以公司为名的商业性企业在泰国、香港以及美国的亚特兰大和达拉斯也拥有房地产。^②

101

军队与商业的联系在许多方面大大削弱了解放军作为一支现代化军事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在军队内部产生了一些问题,如职业道德、内部团结、军队士气和纪律等问题。而最让朱镕基担心的是,民法一般不适用于与军队有关的企业,军队与商业的联系破坏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其他的负面影响中,军队参与赢利活动最具破坏性的一面是,这些活动与城镇的政治经济纠缠在一起,因为许多这样的商业活动都是地方性的。如已为人所知的,军队的商业买卖有助于培育区域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权力,以与中央政府相抗衡。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军队的经济福利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驻地方军队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驻地方军队常常帮助地方政府官员从事灰色的经济交易。军队与地方的商业勾结倾向于加强地方对中央政府的反抗。

在朱镕基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支持新一届政府立刻开展一场重要战役来切断军队与商业的联系。1998 年 7 月,江泽民勾勒出进行这场战役的步骤。^③ 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尉健行这些主要领导人都参与了重组解放军的过程。朱镕基反复强调所有军队开支都必须由中央提供。^④ 1998

^① 关于预算问题和人民解放军企业的更具体分析,见 Thomas J. Bickford,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Its Business Operations: The PLA as Entrepreneur", *Asian Survey*, xxxiv: 5 (May 1994), pp. 460-476.

^② John Pomfret, "Jiang Orders Military to Go Out of Business; in an effort to end rampant smuggling, army must close commercial empir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23, 1998.

^③ "PLA Told to Close Down All Its Firms", *China Daily*, July 23, 1998.

^④ "PLA to Get \$28b for Busine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3, 1998; "PLA Chief Accepts \$47b Payou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9, 1998.

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大力解决军队—商业联系的敏感问题。这个工作组由朱镕基亲自主持,胡锦涛和张万年将军是他的副手。这个工作组直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这个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包括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盛华仁、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这个强大的工作组的目标是加快军队去商业化的进程。在这年年底,工作组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正式断绝对先前为它们所有的商业组织的控制。^①

102 小型国务院(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发展

最后,1998年机构改革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接管了七个原有部委、两个国家局、两个大型国有企业,由此成为国务院最强大的组织,成为众所周知的小型国务院。国家经贸委的形成和发展与朱镕基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紧密相连。对国家经贸委由来的考察,有助于揭示出中国改革派领导人是如何与前市场经济的国家结构作斗争,以获得公认并实行改革的。

经济贸易办公室和朱镕基最初的改革努力

1991年初,朱镕基在春节后即被邓小平调入北京,但他在中南海的生涯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朱镕基负责开始新的经济改革,但这不是保守派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朱镕基被邀请去指导国务院的一些办事机构,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和国家安全生产委员会。但是,对于支持他的所有重要改革而言,这些办事机构太小也太不重要了。到1991年6月,朱镕基仍未找到一个机构可以开始他的经济改革。一年后,即1992年6月,中央领导决定建立一个新机构来主管经济改革,即经济贸易办公室。

如前所述,在1982年赵紫阳改组机构时,国家经济委员会得以重建,并成为赵紫阳创设和执行市场导向的改革政策的组织基础。但1988年的机构重组恢复了计划经济的重要性,那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被整合进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贸易办公室的建立是改革派领导人推动经济改革的另一步骤。

朱镕基被任命为主任,经济贸易办公室里很多具有改革倾向的政府官员

^① 《明报》(香港),1998年12月15日。

表 5.5 1992 年经济贸易办公室的成员

| 名字 | 职务 | 教育背景 | 经历 |
|-----|-----|----------|-----------------------|
| 朱镕基 | 主任 |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 |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上海市市长 |
| 王忠禹 | 副主任 | 大专,经济学 | 吉林省省长 |
| 张彦宁 | 副主任 | 大专,化学工程 |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 |
| 赵维臣 | 副主任 |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 | 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 |
| 李祥林 | 副主任 | 大学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
| 杨昌基 | 副主任 | 大学 | 上海浦东新区 |
| 朱育理 | 副主任 | 大学 | 国家技术监督局 |

都支持他。表 5.5 列出了这个办公室的领导班子。朱镕基的追随者中几乎有一半来自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或者上海,这表明他们是朱镕基以前的同事。他们对中国计划经济的深刻认识以及他们的改革心态,有助于朱镕基为国家设计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经济贸易办公室的建立给予了朱镕基权力,成为他在国务院的组织基础。凭借这个基础,朱镕基能够创设和执行新的经济政策,而不会受到保守派领导人的过多干预。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3 年)

在 1993 年 3 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经济贸易办公室升格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贸委的目标是调整国家官僚机构,使其适应长期的市场经济,其直接目标是改组中国的国有企业。依据国务院的规章制度,国家经贸委旨在通过各种支持市场的方法来推进市场经济,包括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强化和提高适应市场规律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在短期内,国家经贸委必须集中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确立现代企业制度。^①

由于朱镕基是中国全面经济改革的负责人,因此这个委员会直接听命于朱镕基。王忠禹成为首届主任。王忠禹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他从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毕业后,在吉林省的一家造纸厂工作,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在

^① 国务院,《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8—60 页。

表 5.6 1993 年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名字 | 出生年 | 职务 | 教育背景 |
|-----|------|--------|-------------|
| 王忠禹 | 1933 | 委员会主任 | 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 |
| 杨昌基 | 1932 | 委员会副主任 | 南京医科大学 |
| 徐鹏航 | 1940 | 委员会副主任 | 湖北大学机械工程 |
| 陈清泰 | 1937 | 委员会副主任 | 清华大学自动化 |
| 石万鹏 | 1936 | 委员会副主任 | 北方交通大学 |
| 俞晓松 | 1937 | 委员会副主任 | 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开始经济改革,王忠禹获得提升并在省政府担任过许多职务。1985 年,他成为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1989 年当选为吉林省省长。吉林是中国国有企业较多的一个省份。王忠禹成为朱镕基国有企业改革的强有力支持者,他在国有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正是朱镕基所需要的,由此改革国有企业就成为国家经贸委的直接目标。

尽管得到了邓小平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的支持,但在事实上,朱镕基还是受到了保守派的严重制约。虽然他已经成功地创立了国家经贸委,但他不能在 1993 年机构改革中发挥有影响力的作用。在那时,许多经济机构仍然与保留下来的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直到 1997 年朱镕基成为候任总理后,他才得以掌控整个国务院机构改革,而国家经贸委也再次经历了重大转型。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1998 年)

前面已经提过,1998 年的机构改组是过去所有机构改革浪潮中最激烈的一次。特别是,通过接管许多过去独立的产业部门和总局,国家经贸委大大扩大了。所有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朱镕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念。

有许多因素推动了朱镕基及其追随者发动激进的改革。首先,在朱镕基看来,一个笨拙的政府结构和缓慢的官僚机构改革过程对国有企业改革负有责任。^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国有企业是正常的。朱镕基的理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是政企分开。但是不消除国有企业的旧机构,任何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都是徒劳。正如中国谚语说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要赶跑和尚,唯一的出路是推倒庙。无疑,1998 年机构改组要清除的许多部门

^① 罗干,《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几点说明》,载于《文汇报》(香港),1998 年 3 月 7 日, A7。

都是经济机构,这并不是巧合。

第二,来自内外部的压力要求进行一种激进的机构重建。在内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失业和下岗工人急剧增加,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① 在外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领导人发出了信号,如果中国国有企业及其金融制度不迅速予以改革,中国就不能避免其他许多亚洲国家所经历过的不幸。

第三,大胆的改革为创建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所需要。政府官僚机构与企业的密切关系会使任何反腐败手段失效。腐败反过来不仅削弱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执行政策的能力,而且严重侵蚀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朱镕基成为总理后,具有一整套改革的新理念,他希望进行一场新规则之下的新博弈。要增强他的权力需要执行这些新规则,这反过来需要一种新型的机构,在其中朱镕基能够动员实现目的所需的必要资源。国务院的改组,尤其是国家经贸委,无疑给朱镕基提供了重构他自己的权力基础的机会,以执行他的改革政策。

重组后的国家经贸委整合了以前的六个部,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经整合后,这些部降级为总局,不再管理国有企业。随着这些变化,新委员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调控机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重组,朱镕基希望这个委员会在领导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时,能发挥类似日本国际贸易产业部的作用。中国大规模改革国有企业的主要策略是组织大的产业集团,类似于韩国的财团(*chaebols*)。新委员会在这样的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新委员会可视为朱镕基主要的权力基础。表 5.7 表明了 1998 年机构改组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许多国有企业家晋升到国家经贸委中。例如,前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经理盛华仁被任命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是管理中国最大国有企业的成功企业家。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改组和扩张的目标是要执行朱镕基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当然,盛仁华的晋升旨在实现这个目标。

106

^① “下岗工人”指那些被要求离开原来公司但保留部分收入的人,他们可以在其他企业从事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工作。关于“下岗”的讨论,参见邱泽奇和郑永年,“Xia-Gang and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Reducing Labor Redundancy in China's SOEs”,载于王康武和黄朝翰编,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1-226。

表 5.7 1998 年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 名字 | 出生年 | 职务 | 教育背景 |
|--------|------|--------|-----------|
| 盛华仁 | 1935 | 委员会主任 | 大专,管理专家 |
| 蒋黔贵(女) | 1941 | 委员会副主任 | 大学,高级工程师 |
| 王万宾 | 1949 | 委员会副主任 | 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
| 张志刚 | 1945 | 委员会副主任 | 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
| 石万鹏 | 1936 | 委员会副主任 | 大学,高级经济师 |
| 于珍 | 1936 | 委员会副主任 | 大学,高级经济师 |
| 李荣融 | 1944 | 委员会副主任 | 大学,高级经济师 |
| 陈光复 | 1938 | 委员会副主任 | 大学,高级工程师 |

结论

本章表明了中国官僚机构改革如何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如何随着中国共产党部分意识形态立场的转变而得到推进。直到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领导人才认识到官僚机构体制应该怎样重组以拥抱市场经济。但是,1993年的国家机构改革并没有成功。只是在1997年后朱镕基成为总理并完全负责经济改革之后,激进的机构重组才得以实行。

国家机构的改组旨在适应市场导向的经济增长,使国家官僚体系更有效地管理日益复杂的经济。朱镕基的改组适应了市场原则,国家官僚机构不断配合着市场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朱镕基和改革派领导人已尽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制度环境。

107 机构改组也是中国领导人试图重建一个现代经济国家的一部分。朱镕基和其他改革派领导人的所有作为,都嵌入了这样一种理念,即机构改组要有利于中国官僚机构体制的现代化,使之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日益复杂化的社会。如何维持中央对经济和社会的权力?这是领导人在提出大量改革措施时的一个主要考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机构改组一方面是增量渐进的,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断断续续的。只有在领导人确认了他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发动更激烈的改革。

朱镕基在1998年3月宣布,他的政府将在三年内致力于完成全国性的机构重组。到1998年底,朱镕基成功地执行了他的一些改革创议。国家机构的

重组在中央层面上实现了,过剩的政府官员被按计划调动或者分流。然而,在初步的成功之后,改革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向前推进。例如,朱镕基政府打算在1999年完成省一级的国家机构重组,但是直到2000年仍未执行。许多因素可解释这种迟滞。首先,就其本身而言,这个计划被认为是非现实主义的。大规模的分流对政府应有职能的发挥产生了负面影响。在1999年,虽然政府宣布成功实现了中央层面的机构重组,但实际上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却“回流”了。许多省级政府不断质疑这个计划,并且在他们的层面上并不立即加以执行。第二,朱镕基政府把精力从机构重组计划中转移了,因为他们必须应对1999年的其他重要事务,如中国加入WTO、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法轮功的兴起。第三,地方强烈反对执行中央计划。各省官僚机构的宏大规模和巨大差异使得机构重组极为困难。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困难,但朱镕基政府还是成功地在2000年初推动了省级机构重组。在这年年底,大部分省市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改革目标。例如,河南省政府机构由原有的53个精简为40个;海南省政府机构从38个减为32个;北京市政府机构从67个减为46个;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机构从59个减为40个。从全国平均值看,省级机构精简了20%,人员编制减少了47%。^① 尽管县、乡级机构重组并没有严格按计划进行,但所有这些改革为中国不断发展着的市场经济建立起了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虽然可以预期未来仍会进行一些增量调整以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现实,但是中国的官僚机构体系不会再像前面那样剧烈变革了。这是朱镕基为中国官僚机构体系应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而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之一。

108

^① 辛向阳,《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三年进程与未来走势》,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第六章 建立一个现代经济国家： 税收、金融与企业制度

国家官僚机构改组主要是为了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并没有告诉我们中国政府是如何利用现代经济手段来管理和调节经济的。这一章转向后一方面,集中考察税收、金融和企业制度这些关键部门的改革。在改革中国的财政和金融体制时,领导人试图努力实现两个主要目标。首先,财政和金融改革旨在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其次,领导人希望这些改革能够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即通过更有效的经济管理,把经济权力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国家。本章试图把税收、金融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领导人建构国家的努力联结在一起。

税收改革与税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从单一税制到多元税制的彻底转变。当领导人最初开始经济改革时,他们认识到必须给企业以及地方政府提供动力以支持改革。通过财政放权,这个目的实现了。但这个过程在增强地方自主性的同时,导致了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为了扭转这种不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倡议并实行了分税制,以此发展和增强自身的财政资源,同时适应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财政放权

1978 年,中国领导人通过经济放权开始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税收改

革是这个改革过程的重要一环,旨在为农民和国有企业提供生产积极性,割断国有企业对政府的财政依赖,平衡企业间的税收负担,促进生产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110

改革措施首先进入农村地区。农业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因国家提高采购价格而大大提高了,随后国家取消了强制性的生产配额,对超额的部分则向农民提供价格补偿。同时,中央政府努力削减农业税。^①

这些措施伴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结果导致很大的、直接的生产波动。但是大量的农产品补偿金加上其他开支,如国有企业补偿金和大规模投资,加重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预算赤字扩大了,并且必须向银行贷款。银行转面也出现了通货问题,导致了通货膨胀。由于国家大部分税收来自于国有企业,因此在农业改革相对成功之后,1984年开始了全国性的工业改革,目的是减轻预算负担。

1983—1984年的改革:利改税

1983年中央政府开始了“利改税”的改革。国有企业划分为两类,即大企业和小企业。大企业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这对小企业来说是一个进步。税后的利润在企业与国家之间划分。^②这遗留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只有单一的税制,即公司所得税,这使国家无法有效控制资源配置;第二,国有企业仍然需要提交税后的部分利润给国家,这抑制了企业更好地经营。换句话说,国家税收仍然包括了税收和利润两部分。1984年,进一步的改革措施得以实施。企业只需要支付所得税,向国家提交利润的强制命令被取消。利改税的过程完成了,税收成为国家总收入的绝对主要部分。

“利改税”给企业提供了寻求更大利润的积极性。然而,税制仍有待进一步改革。大中企业不仅必须支付所得税,而且还要支付专门的企业调节税。许多国有企业蒙受了损失,不得不与国家进行磋商以谋求补贴。在税率过高的同时,实际的免税者又过多,因此税收并不如预期的那样高。

111

^① 参见陈如龙编,《当代中国的财政》(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页;许毅、项镜泉,《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家财政(1981—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② 何盛明,《中国财政改革二十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另参见钟朋荣,《十年经济改革:历程·现状·问题·出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页。

1987 年改革：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1987 年，中央政府在利改税的基础上向国有企业引入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个制度的引入以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试验为基础，并于 1987 年后在全国实行。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国有企业签订合同，在特定的利润水平上缴纳所得税和调节税。如果它们超过了合同规定的利润水平，仅对其额外利润征收较低的税。合同规定的税收水平常常以前些年的利润加上预期的增长额为基础。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旨在通过增强财政责任、强调利润、赋予企业更大的决策自主权，提升企业的运营绩效。

向这个新制度的转变，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在实行这个制度后，政府对企业的直接税收稳步降低。例如，在 1978 年，直接税收达到全国税收的 60%，其中 93% 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款项。在 1989 年，直接税收只占全国税收的 19%，只有 8% 的直接税收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款项。^①

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强大积极性，因为这给予其更大的决策自主性。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也被诊断为财政衰退的主要原因，因为企业能够保留所有或者大部分的超额利润，而如果企业亏损的话，中央政府则还必须削减企业上缴的利润款项。结果，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逐渐恶化。^②

而且，在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下，每个省都拥有控制超额预算税收的很大自主性。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是，它滋生了地方主义并导致“诸侯经济”的兴起。地方政府发展了产业，随后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强行提高税收把这些产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冲突由此深化了。^③

为了提高政府税收，中央政府在 1989 年进行了另一轮的税制改革，即“利税分留”。国有企业首先要支付所得税，随后上交一部分利润给国家。通过这种做法，中央政府试图尽可能多地分享国有企业所有的利润，国有企业不再享有使用税前利润来偿还贷款（因错误的投资决策而导致的贷款）的特权。为了

^① The World Bank, *China: Revenue Mobilization and Tax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0, p. 2.

^②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问题课题组：《集中财力若干问题剖析》，载于《财贸经济》1991 年第 4 期，第 23—32 页；钟朋荣，《十年经济改革：历程·现状·问题·出路》第 89 页。

^③ 同上。

提高企业偿还贷款的能力,国家降低了小企业的所得税率。大中企业的税率仍然维持在 55%,但是小企业的税率则设定在 35%。 112

这次改革努力的结果仍不令人满意。由于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引入,企业与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于应该缴纳多少税收问题的谈判急剧增多。国有企业管理者为了赢得最好的税收协议而更关心与政府讨价还价,而不是与其他企业竞争。这破坏了政府致力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理性考量。

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制度基础

中央政府在实施财政改革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如何通过获得省市政府的支持来扩大国家税收,同时又维持中央控制财政政策的一些手段呢?在传统上,省市政府在中国行政结构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为它们是税收的征收者、政策执行的工具、具有自身利益的机构。前两个角色意味着没有省市政府的合作,财政放权是不可能的。第三个角色则意味着省市政府常常具有与中央政府不一致的特殊利益。由此,关键是为省市政府和企业提供适当和充分的激励,以便它们积极支持中央政府扩大国家税收的主要目标。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中国财政制度的特征是中央与省市的相互依赖。在理论上,中央政府凭借单一税制指导财政支出政策,决定税收政策的所有方面。几乎所有税收都属于中央政府的全国性税收。省市政府只有少数几个自身的税收资源,它们分享了中央政府征收的税收,中央政府负有决定省份之间税收分配的责任。但实际上,财政体制是分权的。中央政府不具备征收全国税收的单一机构,税收更多的是在省市层面上由省市政府代表中央征收的。事实上,中央政府的税收首先来自省市政府,省市政府成为中央政府的征税代理人。中央政府对省市政府征税的依赖,使得中国的财政体制非常复杂。 113

尽管在征税上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省市政府可能选择既不课税也不花费税收。它们必须在其管辖领域征集所有财政税收,并把预先确定的部分上缴北京。国家预算收入在中央与省市之间的划分并不以任何固定原则为基础,而是以特定安排为基础。整个税收收入中分摊给某个省的部分服从于每年无法预测的变化,没有哪个省确定地知道它的未来收入。财政部必须不

时与各省进行讨价还价,以决定各省应该向北京转交的税收额。^①

由于这种制度基础,省市政府在提高它们的税收上没有直接利益,因为它们是有剩余还是出现赤字都不重要。平衡财政收支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由此,各省往往对中央政府的税收行为不满,如同中央政府对省市政府的税收行为不满一样。在经济改革开始后,省与中央的财政关系成为一个不断冲突的问题。必须从两方面纠正这种关系。首先,中央政府必须让渡更多的财政权力给省市政府,让它们从努力征税的行为中获利。其次,必须确立某种长期的规则来管理中央—省市的财政关系,也就是将两者的关系法律化或制度化。

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实行一种新的财政制度,即“分灶吃饭”。^②在这种体制下,中央政府不再计划地方政府的支出,也不再规定强制性的财政目标。省市政府在它们那一部分上有权组织自己的预算——决定自己与下级政府的财政安排。通过分享五年内不变的工业税和商业税,它们可以获得一个稳定而不断增长的税收资源。

在1982年到1985年之间,中央政府对财政结构做出一些重要调整,以提高它在全国税收中的份额,并把预算外资金并入财政管理体制中。首先,采取从省市政府借用税收,调整省市份额,以及削减中央政府对出现赤字的企业提供的补贴等措施,提高中央政府的税收份额,包括削减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③其次,除了广东和福建,所有省份都实行一种分享总税收的制度,它们在与中央政府分别谈判确定的税率下分享税收资源的绝大部分,五年内不变。^④第三,中央政府控制预算外资金。采取各种措施来控制预算外资金的使用,包括向地方单位借款,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实行严格的资金发放政策。

人们期待这些改革能在中央与省市之间产生更稳定的财政关系,但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出现。改革未能给中央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虽然中央可以从各省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但它也需要向贫困省和国有企业提供补贴。政府赤字扩大了,成为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④

为了控制赤字并改善财政环境,1987年,中央政府在—些富裕地区引入

^① 关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前中国税收制度方面的讨论,参见 The World Bank, *China: Revenue Mobilization and Tax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0, annex 3.

^② 参见陈如龙编,《当代中国的财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同上,上卷,第322页。

^④ 王绍飞,《财政状况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前途》,载于《财贸经济》1990年第4期,第23页。

了承包责任制。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求所有各级地方政府平衡自己的税收和开支。根据官方的解释,实行这个制度有很多好处。^① 首先,在税收和开支上,改革打破了旧的单一的管辖权。税收在中央与省市之间划分。那些企业经营业绩良好的省可以从自己的税收中获利更多。开支也在中央与省市之间划分,因而省市对自己的预算负有责任。

其次,这次改革可以预期实现对省市的激励的制度化。新制度精简了旧的财政资源的分级分配,不再限定具体的省市支出。相反,省市政府官员拥有决定自己开支的自主权。

第三,新制度极大地削减了中央与省市之间讨价还价的需要。在旧体制下,两者的财政份额一年确定一次。而在新制度下,一旦基本数据得到确立,就可以持续五年。据此,只要中央的财政行为更可预测,省市政府官员就能够做出长期规划。

然而,这些理性计算仍然没有实现,这可归因于中国财政制度的本质。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财政自主性的放权,不但可以向省市政府提供激励,而且可以向各省管辖下的各个企业提供激励。但是中央政府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中央政府希望各省政府不要介入企业活动,而是交给市场去影响企业活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需要各省政府有效地管理辖区内的经济,从而为中央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而且,省市政府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这进一步把财政改革复杂化了。各省市官员不仅要考虑既定的中央财政政策是否适合自己管辖的地区,而且还要考虑他们可以从这种政策中获得什么利益。中央向省市的财政分权并不保证省市政府官员会遵循中央官员先前设定的比例。财政改革给省市官员提供了积极性,他们像企业家一样,利用各种方式提高省市税收,其行为结果并不总是与中央政府的预期一致。相反,这成为地方政府寻求相对于中央政府的更大权力的有效工具。

115

中央与省市之间的权力转移

所有这些财政改革导致了国家税收的急剧下降。^② 稳固的政府税收占

① 参见陈如龙编,《当代中国的财政》(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王绍光,“The Rise of the Regions: 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载于Andrew Walder编,《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87—113;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GDP 的比率持续下降,从 1979 年的 34.4% 下降到 1989 年的不足 20%。^① 政府未能降低开支以保持与税收额的下降相适应,这形成了长期的预算赤字。

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央与省市的税收分配时,这幅图画并不简单易懂。中央政府享有的税收从 1981 年占总税收的 20.6% 提高到 1990 年的 41.3% (见表 6.1)。这个转变主要归功于中央政府的税收改革,它使得部分的企业利润直接上缴给了中央。1981 年,中央政府花费了它所征税收的 262%,这意味着中央政府非常依赖来自各省的税收。但是 1990 年,中央政府只花费了所征税收的 96%。中央开支的这种下降是一个重要变化。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意味着在总税收显著下降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提高了对所征税收的享有份额;其次,省市政府削减了它们转移给中央政府的收入。中央与省市由此在财政上变得相对独立。

在省市这方面,税收的享有份额从 1981 年的 79.4% 下降到 1990 年的 58.7%,同时,同期开支从 46% 上升到 60%。这些变化意味着各省不断变得独立,过去上缴中央的税收现在保留在了省市。结果,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加重了,虽然征税能力提高了。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于中央政府各种类型的巨大补贴。

财政放权也导致了各省间人均税收和开支之间的巨大差距(见表 6.2)。在 1985 年,上海的人均财政收入是 1492 元,西藏是 40 元,贵州是 49 元。这体现了较高水平的税收与较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四个省、直辖市征收了 31% 的税收——上海、北京、天津、辽宁,尽管这几个地方只占全国人口的 6.4%。^② 与此类似,财政开支上也不相同。在 1985 年,上海的人均财政开支是 346 元,北京是 344 元,四川是 63 元,安徽是 66 元。同是四个高财政收入的省占了全国财政开支的 15.2%。

与财政开支方面相比,征收方面没有多大不同。^③ 收入较高的省,其税收也高。但是,高收入的省并没有付出多大努力来征税,因此实际税收可能低于预期税收。换句话说,富裕的省市倾向于不努力征税,即使它们能比贫困省征收到更多的税。^④

^① The World Bank, *China: Revenue Mobilization and Tax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0, p. 2.

^② 同上, p. 147.

^③ 同上。

^④ 同上, p. 296.

表 6.1 中央政府与各省间财政收支比例安排的变化,1981—1990*

| | 中央政府的比重(%) | | 省市政府的比重(%) | |
|------|------------|------|------------|------|
| | 总收入 | 总支出 | 总收入 | 总支出 |
| 1981 | 20.6 | 54.0 | 79.4 | 46.0 |
| 1982 | 23.0 | 49.9 | 76.0 | 50.1 |
| 1983 | 29.8 | 49.7 | 70.2 | 50.3 |
| 1984 | 34.9 | 47.8 | 65.1 | 52.2 |
| 1985 | 37.9 | 45.3 | 62.1 | 54.7 |
| 1986 | 40.6 | 41.2 | 59.4 | 58.8 |
| 1987 | 38.2 | 42.1 | 61.8 | 57.9 |
| 1988 | 39.8 | 39.2 | 60.2 | 60.8 |
| 1989 | 37.5 | 36.4 | 62.5 | 63.6 |
| 1990 | 41.3 | 39.8 | 58.7 | 60.0 |

*表中的数据指中央与地方可征收的收入,而不是各级政府在拨款和税收之前的实际收入。

来源:计算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年鉴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1 页。

表 6.2 1991 年的省际间收支差别

117

| | 人均财政收入 | 人均财政支出 | | 人均财政收入 | 人均财政支出 |
|-----|--------|--------|----|--------|--------|
| 上海 | 1 | 3 | 新疆 | 16 | 7 |
| 北京 | 2 | 2 | 湖北 | 17 | 21 |
| 天津 | 3 | 4 | 山东 | 18 | 25 |
| 辽宁 | 4 | 8 | 湖北 | 19 | 27 |
| 广东 | 5 | 14 | 宁夏 | 20 | 6 |
| 浙江 | 6 | 17 | 海南 | 21 | 10 |
| 云南 | 7 | 11 | 河南 | 22 | 26 |
| 黑龙江 | 8 | 13 | 陕西 | 23 | 19 |
| 吉林 | 9 | 12 | 贵州 | 24 | 23 |
| 山西 | 10 | 16 | 广西 | 25 | 20 |
| 福建 | 11 | 15 | 四川 | 26 | 29 |
| 江苏 | 12 | 22 | 江西 | 27 | 24 |
| 青海 | 13 | 5 | 湖南 | 28 | 30 |
| 内蒙古 | 14 | 9 | 安徽 | 29 | 28 |
| 甘肃 | 15 | 18 | 西藏 | 30 | 1 |

来源: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1—1992)》,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56 页。

1994 年的改革与分税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税制改革快速走向了分税制或财政联邦主义。对中央政府而言,分税制的实施至少应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不管是中央政府所有的企业,还是省市政府或其他行为体所有的企业,应该一律平等对待。在承包责任制下,不同企业常常受到很不平等的对待,这导致了不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由于分税制对所有企业采取同一税率,因此,省市政府不再以差别看待的态度对待企业。^① 第二,分税制应该在中央—省市的关系中被制度化。一旦全部分配已达成协议,中央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省市的税收事宜。118 省市政府将拥有实在的自主权决策本省的税收事宜,它们会实施适合本省环境的不同税收政策。第三,在新制度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资源是分离的。省市政府有权决定税率、削减辖区内的税收,由此可以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本省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有自己固定的税收资源,并且仍然保留了(在中央与省市政府之间)分享税收的权威,因此中央财政能力应得到提高,并且稳定下来。^②

1994 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一种新的分税制度,对中央与省市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制度性改革。首先,在这种新制度下,税收划分为三个范畴: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中央税收进入国库,地方税收进入地方预算,共享税则依据先前制定的协议在中央与省市之间划分(具体内容参见表 6.3)。第二,建立了两个相互独立的税务局:国税局与地税局。与授权地方税务局征收所有赋税相反,中央如今凭依独立于省市的机构征税。第三,新制度认可省市的独立权力,即省市在不受中央干预下征收一些类型的赋税。中央还建立了“税收返还”制度,共享税收首先由中央政府征收,随后在中央与省市之间划分。

这些制度变革一定程度上把省市的财政权力移交给了中央。如表 6.4 所示,从 1994 年起,政府的总税收大幅度增长。从此次改革开始,政府的总税收持续攀升。中央征收的部分从不足全国税收的 30% 提高到 50% 左右。如果把被强制收归国库的地方征收赋税也包括在内,那么中央政府的实际税收达

^① 国家税务局,《中国税制改革十年(1978—1988)》,大连:东北财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0—161 页。

^② 余小平,《在我国实行分税制的基本构想》,载于《财贸经济》1990 年第 2 期,第 62 页。

表 6.3 1994 年分税制下的税收基础

| 中央固定税收基础 | 地方固定税收基础 |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收基础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央所有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和利润提交,地方和外国银行的所得税以及其他金融业务税 • 关税 • 海关征收的消费税和增值税 • 对外贸易企业的税收返还 • 商业税、所得税、铁路建设税、主要的银行部门和保险公司 • 消费税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商业税和地方国营企业的所得税 • 个人所得税 • 城镇土地使用税 • 印花税 • 车辆使用税 • 屠宰税 • 商标税 • 农牧业、农业特产税 • 耕地占用税 • 遗产税 • 资本收益税 • 国有土地出售税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增值税(延伸至包括产品税; 75% 归中央, 25% 归地方) • 资源税(包括盐税; 大部分归地方保留, 不算上海石油税) • 新的有价证券交易税(中央与地方平均划分) |

来源: Christine Wong,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35; Tsang Shu-ki and Cheng Yuk-shing, "China's Tax Reforms of 1994: Breakthrough or Compromise", *Asian Survey*, 34: 9 (September 1994), p. 775.

到政府总税收的三分之二。

当然,在“税收返还”制度下,中央政府必须回馈部分税收给省市,但是,由于中央征收并再分配大量财政收入,因此省市对中央政府的财政依赖性也显著提高。在 1994 年之前,中央政府非常依赖像上海、山东、浙江、江苏和广东这些沿海省市的税收。现在这些省市反过来依赖于中央政府的税收。

金融自由与集权

现代金融制度是现代经济国家的命脉。现代金融制度由银行制度、资本市场组成,它们服务于金融资源的流动以及规制这些资源的使用。中国的金融制度仍然由银行控制,尽管资本市场已获得发展。在 20 世纪末,银行的金融业务占储蓄者和投资者所有金额的 90%。^① 由此,我的讨论集中于银行部门的发展上。由于中央银行如何运行决定了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金融部

^① Nicholas Lardy, "China and the Asian Contag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8, p. 79.

表 6.4 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的税收与支出(亿元)*

| 年份 | 总收入 | | | | 总支出 | | | |
|------|--------|--------|--------|-----------|--------|--------|--------|-----------|
| | 合计 | 中央政府 | 地方政府 | 中央政府比重(%) | 合计 | 中央政府 | 地方政府 | 中央政府比重(%) |
| 1970 | 662.9 | 183.0 | 480.0 | 27.6 | 649.4 | 382.4 | 267.0 | 58.9 |
| 1975 | 815.6 | 96.6 | 719.0 | 11.8 | 820.9 | 409.4 | 411.5 | 49.9 |
| 1976 | 776.6 | 98.9 | 677.7 | 12.7 | 806.2 | 377.2 | 428.6 | 46.8 |
| 1977 | 874.5 | 113.9 | 760.6 | 13.0 | 843.5 | 393.7 | 449.8 | 46.7 |
| 1978 | 1132.3 | 175.8 | 956.5 | 15.5 | 1122.1 | 532.1 | 590.0 | 47.4 |
| 1979 | 1146.4 | 231.3 | 915.0 | 20.2 | 1281.8 | 655.1 | 626.7 | 51.1 |
| 1980 | 1159.9 | 284.5 | 875.5 | 24.5 | 1228.8 | 666.8 | 562.0 | 54.3 |
| 1981 | 1175.8 | 311.1 | 864.7 | 26.5 | 1138.4 | 625.7 | 512.8 | 55.0 |
| 1982 | 1212.3 | 346.8 | 865.5 | 28.6 | 1230.0 | 651.8 | 578.2 | 53.0 |
| 1983 | 1367.0 | 490.0 | 876.9 | 35.8 | 1409.5 | 759.6 | 649.9 | 53.9 |
| 1984 | 1642.9 | 665.5 | 977.4 | 40.5 | 1707.0 | 893.3 | 807.7 | 52.5 |
| 1985 | 2004.8 | 769.6 | 1235.2 | 38.4 | 2004.3 | 795.3 | 1209.0 | 39.7 |
| 1986 | 2122.0 | 778.4 | 1343.6 | 36.7 | 2204.9 | 836.4 | 1386.6 | 37.9 |
| 1987 | 2199.4 | 736.3 | 1463.1 | 33.5 | 2262.2 | 845.6 | 1416.6 | 37.4 |
| 1988 | 2357.2 | 774.8 | 1582.5 | 32.9 | 2491.2 | 845.0 | 1646.2 | 33.9 |
| 1989 | 2664.9 | 822.5 | 1842.4 | 30.9 | 2823.8 | 888.8 | 1935.0 | 31.5 |
| 1990 | 2937.1 | 992.4 | 1944.7 | 33.8 | 3083.6 | 1004.5 | 2079.1 | 32.6 |
| 1991 | 3149.5 | 938.3 | 2211.2 | 29.8 | 3386.6 | 1090.8 | 2295.8 | 32.2 |
| 1992 | 3483.4 | 979.5 | 2503.9 | 28.1 | 3742.2 | 1170.4 | 2571.8 | 31.3 |
| 1993 | 4349.0 | 957.5 | 3391.4 | 22.0 | 4642.3 | 1312.1 | 3330.2 | 28.3 |
| 1994 | 5218.1 | 2906.5 | 2311.6 | 55.7 | 5792.6 | 1754.4 | 4038.2 | 30.3 |
| 1995 | 6242.2 | 3256.6 | 2985.6 | 52.2 | 6823.7 | 1995.4 | 4828.3 | 29.2 |
| 1996 | 7408.0 | 3661.1 | 3746.9 | 49.4 | 7937.6 | 2151.3 | 5786.3 | 27.1 |

* 这些数据并不包括来自债务的收入、外债的利息支付或基本建设支出。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金融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462页。

门,因此,我将具体考察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展。

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垄断银行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发挥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种功能。国际贸易由中国银行操控,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助手。在垄断银行体系下,政府与企业的融资需要由年度预算和年度贷款计划实现,它们调控着金融资源的直接分配。政府与企业的业务体现在中国

121
人民银行的账面记录上,人民银行的功能有点像政府出纳员。在中央计划时代,不需要金融业务,也不需要金融借贷。利率和货币供给被行政性地固定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货币政策本质上是财政政策的附属物。

经济改革与银行的制度建设

在中国,金融部门的制度重构如同其他制度建构一样,也与经济改革紧密相连。银行部门的发展不仅反映了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领导人领导经济改革和重建中国经济国家基础的意愿。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企业融资开始从直接的中央分配转向贷款,并需要大规模的金融服务。由于经济改革最初发动于农村部门,因此在1979年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集中于农村的储蓄和贷款活动。同年还建立了其他两个银行。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并成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经济机构。为了支持对外开放,这个银行的业务范围急剧扩张。此外,原来隶属财政部直接行政领导的中国建设银行,也变成直属国务院,具有了与其他银行一样的行政等级。

1980年,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适应这些变化,中国投资银行在1981年正式成立,目的是控制由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项目融资的支付。同样,在1986年中国成为亚洲发展银行的一员后,中国投资银行负责承担支付来自亚洲发展银行的资金。

20世纪80年代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重要变化,最重要的是1984年中国中央银行的创立。在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之后,其储蓄和借贷功能由中国工商银行接手。中国工商银行通过重组中国人民银行的部门网络而建立起来。

10年后的1994年,领导人在银行部门开始了更激进的改革计划。这次改革的主攻点之一是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央银行,它的首要责任是维持货币和汇率稳定。主攻点之二是要把银行体系商业化,国有专业银行执行商业功能,把无利可图的“政策贷款”留给三个新建立的“政策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是为了排除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四个国有银行转变为商业银行的障碍。

1995年中国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地位。随后又制定了《商业银行法》、《票据法》和《保险法》。这些法

律一起为金融部门的金融管理和应有功能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同时,竞争机制逐渐引入银行体系,这有助于加快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大体上说,这通过以下一些方式实现。首先,四个国家银行之间的业务划分最初是模糊的。四个国家银行最初是根据不同业务领域而建立的,并不允许互相竞争。例如,外汇业务曾经由中国银行垄断。但随后,其他三个银行以及新建立的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都被允许经营外汇业务。这种不断扩大的竞争削减了中国银行的外汇经营份额,其经营份额从 1979 年的 100% 下降到 1996 年的 40%。^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许多银行和信托投资公司建立起来,最早的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其他新的全国性银行包括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华夏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这是第一个非国有银行)。这些银行不受制于任何地理局限,可以在全国设立分行,但要经过中央银行的批准。

同时,一些大的地区性银行也建立起来,包括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安徽省的蚌埠住房储蓄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以及山东省的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新的金融制度为所有金融机构创造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既包括国家银行也包括非国家银行。

多年来,一些地区性银行急剧扩张,已经超出了地区定位。例如,深圳招商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已经各自在深圳和上海之外建立了支行。许多城市的信用联社也已经转变成城市合作银行。最重要的是,银行开始变得更具消费者导向,为汽车和住房消费提供贷款。大的国家银行也已经采取步骤提高它们的电子银行业务,特别是中国工商银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将其网上银行业务扩展到企业。

最重要的是,银行部门逐步向外国竞争者开放。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只允许少数几个外国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建立分行。1990 年,上海成为首个向外国银行开放的沿海城市。1996 年,上海的一些外国银行获得了有限开展人民币业务的许可。1998 年,更多外国银行机构获得这一许可。1999 年,经营上的和地理上的限制进一步放松,许多城市和省市都允许外国银行经营国内货币流通业务。

作为渐进改革的一种结果,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动态增长和对外贸易的扩

^① 刘志强(Liu Zhiqiang), "Progress in China's Banking Sector Reform",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62,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9 May, 2000, p. 2.

大,中国的金融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的成长。到1999年底,中国已能夸口自己拥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银行金融结构。它由4个完全国有的商业银行、3个政策银行、10个股份制商业银行、90个城市商业银行、836个城市信用联社、41755个农村信用联社、230个信托投资公司、70个金融公司以及15个租赁公司共同组成。^①

亚洲金融危机与金融集权

亚洲金融危机对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包括中国。这次危机引发了中国新一轮的多层次金融改革。其中中央银行的改革体现了中央政府是如何努力通过运用强大的金融工具来控制中国经济的。

在改革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几乎是一个不具有自主性的金融机构。最初,它是国务院控制下的一个独立机构,具有与财政部和其他计划机构同等的行政级别。从“大跃进”(1957—1958年)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其作用更多的是财政导向而非金融导向。1976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但仍然是一个虚弱的金融机构。

在领导人启动经济改革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发生了变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承担中央银行功能。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负责发行货币、管理借贷、设定利率、监察中国的外汇业务。它仍然保留了专业银行的业务,制订贷款目标,调控银行间的资金流动。它还以中央银行的身份承担着管理和调节的角色。在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监察部,1986年,国务院发布正式法规,把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农村供销社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监察合法化了。^②

124

所有这些变革体现出中央政府试图把中国人民银行建成中国经济中一个有效的金融机构。然而,一直到朱镕基1993年进行经济改革,中国人民银行才得以更有效地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在限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运行的要素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是重要的一个。

^① 黄朝翰和刘志强,“China’s Progress in Banking Reform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AI Working Paper No. 52*,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3 August, 2000, p. 3.

^② Nicholas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 63—64.

中央—地方的关系与中央银行

改革派领导人希望银行体系能够成为管理中国经济的间接工具。另外,如果银行成为以获利为目标的独立企业,那么它既能向企业提供金融资金,又能实现这些资金的优化利用。面对来自企业的金融需求,银行应该拥有自主权,从而聚集金融资源,并向企业贷款。随着企业竞争的不断扩大,银行体系也需要成为独立的逐利者。^①

为了提高银行的自主性,就必须向银行部门引入政治分权措施,尤其是向中国人民银行。这体现在任命体系的变化上。在1984年任命体系改革之后,在中国人民银行中,中央委员会任命的职位数量至少降低了87%。只有少数银行总部的职位是由中央任命的,很多先前由中央任命的职位现在都由银行自己任命。^②

125 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试图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国家行政组织相对的权力。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也存在中央—地方的关系问题,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权力。中国人民银行的省市分行附属于地方党政官员。各省市党委有权任命、辞退、调任和提升自身管辖地域中的银行职员。这种结构破坏了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部在地方层面上贯彻自己的政策。实际上,地方分行很难对现实事务做出自己的决定,比如贷款的扩展。相反,它们的决定是对地方党政官员的要求的回应。

为了对付强大的地方性抵抗,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试图在省市分行取得人事任免权,但收效甚微。只是到了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才正式拥有任命和撤销省市和更下级分支机构经理的权力。然而,中国人民银行仍然必须与地方党政官员协商,因为他们拥有人事任免的投票权。

在1989年事件、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保守主义弥漫了整个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了新一轮的投资扩张。快速而大量的投资流入导致了很高的通货膨胀,威胁着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中央政府付出了极大努力来对付经济过热。

1993年,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任命

^①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研究课题组,《金融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② John Burns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latura Syste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p. xviii.

和撤销各省市分行领导的职务。1994年初,财政部想通过贷款弥补整个国家的财政赤字,但中国人民银行拒绝向财政部贷款,这在历史上是首次这样做。这个行为在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正式合法化。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部获得了对银行贷款甚至财政制度的完全控制权。换句话说,中国人民银行所有贷款和分配的权力都集中起来了。^①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银行集权

中国是亚洲经济中少数几个未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大量负面影响的 国家之一。中国成功地克服了危机,这被归功于许多因素。首先,朱镕基成功地通过危机前的激进金融改革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到1997年,就高速增长和低通货膨胀而言,中国比其他亚洲经济拥有更强大的宏观经济基础。中国经济的良性运行和稳定的外部经济地位,使中国在克服危机上的表现与其他亚洲经济非常不同。由于中国的强势出口和贸易顺差,中国没有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其次,在其他亚洲国家,大量的外国投资成为热钱,也即短期投资和债务。相反,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较少具有不稳定性。中国在引进外资上极为成功,因此它的外部债务相对较少,特别是根据出口和外汇储备来看。换句话说,中国不像泰国和韩国那样存在过度借贷的问题。

126

第三,就资本控制而言,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程度非常之高。对资本交易来说,人民币币值很难变动。国际货币投机者不可能站在中国的外面“买跌”人民币。外部恐慌也不可能引发中国的大量资金外逃。^②

尽管中国相对地没有受到区域金融危机的危害,但是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的经济体系也受到了类似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那些问题的困扰。金融体系受银行统治、中央银行缺乏自主性、政策性和政治性贷款、坏账累积、缺乏一个强大而有序的公平市场、商业银行调控能力脆弱、裙带关系和腐败等,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金融危机。而中国的经济体系或多或少存在着这些因素。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国家金融体系,尤其是改革中央银行方面付出了极大努力。

^① Nicholas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pp. 174—175.

^② 黄朝翰和刘志强,“China's Progress in Banking Reform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王红缨(Wang Hong Ying),“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 Impetus for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 *EAI Working Paper No. 27*,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8 June, 1999.

1997年11月,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讨论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在会上讲了话。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都出席了。这种高层会议并不多见,它表明领导集体非常关注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这次会议集中分析了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分析了这种脆弱的金融体系如何在这些国家引发了金融危机。会议尤其关注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商业贷款上为什么不能行使充分而谨慎的监管。^①

127 同时,中国的研究人员和思想库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人悲叹国际金融资本的权力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国家主权和国民经济安全,另外一些人则相信金融危机深深根源于那些国家的内部制度。^② 不管他们的观点如何,他们全都相信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中国防止出现这种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推动金融改革向纵深发展。^③

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国内的反应给领导人采取一些激进手段改革国家的金融体系创造了有利氛围,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最重要的改革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改组,它把32个省市分行合并成9个区域性分行。新的银行体系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被设想拥有自主权并脱离地方的政治干预。^④ 这个新体系在1999年开始运转。

另外,对一些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目的是抑制这一部门的非法行为。最著名的举措是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倒闭和破产,它是中国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⑤ 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之前,政府于1998年6月采取了许多步骤来清算海南发展银行和其他两个信托投资公司。随后,关闭了21个城市信用联社和18个乡村信用联社,这是政府为阻止金融系统中不良行为蔓延所做努力的一部分。2000年8月,负债累累的中国教育

^① Nicholas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pp. 202—209.

^② 第一种观点,参见庞中英,《国际金融体系酝酿改革》,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观察家,《经济全球化呼唤金融安全》,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0月22日。第二种观点,参见丁建明、李建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1月5日;曹建明,《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6月16日;朱明,《东亚金融动荡引发的思考》,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1月26日。

^③ 如林志远,《商业银行要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挑战》,载于《金融时报》,1999年5月15日。

^④ "China's Central Bank Tightens Oversigh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7, 1998.

^⑤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October 30, 1998.

科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倒闭。^①

政府还做出极大努力来增强中央对金融系统的调控。1998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金融工作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温家宝领导。这个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对金融系统实行垂直领导。同时,为了反腐败,还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与此相似,政府采取行动增强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证券产业的垂直控制。1998年11月,还成立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②

金融改革与市场经济

中国领导人已经做出巨大努力来改革国家的金融制度,尤其是银行制度。金融改革由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把国有银行转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发展一个有序的资本市场等共同组成。所有改革措施都旨在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为市场经济奠定一个制度框架。

128

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挑战却依然存在。首先,国家商业银行仍有待改组。在1994年改革之前,这些银行并不是作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运行的,它们继承了一种官僚管理模式,各分支机构处于银行总部与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之下。银行被迫向亏损的国有企业贷款,而且常常与商业考量相悖。虽然像成立三个政策银行这样的改革措施减缓了一些压力,但国家商业银行仍然被政府逼迫开展无利可图的贷款。

进而,银行系统内部也存在问题。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管理人员常常是政治性任命(也即党员干部),他们并不对银行的商业运行负责。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内部控制脆弱、纪律较差、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金融部门。

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能否具备充分的独立性,有效地发挥其功能,这仍然是不确定的。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已阐明,中国人民银行应该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受任何干预。然而,正如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所指出,许多因素严重限制了中国人民银行设想的独立性。例如,法律阐明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行使职权。这表明银行不是重大事务的最终权威,银行必须得到国务院的批准。此外,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向

^① “ITIC’s Faces Shakeup”, *China Daily*, August 8, 2000.

^② 王红缨,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 Impetus for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

工业企业和其他商业活动贷款,这破坏了银行的独立性。^①

领导人试图把中央银行重组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那样的机构。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央银行获得了与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党政领导相对的自主权。拉迪指出,中央银行必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和政治权力,以实现两个目标:首先,它必须能够使银行独立于政治领导人的要求。政治领导人常常要求银行扩大对那些不符合商业标准的项目的贷款。其次,它必须确保任何政策性贷款的补贴都通过预算来融资,而不是由银行系统来提供。^②当然,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的这一设想的自主性并没有实现。

129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建构一个现代经济国家的第三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本质上是旧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中国,它们过去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社会经济实体而不仅仅是生产单位。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功能目标并不限于利润的最大化。它们的运行包括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和福利服务,这些标准的“公共产品”有教育、医疗、住房、幼儿服务和养老金等。事实上,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就像一个“小型福利国家”。因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在“预算软约束”下运行,政府常常要补贴它们的亏损。

有官方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中国有大约32万家国有企业,其中24万家一般被归类为小企业。^③32万家国有企业中,只有11.8万家从事工业生产,大约有1.6万家企业被归类为大中型企业。^④

1978年,国有企业占了中国工业总产值的78%。到1996年,这一比重降低到29%。^⑤但是,不要把国有部门较低的产出比重误会成其经济重要性消失的信号,因为1.085亿或74%的城市工业人口仍然依赖于国有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就业保障。^⑥而且,整个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全部国有资产的近61%,占全国总销售额的55%。就对外贸易而言,1995年国有企业

① Nicholas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pp. 175—176.

② 同上, p. 172.

③ 参见李鹏在1997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载于《中国工商时报》,1997年3月2日。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⑤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

⑥ 这个数据只到1997年6月底为止。参见新华社消息,1997年8月6日。

表 6.5 国有企业的利润与税款,1978—1994(10 亿元人民币)

| 年份 | 政府总税收(A) | 国有企业总利润与税款 | | C/A 的比率(%) |
|------|----------|------------|--------|------------|
| | | 利润(B) | 税款(C) | |
| 1978 | 51.93 | 73.35 | 33.13 | 63.8 |
| 1980 | 57.17 | 66.92 | 38.24 | 66.9 |
| 1981 | 62.99 | 64.31 | 40.77 | 64.7 |
| 1982 | 70.00 | 63.15 | 43.88 | 62.7 |
| 1983 | 77.56 | 69.65 | 45.55 | 58.7 |
| 1984 | 94.74 | 78.89 | 51.47 | 54.3 |
| 1985 | 204.08 | 99.88 | 69.49 | 34.1 |
| 1986 | 209.07 | 79.51 | 74.52 | 35.6 |
| 1987 | 214.04 | 98.15 | 86.51 | 40.4 |
| 1988 | 239.05 | 116.49 | 105.06 | 43.9 |
| 1989 | 272.74 | 100.12 | 123.23 | 45.2 |
| 1990 | 282.19 | 49.15 | 123.10 | 43.6 |
| 1991 | 299.02 | 74.45 | 139.29 | 46.6 |
| 1992 | 329.69 | 95.52 | 155.54 | 47.2 |
| 1993 | 425.53 | 166.73 | 197.58 | 46.4 |
| 1994 | 512.69 | 160.80 | 223.63 | 43.6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年版。

的对外贸易占了中国整个出口总额的 67%、进口的 50%。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中央政府主要税收资源这个传统角色上(表 6.5)。事实上,国有企业仍然主导着关键的重工业,如钢铁、煤炭、冶金、化学、能源、石油,这些都是规模经济,乡镇企业无从插手,外国投资者也不允许进入。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领导人开始公布自己的“500 强”,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包括历年业绩最好的“前三甲”都是国有企业。^① 另外,还有一些“红筹股”企业已经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H 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N 股”上市。但据这样一幅图景就得出中国有许多“很好的国有企业”,那是一个误解。1993 年,中国政府宣布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亏损,另外三分之一刚刚破

130

^① 例如,1994 年,就利润和税收而言,前三甲是三个最大的钢铁公司:宝钢、首钢、鞍钢。参见 *China Daily*,1994 年 8 月 25 日。在 1995 年,大庆石油进军第一位。参见新华社消息,1995 年 4 月 11 日。

产。亏损的国有企业的比例不断上升,到1997年上半年,有47%的国有企业宣告亏损。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集中在提高企业治理上,强调管理自主权 and 责任的不断提高,但事实上,在这些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中基本的社会主义工作方法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国有企业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1989年事件之后,政府采取了信贷紧缩政策,结果导致许多国有企业为严重亏损而担忧。许多企业和国家银行都陷入严重的“三角债”困境中。^① 这些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除了给金融部门带来严重威胁外,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政府常常被迫对它们的亏损进行补贴。^② 由此,中国领导人除了做出新的努力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131 朱镕基的最初努力

在朱镕基担任副总理的最初几年,他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处理“三角债”问题。朱镕基试图通过注入大量资金来结束这个系统的恶性循环。但是旧的债务链条切断了,很快又产生了新的。朱镕基认识到,不对国有企业强行实施“硬预算约束”,“三角债”就不可能终止。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激进改革措施,“硬预算约束”不可能实现。朱镕基必须寻找新的方式处理国有企业问题。

在经济贸易办公室成立后,朱镕基开始推行他的经济改革理念,他的改革倡议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国营企业”正式更名为“国有企业”。这个名字变动非常重要,它区分了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管理权,显然表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管理。国有企业为国家所有,但在技术上,由企业自己管理自己。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如今可以整合进各种市场导向的制度当中。

1993—1997年的公司化尝试

1993—1997年间,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也被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采纳为整个经济改革工程的一部分。

^① “三角债”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公司A欠公司B的钱,公司B却欠公司C的钱,而公司C又欠公司D的钱,如此恶性循环。

^② The World Bank, *China: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6.

特别是除了进一步提升企业治理能力外,政府还强调了公司化。这样,国有企业被鼓励通过改革内部运行机制和动力结构而发展出一种能够赢利的“现代企业制度”,或者通过合并、强强联合以及其他联合方式而形成新的企业集团。同时,股份制的试验逐步增加。事实上,改革派领导人期待着建立起类似日本集团公司(*keiretsu*)和韩国财团公司(*chaebols*)那样的模式。首先,为了给公司化浪潮提供一个现代法律框架,中国政府于1994年颁布了《公司法》。

1995年初,朱镕基改革国有企业的工作计划进一步走向更明确的“抓大放小”策略,“把大的国有企业培养成集团公司,让小的国有企业面对市场力量”。改革派领导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各种改组方式,如重组、兼并、合并、租赁、合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甚至是直接破产,“放手”24万家或更多的小企业,同时出于一些明显的经济、社会原因,必须保留1000家中央政府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关键的国有企业仍然具有战略重要性,它们构成了中国工业经济的支柱。

132

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宣称,由于这些改革措施,在1996年,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中有300家企业,在国家银行注入贷款资金以及实行财政紧缩控制之后,提高了它们的绩效,另外有57家国有企业形成了现代企业集团。^①然而,根据1997年对12.4万家国有企业的调查统计数据,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介于71.5%与83.3%之间。^②

1997年后的国有企业改革

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之前,如何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的热点问题。焦点是中国是否应该走向私有化。在中国,公开提倡“私有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禁区,可能会直接引发党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家们的反对,引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本质问题的旧争论。在过去,国有企业的改革策略,通过淡化改革的“私有化”方面,有意避免直接针对“国家所有制”问题,以不触及意识形态禁区。要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领导人必须首先确立意识形态基础。

领导人所做的事情,实质上就是规劝人们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这种无益的争论放在一边;并且重新提醒左派批评者注意,中国仍然处于转型

^① 《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六个措施》,载于《中国工商时报》(北京),1997年3月2日。

^② “Workers Daily Says that State-Owned Firms are Bottomless Pi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30, 1997.

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可以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各种经济部门共同发展”。^① 这表明了领导人在改革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时的灵活性，由此迈过了早期改革努力的重要沟坎。早期改革在处理与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相连的内部动力机制薄弱问题时，遇到了困难。

133 1998年，政府正式引入“股份制”这个新概念。它在技术上是中国形式的“私有化伪装”。“股份制”计划更有效地表明了国家所有制的关键问题，这就是，不在企业中占有股份，工人和管理人员就没有将企业经营好的内在动力。

这些概念的调整，使得朱镕基能够依据市场原则来推动国家体制的激进重组。然而，就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这些政策倡议没有多少是新的。基本策略仍然是“抓大放小”。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韩国的财团公司，但是领导人仍然决定推进原定计划。^② 对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改革试图提高企业的治理能力，但也强调“公司化”或者把国有企业转变成独立的现代公司。因此，一些合并，一些破产，一些与外国合资，一些在国内外上市。

对大多数小型国有企业而言，主要的改革策略也仍然不变。但政府更愿意“放开”它们，实际上允许它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重组和改组、合并和/或兼并、租赁和合同管理、改为股份公司或者甚至出售。由于私有制不再是意识形态的雷区，更多的国有企业都能在这一时期转变成股份公司。企业宣布破产、出售（甚至给外国合资者）变得更加容易。这些小型国有企业被给予了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大的灵活性，能够选择自己的改革道路。许多小型国有企业开始进行潜在的竞争活动，这些都不需要国家在场。

朱镕基和改革派领导人依据市场原则全力以赴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然而，经济改革既是经济行为，也是政治行为。在创设和执行改革政策时，领导人必须谨慎地估算来自国有企业改革的风险与成本。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城市。这是对领导人的一个巨大挑战。

在当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国有部门，就物质、金融、人力资源及其社会责任和对政府的税收贡献而言，还需要一个更长的改革过程才能实现企业与经济两方面的可见的真实利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存在许多“硬件问题”，如资金短缺、技术设备过时等，而且还存在许多“软件问题”，如腐败、任人唯亲、管理

^① 参见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② “Asian Crisis ‘No Deterrent’ to Refor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2, 1998.

和工作方式的旧模式,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还需要花多年时间来建立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学会像竞争性商业法人那样行事。

经济国家主义与国家建构

本章已经广泛讨论了中国领导人在税收、金融和企业部门进行的所有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不仅是建立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建立一个现代经济国家。换句话说,镶嵌在所有这些改革努力中的是这样一种理念: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不断发展,必须重建一个现代经济国家。由此,伴随所有这些改革而来的是中国经济国家主义的兴起。

经济国家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证明了中央政府各种集权化举措的正当性。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经济放权的政治后果。放权策略主导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这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批评者相信这导致了地方权力中心的兴起,由此地方在实施自己的发展政策时架空了中央政府。在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后,王绍光——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著作非常有影响力——提出警告,中国国家能力的削弱不是一个好预兆:远非产生我们大部分人所希望的“瑞士化”,往好的方面,它也许会导致产生一种稳定但软弱的民主,或称之为“印度化”;往坏的方面,中央权威的倒塌甚至会导致国家的分裂,或经济的“非洲化”加上政治的“黎巴嫩化”。^①后来成为江泽民顾问的政治学家王沪宁,认为放权是一个“错误”。^②

经济国家主义旨在通过国家计划实现合理性。它并不排斥市场,但强调市场的运转必须受国家计划的指导。在中国,这种意识形态深深体现于陈云的著作当中,陈云也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奠基人之一。^③在改革之初,陈云坚持强调国家计划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必须在国家计划的背景下展开。换句话说,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力量与国家计划两者间

^① 参见王绍光1991年2月向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提交的论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② 王沪宁,《中国改革难题的非经济思考》,载于《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8月29日。此文被中国共产党的机构杂志《求是》转载,1988年第7期,第35—36页。

^③ David Bachman,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以及 N. Lardy and K. Lieberthal 编,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3。

的合理平衡。

135

在意识形态上,经济国家主义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陈云的这种经济思想。经济国家主义认定过去的改革导致了较大的地方自主权,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快速削弱。经济国家主义认为,从中央政府视角看,较大的地方自主权至少产生了三个严重“错误”。第一,地方自主权的特征是排斥中央权力。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渗透到各省,也不能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协调它们的经济活动。结果是,投资过度扩张,中央政府的税收却急剧下降。第二,由于中央政府不再处理地方经济事务,加上中央政府税收急剧下降,中央已无可能向全国提供“公共物品”,而地方政府的管辖权却快速扩大。这个事实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公民发展出强烈的地方认同,与地方官员一道抵制中央政策。第三,放权把全国的发展优势放在沿海地区,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激励,而这造成了沿海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间不断扩大的发展鸿沟。结果,新权威主义政权被广泛地认为是必要的,人们相信中央政府在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上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许多人认为,决策的无限制放权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① 财政事务权力的重新集中是绝对必要的。在陈元看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能否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必要的权力,特别是以财政集中为核心的经济权力重新集中到中央政府的手里”,因为任何一种现代经济都要求对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权的集中,从而中央政府可以贯彻实施宏观管理政策。^②

经济国家主义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因此需要国家在维持国家完整性上发挥重要作用。强大的地方自主权已经使中央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变得不可能,由此中央政府必须重新集中经济权力来限制已经过于放权了的地方自主性。

而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中国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来整合中国经济。中央政府必须负责建立起这样的市场。地方自主性导致中国经济呈现出蜂窝状的特性,这是中央政府在建立一个全国性市场时面临的主要障碍。中央政府必须重新集中权力,限制甚至“摧毁”地方保护主义。

136

经济国家主义体现在本章讨论的政府重新集权化的努力之中。1994年,任仲平在《人民日报》上很好地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

① 参见陈元,《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纲要)》,载于《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② 陈元,《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纲要)》,载于《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第19页。

对重新集权的看法是：

80年代的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推进，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在那个阶段上，冲击旧体制的主要动力来自地方、来自基层……在改革的攻坚阶段，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建立新体制需要做的工作方面众多，它们之间又需要紧密协调，这就必须由一定的权威机关制定基本的规则进行协调……新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投资体制的确立，也都决不是可以用自下而上、自发推进的方式实现的，而必须由坚强有力的国家高层权威机构对整个改革进程自上而下地进行统一协调和组织实施。^①

^① 任仲平，《上下一心打好改革攻坚战》，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3月10日。

第七章 国家重建、大众抗议与集体行动

国家重建并非一个无争议的事业。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威主义国家，但领导人也不能随意重建国家。重建国家的努力不仅产生了大量预想不到的后果，而且也鼓励了不同社会团体在新的国家中争相参与。所有这些因素影响了领导人重建国家的努力。下面两章将讨论国家重建的这些方面。

本章集中讨论国家重建如何引发了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兴起。^① 在中国，社会抗议并不新鲜，一些抗议形式与国家重建有关。“国家建构”这个概念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定义。如我在前面章节中所述，国家建构首先指重新集权化的努力，其次是指把中国企业制度从计划经济导向转变为市场经济导向的努力。“国家建构”尽管常常与“改革”重叠，但不是每项改革措施都可以视为国家建构。像金融和财政放权这样的经济分权就不能被视为国家建构。与此相似，许多改组中国企业制度的措施也不是国家建构，只有旨在增强中央政府调控企业行为的权力的那些系统性变革才称得上国家重建。

这里必须加上一个说明。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迈耶·扎尔德(Mayer Zald)指出，社会运动可以从三组广泛的因素来分析：政治机会、动员结构与组织过程。^② 由于本研究不是关注中国的社会运动，因此我的讨论不关心社会运动的内部动力。换句话说，我的

^① 关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运动的综合性概述，参见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编，*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②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讨论不集中于“动员结构和组织过程”，尽管会触及这些因素。相反，我的讨论将集中于第一个因素上，即国家重建如何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浮出水面”的机会，社会运动为什么是国家重建的一部分。

国家建构与社会运动

138

依据西德尼·塔罗(Sydney Tarrow)的说法,社会运动可以定义为“在与精英、对手和权威持续的互动中具有共同目标并团结一致的人民所发动的集体挑战”^①。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运动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但是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了国家的作用。查尔斯·布赖特(Charles Bright)和苏珊·哈丁(Susan Harding)发现,社会运动总是与国家建设或建构相联系。^②在欧洲,这尤其是事实,“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全国性运动的产生是同时发生的”^③。此后,社会运动和国家建设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这个问题是诸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道格·麦克亚当和西德尼·塔罗等关注社会运动的学者讨论的核心问题。^④

在早期学者中,托克维尔曾经试图探究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揭示了国家集权的不同程度如何造成了社会运动的机会结构的差异。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越强大,对制度参与的鼓励就越弱小,在集体行动发生时,激发暴力的诱因就更大。^⑤尽管这种描述能否适用于不同国家仍受到质疑,但是如塔罗所指出,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探讨了国家结构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认为,国家建构为集体行动创造了社会运动能够利用的机会结构。^⑥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成果仍然影响着当代社会运动的研究学者们。

对许多学者而言,社会运动扎根于国家建设的过程。国家建设是国家与

①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4.

② 如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编,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③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p. 62.

④ 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8; Doug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⑤ 参见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Chapter 4.

⑥ 同上, p. 62.

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国家主义”范式中,国家被视为“自主的、不可简化的机构”^①。然而,学者们也发现,国家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不是内部理性化的官僚机构,不能够免疫于大众的影响或者不受自身创设的规则的管治”;与此相反,如布赖特和哈丁所指出,国家可以被视为“程序化政治竞争的领域,在其中,代表着精英与大众利益的阶级、阶层和政治的冲突得以展开”^②。

139 从这种观点出发,国家建构“不仅包括国家的创制和社会团体的反作用,也包括社会动员,即国家统治者设立的国家目标及其触发的反应”^③。尽管国家是社会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但它不能在遇到影响它自身的社会挑战的情况下这样做。相反,“国家建构并不因国家机构的出现就结束,而是持续的……冲突的过程。这个过程规限了国家与其他社会、经济机构之间的相对地位,并不断重建着国家自身”^④。换句话说,“合法的国家政治与国家外部的挑战者、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反叛者的活动之间的边界,是由抗辩式行动来规限和重新规限的。”^⑤由此,大众抗议最好通过考察国家与社会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依据国家机构与社会之间不断变化着的关系,国家规限或重新规限着自身。

国家建构为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塔罗认为,现代国家建构包括三个基本的国家政策,即发动战争、征收赋税和提供食品。社会运动的机会就镶嵌在这些政策之中。塔罗说:“国家发动战争并征收赋税;战争和税收需要一个统一国家的基础设施;围绕着国家统一进程,社会运动从冲突和机会结构中产生。”^⑥当然,国家从事这三个政策,不是要支持社会动员,而是要确保和扩张国家权力。然而,“每个新政策的创制产生了新的沟通渠道、更加组织化了的公民网络以及更加一致的认知框架,然后,叛乱就可能着手主张和组织起来”^⑦。塔罗得出结论:“这些政策塑造了社会运动的结构,并且这些运动——

① Bright and Harding, “Processes of Statemaking and Popular Protest”, 载于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编,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p. 3.

② 同上, pp. 3-4。另参见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和 Vivienne Shue 编,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③ Bright and Harding, “Processes of Statemaking and Popular Protest”, p. 10.

④ 同上, p. 4.

⑤ 同上, p. 10.

⑥ Tarrow,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 载于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Mayer N. Zald 编,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p. 48-49.

⑦ 同上, p. 49.

或者对运动的恐惧——塑造了民族国家演进的道路。”^①

蒂利认为,国家建构为社会行为体提供了集体行动的机会,同时通过大量的争斗——无数的对外战争以及在征服过程中国家管理者与大众的斗争——现代国家被锻造出来。如同国家结构由国家化的、选举的政治演化而来,大众骚动也造成了一些深层变革。深思熟虑组成的不同团体向国家提出要求,形成对国家权威有组织的、持续的、自觉的挑战。随着大众运动成功地进入并控制国家资源,它们也重塑了政治领域,改变了国家自身的行动。^②

中国的国家重建及其不满者

中国社会运动的兴起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目光。^③ 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与全球化时代,社会运动也可以在国家重建的背景下得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倾向于引发社会运动的兴起。在改革之前的时代,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打击他的政敌,毛泽东不屈不挠地发动了多次社会运动。但在邓小平掌权后,领导人付出了极大努力来使社会去动员化。在前苏联,“新思维”与“公开化”为集体行动开放了新机会,导致了抗议运动。在中国,领导人认为稳定和经济发展压倒一切,严厉地压制任何会导致不稳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对政权展开的有组织的严重挑战。这里的问题是,尽管有政府的高压政治控制,为什么大众抗议还屡兴不止?换句话说,为什么政府不能控制大众抗议的兴起,尽管它在维护稳定上投入了大量精力。

140

同样,大众抗议也是中国国家重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在领导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样做时,国家已经创制了新政策(如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制定不平衡发展的政策),并开展了各种发展项目(如建设信息社会)。一方面,所有这些新政策和新项目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它们也为大众抗议提供了工具,创造了机会。

^①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p. 66.

^② Charles Tilly,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载于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编,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297 – 317;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 D. 990 – 1990*,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0.

^③ 如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编,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信息社会与集体行动

中国已经迅速发展出一个信息社会(第一章)。这个信息社会是如何影响社会运动的?许多学者相信,在信息社会与社会运动的兴起之间有着正相关。当许多人认为信息社会有利于公共领域转型时,另一些人则强调信息社会对大众民主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公共领域的学者们认为,公民社会是民主的一部分,^①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为公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工具。^②事实上,通讯是公共领域兴起的一个根本方面,^③并且信息技术产生了一个“电子化的公共领域”^④。此外,信息技术也促进了政治参与,有助于传统精英民主向大众直接参与转变。^⑤互联网促进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⑥

这在中国的确如此。信息技术为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工具和资源,如近年来的法轮功运动就是一例。^⑦1999年4月25日,在北京的约一万名法轮功信徒成为国际新闻媒体的头条,他们围攻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大院中南海,要求官方承认他们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组织。高层领导深为苦恼,因为公安部门对这种状况未能先行掌握。

① Robert D. Putman,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Kevin A. Hill and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David Holmes (ed.), *Virtual Politics: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London: Sage, 1997; Howard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4; R. Tsagarousianou, D. Tambini and C. Bryan 编,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③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④ P. Dahlgr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1995; D. Schuler, *New Community Networks: Wired for a Change*, New York: ACM Press, 1996.

⑤ L. K. Gorssman,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Viking, 1995.

⑥ K. W. Grewlich and F. H. Pederson (eds.),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Brussels: Europe Commission, 1994.

⑦ 黄朝翰和 William T. Liu, *The Mystery of China's Falun Gong: Its Rise and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London a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在1978年后,中国政府不断放松对宗教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限制。但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的复苏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中国的科技已经比较发达。没有现代信息技术,法轮功就难以如此有效地动员其信徒。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现代通讯技术,法轮功已形成世界范围的网络。在静坐之后,中国政府发现法轮功并不是其信徒所声称的那种简单组织,而是高度结构化的组织,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进行联系。对局外人甚至其广大新信徒而言,法轮功显得是一个松散而非正式的组织——自愿参与,信徒无须交纳会费,不需要向专门的行政机构汇报。但是中国领导人很快“被狂热的宗教膜拜惊醒,这个秘密的社会组织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地下组织”^①。在根基上,法轮功的成员由松散组成的“单元”构成,通过电子通讯技术,全中国有1900个指导中心和28000个修炼场所。^②虽然围攻中南海直接导致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展开全国范围内的清查运动,但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办法阻止法轮功信徒在世界范围内的彼此通讯。政府的重要影响看来只是迫使法轮功转为地下活动。

当局还常常关闭散布政治异议的网站。^③《人民日报》把互联网视为不良因素可能用来影响公共舆论的一个平台,它警告说,“国内外敌对势力正竭力利用这个阵地对我进行渗透”^④。认识到互联网可能会被用来当做反对政权的公共话语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做出了大量努力来控制网络交流,包括监管和关闭批评类网站。从1994年到2000年,政府出台了8个法规来管理网络活动:2个针对计算机信息安全,2个针对平台登记管理,2个针对网络物理连接和访问,1个针对电信通讯(包括网络在内),1个针对网络服务。2000年的法规提出了指导方针,规定了不良的网络行为,如反宪法,反国家利益,损害国家名誉,引发种族冲突,提倡邪恶宗教祭祀,引发社会不稳定,传播色情、暴力、恐怖主义和赌博内容、诽谤性评论以及其他违反刑法、民法和治安法的行为。^⑤政府甚至试图建立“网络警察”来管制互联网。^⑥

142

收入差距与社会不满

由于国家重建是一个利益再分配过程,因此它造成了不同社会团体和地

① “Fear of Non-Party Faithfu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9, 1999.

② “China Exposes Falun Gong Structur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ly 31, 1999.

③ 美联社,2000年8月8日。

④ 《人民日报》,2000年8月9日。

⑤ 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新华社消息,2000年8月1日。

⑥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2000年8月10日。

区之间的分配冲突。一些团体和地区比另外一些团体和地区获利更多,一些人是成功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是失败者。换句话说,社会团体和地区彼此不均衡地从不断扩大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获利。那些参与了这个过程的人获得了利益,同时那些没有参与的人则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失败者是谁?表 7.1 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中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对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认知。虽然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通常意见不一致,但他们都同意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失败群体。也可以合理地认为政府雇员与流动者也是失败者。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和怎样变成了失败者?

在造成这种情况的众多原因当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经济改革政策逐步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政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贫困也得到实质性的削减。然而,福利的提高与贫困的削减是极不平衡的,即是说这些改革并没能够削减不同社会团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世界银行的调查表明,1981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28.8,但到 1995 年已达 38.8。这仍然低于大部分拉美国家、非洲国家和东亚国家,而与美国相似,但却高于大多数处于经济转型中的东欧国家以及许多高收入的西欧国家。^① 许多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更加恶化,如表 7.2 所表明。

农村差距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各种调查发现,在中国农村,80%以上农民的收入低于全国人均收入。换句话说,不足 20%的农村居民的收入高于其他农村居民。^② 低收入团体与高收入团体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24.2 上升到 1995 年的 33.3。^③

根据王绍光的调查,恶化的就业形势是导致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中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农村人口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便难以为继。根据一个评估,1995 年,5 亿农村劳动力中,

^① The World Bank, *China 2020: Sharing Rising Incom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p. 7.

^② 王绍光,“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WTO Membe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25 (2000), pp. 379—380.

^③ The World Bank, *China 2020: Sharing Rising Incomes*, p. 17.

表 7.1 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改革受益者与受损者的认知

143

| A 政府官员的认知 | |
|----------------|-----------------|
| 受益最大者 | 受益最小者 |
| 1997 年 10 月的调查 | |
| 1 私营企业主 | 1 国有企业的工人 |
| 2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雇员 | 2 农民 |
| 3 农民 | 3 政府公务员 |
| 1998 年 10 月的调查 | |
| 1 私营企业主 | 1 国有企业的工人 |
| 2 艺术家 | 2 农民 |
| 3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雇员 | 3 政府公务员 |
| 1999 年 11 月的调查 | |
| 1 私营企业主 | 1 失业工人 |
| 2 艺术家 | 2 农民 |
| 3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雇员 | 3 国有企业工人和乡镇企业工人 |
| 2000 年 10 月的调查 | |
| 1 私营企业主 | 1 农民 |
| 2 艺术家 | 2 国有企业的工人 |
| 3 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雇员 | 3 政府公务员和乡镇企业的工人 |
| B 城镇居民的认知 | |
| 受益最大者 | 受益最小者 |
| 1997 年 11 月的调查 | |
| 1 私营企业主 | 1 国有企业的工人 |
| 2 艺术家 | 2 农民 |
| 3 银行工作人员 | 3 民工 |
| 1998 年 11 月的调查 | |
| 1 艺术家 | 1 国有企业的工人 |
| 2 腐败官员 | 2 农民 |
| 3 私营企业主 | 3 民工 |
| 1999 年 8 月的调查 | |
| 1 艺术家 | 1 国有企业的工人 |
| 2 腐败官员 | 2 农民 |
| 3 私营企业主 | 3 民工 |

来源：由王绍光根据汝信、陆学艺和尚天伦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999、2000、2001 年各版）编辑。参看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 WTO 的社会政治意义》，工作论文，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2002。

表 7.2 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平等状况比较 (基尼系数)

| 地区或国家 | 1980s | 1990s |
|---------|--------------|-----------------------|
| 东欧 | 0.250 | 0.289 |
| 高收入国家 | 0.332 | 0.338 |
| 南亚 | 0.350 | 0.319 |
| 东亚和太平洋 | 0.387 | 0.381 |
| 中东和北美 | 0.405 | 0.380 |
| 非洲 | 0.437 | 0.470 |
| 拉美和加勒比海 | 0.498 | 0.493 |
| 中国 | 0.299 | 0.388 |
| 中国(赵人伟) | 0.382 (1998) | 0.445 (1995) |
| 中国(邱晓华) | | 0.450 (1997) |
| 中国(李强) | | 0.458 (1997) |
| 中国(成宗胜) | | 0.403 (正式经济, 1997) |
| 中国(成宗胜) | | 0.515 (包括非正式经济, 1997) |

来源: 参见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 中国加入 WTO 的社会政治意义》, 工作论文,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系, 2002。

市场只能接纳 3250 万人, 其余都是过剩的。^① 官方统计数据也表明, 乡镇企业的就业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急剧下降。例如, 1997 年下降了 4.8%, 1998 年下降了 18.7%。^②

城市差距

145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 许多城市家庭也经历了实际收入的下降过程。依据官方数据, 城市基尼系数从 1981 年的 17.6 上升到了 1995 年的 27.5。^③ 1996 年, 20% 的最低收入家庭中的近三分之二家庭发现他们的收入下降了。接近最低收入家庭的 20% 的家庭中, 几乎有一半家庭发现他们的收入下降了。与此相反, 20% 的高收入城市家庭享受着收入不断提高的乐趣。^④ 1990 年, 20% 的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是 20% 的最低收入家庭的 4.2 倍。到 1998 年, 这一比值跳到 9.6 倍。最富有的 10% 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3.6% 上升到 1998 年的 38.4%。另一方面, 那 20% 的最低收入家

① 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制度挑战: 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 未发表手稿。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388 页。

③ The World Bank, *China 2020: Sharing Rising Incomes*, p. 17.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1998)》,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9 页。

表 7.3 中国城市不断扩大的不平等,1990—1998

| 年份 | 20%最高收入者/ 20%最低收入者 | 20%最低收入者 占总收入的比重 | 20%最高收入者 占总收入的比重 | 10%最高收入者占 总收入的比重 |
|------|-----------------------|---------------------|---------------------|---------------------|
| 1990 | 4.2 倍 | 9.0% | 38.1% | 23.6% |
| 1993 | 6.9 倍 | 6.3% | 46.5% | 29.3% |
| 1998 | 9.6 倍 | 5.5% | 52.3% | 38.4% |

来源:许欣欣、李培林,《1998—1999年中国就业收入和信息产业的分析与预测》,载汝信、陆学艺、尚天伦编:《社会蓝皮书(199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庭在总收入中的同期比重从9%降低到5.5%(见表7.3)。过去,城市居民把城市当做安全的避风港,因为城市把他们与广阔国土中的千百万穷人阻隔开来。但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大约300万城市居民生活在穷困之中,他们的收入还不到全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①

城乡差距

改革也导致了城乡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并不是新鲜事。在中国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就是农村居民的2.6倍。^②在改革初期,城乡差距因改革首先在农村实行而大大缩小。但是,自从1984年开始城市改革以来,差距就越来越大。世界银行认为,以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城乡差距是非常大的。在其他国家,城市居民收入很少超过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在大部分国家,农村居民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66%或更多。1995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仅是城市收入的40%,从1983年的59%掉了下来。^③1999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是2162元,而城市工人的人均收入却是7668元。^④

地区差距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与省市内部的不平等相比,地区间的不平等要缓和一些。例如,199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人均收入比内地省份高出50%,而同年城乡收入差距达两倍之多。^⑤相反,王绍光和胡鞍钢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悲

146

① 王绍光,“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WTO Membership”,p. 385.

② 同上,p. 386.

③ The World Bank, *Sharing Rising Incomes; Disparities in China*, p. 16.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61页。

⑤ The World Bank, *China 2020; Sharing Rising Incomes*, p. 22.

观的画面。在一个关于地区差距的详细研究中,他们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各省间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第二,地区差距大得出奇;第三,地区不平等是一个多向度的现象。^① 中国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之间人均 GDP 中的收入差距从 1983 年开始扩大,从 1990 年开始快速拉开。除了广西,所有沿海省份的人均 GDP 都高于全国水平。上海市是全国水平的 4.5 倍。在另一极端,贵州省的人均 GDP 却只有全国水平的 37%。除了黑龙江省,没有哪个中西部省份的人均 GDP 高于全国水平。^②

腐败与道德衰退

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了社会的不断多元化,这使中国国家更加难以治理社会。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削弱了国家本身,侵蚀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当国家向人民供给和交付公共物品的能力下降时,人民的担忧上升,同样,他们进行集体行动的动力增强了。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国家在推动经济变革的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商业的紧密联系导致了党政官员的腐败。表 7.4 显示了各级主要党政官员腐败行为的官方统计数据。

腐败引发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不能保证公平的不满,导致对党统治国家的合法性的质疑。各种调查表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政府官员的严重腐败”和“治安混乱”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③ 当老百姓认为政府腐败而社会治安又被破坏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充满担忧。根据 1998 年的一个调查,近 93% 的人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当问及他们与他人发生冲突或争端会如何做时,74.4% 的人说他们会求助法律手段来解决。然而,他们也知道这种手段的有限性,因为在中国依然是“权大于法”,因此他们可能会借助非法律手段。约 49% 的人认为他们会向新闻媒体寻求帮助,24.7% 的人认为他们会向个别领导人寻求帮助。此外,约 16% 的人可能会转向一些集体行动来寻求正义,如请愿、示威或上访。^④

① 王绍光、胡鞍钢,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② 同上, pp. 56-57.

③ 参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的各年度调查报告,即《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 王春光,《1997-1998 年:中国社会稳定状况的调查》,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1998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7 页。

表 7.4 20 世纪 90 年代领导干部腐败的加重

147

| |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1—10月 | 1999 |
|--------------------|-----|------|------|------|------|------|---------------|------|
| 受党纪 政纪处分 | 省部级 | 6 | 17 | 24 | 23 | 7 | 10 | 17 |
| | 地厅级 | 205 | 309 | 429 | 467 | 576 | 219 | 327 |
| | 县处级 | 2793 | 3528 | 4880 | 5868 | 6585 | 2955 | 4029 |
| 被检察 机关立案 侦查的 | 省部级 | 1 | 1 | 2 | 5 | 3 | 3 | 3 |
| | 地厅级 | 7 | 88 | 145 | 143 | 148 | 85 | 136 |
| | 县处级 | 1141 | 1826 | 2306 | 2551 | 2426 | 1462 | 2200 |
| 被判刑的 | 省部级 | | 1 | | 1 | 5 | 2 | 2 |
| | 地厅级 | 7 | 28 | 35 | 43 | 58 | 30 | 65 |
| | 县处级 | 69 | 202 | 396 | 364 | 403 | 271 | 367 |

来源：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年：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公共部门的严重腐败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风气。普通公民看到党政官员积累了大量财富，并且难以相信他们会自我约束。久而久之，人们开始认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公平。同时，各级政府官员也发现他们越来越难以维持城乡居民的道德感和社会团结。随着党政官员腐败的蔓延，普通公民的犯罪也变得广泛。^① 抢劫和械斗，这些在毛泽东时代曾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如今却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

148

社会抗议的兴起：农民与工人

实际上，农民和工人的社会抗议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事件。因为问题比较敏感，所以还不能获得一个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值得长篇引用的是一个中国报告（1998年）：

近几年我国各种各样的社会不稳定事件时有发生，其中有的事件还相当严重，对整体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些社会不稳定事

^① Borge Bakken, "State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载于 Brodsgaard and Young 编, *State Capacity in Japan, Taiwan, China and Viet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5—202.

件主要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罢工罢教、上访、游行请愿、暴力冲突、静坐示威、卧轨、绝食、恶性伤害、毁坏、哄抢围堵等形式。其中发生频率最多的是罢工罢教、上访和游行请愿。近年来发生的这些事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事件的激烈程度有所增加，个别地方出现了冲击政府机关、堵塞交通要道、围攻工作人员、呼喊口号的事件。某省某市仅在一个季度内就发生上访群众围堵冲击市政府机关大院达 23 次之多，更有个别省市出现了爆炸事件。第二，集体性不稳定事件呈大幅度增长之势。以集体上访为例，近年来都以 27% 以上的比例增加，如南方某省的某县农民因负担过重问题，在一个月就发生百人以上集体上访达 13 次，参与人数多达上万人，现在一些地方的群众常常是几十人、上百人，或是几个村、几个乡的群众联合行动，往往是开着机动车、打着横幅、举着牌子、喊着口号，声势浩大。1997 年上半年集体性不稳定事件仍然有增无减，在一些地方出现创纪录的现象。第三，与干群关系紧张有关的不稳定事件增加较快。^①

149 这个报告是王春光写的，他是一位来自国务院的学者，他建议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来应对国内不断增加的社会抗议活动。2001 年的另一个报告也认识到，在中国，由于经济、民族和宗教冲突的上升，各种类型的集体抗议和团体事件在不断扩大。这个报告是由中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的一个课题组写就的，它警告说，中国向国外贸易与外国投资进一步开放市场，将在未来产生急剧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引发较大的社会冲突。这个报告对这些变化做出的紧急建议是，通过降低人民大众的不满来解救党和国家。^② 在这一节中，通过集中分析改革时代的农民抗议和劳动纠纷，我将强调社会抗议与国家重建之间的联系。

税收改革、农民负担与农民抗议

农民抗议在中国并不罕见。依据一份官方报告，“组织起来，抵制地方国

^① 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1998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8—129 页。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 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另参见 Erik Eckholm, “China Party Says Unrest is Spreading in Country; Frank Official Report Calls Relations with the Masses ‘Ten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3, 2001.

家机关和团体的各种无政策根据的和违法的事项,已经成为农民有意和无意的行为”^①。2000年的另一个研究报告指出:

这几年农村干群矛盾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有些地方农民私下办起了上访培训班。有的地区《上访须知》、《上访手册》广为流传。^②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农民的抗议行为与各级政府施加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密切相关。^③官方称之为“农民负担”,它指的是各级政府和 other 行政部门从农民身上收取的各种赋税和管理费。包括:

1. 国税:农业税和附加费;特产税;屠宰税;耕地占用税;教育附加费。
2. 乡镇和村征收税(乡统筹、村提留或三提五统):三项村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项乡镇统筹——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民办交通费。
3. 集体征收的土地费:5—10个工作日的灌溉防护林、公路或学校建设的劳动;5—10个工作日的国家护林水利管理的“累积劳动”。
4. 收费、基金和集资:公路或学校建设以及其他的地方性公益项目;订阅报刊、购买保险、办理结婚证等。
5. 罚款:很多政府机构征收的违规罚款,如超生。
6. “隐性负担”:强迫按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国家出售粮食;工业与农业的价格剪刀差。^④

150

并不是所有的负担都是不合法的,同样农民也并不是反对全部负担。许多研究发现,农民通常愿意接受前两项,但对后四项非常抱怨甚至抵制。前两项,即正式国税和乡镇征收是法律法规定下的,它们由高层权威管理。但是中

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农民日报》编辑办公室,《矛盾、引导和历史的奇迹——关于196份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载于《农民日报》,1998年12月8日。

② 陆学艺,《中国农村状况及存在问题的根源》,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③ 同上。以及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载于《香港社会科学》2000年第17期,第67—85页。

④ Thomas P. Bernstein and Xiaobo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September 2000), p. 744. “剪刀差”是指政府维持农产品的低价格,以此使城市居民获益。

中央政府并没有制定任何有关后四项的法律法规,地方政府和其他行政机构常常滥用它们在这几个方面的课税权力。结果,实际提取的资金常常超过了规定的水平。例如,规定乡镇和村的总课税不得超过乡镇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5%,但实际数字远远超乎其上。根据对四川省1000个农村家庭的一项调查,1991年的比重是12.7%。^① 一项对贵州省四个乡的研究显示,1992年的比重是13.8%。^② 另外一项对安徽省某个村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超过了25%。^③ 事实上,这种形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变得越来越严峻。苏州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民负担总计达(人均纯收入的)30%—50%,在这些负担中,有20%—40%被农民认为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④

那么,为什么中国农民面临着如此不断扩大的沉重负担呢?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观点。一些人认为是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贪婪和腐败,^⑤另外一些人相信这是地方政府组织急剧扩张的结果,^⑥还有些人将之归咎于地方各级收入资源的萎缩。^⑦ 上述每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很难揭示问题的根本所在。政府官员的贪婪导致了对农民征收不合法的、违规的税费。但并不是所有的税费都可使个人得利。相反,这些税费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如公路建设、学校基建和造林。萎缩的税收资源是导致不合法和违规征税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西部落后地区。但是,这难以解释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沿海富裕地区的农民也面临着沉重的负担。地方行政机构的急剧扩张的确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增加,但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大部分农民负担来自于上面提

① 陈柏松、张斌,《农民负担现状、成因及对策》,载于《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第3期,第37—41页。

② 廖金莹,《农民负担过重的调查与思考》,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6期,第54—56页。

③ 李先刚,《关于农村分税制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载于《农村调查》1995年第7期,引自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载于《香港社会科学》2000年第17期,第70页。

④ 苏州大学法学院行政法课题组,《当前农村乱收费现象成因分析及对策》,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3期,引自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第70页。

⑤ 如刘晓波(Xiaobo Lü),“The Politics of Peasant Burdens in Reform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5: 1 (1997), pp. 113—138。

⑥ 例如苏州大学法学院行政法课题组,《当前农村乱收费现象成因分析及对策》;黄延信,《农民负担过重的制度性根源与对策》,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5期,第38—42页。

⑦ 如 Albert Park, Scott Rozelle, Christine Wong, and Changqing Ren,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Reforming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47 (1996), pp. 751—779。

到的那些地方公共物品的费用和管理费,而不是地方政府征收的职员成本;而且,大部分职员成本用在了地方学校教师身上。^①

这一问题的更根本原因在于1994年税制改革及其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第六章已经表明,1994年税制改革是领导人进行国家重建尝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旨在集中财政权力,限制正在兴起的地区主义。如第六章所指出,新体制非常有效。它能够阻止预算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的下降趋势,提高中央政府在总预算收入中的份额。如表7.5所示,1998年总预算收入是GDP的12.8%,稍稍低于1993年的13.5%。省市所占份额也被削减。上缴税收的省市看到它们所占的预算收入份额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从1993年的85.8%下降到1998年的61.8%。而得到补贴的省市也面临着相似的形势:在同一时期,它们所占的份额从112.7%下降到了86.3%。

新体制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同时大幅度地影响了不同层级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在县与乡镇层级上,这种变化的影响最大,表现为两种方式:第一,当新体制把财政权力从地方转交给中央时,责任却并没有相应地转交给中央。例如,中央政府应该负责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本提供财政支持,但事实上,县和乡镇层级的地方政府仍然必须承担这笔费用,结果这些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加重。第二,新体制阻碍了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这缩小了地方的课税基础。^②

1994年改革之前的财政放权被普遍认为是向地方政府提供了帮助之手。从额外增长的税收中取出合理的一部分给地方政府,这有效地把地方政府变成当地剩余的索要者,由此为它们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积极性。^③与这些财政激励相关联的是非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许多改革。^④

如第六章所指出,中央政府必须开启新的财政改革来解决财力急剧下降的问题。然而,1994年的改革把作为改革初衷的帮助之手变成了掠夺之手。它改变了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构,导致了诸如腐败加剧、大范围失

① 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第73—74页。

② 陆学艺,《中国农村状况及存在问题的根源》,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63页。

③ 钱颖一(Yingyi Qian)和Barry R. Wei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 (1996), pp. 149—185, 以及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1 (1997), pp. 83—92.

④ Hehui Jin、钱颖一和Barry R. Wei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SWP-99-013, 1999.

表 7.5 省市预算收入的比重 (%)

| | 上缴税收省市的份额 | 受补贴省市的份额 | 所有省市的份额 | 分摊后的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 总预算收入占 GDP 的比重 (%) |
|------|-----------|----------|---------|-----------------------|--------------------|
| 1985 | 61.8 | 131.7 | 96.4 | 14.4 | 23.7 |
| 1986 | 67.1 | 141.7 | 104.3 | 15.7 | 22.2 |
| 1987 | 70.1 | 140.8 | 107.1 | 15.1 | 19.7 |
| 1988 | 75.9 | 126.1 | 102.8 | 13.5 | 17.8 |
| 1989 | 79.8 | 122.2 | 103.0 | 14.1 | 18.0 |
| 1990 | 79.4 | 122.0 | 104.4 | 13.1 | 17.9 |
| 1991 | 81.0 | 118.8 | 102.6 | 12.3 | 16.0 |
| 1992 | 81.3 | 118.2 | 101.4 | 10.6 | 14.2 |
| 1993 | 85.8 | 112.7 | 98.5 | 10.8 | 13.5 |
| 1994 | 78.7 | 96.0 | 88.5 | 9.7 | 11.8 |
| 1995 | 76.5 | 95.3 | 87.0 | 8.9 | 11.2 |
| 1996 | 77.9 | 94.5 | 87.3 | 8.9 | 11.3 |
| 1997 | 66.1 | 89.2 | 79.6 | 8.7 | 12.0 |
| 1998 | 61.8 | 86.3 | 74.4 | 9.6 | 12.8 |

来源: Kang Chen, Arye L. Millman and Qingyang Gu, "From the Helping Hand to the Grabbing Hand: Fiscal Federalism and Corruption in China", *EAI Working Paper No. 67*,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ebruary 2001.

业、经济增长放慢等负面后果。^① 农民生存形势的恶化也可以在掠夺之手的背景下得到理解。对 1994 年后县和乡镇层级财政状况变化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 1994 年财政改革对农民的影响。

县政府的财政是中国财政体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② 县税收由三部分构成,即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和自征税。预算收入包括国税和地税。前者由工业附加税和消费税组成,后者包括商业税、所得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所有权税、动物屠宰税等。预算外收入包括各种地方收费、基金和集资等。自征税包括了大范围的违规收入 and 不法收入。所谓“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① 陈抗(Kang Chen), Arye L. Millman and Qingyang Gu, "From the Helping Hand to the Grabbing Hand: Fiscal Federalism and Corruption in China", *EAI Working Paper No. 67*,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ebruary 2001.

^② 如参见 Christine P. W. Wong 编,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5.

就属于这一范畴。

在1994年财政改革之前,分享总税收的体制在全国实行,依据之前两者达成的协议,中央与省市分享全国的总税收。同一协议也存在于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以及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之间。人们普遍认为,全国的税收分享制度为地方发展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并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① 1994年改革给这个体制带来了重大变革。当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实行分税制时,县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关系仍然运用着分享总税收的体制。县政府处于一个不值得称羨的地位,它必须“向上级政府让步更多”,又“不能(向乡镇级政府)索取太多”。按照分税制的安排,中央政府在县级征收的全部国税中有25%要返还给县政府,县政府依然留有自己征收的所有地税。中央政府与县政府分享地方税收资源的最大份额,即增值税。此外,税收的这一份额是得到保证的。相反,按照分享总税收的体制,县政府不能从镇政府抽取更多的税收,地税征收的数量严重依赖于地方的经济业绩。

153

1994年的财政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由于上级政府从地方经济增长中分享了最大份额的税收,地方政府因此变得不再积极推进地方投资。地方增长越缓慢,课税基础就越小。例如,安徽省的一个县,从地方国有企业中征收的所得税分享份额占全部地方税收的比重,从1995年的14%下降到1997年的不足3%。从总体上看,对所征地方税收的分享份额从1994年占总地方税收的64%下降到1998年的42%;由于地税部门征收了绝大多数县级税收,所以它们的税收总额直接体现了一个县的财政状况。^②

乡镇政府的财政状况面临着类似的恶化。乡镇一级的财政预算在中国预算体制中是最低的一级。预算结构类似于县政府,包括预算收入、预算外收入和自征税。在有乡镇企业的地方,乡镇层级的征税成为主要的预算收入来源。乡镇政府必须向上级政府转交大部分的预算收入,即正式税收。此外,中央政府规定乡镇和村的总征收不能超过人均年纯收入的5%。乡镇的征税几乎涵盖所有的政府成本,包括地方学校、民兵、退伍军人家属、五保户、计划生育等。

154

^① 如参见 Jean Oi, *Rural China Takes Off*,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Andrew Walder (ed.), *Zouping in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载于《香港社会科学》2000年第17期,第76页。

没有征税,镇政府就难以运行下去。村级征收由农村使用,但受镇政府管理。但是人们发现,这种管理在大多数地方都是紊乱的。^①在发达地区,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级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于乡镇企业提交的利润。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乡镇政府通过不断提高税收来满足它的财政需要。

乡镇政府是行政部门的最低一级,但在中国扮演着极端重要的治理角色。其成本大部分来自三个领域的开支:(1)行政成本(职员);(2)基本建设费用(如公路建设、耕地基本建设);(3)文化、教育和卫生(如学校建设、教师工资、公共卫生医疗设施)。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中国内地,乡镇征税只能满足行政人员与教师的工资。严重的财政短缺使乡镇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如表7.6所显示。

155 1998年,为了改变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许多县政府开始与乡镇政府实行分税制。但这种变革导致乡镇预算进一步恶化,因为如上面所指出,县政府只是从乡镇政府中提取更多的税收。^②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1994年的财政改革如何影响了农民负担,并由此导致农村抗议活动的兴起。这次改革增强了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提取税收的能力。当中央政府不断扩大整个税收蛋糕的享有份额时,地方政府的享有份额却下降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也下降了。当地方增长缓慢时,地方税收基础萎缩,正式税收的收入不再能够满足地方政府的需求。结果,地方官员转向征收非正式的收入,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

当中央向地方政府汲取财富时,后者就从农民身上汲取财富。不法的和违规的掠夺,大量地加重了农民负担,从而迫使他们反抗地方政府。^③中国古代有句俗语说:“苛政猛于虎。”如今,中国老百姓说:“苛费猛于虎。”如果古代的农民暴动被认为是“暴政”的结果,那么今天的农民抗议肯定与“苛费”相关。

^① 廖金莹,《农民负担过重的调查与思考》,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6期,以及张元红,《论中国农业税制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12期,第4—11页。

^② 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第79页。

^③ 如参见 Thomas P. Bernstein and Xiaobo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September 2000).

表 7.6 1998 年安徽省乡镇与农村的平均债务 (1000 元)

| 地区 | 乡镇 | 村 |
|------|--------|-------|
| 阜阳市 | 4835.0 | 137.0 |
| 六安地区 | 4468.4 | 155.8 |
| 蚌埠市 | 4185.3 | 138.7 |
| 淮南市 | 4164.0 | 404.8 |
| 宿州市 | 3446.5 | 106.2 |
| 巢湖地区 | 3176.3 | 298.5 |
| 亳州市 | 2859.6 | 64.4 |
| 铜陵市 | 2671.7 | 255.7 |
| 淮北市 | 2555.4 | 341.3 |
| 滁州市 | 1971.8 | 149.6 |
| 宣城地区 | 1421.9 | 85.2 |

来源: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载《香港社会科学》第 17 期,2000 年秋季号,第 79 页。

资本主义、失业和工人运动

工人运动在中国亦非新鲜事。在“百花齐放”和“文化大革命”年代,工人运动被自上而下地动员起来。^① 然而,改革促成了新工人抗议活动的兴起,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工人抗议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② 1995 年的一个官方调查称,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中,与工人相关的示威活动的参与人数已经超过 110 万人。1998 年,有 360 万工人参与了这样的示威活动。^③ 表 7.7 显示出劳工纠纷的数量在不断攀升。我们可以看到,在 1999 年上半年,劳动纠纷事件的总数是 1994 年的 7 倍。而且,集体性的劳工纠纷事件也在增多,其数量从 1996 年到 1999 年增加了 4 倍。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工人抗议的兴起呢? 与农民抗议活动

^① Elizabeth Perry,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7 (March 1994), pp. 1 – 27; Elizabeth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1997.

^② 如参见陈峰, “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44 (July 2000), pp. 41 – 63; 以及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载于 Perry and Selden 编, *Chinese Society*, pp. 41 – 61.

^③ 同上, p. 41.

156 一样,工人运动也是国家重建的一部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讨论了中国领导人如何调整国家结构以便适应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1949年后三十年的艰辛实验之后,领导人决定利用资本主义作为重建中国经济体制的一种方式。尽管中国领导人并不想放弃社会主义这个终极目标,但他们认识到学习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虽然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已经改变了它的形式,但它却依然保留了19世纪的大众想象,即剥削工人的撒旦式工厂。

在中国,失业和管理层腐败可能是导致工人运动兴起的两个最重要因素。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不切实际地低,因为它只包括了那些不怕麻烦在政府登记了的失业者,而排除了未登记的下岗工人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第六章讨论过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事实上,下岗工人问题是这些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几乎每个主要的改革措施都加剧了失业形势。

157 下岗工人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涌现。在邓小平1992南巡之后,中国国有企业开始了各种市场导向的改革,如“打破铁饭碗”和“三项制度改革(即劳动、工资、养老保险)”。^① 这些改革直接导致下岗工人问题进一步恶化。1995年只有600万左右的下岗工人,而在1996年达到740万人,当时启动了局部的私有化计划,即实行“抓大放小”(第六章)。^② 这种状况在1997年之后更加恶化,那时实行了更进一步的私有化措施,如股份制。到1997年底,下岗工人人数已达到约940万。^③ 尽管政府启动了各种再就业项目来应对这个问题,但它们未能使形势有所好转。^④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99年只有580万城市居民失业,^⑤但下岗工人的数量已经达到1000万人。^⑥ 依据这个估计,1998年总失业人数已经达到1500万—1600万人,1999年达到1800万—1900万人。^⑦

① 关于对这些政策的一些直接反应,请参见杨爱华、陆思山,《砸破“三铁”后的中国人》,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中国劳动年鉴》,北京:中国年鉴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

③ *China Daily*, February 28, 1998.

④ Edward X. Gu, "From Permanent Employment to Massive Lay-Off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al Un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1993-1998)", *Economy and Society*, 28, 2 (May 1999), pp. 281-299.

⑤ 杨宜勇,《2000年中国就业形势及其政策选择》,载于刘国光编,《经济蓝皮书·200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⑥ 同上,第150页。

⑦ 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载于胡鞍钢编,《中国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7页。

表 7.7 劳动纠纷事件

| 阶段 | 劳动纠纷事件总数 | 集体劳动纠纷事件总数 | 参与劳动纠纷事件的工人总数 | 参与集体劳动纠纷事件的工人总数 |
|--------------|----------|------------|---------------|-----------------|
| 1994 年 1—6 月 | 7905 | — | — | — |
| 1995 年 1—6 月 | 12956 | — | 31144 | — |
| 1996 年 1—6 月 | 14852 | 1050 | 40413 | 33646 |
| 1997 年 1—6 月 | 26600 | 1821 | 97006 | 56425 |
| 1998 年 1—6 月 | 34879 | 2798 | 134436 | 84208 |
| 1999 年 1—6 月 | 55244 | 3955 | 230243 | 144273 |

来源：由王绍光根据汝信、陆学艺和尚天伦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各年版）编辑。参见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 WTO 的社会政治意义》。

失业问题在北方那些传统重工业导向的省市特别难以处理，如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些地方的真实失业率在 1998 年从 12.8% 上升到了 15.5%。失业也是内陆省市的严重问题，如安徽、四川和陕西。这些地方的失业率超过了 10%。与此相反，沿海省市，包括广东、山东、浙江、江苏、河北、上海以及首都北京，显示出低失业率。^①

失业问题因国有企业有权解雇工人而产生。国有企业的经济业绩在改革时期有了可观的提高，^②尽管国有部门的生产力增长还明显低于非国有部门。^③如表 7.8 所表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亏损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亏损额也越来越大。事实上，非国有部门在改革期间对中国的增长奇迹贡献最

① 胡鞍钢，“High Unemployment in China: Estimates and Policies”，此文发表于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于 2000 年 3 月 25 日在香港合办的国际会议“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China: Integration, Disintegration or Reshaping of An Empire?”

② Theodore Groves, Yongmiao Hong, John Mcmillan, and Barry Naughton, “Autonomy and Incentives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1 (1994), pp. 183—209; 李伟(Wei Li),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1980—198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5 (1997), pp. 1080—1106; Bai Chong-en, David D. Li and Yijiang Wang, “Enterprises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en is up really dow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4: 3 (1997), pp. 265—280.

③ F. C. Perkins,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Prioritie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 32: 3 (1996), pp. 414—444.

表 7.8 国有企业的亏损

| | 亏损额 (10 亿元) | 亏损的国有企业/所 有国有企业 (%) | 总亏损/总税 前利润 (%) | 总亏损/总纯 利润 (%) |
|------|----------------|------------------------|-------------------|------------------|
| 1985 | 3.24 | 9.66 | 2.43 | 2.43 |
| 1986 | 5.45 | 13.07 | 4.06 | 7.90 |
| 1987 | 6.10 | 13.00 | 4.03 | 7.76 |
| 1988 | 8.19 | 10.91 | 4.62 | 9.18 |
| 1989 | 18.02 | 16.03 | 10.16 | 24.25 |
| 1990 | 34.88 | 27.55 | 23.20 | 89.86 |
| 1991 | 36.70 | 25.84 | 22.09 | 91.25 |
| 1992 | 36.93 | 23.36 | 18.99 | 69.01 |
| 1993 | 45.26 | 28.78 | 18.44 | 55.39 |
| 1994 | 48.26 | 30.89 | 16.78 | 58.21 |
| 1995 | 63.96 | 33.53 | 22.25 | 96.09 |
| 1996 | 79.07 | 37.70 | 28.89 | 191.61 |
| 1997 | 83.10 | — | 28.58 | 194.22 |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8)》；北京：国家统计局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61 页；郑海航编：《国有企业亏损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3 页。

大。^① 这里的一个原因是，冗员导致了中国国有企业的业绩低下。根据 1994 年世界银行对中国 142 家国有企业的调查，绝大多数经理承认，在他们的管理下，存在着大量的多余工人。^②

经济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企业拥有合法的经营自主权，包括雇佣和解雇的权力。^③ 当经理具有解雇工人的极大权力时，国家与工人之间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恶化了这种状况。例如，陈峰证明两大因素，即生存危机与管理腐败，造成了工人的不公平感并促使他们抗议。^④ 生存危机意味着工人生活在其收入远远低于地方最低工资或一段时期根本无收入

① 田晓文(Xiaowen Tian), "The Rise of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9: 2 (1997), pp. 219-231.

② The World Bank, *China: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6.

③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 - 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94-295.

④ 陈峰, "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44 (July 2000), p. 42.

的状况之中。工人面临这种状况时必然会强烈地抗议,而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经济困境是由工厂管理层腐败造成的——认为经理通过挪用他们赖以生存的国有资产而致富,他们的抗议动机就会更加强烈。^①

换句话说,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有效地消除了工人在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特权。随着改革的深化,工人的生活质量不断下降,许多工人进入了城市贫民的队伍。管理改革赋予了经理极大的自主权,使工人处于强制性的劳动控制方式与武断的管理权力之下。工人在面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强大力量和不断专制化的工厂体制时,变得软弱无力。^②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这种权利,最初曾赋予过工人,但在1982宪法中被废除了。199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也没有规定这样的权利。事实上,由于各种政治原因,中华全国总工会仍然更多地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工人利益。^③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催化工人运动兴起的环境。

更根本的是,改革改变了国家—工人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为工人运动的涌现创造了机会。在改革之前的中国,国家—工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向度是工人的所有生活都依赖于全能型的国营企业。^④这种制度安排造成了过去时代工人抗议活动的低频率。工人依赖于他们的企业,这是集体行动最强大的障碍因素,因为各种利益和服务的分配大部分都由管理层来决定,可选择性极少。虽然存在不满,但公开对抗会招致风险。结果,“不满”就用詹姆斯·司各特(James Scott)所说的“弱者的武器”来表达,即怠工、旷工、懒散。^⑤陈峰认为,大量的下岗改变了抵抗的形式。一旦离开车间,工人们就不再能够求助懒散

159

① 如丁学良,“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The China Journal*, no. 43 (January 2000), pp. 1-28.

② Ching Kwan Lee,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7 (March 1999), pp. 44-71.

③ Elizabeth Perry,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载于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编,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02-325.

④ 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⑤ 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对中国城市中日常抵抗的讨论,可参见 Ching Kwan Lee,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 1 (1998), pp. 3-33.

和其他平静的抵抗形式,车间外的公开对抗成为表达其心声的可行手段。而且,下岗工人名义上仍属于企业,有权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费,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从企业那里接受任何援助,他们被抛弃了。一旦下岗工人对企业的依赖被断绝,那么对他们的集体行动的限制也就大都消失了。^①

在国有部门,工人抗议活动兴起是因为市场改革的每一举措,几乎都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水平每况愈下。^②在非国有部门,尤其是外资企业,情况也不完全令人乐观。为了吸引外资,政府向外国投资者实行各种优惠政策。随着外资企业出现大量的劳动纠纷事件,为了调控产业关系和抗议工人,政府开始强调劳动法。然而,劳动法和各种规制的有效依赖于执行力度,而就在这种执行过程中面临着一些主要障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例。由于不同地区彼此为引进外资而竞争,为了吸引外资和技术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倾向于消极执行劳动法。^③

在法律没有得到有力执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涌现了大量的劳动纠纷事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纠纷事件大部分发生于非国有部门。例如,1999年,在非国有部门发生了76633件劳动纠纷,占该年全国劳动纠纷事件的63.8%。其中,27824次劳动纠纷事件或36.3%的非国有部门劳动纠纷事件发生于外资企业。同年,发生了2726次集体劳动纠纷事件,占纠纷总数的30.1%,涉及111438名工人,占34.9%。^④

结论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重建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第一,国家重建改变了利益的分配。一些人或团体能够获得更多利益或至少维持他们的利益,但同时另外一些人则失去了生存基础。第二,

^① 陈峰,“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u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44 (July 2000), p. 42.

^② Ching Kwan Lee,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载于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编,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41-61.

^③ Lo Vai Io, “Labor Law for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China”, 载于王康武和郑永年编, *Ref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pp. 167-195.

^④ 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国家重建旨在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非常迅猛。尽管每个人都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利,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不断增长的经济蛋糕中获得相同的份额。如此,国家重建就伴随着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

国家重建改变了阶级结构。在改革之前,毛泽东执行一种平均主义的政策。工人和农民被认为是国家的两个领导阶级,但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废除了这种平均主义政策。工人与农民的领导地位变得只是名义上的。而且,如第四章所指出,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统治结构,以便适应新兴的社会阶级,如新的富翁和企业家。由此,不满在工人和农民中普遍盛行,社会运动成为他们表达不满的一种重要工具,因为中国的政治过程对公共领域来说依然相对封闭。

社会运动转而影响了领导人进行国家重建的尝试。尽管社会和经济利益不直接形成政策,但它们还是破坏了国家的权威。有时,当社会抗议活动成功地向政府施加了政治压力时,领导人就不得不放慢改革过程。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这样。尽管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引入各种局部私有化的措施,但根本性的私有化并未发生。社会运动也引发了新政策的制定。1994年的财政改革极大地加重了农民负担并导致农村的抗议活动,于是国家启动了新的财政改革,即费改税;2000年又开始了新的改革,旨在给地方政府的乱收费行为设定制度约束。^①当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失业时,国家加快了就业服务与失业保险改革。^②为了给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提供更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还把大量精力放在建立新制度上,如廉租房制度。^③

161

社会抗议活动常常被理解为领导人减慢改革速度的信号。但并不必然如此。在一些情况下,社会运动代表着对政权的一些威胁,但在另外的情况下,它们为领导人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提供了新的契机。通过启动新的政策创制,社会运动实际上增强了领导人重建国家的努力。

① 陆学艺,《中国农村状况及存在问题的根源》,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66页。

② 顾昕,“Employment Servi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载于黄朝翰和郑永年编,《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Post-Deng Development》,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143—169。

③ 如Edward X. G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Housing Reform”,载于王康武和郑永年编,《Ref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pp. 195—230。

第八章 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 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既然国家重建涉及利益的再分配,那么有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就会有参与这个过程的强烈动机。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向公众参与开放,因此社会团体必须找到替代的方式来影响国家的重建过程。当失势的工人和农民求助于“行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时,知识分子则利用自己的武器即“知识”去实现目标。

本章集中考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作用于国家重建过程——通过想象和表达国家重建的不同话语。尽管国家仍然对学术活动实施着控制,但还是有产生这些话语的空间。虽然每个人都同意改革是一个国家重建的过程,但大部分人并不确定它最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这个空间,并且为大众提供了一些认识上的图谱。不用说,不同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也广泛地批评政府并挑战其政策。在这个意义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的兴起也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本章试图详细描述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中的最重要景象: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①。

1989年后知识分子话语的兴起

1989年后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知识分子话语的兴起,深深根植于中国国内外事务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中

^① 关于中国国家的争论存在多种思潮和学派,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或可视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两种最重要景象。——译者注

国知识分子表达了他们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①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西方思想迅速传入中国，通过翻译介绍、海外青年学者的研究、会议、论坛和各种出版物，西方话语被逐渐介绍给国人。许多普通的中国百姓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强烈赞赏和钦佩。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被称为“新五四运动”或“中国启蒙”的文化活跃时期。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先辈们一样，自由派知识分子质疑旧的国家意识形态，并为现代化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模式。他们试图在中国政体中重新定义自身，要求在其演化过程中发挥作用。^②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引导知识分子呼吁中国的民主化，他们认为经济自由化开启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尽管对民主概念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但所谓的“民主精英”坚持按照西方自由民主实践来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激进改革。^③ 当领导人未能实现这种变革时，知识分子转而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中国难以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为了使中国民主化起来，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批判传统文化。^④

但这种自由派话语被1989年事件猛然打断。1989年后的最初几年（1989—1992年），见证着20世纪80年代末知识分子活跃而多元的自由空间开始倒塌。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变革的保守派观点成为主流话语，中国学者不断吁求政治稳定、中央权威、严密的社会控制、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强大作用。^⑤ 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巡，一方面加速了中国的市场改革，另一方面也

① 关于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生活的讨论，参见Edward X. Gu, “Plu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llectual Public Spac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Four Intellectual Groups”, 载于赵穗生编,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41–172; 以及“Cultur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ublic Space in Communist China (1979–1989): A Case Study of Three Intellectual Group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2 (May 1999), pp. 389–431.

②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结》,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第50期,第4–13页。另参见Geremie R. Barme,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载于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编,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98–220.

③ 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④ 苏晓康、远志明、王鲁湘等,《河殇》,北京:现代出版社1988年版。

⑤ 陈峰, “Order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ition: Neo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89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51 (September 1997), pp. 593–613.

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来了急剧变革。短短几年中,涌现出了许多知识分子期刊,如《战略与管理》、《东方》、《现代与传统》、《中华人文》、《学人》、《中国文化评论》、《今日先锋》、《东西方文化评论》。许多香港杂志也为大陆学者提供了可选择的论坛,如《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然而,这些有思想深度的激进期刊没有促成自由派话语在中国的复兴。

164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在取向上变得如此保守呢?有一些外部因素可用来解释这种发展。1991年,当人们仍然生活在六四事件的阴影中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电视上看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受到支持叶利钦的军队的炮轰。随后在1993年,中国申请举办2000年奥运会被西方国家挫败。尽管政府主办的申请活动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愤世嫉俗地接受,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参与了有损中国名誉的活动,尤其是英美两国扮演了活跃角色,破坏了许多中国人认为很有希望的申办奥运(中国北京最终只输给悉尼两票)。这次失败震动了中国年轻一代学生、知识分子以及专家教授们,他们认为中国成为奥运会东道主是中国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可以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可以为政权引入新的变革。结果,民族主义情感在不同社会团体中“浮出水面”。

随后,1995—1996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李登辉访美触发了一系列的外交冲突和两岸危机,导致中国在台湾海峡水域进行了导弹“试验”。美国政府的反应是向台湾海峡的外围派出两支航母舰队。美国的反应一定程度上再次造成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深深伤害,使他们回想起西方帝国主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一百多年来给中国带来的耻辱。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更加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当时北约展开对南斯拉夫的空袭,而中国与俄罗斯反对北约的行动。中国领导人看到台湾与科索沃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相似,北约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表明了西方联盟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军事介入。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5月7日午夜,北约的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致使三名中国记者死亡,二十多名中国外交官受伤。

不幸的事件看起来没有尽头。这些事件触发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萌发的民族主义浪潮。更重要的是,这迫使中国知识分子严肃反思西方的自由话语。可以肯定,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开始认识到,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曾经太幼稚地认为自由理念是普世的。

他们发现西方制度并不完美,远远不符合他们最初的高度期望。从美国国会每年关于扩大对华正常贸易关系的争论中,中国知识分子看到美国政府和媒体在处理中国事务时夹带着深层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指控也是以其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考虑为基础的。

165

与这些发展可相比照的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通过这个参照点,中国知识分子考察了自己的环境,并衡量了他们的选择。在苏东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攻击保守主义,认为它是中国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根本障碍。这种立场体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围绕“球籍”展开的争论之中。^①但是东欧和苏联的事件表明,传统意识形态的衰弱以及社会危机的恶化是可能的,政治和社会崩溃比保守主义更危险。结果,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者,他们很快得出结论,1989年事件只是一个不幸的大众运动,它被那些相信激进的整体社会变革以及崇高政治理想的知识分子信仰所推动。

在1995年到1998年间,席卷拉美、东欧和东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了急剧而大量的金融资本流动会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过度解除经济管制会招致的破坏力。许多受到严重打击的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由于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一度成为快速经济增长的典范。而如今,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国家货币崩溃了,政府在面对国际金融投机者早有预谋的袭击时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另一方面,中国在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能够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这两方面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和果断地重新确认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这种对比使人们深深质疑新自由主义信条,重新强调国家是保护羽翼未丰的国内市场,以及为公正的国际和国内经济政治秩序而奋斗的唯一机制。

还有各种国内因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由主义话语。在二十多年经济发展之后,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具有混合经济和多阶层的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大量财富,也造成了财富分配令人吃惊的差距,这使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参见第七章)。社会紧张不仅来自个体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而且还不断来自不平等的财富和权力分配所产生的挫折感。在一个混合经济和一个多阶层国家中,存在着党政官员不断严重的腐败行为,如

166

^① 在有关中国球籍的争论中,许多人甚至包括改革派领导人,都认为如果中国不改革经济与政治体制,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就会成问题。

前面章节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寻租、内部交易、盗窃公共财产等形式的权力腐败已经成为社会流行病。^①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严肃的争论: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该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将走向何处?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有意无意地联合起来,形成了不同的“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是众多争论学派中的两个“主流”。

新左派最初从海外中国学者,如王绍光和崔之元那里发现了他们的声音。他们最初借助香港杂志如《二十一世纪》来发言,并且不断扩大了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获得了大陆学者的强烈支持,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晖、北京大学的韩毓海。新左派初步形成,他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保守主义重合,认为国家必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维持政治稳定,现存的国家权力必须得到增强。这种重合使新左派比其他非官方话语更容易得到党和国家的接受。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可以视为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理论兴趣的复兴。如白杰明(Geremie Barme)所观察到的,自由思想和理论的新形态,部分地受到从洛克、卢梭到波普尔、哈耶克的西方思想家著作译介和普及的影响,部分地受到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作家挖掘、记录 20 世纪早期中国自由主义倡导者的工作的影响。^②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统治之下,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政治思想的一部分,但是,它仍然被视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备选方案。在 1989 年事件之后,支持自由主义的力量被迫“消失”,但是社会问题的增多再次为他们提供了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军宁和徐友渔、清华大学的秦晖、上海的朱学勤等人,成为新自由派中少数几个发言最多的学者。

167 新自由派的话语

所谓新自由派包括不同领域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他们未必观点一致。他们没有一个单一的哲学来源;相反,他们从不同的西方思想家

^①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Geremie R. Barme,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载于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编,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p. 210.

那里获取思想资源。然而,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意见一致。我的讨论集中于新自由主义思考中国问题时形成的一些主要观点,即中国问题如何产生、又应该如何解决。

哲学基础

在众多新自由派学者中,刘军宁给出了新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最简明的表达。新左派常常批评自由派忽视穷人与弱者的利益,中国社会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社会不公,而自由派却未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作为回应,刘军宁写了一篇长篇论文,第一次向读者全面介绍自由思想。^①

自由主义常常与新兴的富人阶级相联系。但刘军宁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自由主义形成于中国的环境,那就是穷人没有改善生存处境的自由、绝对不公平的竞争、官商勾结、政治权力不受节制、私有财产不受保护。他说:“自由主义与这种现实是根本对立的……自由主义不是权势与贵族的自由主义,而恰恰是站在民间立场上。”^②显然,在新左派要求用国家权力来保护穷人时,新自由派认为国家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如此穷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促进和保护。在刘军宁看来,自由主义是一种普世主义,它强调人的普遍权利和普遍价值,如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基本人权等。在国家常常剥夺人民的这些权利时,市场可以帮助人民实现这些权利。刘军宁主张:

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每个人本应具有的基本权利,无论人们的社会地位、财产、声望、权力、阶级、等级、民族、文化等如何不同,每个人都应当平等地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认为,没有一种手段能够比市场体制更有效地改善资源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效率,而建立有效的制度才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根本。^③

除了个人自由以外,刘军宁还突出了平等原则。“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以自由为依归的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来充分实现人在各个

168

^①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第50—67页。

^② 同上,第51页。

^③ 同上,第51页。

方面的潜能。”^①平等并不意味着机会的绝对平等,而只是意味着享有机会的同等自由。刘军宁认为,“平等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同等的保障,也不意味着人们有权平等地占有政府提供的物品(法律所提供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待遇不在此列)”^②。

在经济方面,平等权指的是机会的平等,即免于政府对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的任意限制。按照自由主义的看法,为个人提供经济方面的保障不是政府的责任,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政府一旦作出这方面的承诺,通常是为了让人们放弃自由,其结果是个人为了在经济上得到保障而失去了自由。^③新自由派也承认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但他们认为收入的公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政治权力来实现。刘军宁认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分配方式是市场经济下财富的分配方式”^④。对自由主义来说,公正与自由密切相关。

在这种哲学基础上,自由派不赞同新左派关于中国问题的起源与解决手段的观点。在新左派看来,像收入差距这样的中国问题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与此相反,新自由派相信这些问题是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如果这些问题是改革带来的,那也只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发展。在整个改革过程中,私有财产权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国家所有使得党政官员能够借助各种腐败形式来“盗取”国有资产。^⑤国家权力干预商业活动,导致了社会不公和不平等。刘军宁认为:“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政治制度,不在于新生的市场经济,更不在于普通民众刚开始享有的有限的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中国的政治体制一天不变革,社会不公就一天不能解决。”^⑥

全球主义

169

新左派认为后毛泽东时代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一个西化的过程,而新自由派认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自由价值观如自由和财产权,并不属于任何

①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第5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51—52页。

④ 同上,第57页。

⑤ 同上,第58—62页。

⑥ 同上,第60页。

特殊的民族国家,而是普遍主义的。他们认为,如果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不能也不应该拒绝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秦晖指出:

应当承认自由主义价值是超民族(亦即超“文明”)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优于命令经济,民主政治优于专制政治,政教分离优于政教合一,信仰自由优于宗教审判,等等。^①

因此,在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个人自由,不能被视为“西化”的过程。就个人自由而言,文明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人的尊严和自由是所有文明的终极目标。如果中国要“文明化”,就必须接受自由主义。作家刘心武认为,所有国家都要懂得“共享的文明”,不管其起源如何,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成员,应该认识到“共享的文明”的价值。在刘心武看来,共享的文明也许由某个特定国家或者许多国家发展出来,但只要它能提高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它就是共享的文明。刘心武认为,我们(中国人)应该认识到,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欧和北美的人民对这种共享的文明贡献巨大。我们不必询问它的起源。我们有权享用它。^②

当新左派的拥护者们反对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主义时,新自由派确认全球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目标。新左派相信现存的规则 and 标准是西方确立的,它们并不必然符合中国的民族利益,由此,中国必须改革当前在国际体制中的权力分配,或者至少修正国际规则 and 标准,以促进自身的民族利益。与此相反,新自由派认为,中国的利益所在正是接受现存的国际规则 and 标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自由主义的主要倡导者李慎之认为,中国必须抛弃旧的地缘政治概念,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国家都能从全球主义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获益。由于中国的整个现代历史充满了西方列强带来的耻辱,因此民族主义很容易发展成中国的沙文主义,这实际上限制了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现存的国际规则 and 标准,这也是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③

170

无疑,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中现存的规则 and 标准是在西方强权的影响下

① 秦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点在哪里?》载于《东方》1996年第3期,第45页。

② 刘心武,《确立人类共享文明观念》,载于《东方》1996年第6期,第25页。

③ 李慎之,《从全球化视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第6页。另参见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载于《东方》1994年第5期,第13—18页。

确立的,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从接受这些规则和标准中获益。广东学者陈少明认为,这些规则与标准的公平与否,不能以主要的强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和态度来判断。他认为,“我们首先可看看,这个规则对所有的参与者是否都同样适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地区)之间也遵循着同一规则,故不能将其当做欺诈性的。”^①陈少明还认为,中国不能声称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些规则和标准不适合中国国情,从而拒绝国际规则与标准。因为,通过接受这些规则和标准,中国可以改变国情,如其他东亚国家所做的示范那样。^②

民主

对自由派而言,全球主义或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向中国引入自由主义而有助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李慎之为一个关于1949年之前的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历史的文集写了一篇序言。这个文集由刘军宁主编,于1998年北京百年校庆之际出版。李慎之在序言中声称,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内外政治经验证明,自由主义是人类最好和最具普世性的价值。他相信,全球化会促进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③

171 在新左派吁求国家主义,并认为只有一个强大国家才能使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变得强大起来时,新自由派争辩说国家主义只会导致权威主义统治,由此他们吁求经由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化。新自由派也看到了强大的中央权力的重要性,但质疑国家的现存基础。按照新自由派的观点,中国的整个现代史,独立与民族存亡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但一旦实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权利,就必须赋予民主优先权,以促进个人权利或公民权利。^④

新自由派认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前提是民主,并相信没有一个强大的内部竞争制度即民主制度,则任何政治制度都终将走向死亡。陈少明指出,为了变得强大,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向所有人民开放;如果个人不能把他们的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将本能地对任何政治动员产生淡漠感。极大的内部动力依赖于个人是否参与政治过程,是否有充分的机会表达他们

① 陈少明,《民族主义:复兴之道?》载于《东方》1996年第2期,第75页。

② 同上。

③ 刘军宁编,《自由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④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17期,1996年冬季号,第43—53页。

的意见。^①

沈骥如认为,不仅中国的经济制度要融入世界体系,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建构政治和社会制度时要向美国学习。当考虑美国为何强盛时,必须对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予以重视。美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它在世界权力中的地位,是因为它的财富、它的自由环境和宽容的社会,正是这些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顶级人才。^② 沈骥如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断会聚在一起。^③ 由此,中国应该欢迎“和平演变”,因为它是社会进步的自然而积极的方式。^④

公民社会

许多新自由派强调公民社会在引导中国“和平”转向民主时扮演的角色。在这一派关于公民社会思想发言最多的两位学者邓正来和景跃进看来,公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⑤。新自由派学者之间尽管对公民社会的含义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但他们的普遍共识是:公民社会代表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自由、财产权、社会契约关系、自主的社会组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平等与独立。^⑥

对新自由派而言,公民社会的政治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它有助于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限制国家权力。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民主,因为民主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而这些前提只能通过公民社会来创造。^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改革,已经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圈,“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新自由派认为,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中国

172

① 陈少明,《民族主义:复兴之道?》载于《东方》1996年第2期,第75页。

② 沈骥如,《中国不当“不先生”》,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页。

③ 同上,第36—42页。

④ 同上,第42—46页。

⑤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⑥ Yijiang Ding,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Democracy in Intellectual Circles’ Rethinking of State and Society”, 载于赵穗生编,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11—140.

⑦ 参见郭定平,《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转型》,载于《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52—55页。

缺乏一个公民社会的结果。当社会自己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时,国家权力就会入侵,而当国家权力开始干预时,这种恶性循环就会永无止境。^①

那么,公民社会又如何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又限制国家权力并使国家变得民主起来?邓正来和景跃进提出了公民社会的两阶段发展论。在第一阶段,应建立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二元结构。国家应该把经济权力归还社会,公民社会要获得更大的经济自由,同时在政治领域保持低调。在第二阶段,公民社会要从“私域”扩张到“公域”,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保护社会自由、反抗国家控制、发展社会多元性、促进民主等方面,公民社会要发挥积极作用。^②

邓正来和景跃进认为,通过这样做,公民社会可以抑制和平衡国家权力;更重要的是,公民社会可以参与政治。在他们的观点中,要特别注意的是,“控制与平衡”是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否定关系”,而“参与政治”是两者之间的“肯定关系”。^③其他学者对这种定义有些许不同的意见。例如,何增科认为,良性互动关系仅仅意味着公民社会对国家的建构意义而不是对抗意义。但对其他人来说,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性质在于两者之间的抑制与平衡。^④

宪政主义

许多自由主义者,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强调自由宪政主义。在这些学者看来,从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转变,取决于自由宪政主义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结构的基础。宪政主义对中国和平、稳定的转型来说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党领导下的国家站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并且它的行为不服从任何宪法或法律的约束。另一方面,宪政主义意味着社会或非官方(非政府)力量以合法方式而非激进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方式参与到政治中来。^⑤

① 参见鲁品越,《中国历史进程与市民社会建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第8期,第173—178页。

② 参见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③ 同上。

④ Yijiang Ding,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Democracy in Intellectual Circles’ Rethinking of State and Society”, 载于赵穗生编,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p. 128.

⑤ 如季卫东,《宪政的复权》,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第386—400页。

新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的宪政争论,其核心就是财产权与经济改革之间的联系。如后面将会讨论到的,新左派反对激进的私有化。相反,新自由派把私有化视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所在。自由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经济改革的困难,是在长期的改革阶段中,私有财产权得不到宪法的保护。他们还认为,如果不确立私有财产权,中国的经济改革将无法前行。张维迎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产生企业家的前提条件,也是经济绩效的充分必要条件。^①汪丁丁认为,要深化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进行宪政改革,确立保护私有产权的宪法”^②。

政治学家刘军宁强烈主张:“个人自治的核心是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性的支配权。连置产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权利治身。”由此,刘军宁认为,“财产权是所有政治权利的基石,是宪政民主的基石。”^③与汪丁丁一样,刘军宁也相信,“现在的政体改革要求修改现行的《宪法》,承认财产权是公民个人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建构政治体制的出发点。”^④刘军宁得出结论:只有承认了财产权,中国政治体制才能获得政治支持,国家权力才能受到有产阶级的约束。

正如后面将要讨论的,新左派强调国家权力,尤其是财政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以此增强国家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能力。新自由派看到了无限制的国家权力在处理收入分配时存在的危险,由此他们更愿意利用宪政手段来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在法学家季卫东看来,无限的集权尽管旨在实现所谓公平的收入分配,但只会导致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平等主义,导致党政官员腐败的蔓延,由此破坏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季卫东认为,国家尽管在削减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国家要介入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强制性的经济平等化”^⑤。要更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制定各种各样的民主措施。季卫东认为,

174

①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章。

② 汪丁丁,《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6期,第17页。

③ 参见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第340页。

④ 刘军宁,《产权保护与有限政府》,载于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⑤ 季卫东,《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3期,第50页。

财产权的各种不公平的分配以及试图改变分配格局的努力,正是党派活动的基础和源泉;在追求社会公正的目标时,不应抱持“毕其功于一役”或一劳永逸式的期待,应把这一目标与实现利益代表制度和审议制度结合起来考虑,注重在多元化的意见表达和试错过程中,不断纠正社会不公现象。^①

国家不能单独命令式地进行收入分配活动,不同利益必须参与这个过程。由此,既然国家会介入财富分配,那么就要注意通过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来限制国家在分配方面的活动。^② 综上所述,与新左派一样,新自由派也同意国家在解决新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要发挥重要作用,如收入差距,但对新自由派而言,在这样做时,国家必须将自身从权威主义过渡到民主。

新左派的话语

新左派代表了许多显著区别但又互相关联的知识立场与理论话语,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三个普遍倾向。第一,新左派把中国问题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来理解,由此新左派的一个主要关注点就是反“西化”。第二,在处理中国问题时,新左派赋予国家极大的作用,由此其倡导者认为应该增强国家。第三,与新自由派认为应该不断向西方学习有所不同,新左派要求发展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来代替西方的现代性。

反全球化

新自由派认为中国问题产生于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新左派则将之归结为中国的全球化。新左派思想运动的一个主题就是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加快了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步伐。与此相应,中国知识分子也努力地使这种新经济现象理论化。在众多学者中,林毅夫(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了一种比较优势理论,

^① 季卫东,《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3期,第50页。

^② 同上。

认为执行这种战略需要政府为自由市场体系确立各种支撑性制度。^① 比较优势战略引起新左派和反西化的支持者们的极大反应。主要有三种观点反对比较优势理论。

首先,采取比较优势战略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完全融入世界体系。尽管中国可以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中获益,但这将破坏中国的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新左派的主要倡导者石中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的危险是:“这将使中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他人手中,允许自己的经济前途、国家安全取决于别国的战略利益。”^②

在石中看来,现代中国历史表明,依赖最终会导致国家主权的丧失。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发达得多。那时,西方在一些关键的工业科技上比较发达,这最终导致了中国的战败。由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而言,政治精英们最紧迫的任务是采取赶超战略来保证民族生存。毛泽东的赶超战略引发了各种经济危机。但正是这种战略让中国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中更加独立。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就会危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地位。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尽管已经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在许多关键的工业科技上依然落后。由此,

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很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这次很可能比19世纪更惨……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仍应是中国的长远目标。^③

由于中国在总体上落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在不断强化的国际竞争中保护民族工业,而只会削弱它们。事实上,许多普通中国老百姓相信,外国资本破坏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削弱了中国的国家权力。^④ 由此,新左派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坚实的工业基础。

第二,新左派的拥护者们倾向于支持中国的独立性,反对出口导向的发展

①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以及《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对“比较优势战略”批评的几点回应》,载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第35—45页。

② 石中,《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第11页。

③ 同上,第14页。

④ 吴越涛、张海涛编,《外资能否吞并中国——中国民族产业向何处去》,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战略。在他们看来,这种战略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和民族生存具有负面的影响。一位作者把出口导向的经济视为一种依附性经济。他认为:

176 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最大缺点,是受国际环境影响太大。因为对欧美市场需要的依赖性极大,只要国际市场发生小变化,就会造成本国经济的大波动。^①

这种观点为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所印证。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是西方建立的,西方控制着关键的经济工具和机制,如关税、借贷、投资、汇率率等。几乎所有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都不得不大大依赖于发达国家。一旦它们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冲突,它们必须屈从于西方的压力。^②

新左派认为,尽管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从出口导向战略中获益,但它能否在长时期内保持成功仍令人怀疑。如果中国不想让主权屈从于西方,那么西方不会允许中国维持其出口导向型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力群认为,东亚出口导向型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许多前提条件。首先是东亚与西方的政治军事同盟。西方在冷战期间愿意与东亚国家形成这种联盟,是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当地的经济活动必须依赖于西方的经济活动。当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必须改革以适应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显然,如果中国不断追随这种发展战略,其命运将是受更发达国家的控制。^③

而且,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也难以成功。这是因为上述那些曾经使其他东亚国家的这种战略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而且,西方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以前西方有兴趣看到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现在,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有竞争力,它不断地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甚至政治、军事利益相冲突。西方不愿意让中国发展成超级大国,会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177 由此,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便与中国的民族利益存在着冲突。一旦中国经济有效地融入国际体系,西方就会采取更多手段来遏制中国。因此,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战略变得十分紧迫。即使出口导向战略对中国确实有利,“从我

① 刘力群,《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4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4—45页。

国长远利益看,也还是独立比依附好”^①。

第三,比较优势战略的支持者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能否深化依赖于政府是否能够抛弃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和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要的作用。与此相反,新左派坚持认为,如果中国经济改革要获得成功,政府计划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左派意欲回归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反,新左派的拥护者们强调一种新型的经济计划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必需的。比较优势的倡导者与新左派的倡导者对东亚经济奇迹有着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东亚经济的成功应归功于比较优势战略,后者则认为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实行了“计划理性”。^②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赶超发展战略是计划理性的典范。一位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运行仍然给人以深刻印象。旧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拒绝市场经济,而新的政府计划必须旨在确立一种适应市场力量的体制。市场体制不会按市场逻辑自然出现,而必须加以计划。在俄罗斯,政府试图让“市场理性”发挥功能,结果导致经济混乱。如果中国要避免这种厄运,就必须引入和增强政府的“计划理性”。^③

反制度拜物教

与新左派攻击全球化相关的是,他们批评新自由派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主张。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解体前,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这种西化导向的改革战略,这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当

① 刘力群,《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46页。

② 程明,《东亚模式的魅力》,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18—27页;尹保云,《集权官僚制的现代化道路:韩国发展经验探索》,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35—42页;江时学,《拉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的启示》,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58—68页;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视点的分析》,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69—78页;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因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5期,1996年夏季号,第88—9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并不都支持新左派,尽管他们都相信政府经济计划的重要性。

③ 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视点的分析》,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75—76页。

中。^① 欧洲共产主义的崩溃让中国知识分子确信,“西化”导向的改革会导致经济与政治的混乱。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在 1989 年事件后变得保守起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新左派由此反对任何激进的改革,强调中央集权国家在指导中国发展上的重要性。

178 对新左派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遭遇的困难,源自激进的改革政策,或那些对西方制度顶礼膜拜的人提出的政策。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面对西方自由经济学家的影响,一些改革派领导人甚至相信苏联和东欧曾经利用过的“休克疗法”。同时,许多得到改革派主要领导人支持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需要引进西方民主,以便为自由市场制度提供制度基础。正是这些西化导向的改革措施最终导致中国的政治动乱,如 1989 年事件。^②

新左派的主要倡导者崔之元,曾经提出过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话语,主题是中国如何借助制度创新向西方和自己的过去学习。崔之元认为,一方面要清除对绝对市场和绝对国家的拜物教,另一方面要吁求大众参与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崔之元认为,“第二次思想解放”是对一些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辩证超越,它们包括“私有/国有、市场/计划、中体西用/全盘西化、改革/保守”。所有这些二元对立都出现于“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反对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教条主义,并为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铺平道路的那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二次思想解放不再强调“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它将不再留恋于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将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为指导思想,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③。

在中国的改革背景下,制度创新何以可能? 崔之元以辩证思考的动态实践为基础——包括解构与建构两方面,考察了从卢梭、密尔的著作到后福特主义生产,从中国村民选举到俄罗斯“休克疗法”在内的一整个系列的历史的或当代的案例。他把当代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发展过程。由此

^① 有一个文集反映了这段争论,参见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1989 年版;对此次争论的讨论,另可参见 Mark P. Petracca and Mong Xiong,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eo-Authoritarianism: An Exploration and Democratic Critique”, *Asian Survey*, xxx: 11 (November 1990), pp. 1099—1117.

^② 《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内部稿),1991 年 9 月 9 日。

^③ 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 页。

他主张要不断地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复杂性和社会政治矛盾,以便挑选出那些推动了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民主、自由因素。但是,他也承认资本主义受到具体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约束和扭曲。

制度创新,特别是知识创新,可以发生于经济改革的各个领域。崔之元把产权观念确定为“权利束”,而非统一、神秘化的实体,并表明了如何将权力、特权、豁免权和其他亚范畴的权利,如控制少数人的权利、少数人的发言权等,引入新的结构,以便表达股东(stockholders)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两者的利益,以及无论在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背景下为经济民主开放新的理论空间。崔之元通过参考美国近年来制度和知识创新的具体案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29个州修改了公司法),使中国语境中的改革清楚明白地显现出来,从而消解了“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在崔之元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挑战和工人阶级运动进行回应与妥协的结果;甚至美国经济也具有比它的中国或俄罗斯批评者与崇拜者所承认的多得多的社会主义因素。

179

崔之元解释了制度创新为什么重要。在他看来,当东欧、俄罗斯和中国的新社会精英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代言人把私有制视为新的圣经时,美国的公司法在相反的方向上经历了深刻变化。在西方,长期以来,私有制在公司法上表述为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是所有者,经理人员对他们也仅对他们负责,即努力使利润最大化。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有超过半数的州修改了它们的公司法。新法律要求经理人员不仅要向股东负责,而且也要向利益相关者负责。美国公司法的这些变化打破了私有制近乎公理一样的逻辑,因此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和经济中最具重大意义的事件。^①

与此相似,崔之元也从中国的过去看到了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例如,在分析中国过去20年农村工业的增长现象时,崔之元将其根源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在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中未能实现的农村工业化理想,以及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太壮观的前史。在他看来,1978年后中国乡镇工业的成功表明,过去实践的失败“并不阻碍其中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而出现”^②。

从这种观点出发,崔之元似乎并不满意新的中国公司法。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的中国公司法把三个旧“会”降级了,即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和

180

① 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

② 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第5页。

工会,而把三个新“会”制度化了,即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崔之元认为,以“国际惯例”来看,新法律未能跟上进步潮流,没有把工人参与公司决策制度化,而只在国有企业允许工人代表进入理事会,由此切断了工会与理事会的联系。崔之元反对和与资本主义公司制度有关的过时理念保持一致,而要求创新性地探索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的中国模式。^①

像崔之元这样的新左派由此认为,如果中国要进一步推动工业改革并提高国有部门、集体部门的企业经营业绩,就不应遵从西方的任何模式。制度拜物教(西方化)导致俄罗斯和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陷入政治和经济混乱。如果中国要避免这种厄运,就不应该求助于任何西方理念来指导改革。私有制、私有化和其他资本主义手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可能给中国带来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②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非西方的理论来指导发展。中国工业改革的失误在于,许多领导人在经济决策时过于西化。崔之元认为,在考察西方的工业管理与改革时,中国还需要考察毛泽东时代工业实践的经验教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为现代工业管理提供了最重要的形式,即工人参与管理。^③

国家主义

对新左派而言,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随后的经济混乱,都凸显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一旦这种政权崩溃了,任何民族国家都会陷入危机之中。在新左派的倡导者们看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中盛行的“错误”观念,就是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齐头并进。因此,随着自由市场体制的引入,政权本身必须自由化。仍然有效的是,中央集权为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需。没有这种政权,就难以应对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各种不可预测的结果。如果这种政权是脆弱的,那么经济现代化将导致民族生存危机,而非政治民主。

王绍光和胡鞍钢在这方面发展出一种国家能力的理论。他们认为,国家不仅要在调控市场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要在抑制地区保护主义和碎片化以

^① 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第212—213页。

^② 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载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7月特刊,第1—33页。

^③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于《读书》1996年第3期,第11—21页。崔之元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工业管理体现在鞍钢宪法中,这种管理方法等同于西方的后福特主义。

及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等趋势上发挥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一个有能力的国家应该维持可靠的国防、财富分配的社会公平,并维护民族的道德与政治统一。国家能力的理论核心,是国家必须在征税上保持强大的能力,以履行它在培育富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民族生活中关键而必不可少的职责。^①

王绍光和胡鞍钢的观点,可视为中国背景下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最早话语,也是对东欧尤其是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等转型社会中的经济崩溃、政治失败和社会悲剧的较早反应之一。他们关于征税必要性的主题与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即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理论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在新兴市场环境下保障税收的那种相对粗糙的机制。他们的观点不是反市场的,但他们并不像新自由派那样虔诚地相信市场。国家能力理论强调必须探索以一种经济成功、社会公平、政治稳定的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他们看来,中国致力于建立的市场经济,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财政制度、税收制度为基础,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中国的市场必须是摆脱了地方、区域分割和保护主义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这种市场必须依据由税收政策和政府服务来保障的公平竞争原则来运行;这种现代的、平等的、统一的市场必须受到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法律结构的调控与保护。^②

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取决于一些特定的条件。首先,必须转变和重新设定中央权力的功能,以产生一种新的、有效的宏观行政管理框架。其次,政府必须根除制度性腐败,这种制度性腐败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大量的社会不稳定,并使建立一种社会公平的经济秩序变得不可能。第三,政府必须允许不同团体展开自由辩论,使决策过程变得更加民主。^③

“国家能力”论题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争
182

论。无疑,最大的反应来自新自由派。为了支持他们的国家能力理论,王绍光对斯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的著作《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收》写了一篇书评。^④ 该书作者认为,所有的权利,包括“消极权利”,都依赖于国家及其税收能力;所有权利都是公共

①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同上,第 159 页。

③ 同上。

④ Stephen Holmes and Cass Sunstein,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 New York: Norton, 1999.

财产,其保障需要政府做出对社会负责、在道德上让人满意的选择;就“自由”俄罗斯令人遗憾的现实来看,“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共权利”。王绍光指出,中国“自由派”应被视为西方社会政治光谱中的右派和自由派,而像霍尔姆斯和桑斯坦这样的自由经济学家,应该是“与中国新左派站在同一阵营”的。^①

新集体主义

新左派倡导者的第一个目标是表明中国改革为什么不能接受任何西方模式的指导,第二个目标是要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替代性解释,即经济改革的中国话语。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成功归功于西方式的经济改革,并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私有化并建立起一种自由市场制度。相反,新左派认为,正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而非西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当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怎样创造经济发展的动力感兴趣时,新左派看到的是快速的经济增长对社会、政治的稳定所产生的影响,并且非常强调社会公平。

在新左派看来,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其集体主义实践。这在农业发展中尤其如此。在邓小平时代的农村,增长获得了巨大动力。但是农业增长并不始于邓小平改革。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各省,快速的农业发展发生在邓小平改革之前,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同样重要的是,甚至在邓小平时代,正是在集体主义框架内,农村的经济发展才得以发生。^② 换句话说,邓小平改革只是为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提供了促进农业增长的政治条件。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导致农村产生西方式的个人主义。私有化并没有在中国农村传播开来。甚至在改革十多年后,私有制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主要的经济行为体不是个人,而是地方共同体。在新左派看来,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快速的农业增长做出了贡献。^③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改革以来,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不断成为社

① 参见王绍光,《权力的代价与改革的路径依赖》,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112—115页。

② 崔之元,《制度创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第24期,第5—15页。

③ 王莹,《新集体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第25期,第11—14页。

会各界人士和知识分子批判的目标。但对新左派来说,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不能全盘否定。在许多地区,这仍然能够给个人尤其是低层级政府官员提供带动地方发展的“精神”动力。在许多地方,正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领导提供了经济动力。新左派的倡导者们确信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在增强农村集体主义、减少农民的收入差距、维护农村稳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中国进一步开展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要抛弃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相反,我们需要依据中国现在的条件来重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①

从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读出发,甘阳似乎认为他找到了建构一个新国家的中国道路。在甘阳看来,乡镇企业的兴起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②甘阳认为,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起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工业转型提供了微观社会组织这种可靠的基础。换句话说,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不是以削弱、破坏、最终摧毁现存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实现的,相反,它的兴盛是以与农村共同体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为基础的。它的繁荣加强了中国农村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这种历史经验的运用行得通的话,那么它对中国生活方式的维系将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对文明史的贡献也将是不可估价的。^③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新左派提倡中国实行经济民主化。在新自由派强调各种形式的自由、政治权利和多党制时,新左派的倡导者们认为民主化不是西方化,即遵从西方民主模式。相反,他们相信,毛泽东时代的实践包含了民主的各种重要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得到适当发展,它们将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④

崔之元认为,民主有两种形式:程序民主与协商民主。前者把民主视为政治方法,精英们利用这种方法从人民那里“购买”选票,由此程序民主强调正式

184

^① 依据对南街村的案例研究,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制度在领导农村成功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参见邓英淘、苗壮、崔之元:《南街村经验的思考》,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14—24页。

^② 甘阳,《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载于甘阳:《将错就错》,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③ 同上,第186—187页。

^④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载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7期,1996年春季号,第49—74页。

选举。后者强调实质民主和各种形式的人民参与。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过分关注程序民主,却忽视了协商民主。正是毛泽东在他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出一种协商民主理论,尽管它还不够系统。对新左派来说,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是后毛泽东时代快速经济增长的根源。中国协商民主的主要特征是放权。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是高度分权的。这使得地方共同体和个人具有参与发展过程的可能性。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战略,即动员大众参与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与此相类似,“鞍钢宪法”也为工人参与生产过程提供了制度框架。^①协商民主也使各级地方政府有可能在中国经济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使中国有可能避免前苏联的厄运。对新左派来说,协商民主或经济民主比私有财产权和个人主义更应该用来指导中国的进一步经济改革。^②

在政治上,新左派倡导者们也提议从毛泽东形成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众民主”理论中吸取教训。事实上,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是新左派的一个主题。新左派认为,毛泽东式“大众民主”的主要目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形成以大众参与为基础的真正民主。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并旨在提供一种替代西方民主的方案。毛泽东希望为人民创造机会,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但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式大众民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歪曲”了。由此,新左派提倡变革毛泽东式大众民主,并将之制度化。中国需要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走向西方政治民主的任何一种模式。把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制度化,将使中国有可能基于自己的政治实践重构西方现代性,建立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由此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③

185 结论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反映了对中国国

^① 崔之元,《制度创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第24期,第5—15页。

^②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第70—71页。

^③ 同上,第67—72页。

家的不同观点。然而,两个学派都关注中国应该建成何种国家,以及国家应该在型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时扮演怎样的角色。

新左派的话语批评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其倡导者相信中国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都是全球化的结果。由此,他们提倡增强国家权力,以此对抗全球化,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相反,新自由派的话语认同全球主义,其倡导者相信中国的问题与它还没有完全融入世界共同体这个现实有关。新自由派普遍倾向于赞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亦即市场与私有制的首要性。在他们看来,形成一个自主的中国中产阶级或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可以刺激和巩固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社会,就像许多西方社会那样;因此,纳入世界文明主流可以帮助中国实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的转型。

新自由派还相信,市场导向的改革是中国建立一种有效的经济体制的唯一道路。因此,他们提倡发展私有财产权,让人民拥有分享党政官员占有的公共财产的平等机会。此外,新自由派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为了让国家发挥这种作用并限制国家的恶,应该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国家权力,如发展公民社会,进行宪政改革。

相反,新左派可以视为对冷战后俄罗斯灾难性经历的回应,其倡导者反对经济的私有化、政治的无限自由化。新左派并不相信仅靠市场能够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由此他们强调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核心作用。此外,新左派试图发展出一套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的系统话语。与自由派不同,新左派并不把纳入世界文明主流视为解决中国当前问题的出路。

在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斗争中,新自由派与新左派都试图在否定的意义上突出对方与现存国家之间的联系。新左派把新自由派看做是已经被中国国家采纳了的主流话语,即现代化和普遍进步的意识形态。186 当中国国家实行着各种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时,新自由主义被指责为替政府主导的发展进程论证合法性。另一方面,新自由派不断重复地指责新左派拒绝自由市场的理念、“古典社会科学”的话语、自由话语的普世性以及由西方表现出来的普世价值观和制度,如自由民主。新自由派认为,新左派表明了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复古幽思,对直接民主、政治集权、群众激情的肯定态度,对诗意、浪漫的理想主义的向往以及对当代中国带有实践色彩的社会转型的不满意。

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政治意义在于,两者分别获得了来自社会、经济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如前所述,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新兴的中产阶级得以产

生,同时削弱了国有部门的工人和农村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派代表了新兴富裕阶级的利益,而新左派则代表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但事实上,新自由派和新左派都不愿把自己与任何社会力量完全结合。然而,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迅速推动着知识分子把自己与相应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一旦这种联系确立下来,不管是新自由派还是新左派,都会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

按照贝蒂所定义的，全球化是一个确立国际体系的过程，它趋向于规则、价值观和目标的统一。^① 全球化将促成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际标准接轨吗？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讨论了全球化如何导致了中国的国家转型。国家转型是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与全球体系的结果。一方面，尽管存在困难，中国国家已经付出极大努力调整治理结构，以适应全球化；另一方面，这也推动了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的进程。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种新的全球主义心态，他们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中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第三章）。因此，领导人调整了中国的政治秩序以适应正在兴起的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第四章），重建了国家官僚系统和经济制度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培育新生的市场经济（第五、六章）。所有这些改革措施看起来似乎已推动中国更接近于现代国家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是否会导致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就像许多国家发生过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在使经济制度国际化的同时，是否也会推动政治制度国际化呢？一些学者和决策者相信会这样。这种乐观的看法产生于这样的信念，即全球资本主义将诱发民主化。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两翼；资本主义与经济财富有助于民主政府的形成，民主作为政府的一种形式可能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唯一可行形式。自1959年西蒙·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把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联理论化以来，这种观点就

^① Bertrand Badie,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

非常流行,在许多当代学者如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塞缪尔·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著作中也得到了体现。^①

188 所有这些学者都看到了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与逻辑联系。

这种推理如下。以东亚政治发展经验为基础,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同时,垄断性的政治权力不可能长期保持平衡,尤其是在通讯与贸易不断紧密相连的世界。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以及视野的拓宽,他们会要求有权参与统治,享有法治下的充分保护。因此,克林顿在连任美国总统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讲到,“社会的推动力和经济变迁的本质将一起发生作用,随着从外部世界获得信息,它们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升自由精神”;中国不能阻止民主,正如柏林墙最终倒塌一样。^②

然而,正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中国领导人尽管努力推进全球化,但他们不愿按西方的规则 and 标准来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尽管使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标准显著提高,但中国工人与农民仍然没有合适的制度和法律工具可以用来保障他们表达自身的利益(第七章)。中国的知识分子,新自由派也好,新左派也好,都极力提倡他们自己关于未来中国国家的观点,但中国共产党在决策时依然不太顾及这些社会影响(第八章)。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没能使中国变得民主?显然,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家转型,是为了从全球化中获益,并不想放弃其垄断性权力。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向法治型国家治理转变?如第一章所概述,本研究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家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样做时,我没有处理另一个重要论题:国家建构与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张力。全球化推动中国国家建立起一种治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合乎国际规则与标准,但当我们考察中国共产党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时,情形却不是这样。这可能会延缓

^① Seymour. M.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pp. 69—105 以及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3; Charles Lindbl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Samuel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9 (Summer 1984), pp. 193—218;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 关于这个观点的综合评论,参见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Lee Siew Hua, "China Will be 'more democratic over tim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anuary 30, 1997, p. 1.

中国的国家建构进程。最后一章集中考察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与法治型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的矛盾。它表明尽管中国领导人为重建国家作出了努力,但也存在着威胁中国共产党存亡的解构性因素;因此,当党试图建立一种法治体系时,它不愿意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这转而影响了中国走向一种法治型的国家治理。^① 中国能否建立一种法治型的国家治理?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衡量,因为“法治”这个术语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指令,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标准、履约程序以及其他制度化的操作实践。

189

法治抑或法制

在西方语境中,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法治”是指:

权威认可的普遍运用的法律原则,常常以准则或逻辑命题表述出来。法治,有时称为“法律的至高无上”,它规定任何决策都应运用已知的原则或法律来制定,在运用它们时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的干预。^②

法治形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背景中,是限制权力拥有者专断行为的一种手段。哈耶克认为,法治意味着:

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并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③

具体而言,法治意味着:第一,法律必须运用于既定社会的每个人;第二,统治者在统治时要遵守法律;第三,统治者的行为是可预测的。^④

然而,在中国传统中,法律是国家权力的工具;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家

^①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法治与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这或可回答作者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译者注

^② Henry Campbell Black, et al., *Black's Law Dictionary*,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p. 1332.

^③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④ 同上,第六章。

族和行会,而不是个人。这种传统使国家依赖于贵族、家长和族长来强化地方风俗习惯,而在西方,这些任务交给了法庭,法庭运用民法来统治。^① 鲍瑞嘉(Richard Baum)由此区分了“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鲍瑞嘉认为,法治概念属于西方,意味着一种兼顾各方的法律,反映着各种社会力量微妙平衡,像盾牌一样保护着各种社会经济阶级和阶层,以抵抗政府的任意监护。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制”(依法治国)这个概念意味着“国家主义的工具主义,诉诸传统中国法家的教条”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的官僚特质”。^② 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以同样的风格指出,法律在中国“仍然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像工具一样运行,以之维护社会主义政治秩序,永续党的统治”,并且“惯常根据预定政策来实行和巩固制度(主要是经济)的变迁”。^③

中国尽管没有法治的传统,但法治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政治与法律发展的一个(即使不是唯一)主要目标。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用十六个字清楚地表达了“法治”的意思,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此背景下,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至高无上”、“法治国家”、“合法化”等术语,开始成为中国建立一个法治国家的话语中的流行词。

在西方,法治是在民主的语境下讨论的。事实上,“民主”与“法制”在中国常常是两个交替使用的术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陈述的: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④

法治的一个目的是保障人民免受专断统治的侵害。邓小平曾经认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

^① Stanley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Richard Baum, “‘Modernization’ and Legal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the Rebirth of Socialist Legal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xix: 2 (Summer 1986), pp. 70–72.

^③ Edward J. Epstein, “Law and Legitimation in Post-Mao China”, in Pitman B. Potter (ed.), *Domestic Law Reform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 19.

^④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中国领导人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不辞劳苦地追求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新的有效治理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建设法制,结束没有法律的时代,成为最迫切的目标。领导人提倡依法治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领导人试图建立一种法治体系,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将它确立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当然,就引入法律、法规而言,中国的法律发展非常可观,法律的增长速度甚至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例如,从1949年到1978年只制定了514部法律法规,而在1979年到1997年之间制定了16493部。^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66年到1978年制定了7部法律,而从1979年到1998年则制定了327部。^③

191

蕴涵在推进法律发展之中的是,领导人认识到必须运用法律来增强治理国家的能力,因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复杂。换句话说,任何新的治理体系都必须以法制为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需要使法制成为必需。经济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导向的经济取代旧的计划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成为调节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并逐步取代了计划手段来管理不同行为体的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经济活动。例如,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从1985年的226600件上升到1997年的1483356件。^④不难理解,从1978年以来制定的大部分法律都与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和外国投资密切相关。

如第四章所指出,在改革之前的中国,国家通过单位制、户籍制严密控制着公民。随着市场体系的发展,法律在治理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自由化导致了各种非国有部门的兴起,它们雇佣了大部分的人口。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再是过去简单的政治手段所能协调和解决。而且,经济自由化也使户籍制失效了。当货币代替政治命令成为调节人的行为的重要手段时,当人们能够通过积极参与自由市场获得更好的生活时,他们就准备更多地冒险。今天,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尤其是农民工,从一个地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② 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中天软件公司编:《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大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郑永年,“From Rule by Law to Rule of Law: A Realistic View of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 *China Perspective*, 25 (1999), p. 35.

④ 中国法律年鉴编辑办公室:《中国法律年鉴》,北京: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85—1998年各版。

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中国的人际交往变得复杂。^① 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失业人口如“下岗工人”，给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② 在应对公共秩序危机时，尽管仍然常常采取各种行政措施来打击公共暴力行为，但法律无疑变得越来越重要。

192

在中国法制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重要的推动力，它与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相关。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去，新一代领导人必须创造新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法律、法规、准则和其他制度形式显然可以用来巩固和增强他们掌握的权力。^③ 为了提高和增强政治合法性，领导人必须首先建立公共秩序，其次减少官员的专断行为。无疑，维持公共秩序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功能，法律就是用来保障这种秩序的。中国领导人还认识到，官员的专断行为可能会引发人民反对党的统治。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抵制官员的专断行为，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多次群众运动。但这种策略不再可行，因为大众动员会引发社会混乱，也因为对新的领导人来说，稳定高于一切。因此，法律成为规范官员行为的重要手段。1989年，中国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为寻求对国家机关活动的司法审查奠定了基础。^④ 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为寻求获得违法的国家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赔偿确立了指导方针。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确保了公民在遭受非刑事的、行政的处罚时能得到保护。1996年，通过修订《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候审羁押、辩护权、终审判决和审讯等内容。更重要的是，中国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有这些法律虽不尽善尽美，但都是限制官员专断行为的制度手段，因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① Lincoln H. Day and Ma Xia (eds.),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eng Li, "Surplus Rural Laborer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Asian Survey*, xxxvi, 11 (November 1996), pp. 1122-1145.

② 邱泽齐和郑永年, "Xia-Gang and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Reducing Labor Redundancy in China's SOEs", 载王康武和黄朝翰编,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998, pp. 211-226; Greg Austin,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Public Order Crisis", *Survival*, 37, 2 (Summer 1995), pp. 7-23.

③ 这与中国法学界关于韦伯区分个人权威与法理权威的争论相符合。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化和法律的讨论，尤其是从领袖个人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转变，成为最吸引中国人的理论。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载《人民日报》，1989年4月10日。关于这个讨论，参见 Pitman B. Potter,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of the PRC: Judicial Review and Bureaucratic Reform", 载于 Potter 编, *Domestic Law Reforms*, pp. 270-304.

党与法治

中国尽管在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时付出了极大努力,但还仍然没有实现法治。中国领导人重视法律的重要性,因为他们认识到法律是治理或规制人民活动以及抑制和应对社会经济混乱的有效手段。但在建立一种法治的国家治理时,中国看来面临着与中国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有关的棘手问题。依法治国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依然站立在法律之上。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建立一个法治国家并不包括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一些学者发现,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立法控制权的侵蚀。例如,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谭睦瑞 (Murray Scot Tanner) 认为,立法过程变得如此复杂,以致于中国共产党的官员越来越难以参与起草法律法规的细节,政治局既不能使政策混乱减少,也不能垄断立法,其他机构在立法上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行使比“橡皮图章”更多的职能,其立法审查不再敷衍了事,也不再只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公开表演。^①无疑,立法权更多元化了,但中国共产党立法权的削弱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处于法律的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仍然统治着政治舞台,其一言一行都仍然是最重要的。

193

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江平指出,中国法律改革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国家的法律与政治结构之间的矛盾”。例如:

在宪法之下,国务院起草的预算报告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但事实上,国务院常常在没有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事先同意的情况下,突破预算的最高限度。在所谓监督法的草案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应该支撑起来反对行政机构。这个法律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国行政机构的工作的权力。但是,它永远只是停留在草案的地位上。^②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也控制着其他领域,如为言论和新闻自由立法、决定审

^① Murray Scot Tanner, *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江平,“Chinese Legal Reform: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1 (Spring 1995), p. 72.

判员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① 江平的这些观察,尽管是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时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但在今天依然是贴切的。

194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增强了它对法律的控制。中国共产党有责任自上而下地提供政治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导致了党对社会的统治。如第四章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允许资本主义加强它的社会基础,但却不能容许任何独立社会力量挑战它的垄断权力。没有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党尤其是党的领导人就会缺乏自愿立法来限制自身的动力。^②

进一步说,在中国走向法治的道路上还有文化障碍。法治在中国传统中是个“舶来品”,这个传统既包括“大传统”(儒家和法家),也包括“小传统”(共产主义)。儒家认定依法治国不是治理人民的一种“好”方式,而且“刑不上大夫”。^③ 即便孔子强调“礼治”及其建设过程的作用,也只是强调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由于统治者或士大夫是品行与道德的典范,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优越于普通百姓,因此,普通百姓应该乐意把自己做决定的权力让渡给政府官员。这种传统文化观点与中国对现代民主概念的解释相符合。民主或人民主权这个西方概念,最初是中国人从日语中翻译过来的。古汉语把“民主”解释为“为民做主”。显然,“为民做主”符合儒家精英主义。

法治也与中国的法家传统相矛盾。法家认为,法律制定出来就是用来统治人民,而不是用来审查统治者自身的行为的。法律也必须严苛,以便压制人民。如狄百瑞(Theodore de Bary)所指出:

法家发展出来的法律,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工具,向人强加自己的善行,却没有得到任何公意的认可。法律和国家是绝对的权威。不存在需要权力制约或审查和平衡的这种意义,如现代宪政主义常常努力提供的

^① 江平,“Chinese Legal Reform: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1 (Spring 1995), p. 72.

^② 关于这种思路的讨论,参见 Atul Kohl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载于 John P. Lewis and Valeriana Kallab 编,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econsider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86, pp. 153—182; 以及郑永年,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re They Compatible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 2 (Summer 1994), pp. 235—259.

^③ 孔子,《论语》,2: 3。这里引用的翻译,参见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1 (Spring 1995), p. 8.

那样。^①

对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小传统而言,法治也是“舶来品”。如爱泼斯坦指出,“接受了对法律和国家的列宁主义解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法律的态度也是工具主义的。”^②法律和国家只是统治阶级享有的经济权力的强制性表达。在社会主义中国,只要阶级还存在,法律只能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先进阶级政党的意志。在这个小传统内,法律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一个工具。尽管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法治,但在他们的心态中,法律仍然是一种统治工具。例如,党内仍有一些人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宪法监督,因为在他们看来,

195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它以许多方式行使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和控制。党的活动延伸到国家系统的领域之外,党的权威由此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更伟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宪法监督。^③

如第四章所指出,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领导人阐明党不再仅仅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也代表其他新兴社会阶级的利益,如资本家和私营企业主。现在的党章也阐明,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只要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看作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它要让自己服从于法治就显得比较艰难。

党与治理危机

在中国努力走向一种法治的国家治理时,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即党的存亡。当领导人付出巨大努力建构一种法治的国家治理时,这个

① 孔子,《论语》,2:3。这里引用的翻译,参见 Wm. Theodore De Bary, “The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1 (Spring 1995), p. 11.

② Edward J. Epstein, “Law and Legitimation in Post-Mao China” in Pitman B. Potter (ed.), *Domestic Law Reform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 22.

③ 蔡定剑,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2 (Fall 1995), p. 228。蔡定剑讨论了各种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受宪法监督的不同观点。

过程也导致了那些威胁党的存亡的力量的兴起。在调整党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领导层极力推动的中国的市场化转型,给中国共产党制造了多方面的治理危机。

196 最严重的危机是党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上台之后,这种发展就不可避免了。邓小平的领导集体降低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削弱了毛泽东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鼓励官员和人民进行改革实验。1978年,他对一场对毛泽东主义进行反思、争论的意识形态运动采取了宽容态度。1989年后,为了应对保守主义的兴起,邓小平在中国发动了所谓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结束了有关中国经济发展姓资姓社的长期争论。

去意识形态化培育了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氛围。但是,它也给人民尤其是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当邓小平向人民提供谋取利益的机会时,他不会期望出现对资本主义和货币的过度的、了无拘束的崇拜。当人们富起来时,却发现他们生活在道德的真空之中。在精神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销蚀,许多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党对党员的控制力大大削弱了。例如,尽管党禁止党员信仰任何宗教,但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有7%的法轮功正式成员是党员,其中46%的领导组织者是党员。^①

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和政府官员的腐败。腐败是导致1989年事件的主要因素,也是引发20世纪90年代大众不满的主要因素,这一点我在第七章已经指出过。一方面,腐败是领导干部和官员缺少法律执行的结果,另一方面,腐败也使法律执行变得更加困难。1995年,检察机关调查了2153名县级以上官员可能存在的腐败犯罪。这一年的官员腐败行为比上一年上升了27%,成为中国共产党自执政以来腐败上升率最高的一年。^②在那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副市长王宝森被控腐败,接受调查。王宝森畏罪自杀,陈希同入狱。在1993年到2000年之间,纪委和检察院调查和处理的全国案件总数每年上升9%,给予党纪和行政处罚的官员总数每年上升12%。在1990年到

^① 吴国光,“The Return of Ideology? Struggling to Organize Politics During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s”,载于黄朝翰和郑永年编,《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Post-Deng Development》,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221-246.

^② 《镜报》编辑部编,《江泽民运筹帷幄》,香港,1999年版,第54页。

1998年之间,检察机关在全国受理了110多万件腐败案,其中有50多万件案子的调查和检举已经存档,涉及60多万名罪犯。^①仅2000年1月到8月之间,全国检察机关就起诉了23464件渎职和贪污的刑事案件。^②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期间,中纪委的一个最新报告指出,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9月,检察机关在全国受理了861917件腐败案,846150名党员干部受到了处罚,其中处级干部28996名,局级干部2422名,省级干部98名。^③

197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三种主要的腐败倾向。第一,高层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如原江西省政府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④这是所谓“第一把手腐败”的全国性现象,即领导干部和官员腐败。显然,当权力被高度集中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甚至法律也不能——约束那些领导干部和官员的行为。第二,部门或地方政府的官员集体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腐败很快成为有组织的犯罪,尤其是走私案,如臭名昭著的湛江大案和远华大案。第三,受贿和贪污现象激增。例如,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北京检察机关调查的589件腐败案中,有77件的涉案金额达到100万元,仅成克杰一人就索贿受贿4100万元。^⑤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所有这些社会弊病必须得到救治,因为它们侵蚀了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领导人开展了多次反腐败斗争。然而,腐败仍然猖獗。2000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承认,“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⑥。江泽民也承认严重的腐败破坏了党的领导。^⑦

① “Major Corruption Cases”, Beijing Review, 22 May 2000, p. 14.

② 《人民日报》,2000年9月15日,第1版。

③ 新华社消息,2002年12月19日。

④ 胡长清于2000年2月15日被判处死刑,被指控收受大量贿赂;成克杰于2000年7月31日被判处死刑,被指控收受大量贿赂。成克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因腐败而被处决的最高级别官员。

⑤ 李明(Li Ming), “City Beefs up Anti-Graft Drive”, China Daily, April 22, 2000。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就公务员正常情况下一个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而言,100万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⑥ 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2000年3月5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载《人民日报》,2000年3月17日。

⑦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回归传统？

198 当江泽民在 2002 年 11 月向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报告时，他声明中国不会也不能学习西方的多党制民主。^① 当领导人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民主和法治时，党讽刺性地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到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此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近年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

1995 年，江泽民的领导集体展开了一场“讲政治”的政治运动。领导干部和官员们一定要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不能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② 1996 年 3 月，江泽民又开展了另一场“三讲”的政治运动，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通过开展“讲政治”和“三讲”运动，江泽民试图重新为党的发展指明方向。2000 年 2 月，在广东考察时，江泽民开始提出德治与法治应该互相促进，以此重塑党的风貌。江泽民相信道德教育能够提高干部的品质和精神，减少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③

江泽民渐渐把重心从法治转向德治。2001 年 1 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江泽民重申并解释了他的德治和法治理念。他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党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他认为，法治与德治应该互为补充，平等对待，最终结合在一起。^④ 显然，江泽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来治理这个国家。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确立法治优先的同时，促进德治能够大力加强法治。^⑤

所谓“以德治国”运动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许多人认为，领导人试图复兴儒家学说来统一人民，因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已然幻灭，沉溺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竭尽全力在党政官员中宣传德治理念。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 年 11 月 8 日），载《人民日报》，2002 年 11 月 18 日。

② 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1995 年 9 月 27 日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

③ 《江泽民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载《人民日报》，2000 年 5 月 18 日。

④ 中国新闻社：《江泽民强调法治与德治的必要性》，2001 年 1 月 10 日。

⑤ 《人民日报》，2001 年 1 月 11 日。

2001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发展法治的同时促进德治。^①

以德治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江泽民并没有清楚做出解释。但他忠诚的理论顾问们将他的思想发扬光大。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些学者的说法,这个概念虽然起源于古代中国,但是需要在中国的新背景下重新定义。他们认为,以德治国常常是指道德在治理国家时的作用,“我们今天所说的‘德’的含义更广,它还包括理想、信念等”^②。具体地讲,以德治国包含:

(1)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立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2)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3) 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

(4) 在选任和提升党政干部时,要评估他们的道德水准;

(5)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道德垂范;

(6) 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法治支撑德治的重要性。^③

当然,德治必须在现代背景下建立起来。它的传统意义已不再适应现代要求,而必须以现代性、合理性、先进性为基础。那么德治的现代背景是什么呢?这些学者认为,德治的现代背景就在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德治“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法治建设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④。

由此,重要的问题是法治与德治之间的关系。对那些支持这个概念的人来说,法治与德治并不冲突,而是相互补充的。首先,两者都旨在扬善抑恶,净化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推进社会发展。其次,当立法者立法、执法者执法时,都必须有道德感。第三,没有德治的支持,法治本身就不能有效运行。自改革开放政策实行以来,中国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是它们没有得到执行。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执法者不具备道德素质。此外,人民的道德素质与法律要求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执法相关的问题是法律的道
德支持不足。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法律建设,但人民的道德提高却依

① 《人民日报》,2001年2月1日。

② 张前、计海庆:《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第18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189—190页。

然相对滞后。无疑,当法律建设大大进步时,实现道德提高就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①

在教育党政干部时,德治能够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德治的拥护者们认为,领导干部必须:(1)强调行政管理的道德维度和社会正义;(2)教化党政干部,这是德治最重要的功能所在;(3)树立“官德”模范;(4)在立法和执法时,要平衡法律与道德。

德治还有制度的一面。没有一定的制度,德治就不能充分发挥潜力。德治的拥护者们声称,德治的实现必须建立一组制度,包括:(1)道德评价与道德监督制度;(2)不同管理领域以及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的伦理规范;(3)个人的职业道德。^②

江泽民在2002年的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宣布,党要继续强调法治和德治。^③在早些时候,江泽民的助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提出,在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时,中国应该在5000年文明的基础上利用道德价值观来辅助法制。仅凭法律来治理的国家不可能是健康的。法律必须由道德价值观、人的情感、家庭关怀来辅助。刘吉相信,如果个人主义走得太过头了,就算法律允许,它也会变成社会的毒瘤,中国不应该重复西方的错误。因而,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适合中国。^④不言而喻,对党而言,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传统价值。

结论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建立一种法治的国家治理吗?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正不断成长为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但就法治建构而言,这条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亟待清除。

现在的国家治理仍然不是法治的。然而,急剧的社会经济进步,可能会在中国产生政治改革的自身动力。我们已经在欧洲历史上看到了法治的治理结

① 张前、计海庆,《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第190页。

② 同上,第191页。

③ 《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④ Clara Li, “Culture as Vital as Law, says Jiang ai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3, 2001. 关于儒家共同体主义,参见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s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构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法治的发展是与民主的发展同步的。法治的核心是如何驯服国家。对欧洲民主的历史分析表明了充满生机的资产阶级的重要性。新兴的商人阶级成功地驯服了专制国家,挑战了贵族关于“政府是因出身、血统而拥有特权的人的政府”的主张,慢慢地用这样一种原则替代了上述主张——政府是有产“平民”的天生领地。后来,新兴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挑战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西方发生过的事情不可能在中国重演,但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给中国共产党制造了大量的压力。党的权力仍然卓立于社会之上。但是,随着社会力量的兴起,党也必须调整自身的权力结构,从而逐渐适应社会现实。在农村,随着村民选举制度的建立,农村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领导层做出允许资本家入党的决定,也可能会对党的转型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重建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国领导人引进了西方国家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成功了。但是,在重建政治制度时,他们拒绝了西方政治产品。领导人求助于中国传统来复兴党,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实现任何具体的目标。随着中国快速地变得全球化,其社会经济制度不断融入国际共同体,党的领导人除了变革政治制度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参考文献

英文

- Anderson, P. ,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 February 28, 2000.
-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 November 17, 1998.
- The Associated Press, August 8, 2000.
- Austin, Greg,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Public Order Crisis", *Survival* , 37:2 (Summer 1995), pp. 7-23.
- Bachman, David,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 Berkeley, CA: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 Badie, Bertrand,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 translated by Claudia Roy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i Chong-en, David D. Li and Yijiang Wang,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en is up really dow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24: 3 (1997), pp. 265-280.
- Bakken, Borge, "State Control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Susan Young (eds.), *State Capacity in Japan, Taiwan, China and Vietna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85-202.
- Barme, Geremie R. , "The Revolution of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98-220.
- Baum, Richard, "'Modernization' and Legal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The Rebirth of Socialist Legal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 xix: 2 (Summer 1986), pp. 69-103.
- Bell, Danie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Bendix, Reinhard, *Nation-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Berger, Suzanne, and Ronald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ern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 A. Knopf, 1997.
- Bernstein, Thomas P., and Xiaobo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63 (September 2000), pp. 742—763.
- Bickford, Thomas J.,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Its Business Operations: The PLA as Entrepreneur", *Asian Survey*, xxxiv; 5 (May 1994), pp. 460—476.
- Black, Henry Campbell, *Black's Law Dictionary*, St. Paul, Minn.; West Publishing Co., 1990.
- Boli, John, and Geoge M. Thomas (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ince 187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oyer, R., and D. Drache (eds.), *States Against Marke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 Bright, Charles,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Essays in History and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 Brodsgaard, Kjeld Eric, and Susan Young, "Introduction: State Capacity in East Asia", in Brodsgaard and Young (eds.), *State Capacity in East Asia: Japan, Taiwan, China, and Vietn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16.
- Brook, Timothy and B. Michael Frolic (ed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 Burns, John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Nomenkultura Syste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 Burns, John P., "Reforming China's Bureaucracy, 1979—1982", *Asian Survey*, xxiii; 6 (June 1983), pp. 692—722.
- Business Times*, Singapore, 30 October 1998.
- Byrd, William A. and Lin Qingsong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Cable, Vincent, "The Diminished Nation-State: A Study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 *Daedalus*, special issue,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124; 2 (Spring 1995), pp. 23—53.
- Cai Dingjian, "Constitutional Supervi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2 (Fall 1995), pp. 219—245.
- Calhoun, C.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 Chen, Feng, "Order and Stability in Social Transition: Neoconservative Political Thought in Post-1989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51 (September 1997), pp. 593—613.
- Chen, Feng, "Subsistence Crisis, Managerial Corruption and Labor Protest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4 (July 2000), pp. 41—63.
- Chen, Hongyi,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of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Market Liberalization, Contractual Form Innovation and Privatization*,

- Aldershot: Ashgate, 2000.
- Chen, Kang, Arye L. Millman and Qingyang Gu, "From the Helping Hand to the Grabbing Hand: Fiscal Federalism and Corruption in China", *EAI Working Paper* No. 67,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ebruary 2001.
- Cheng, Tiejun and Mark Seld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Hierarchies: China's Hukou and Danwei System",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77, pp. 23—50.
- China Daily*, August 25, 1994.
- China Daily*, February 28, 1998.
- China Daily*, October 26, 1998.
- China Daily*, July 22, 1999.
- China Daily*, March 6, 2000.
- China Daily*, August 8, 2000.
- China Daily*, August 10, 2000.
- China Daily*, May 16, 2001.
- China Economic News* (HK), no. 39, October 11, 1999.
- China Economic News* (HK), no. 38, October 4, 1999.
- China Economic News* (HK), no. 33, August 30, 1999.
- China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Times*, "The 6-Measure of Promoting SOE Reform", Beijing, March 2, 1997.
- China News Service*, August 22, 2000.
- "China Telecom IPO faces crucial te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9, 2001.
- Crane, George 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rmonk: M. E. Sharpe, 1990.
- Daedalus*, 124: 2 (Spring 1995), special issue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 Dahl, Robert,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Dahlgren, P.,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Citizenship, Democracy and the Media*, London: Sage, 1995.
- Dauvergne, Peter (ed.), *Weak and Strong States in Asia-Pacific Societies*, Sydney: Allen & Unwin, 1988.
- Davis, Deborah 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Day, Lincoln H., and Ma Xia (eds.),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 De Barry, Wm. Theodore, "The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aw*, 9: 1 (Spring 1995), pp. 7—34.
- Ding, X. L., "The Illicit Asset Stripping of Chinese State Firms", *The China Journal*, 43 (January 2000), pp. 1—28.
- Ding, Yijiang, "The Conceptual Evolution of Democracy in Intellectual Circles' Rethinking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Zhao Suisheng (ed.), *China and Democrac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pp. 111—140.
- Dirlik, Ari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eft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y*, 34: 4 (August 1975), pp. 945—980.
- Durkheim, Emil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 Dittmer, Lowell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Eckholm, Erik, "China Party Says Unrest Is Spreading in Country; Frank Official Report Calls Relations with the Masses 'Ten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3, 2001.
- Economy, Elizab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 Epstein, Edward J., "Law and Legitimation in Post-Mao China", in Pitman B. Potter (ed.), *Domestic Law Reform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19—55.
- Evans, Peter,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50 (October 1997), pp. 62—82.
- Evans, Peter,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Evans, Peter B., D. Rueschmeyer, and T.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Findlay, Christopher, Andrew Watson, and Harry X. Wu (eds.), *Rural Enterprises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 Friedman, Milto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Fukuyama, Francis, *Tru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Fukuyama, Francis,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6: 2 (1995), pp. 20—33.
-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 Gilpin, Robert,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ilpin, Rober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Goldman, Merle,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rossman, L. K., *The Electronic Republic: Reshaping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New York: Viking, 1995.
- Grewlich, K. W., and F. H. Pederson (eds.), *Power and Participation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Brussels: Europe Commission, 1994.
- Grindle, Merilee S., and John W. Thomas, *Public Choices and Policy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roves, Theodore, Yongmiao Hong, John McMillan and Barry Naughton, "Autonomy and

- Incentives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1 (1994), pp. 183–209.
- Gu, Edward Xin, “Employment Servi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John Wong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Deng Era*,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143–169.
- Gu, Edward Xin, “Plu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llectual Public Space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Four Intellectual Groups”,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ing the Prospects for a Democratic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41–172.
- Gu, Edward X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Housing Reform,”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Ref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pp. 195–230.
- Gu, Edward Xin, “From Permanent Employment to Massive Lay-Off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itional Unemployment’ in Urban China (1993–1998)”, *Economy and Society*, 28: 2 (May 1999), pp. 281–299.
- Gu, Edward Xin, “Cultur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ublic Space in Communist China (1979–1989): A Case Study of Three Intellectual Group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 2 (May 1999), pp. 389–431.
-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 Hall, David L, and Roger T. Ames, *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 Dewey, Confucius, and the Hop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Chicago: Open Court, 1999.
- Harris, Stuart and Gary Klintworth (eds.), *China as a Great Power, Myths,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Hass, Ernst B.,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Hayey,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Hayes, Carlton J. H.,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Macmillan, 1948.
- Held, Davi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Held, Davi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 Held, David,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Held (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p. 197–235.
- Hill, Kevin A., and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 Hirschman, Albert O.,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d Other Recent Essay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irschman, Albert O.,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Hirschman, Albert O. ,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irst, P. ,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 Hobsbawn, Eric J. , *The Age of Capital 1848 — 1875* ,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5.
- Holmes, David (ed.) , *Virtual Politics: Identity and Community in Cyberspace* , London: Sage, 1997.
- Holmes, Stephen, and Cass Sunstein, *The Cost of Rights: 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ation* , New York: Norton, 1999.
- Horsman, Mathew and Andrew Marshall, *After the Nation-State* ,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 Hu Angang, “High Unemployment in China: Estimates and Policies”, 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China: Integration, Disintegration or Reshaping of An Empire?”, The Fren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5 March 2000.
- Hunt, Michael H. ,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Late Qing-Republic Crisis”,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 (eds.) ,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2—79.
- Huntington, Samuel,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Huntington, Samuel S. ,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Huntington, Samuel,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99 (Summer 1984), pp. 193—218.
- Jacobson, Harold K. ,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 Jiang Ping, “Chinese Legal Reform: Achievement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aw* , 9: 1 (Spring 1995), 67—76.
- 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arry R. Wei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 SWP-99-013, 1999.
- Johnson, Chalmers A. ,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 — 1945* ,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Kasza, Gregory J. , *The Conscript Society: Administered Mass Organization*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 New York: Longman, 2000.

- Keohane, Robert, and Joseph S. Nye,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s Not? (And So What?)" *Foreign Affairs*, 118 (Spring 2000), pp. 104–119.
- Khalilzad, Zalmay M., Abram N. Shulsky, Daniel L. Byman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9.
- Kohli, Atul,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in John P. Lewis and Valeriana Kallab (ed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Reconsidered*,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86, pp. 153–182.
- Kohn, Hans, *The Age of Nationalism: The First Era of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62.
- Kohn, Hans,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1944.
- Krasner, Stephen,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rasner, Stephe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dependent Statehood", in R. H. Jackson and A. James (eds.), *Stat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1–321.
- Lai, Harry Hongyi, "Behind Chin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 2 (2001), pp. 237–255.
- Lardy, Nicholas, *Integrating China into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2.
- Lardy, Nicholas, "China and the Asian Contag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8.
- Lardy, Nicholas,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 Lardy, Nicholas 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 Lardy, Nicholas R.,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8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Lardy, Nicholas R.,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Economy: Implications for North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 Lardy, Nicholas and Kenneth Lieberthal (eds.),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3.
- Lee, Ching Kwan, "Pathways of Labor Insurgency",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41–61.
- Lee, Ching Kwan,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57 (March 1999), pp. 44–71.
- Lee, Ching Kwan,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Collective Inaction and Class Experience Among State Workers in Guangzhou", *Modern China*, 24: 1 (1998), pp. 3–33.
- Lee, Hong Yo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Lee Siew Hua, "China will be 'more democratic over time'",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anuary 30, 1997, p. 1.
- Levenson, Joseph L., *Liang Ch'i 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 Li, Cheng,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 Li, Cheng,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n Survey*, 38: 3 (March 1998), pp. 231–264.
- Li, Cheng, "Surplus Rural Laborer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Asian Survey*, xxxvi: 11 (November 1996), pp. 1122–1145.
- Li, Clara, "Culture as Vital as Law, says Jiang ai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3, 2001.
- Li Ming, "City Beefs up Anti-Graft Drive", *China Daily*, April 22, 2000.
- Li, Wei,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1980–198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 5 (1997), pp. 1080–1106.
- Liao, Kuang-sheng, *Anti-foreignism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860–1980: Linkage Between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4.
- Lieberthal, Kenneth,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Lindblom, Charles E.,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Lipset, Seymour. M.,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3.
- Lipset, Seymour. M.,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 (1959), pp. 69–105.
- Liu Zhiqiang, "Progress in China's Banking Sector Reform",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62*,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May 9, 2000.
- Lo, Vai Io, "Labor Law for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in China",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Ref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pp. 167–195.
- Lu, Ding,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Xiaoping's 1992 *Nanxun*", in John Wong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London a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1–76.
- Lü, Xiaobo, "The Politics of Peasant Burdens in Reform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25, no. 1 (1997), pp. 113–138.
- Lü, Xiaobo,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 Lubman, Stanley,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llee, Hein,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under Reform", in Alan Hunter and Kim-kwong Chan (eds.),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0–16.
- Mann, Michael, "Has globalization ended the rise and ris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 V. Paul and John A. Hall (eds.),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7–261.
- Mann, Michael, *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 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 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Marshall, T. H., *Class,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 Marx, Karl,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8, pp. 469–500.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 –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Meier, Gerald M., "Policy Lessons and Policy Formation", in Gerald M. Meier (ed.), *Politics and Policy Ma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erspectives on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San Francisco, CA: ICS Press, 1991, pp. 3–12.
- Meyer, John W.,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in Frank J. Lechner and John Boli (eds.), *The Globalizati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pp. 84–92.
- Migdal, Joel S., Atul Kohli and Vivi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igdal, Joel S.,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Mo, Y. J.,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s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此文发表于 2000 年 6 月 28–29 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关于 "China's WTO Acc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Northeast Asia" 的会议。
- Moore, Barrington,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
- Moore, G. Thomas,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yers, Charles A.,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Nathan, Andrew J.,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Nathan, Andrew J.,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Nathan, Andrew,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1985.
- Naughton, Barry,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 — 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he OECD 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 *Globalization: Wha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Government?* Paris: OECD, 1996.
- Ohmae, Kenichi,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 Ohmae, Kenichi,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
- Oi, Jean, *Rural China Takes Off*,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Olson, Mancur,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 Olson, Mancur, and Satu Kahkonen (eds.), *A Not-So-Dismal Science: A Broader View of Economics and Socie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Olson, Mancu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Park, Albert, Scott Rozelle, Christine Wong, and Changqing Ren,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Reforming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47 (1996), pp. 751—779.
- Peking Review*, no. 52, 29 December 1978.
- Perkins, F. C.,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and Prioritie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 32: 3 (1996), pp. 414—444.
- Perry, Elizabeth, "Labor's Battle for Political Space: the Role of Worker Associ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eborah S. Davis,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02—325.
- Perry, Elizabeth, "Shanghai's Strike Wave of 1957", *The China Quarterly*, 137 (March 1994), pp. 1—27.
-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Perry, Elizabeth,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1997.
- Petracca, Mark P., and Mong Xiong,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eo-Authoritarianism: An Exploration and Democratic Critique", *Asian Survey* xxx: 11 (November 1990), pp. 1099—1117.
- Poggi, 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Pomfret, John, "Why 'Beijing Spring' Cooled; Dissidents Overstepp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4 January 1999, pp. 1 and 7.
- Pomfret, John, "Jiang Orders Military to Go Out of Business; in effort to end rampant smuggling, army must close commercial empir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ly

- 23, 1998.
- Potter, David,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and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 Potter, Pitman B.,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of the PRC: Judicial Review and Bureaucratic Reform", in Potter (ed.), *Domestic Law Reforms in Post-Mao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270—304.
- Putman, Robert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1 (1997), pp. 83—92.
-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 (1996), pp. 149—185.
- Qiu Zeqi and Zheng Yongnian, "Xia-Gang and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Reducing Labor Redundancy in China's SOEs", in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ed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1—226.
- Rheingold, Howar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4.
- Rodrik, Dani,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 Rosenau, James N.,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Rosow, Stephen, "Commerce, Power and Justice: Montesquieu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view of Politics*, 46: 3 (1984), pp. 346—367.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 Ruigrok, W., and R. van Tulder,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struct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5.
- Schiffirin, Harold Z.,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Schuler, D., *New Community Networks: Wired for a Change*, New York: ACM Press, 1996.
-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Schwartz, Benjamin I., "Themes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May Fourth and After", in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06—450.
- Scott, James,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hambaugh, David (e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hieh, Milton J. T., *The Kuomintang: Selec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1894 — 1969*,

-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Shinn, James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
- Shirk, Susan,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Shue, Vivienne,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hue, Vivienn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eds.),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5—88.
- Skinner, Q.,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Smith, Adam,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mith, Anthony D.,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 Smith, Anthony D.,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1971.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2, 2000.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9, 1999.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9, 1998.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2, 1998.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3, 1998.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30, 1997.
- The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ly 31, 1999.
- Strange, Susan,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trange, Susan, "The Defective State", *Daedalus*, special issue "What Future for the State?" 124: 2 (Spring 1995), pp. 55—73.
- Suleiman, Erza, *Politics, Power, and Bureaucracy in France: The Administrative Elit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Sun, Yan, *The Chinese Reassessment of Socialism, 1976—199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waine, Michael D., *China: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 Santa Monica, CA: Rand, 1995.
- Tanner, Murray Scot, *The Politics of Lawmaking in Post-Mao China: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Tarrow, Sidney,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Political Structuring of Social Movement",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Mayer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Tarrow, Sidney,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eng, Ssu-yu and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Tian, Xiaowen, "The Rise of Non-State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Communist Economie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9: 2 (1997), pp. 219—231.
-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 D. 990—1990*,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90.
- Tilly, Charles, "Social Movemen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in Charles Bright and Susan Harding (eds.), *Statemaking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 pp. 297—317.
-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 1978.
- Tilly, Charles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sagarousianou, R., D. Tambini and C. Bryan (eds.), *Cyberdemocracy: Technology, Cities, and Civic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Tsang Shu-ki and Cheng Yuk-shing, "China's Tax Reforms of 1994: Breakthrough or Compromise", *Asian Survey*, 34: 9 (September 1994), pp. 769—788.
-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Tyau, Min-Shien (ed.), *Two Years of Nationalist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0.
- Unger, Jonathan (ed.), *Chinese Nationalism*,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
- Vincent, Andrew, *Theories of the Stat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Vogel, Ezra F. (ed.), *Living with China: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Wade, Robert, "Glob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Reports of the De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in Suzanne Berger and Ronald Dore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60—88.
- Wade, Robert,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alder, Andrew (ed.), *Zouping in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Reform in Rural North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alder, Andrew, "Workers, Managers and the State: The Reform Era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1989", *The China Quarterly*, 127 (September 1991), pp. 467—492.
- Walder, Andrew,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Wan Yan Shu, "Some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Our National Security", *Yazhou Zhoukan* (Asiaweek), Hong Kong, 14 January 1996.
- Wang, Gungwu, *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Singapore and

-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 Wang, Gungwu, *Nationalism and Confucianism*, Singapore: Unipress, 1996.
- Wang, Gungwu, *The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alism*, Leid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1996.
- Wang, Gungwu,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 (eds.), *Reform, Legitimacy and Dilemmas: China's Politics and Society*,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0.
- Wang, Hongy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s Impetus for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 *EAI Working Paper No. 27*,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June 18, 1999.
- Wang, Shaogua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WTO Membership",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25 (2000), pp. 373-405.
- Wang Shaoguang and Hu Anga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neve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 Wang Shaoguang, "The Rise of the Regions: 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in Andrew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 87-113.
-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 Weiss, Linda,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Governing the Economy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1998.
- Weizman, Martin L. and Chenggang Xu, *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Lond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program, 1992.
- White, Gordon,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a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Whitney, Joseph B. R., *China: Area, Administr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Chicago,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0.
- Williamson, John (ed.),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 Wong, John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Development*,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2001.
- Wong, John and Sarah Chan, "China's Rapidly Changing Export Structure",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85*,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9 April 2001.
- Wong, John and Liu Zhiqiang, "China's Progress in Banking Reform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EAI Working Paper No. 52*, 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3 August 2000.
- Wong, John and William T. Liu, *The Mystery of China's Falun Gong: Its Rise and Its Sociological Implications*,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999.
- Wong, John, "Xiaokang: Deng Xiaoping'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arget for China", in Wang Gungwu and John Wong (eds.),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998, pp. 211–226.
- Wong, John, Rong Ma and Mu Yang (eds.), *China's Rural Entrepreneurs: Ten Case Studie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
- Wong, John, "The Xia Hai Phenomenon in China", *Ritsumeik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rea Studies*, 6 (March 1994), pp. 1–10.
- Wong, Christine P. W. (ed.),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The World Bank, *China 2020: Sharing Rising Incom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 The World Bank, *China: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6.
- The World Bank, *China: Revenue Mobilization and Tax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0.
- Wriston, Water B., *The Twilight of Sovereignt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2.
- Wu Guoguang, "The Return of Ideology? Struggling to Organize Politics During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s", in John Wong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Nanxun Legacy and China's Post-Deng Development*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2001), pp. 221–246.
- Zhao, Suishe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5 (Spring 2000), pp. 1–33.
- Zhao, Suishe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Quest for National Greatness and Nationalistic Writing in the 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152 (December 1997), pp. 725–745.
- Zheng, Shiping, *Party vs. State in Post-1949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Zheng, Yongnian,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Zheng, Yongnian "From Rule by Law to Rule of Law: A Realistic View of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 *China Perspective*, 25 (1999), pp. 31–43.
- Zheng, Yongnian, "Political Incrementalism: Political Lessons from China's 20 Years of Reform",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 6 (1999), pp. 1157–1177.
- Zheng, Yongnian,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Are They Compatible in Chin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 2 (Summer 1994), pp. 235–259.
- Zheng, Yongnian and Zou Keyuan, *Toward More Effective Governance: China's Politics in 1998*, Singapore and London: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1999.

Zou, K., and Y. Zheng, "China's Thir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 Leap Forward Towards Rule of Law in China", A. J. de Roo and R. W. Jagtenberg (eds.), *Yearbook: Law & Legal Practice in East Asia 1999*, 4,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0, pp. 29-42.

Zweig, David,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文

曹建明,《金融安全与法制建设》,《人民日报》,1998年6月16日。

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北京中天软件公司编,《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大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陈少明,《民族主义:复兴之道?》载于《东方》1996年第2期,第74-76页。

陈元,《我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和选择(纲要)》,载于《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陈冬东,《社会团体组织大全》(第三卷),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陈柏松、张斌,《农民负担现状、成因及对策》,载于《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第3期,第4-11页。

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因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5期,1996年夏季卷,第88-99页。

程明,《东亚模式的魅力》,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18-27页。

陈如龙编,《当代中国的财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钟朋荣,《十年经济改革:历程·现状·问题·出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崔之元,《第二次思想解放与制度创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载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7期,1996年春季,第49-74页。

崔之元,《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载于《读书》1996年第3期,第11-21页。

崔之元,《中国实践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载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特刊,1995年7月,第1-33页。

崔之元,《制度创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第24期,第5-15页。

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1-82页。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邓小平,《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14页。

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载于《邓小平文选》

-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118页。
-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十一月),载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80页。
-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343页。
-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载于《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53页。
- 邓英淘、苗壮、崔之元,《南街村经验的思考》,载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第14—24页。
-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 《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内部稿),1991年9月9日。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农民日报》编辑办公室,《矛盾、引导和历史的奇迹——关于196份农民来信的初步分析》,载于《农民日报》1998年12月8日。
- 丁建明、李建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启示》,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1月5日。
- 中国法律年鉴编辑办公室,《中国法律年鉴》,北京: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85—1998年。
- 《瞭望》编辑部编,《国务院机构改革概览》,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 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研究课题组,《金融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管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 甘阳,《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载于甘阳,《将错就错》,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谷源祥,《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总趋势》,载于教育部编,《五个当代讲稿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5页。
- 观察家,《经济全球化呼唤金融安全》,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10月22日。
- 郭定平,《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转型》,载《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52—55页。
-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 何盛明,《中国财政改革二十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胡鞍钢编,《中国挑战腐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载于胡鞍钢编,《中国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77页。
- 胡鞍钢,《跨入新世纪的最大挑战: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未出版手稿,中国科学院,1999年。
- 胡伟,《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何在——超越纯经济视点的分析》,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69—78页。
- 黄延信,《农民负担过重的制度性根源与对策》,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5期,第38—42页。

- 季卫东,《宪政的复权》,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400页。
- 季卫东,《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载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3期,第26—53页。
- 姜南扬,《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载于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17页。
- 江时学,《拉美、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与启示》,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第58—68页。
-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
- 中国新闻社,《江泽民强调法治与德治的必要性》,2001年1月10日。
- 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
- 江泽民,《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带领全国人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载于《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
- 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载于《理论探讨》1996年特刊,第2—3页。
- 《经济日报》,1999年1月26日。
- 刘兆佳等编,《市场、阶级与政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0年版。
- 李鹏,《政府工作报告》,载于《中国工商时报》1997年3月2日。
- 李强,《关于私营经济的若干资料》,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第17—27页。
- 李慎之,《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使命》,载于《东方》1994年第5期,第13—18页。
- 李慎之,《从全球化视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第5—6页。
- 李先刚,《关于农村分税制度改革的调查与思考》,载于《农村调查》1995年第7期,第6—10页。
- 廖金莹,《农民负担过重的调查与思考》,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3年第6期,第54—56页。
- 林炎志,《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载于《真理的追求》2001年第5期,第2—11页。
- 林毅夫,《资源结构升级:赶超战略的误区——对“比较优势战略”批评的几点回应》,载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第35—45页。
-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 林志远,《商业银行要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挑战》,载于《金融时报》,1999年5月15日。
- 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89年版。
- 刘军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政治理论视野中的财产权与人类文明》,载于罗岗、倪文尖编,《90年代思想文选》第2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9页。
-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公正:对若干诘难的回答》,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第50—67页。
- 刘军宁,《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刘军宁,《产权保护与有限政府》,载于董郁玉、施滨海编,《政治中国——面向新体制选择的时代》,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8页。
- 刘力群,《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44页。
- 刘心武,《确立人类共享文明观念》,载于《东方》1996年第6期,第21—25页。
- 鲁品越,《中国历史进程与市民社会建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第8期,第173—178页。
- 陆学艺,《中国农村状况及存在问题的根源》,载于汝信、陆学艺和单天伦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6页。
- 陆学艺、景天魁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罗干,《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几点说明》,载于《文汇报》(香港)1998年3月7日。
-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载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第17期,第43—53页。
- 马洪、孙尚清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1—1992)》,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于《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于《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明报》,香港,1998年12月15日。
- 《明报》,香港,1998年1月8日。
- 《镜报》编辑部编,《江泽民运筹帷幄》,香港:镜报文化公司1999年版。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党的建设文件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庞中英,《国际金融体系酝酿改革》,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
- 《人民日报》,1989年4月10日、1994年3月10日(海外版)、2000年8月9日、2000年9月15日、2001年1月11日、2001年2月1日。
- 秦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点在哪里?》,载于《东方》1996年第3期,第45页。
- 秦少相、贾铤,《社会新群体探秘: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课题组,《2000—2001中国调查报告: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 苏州大学法学院行政法课题组,《当前农村乱收费现象成因分析及对策》,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3期。
- 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编,《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年版。
- 沈骥如,《中国不当“不先生”》,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 石中,《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载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第11—15页。
- 国务院,《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新华社2000年8月1日。
- 国务院,《中央政府组织结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
- 国家统计局,《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8年版。
- 国家统计局,《中国金融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
-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年鉴》,北京:中国年鉴出版社1996年版。
- 国家税务局,《中国税制改革十年(1978—1988)》,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国家统计局,《中国私营经济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各年。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
-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问题”课题组,《集中财力若干问题的理论剖析》,载于《财贸经济》1991年第4期,第23—32页。
- 苏尚尧、韩文伟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 苏晓康、远志明、王鲁湘等,《河殇》,北京:现代出版社1988年版。
- 孙中山,《三民主义》,载于《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 王春光,《1997—1998年:中国社会稳定状况的调查》,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主编,《社会蓝皮书·199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32页。
- 汪丁丁,《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6期,第15—21页。
- 王沪宁,《中国改革的非经济思考》,载于《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8月29日。
- 王绍飞,《财政状况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前途》,载于《财贸经济》1990年第4期,第23—28页。
- 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
- 王绍光,《权力的代价与改革的路径依赖》,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112—115页。
- 王绍光和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1年2月向“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提交的论文。
- 王莹,《新集体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第25期,第11—14页。
- 王颖、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
- 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载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第25—38页。
- 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 乌杰编,《中国政府与机构改革》,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 吴越涛、张海涛编,《外资能否吞并中国》,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 萧功秦,《从“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看后邓时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EAI Working Paper, No 37*,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2002年1月21日。

辛向阳,《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三年进程与未来走势》,载于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编:《社会蓝皮书,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20页。

新华社消息,1995年4月11日、2000年3月6日、2002年11月18日、2002年12月19日。

新华社,《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结》,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第50期,第4—13页。

许毅、项镜泉,《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国家财政(1981—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杨爱华、陆思山,《砸破“三铁”后的中国人》,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杨宜勇,《2000年中国就业形势及其政策选择》,载于刘国光编:《经济蓝皮书(200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尹保云,《集权官僚制的现代化道路:韩国发展经验探索》,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第35—42页。

余小平,《在我国实行分税制的基本构想》,载于《财贸经济》1990年第2期,第60—62页。

张厚义、明立志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张前、计海庆,《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第189—192页。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张元红,《论中国农业税制改革》,载于《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12期,第4—11页。

张振龙,《军队生产经营管理》,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赵阳、周飞舟,《农民负担和财税体制——从县乡两级的财税体制看农民负担的制度原因》,载于《香港社会科学》第17期,2000年秋季号,第67—85页。

郑永年,《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根源、过程和前景》,载于林佳龙、郑永年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台北: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中国工商时报》,1996年4月29日。

朱光磊,《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朱明,《东亚金融动荡引发的思考》,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1月26日。

索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个别有出入)

- absolutism 绝对主义 26,27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由 162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行政诉讼法
192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Law 行政处罚法
192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ABC) 中国
农业银行 121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122
agricultural reform 农业改革 2
agriculture 110, *see also* farmers and
peasants 农业 110,另见农民
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CFTU) 中华全国总工会 158
Ames, Roger T. 安乐哲 232
Anderson, P. 安德森,皮尔逊 207
Anhui (province) 安徽省 116, 122,
137, 153, 154
Anshan Steel Mill Constitution 鞍钢宪法
184, 227
anti-foreignism 排外主义 42
anti-Rightist Movement 反右运动 80
armed forces, *see* military 军事力量, 参见
军队
Asian Development Bank 亚洲发展银行
121
Asian financial crisis 亚洲金融危机 29,
105, 123, 125—127, 133, 165
Austin, Greg 231
authoritarianism 权威主义 135, 170,
177
authority 权威
basis of 的基础 35
loss of 的丧失 16
autonomy, financial 自主性, 财政 114,
135
Bachman, David 219
Badie, Bertrand 贝蒂, 贝特朗 25, 30—
31, 187, 206, 208, 229
Bai, Chong-en 224
Bakken, Borge 222
Bank of China (BOC) 中国银行 120,
121
Bank of Communications 交通银行 122
banking sector 银行部门 119—128
Barme, Geremie R. 白杰明 166, 225,
226
Baum, Richard 鲍瑞嘉 189, 230
Beijing 北京 4, 107, 116, 157, 164, 166,
196, 197
Beijing University, Center of Legal
Information 北京大学, 法律信息中
心 230
Beijing Zhongtian Software Company 北
京中天软件公司 230
Bell, Daniel 贝尔, 丹尼尔 207
Bendix, Reinhard 207
Berger, Suzanne 207, 208
Bernstein, Richard 203
Bernstein, Thomas P. 222, 223
Bickford, Thomas J. 216
Black, Henry Campbell 230
Boli, John 205, 207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 60, 76—77, 185
Boyer, R. 波耶尔, 罗伯特 206
Bright, Charles 布赖特, 查尔斯 138,
220
Britain 英国 56, 164
Brodsgaard, Kjeld Eric 208
Brook, Timothy 214

- Bryan, C. 221
- bureaucratic restructuring 官僚机构重组
aim of 的目标 106
development of the SETC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发展 102-106
dynamics of 动力 83-84
provincial level 省级 107
under Li Peng 李鹏(1988) 89-93
under Zhao Ziyang 赵紫阳(1982) 85-89
under Zhu Rongji 朱镕基 93-101
- Burns, John P. 伯恩斯, 约翰 84, 216, 218
- Byrd, William A. 203
- Cable, Vicent 凯伯, 文森特 23, 205, 206
- Cai Dingjian 蔡定剑 231
- Cai Fang 蔡昉 227
- Calhoun, C. 221
- Cao Jianming 曹建明 218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see also economic expansion; market economy 另见经济扩张; 市场经济
- Constitution 宪政 81
- drives China's globalization 推动中国的全球化 1
- in the Party 党内 77
- justification of 正当性 60, 63
- leading to corruption 导致腐败 146
- leading to democracy? 导致民主? 187-188
- legitimization 合法化 64-66
- method of globalizing 全球化的方法 3
- rise of the labor movement 劳工运动的兴起 155-156
- capitalistic reform 资本主义改革 56-58
- catching-up and surpassing strategy 赶超战略 175, 177
- CCP, *se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中国共产党
- Central Bank Law 中央银行法 122, 128
- central bank (People's Bank of China) 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120-125, 128
- Central Committee (CC) 中央委员会
Financial Discipline Committee 金融监督委员会 127
Financial Work Committee 金融工作委
员会 127
- Political Bureau 政治局 34, 90, 101, 126, 127, 193
- recruits technocrats 招募技术专家 34
- "central to local tax rebate" system "税收返还"制度 118
- centralization 集权
see also decentralization 另见分权
- banking sector 银行部门 125-127
- financial 金融 119-128
- impact on social movements 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138
- need for 需要 57
- new left vs. new liberal 新左派对新自由派 173
- recentralization 重新集权 135
- reform proposed 改革计划 56
- statism 国家主义 180
- Chan, Sarah 204
- chauvinism 沙文主义 169
- Chen, Feng 陈峰 157, 223, 224, 225, 226
- Chen Hongyi 陈弘毅 203
- Chen Jinhua 陈锦华 97
- Chen, Kang 陈抗 223
- Chen Shaoming 陈少明 170, 171, 226, 227
- Chen Xitong 陈希同 196
- Chen Yuan 陈元 134, 219
- Chen, Zhongdong 陈冬东 204
- Cheng Baisong 陈柏松 222
- Cheng Fengjun 陈峰君 228
- Cheng Ming 程明 228
- Cheng Rulong 陈如龙 217
- Cheng, Tiejun 程铁军 213
-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50
- China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中国教育科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127
-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Bank 中国进出口银行 122
-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ttee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109-119
- 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ITIC)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22
- China Investment Bank (CIB) 中国投资银行 121
-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ttee 中国安全监督管理委员会 127

- China Writers Association 中国作协
169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中国社会科学院 60, 162, 166, 200
-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中国共产党
Eleventh Congress 十一大 190
Twelfth Congress 十二大 65, 85
Thirteenth Congress 十三大 39-40, 53, 65, 89
Fourteenth Congress 十四大 54, 90
Fifteenth Congress 十五大 34, 54, 81
Sixteenth Congress 十六大 81, 195, 196, 197
accepts capitalism 接受资本主义 81
bank reform 银行改革 127
bureaucratic restructuring 官僚机构重组 85, 89, 90, 96
Central Committee, *see* Central Committee (CC) 中央委员会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中纪委 196
corruption within 党内的腐败 197
decline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衰落 195
establishes interest-based social order 建立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72
governance crisis 治理危机 195-197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1, 47-48
Office of the Documentary Research 文献研究办公室 215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私营企业主 74, 75-78
recruitment policy 录用政策 35
Research Group of the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组织部课题组 222
Standing Committee 常委 34
state transformation 国家转型 188
structure 结构 50
technocratic movement 技术专家治国运动 34
vs. the rule of law 法治 192-195
Youth League 共青团 74
- Chinese Enlighten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运动 47, 163
- Chinese Nationalism 中国的民族主义
see nationalism 见民族主义
-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see* Kuomintang (KMT) 中国国民党
-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98) 74
- Chinese state 中国国家
agent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行为体 31-36
definition 定义 34
leadership 领导人
weakened by globalization 被全球化削弱 9-14
westernization 西化 30-38
- Chong Pengrong 钟朋荣 217
- civil society, role of 公民社会, 作用 171-172
- Civil War 国内战争 50
- civilization 文明 169
- class structure 阶级结构 160
- collective contracting fees 集体征税 149
-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182-183
- Commercial Bank Law 商业银行法 122
- commissions, restructuring 委员会, 重组 85, 90, 97
- communism, collapse of 共产主义, 崩溃 54, 55, 69, 164, 165, 180
- Communist Party, *se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共产党
- Company Law 公司法 131
-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rategy 比较优势战略 174, 177
- Compensation Law 赔偿法 192
- competition in the banking sector 银行部门的竞争 122
- conflict 冲突 17
- Confucianism 儒家 46-47, 194
-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 163-165, 177
- constitutional change 宪法变革 79-81
-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主义 172-173
- Construction Bank of China (CBC) 中国建设银行 121
-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CRS) 承包责任制 111-112, 114
- controls 控制 57
- convergence 融合 28, 29-30, 31
- "cooking in separate kitchens" tax system "分灶"税制 113
- cooperative banks 合作银行 123
- corporations, international 公司, 国际化 15, 24
- corporatization of SOEs 国有企业公司化 131-132
- corruption 腐败 10, 72, 148, 156, 166,

- 168, 196—197
 Grane, George T. 204, 209
 credit crunch, post-Tiananmen 信贷紧缩, 1989年事件后 130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刑事诉讼法 192
 Cui Zhiyuan 崔之元 166, 178—180, 183, 228, 229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35, 52, 63
 currency collapse 通货崩溃 165
 Dahl, Robert 达尔, 罗伯特 207
 Dahlgren, P. 221
 Dauvergne, Peter 208
 Davis, Deborah S. 214
 Day, Lincoln H. 230
 De Bary, Wm. Theodore 狄百瑞 231
 decentralization 分权
 economic nationalism 经济国家主义 134—136
 fiscal 财政 109—119
 focus of economic reform 经济改革的重点 83
 power 权力 13
 de-ideologization 去意识形态化 196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商谈民主 184
 democracy 民主
 capitalism and 资本主义和 187—188
 development of 的发展 28—29
 importing from the West 从西方输入 4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ed for 信息技术的使用 140
 intellectuals' call for 知识分子的主张 163
 liberals' view of 自由派的观点 170—171
 movements for, see pro-democracy movements 运动, 见支持民主运动
 new left's call for 新左派的主张 183—184
 rule of law 法治 190
 transformation from absolutism to 从绝对主义转型为 26
 Democracy Party, Preparatory Committees 民主党, 筹备委员会 79
 de-nationalization 去民族国家化 15
 Deng Liqun 邓力群 75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1982 Constitution 1982年宪法 80
 decline of ideology 意识形态的衰落 195
 develops market economy 发展市场经济 65
 economic expansion 经济扩张 64
 economic reform 经济改革 182
 justifica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证明 58, 60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 93
 political legitimacy 政治合法性 51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 52—53
 response to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对苏联解体的回应 54
 Southern Tour 南巡 3
 technocratic movement 技术专家治国运动 34
 writings by 著作 211, 212, 214, 227, 230
 Deng Yingtao 邓英洵 229
 Deng Zhenglai 邓正来 171—172, 227
 Department of Thought and Theory of China's Youth 《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 228
 depoliticization 去政治化 35
 deregulation, economic 去规制化, 经济 165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发展研究中心 176
 developmentalism 发展主义 51—52
 Ding, Jianming 218, 227
 Ding, X. L. 224
 Ding, Yijiang 227
 Dirlik, Arif 德里克, 阿里夫 211
 distribution of wealth 财富分配 142—146, 165, 173
 distributive conflicts 分配冲突 9
 Dittmer, Lowell 209
 divergence, national 纷争, 民族的 28, 30, 31, 32
 Dore, Ronald 207, 208
doux commerce 商业 62
 Drache, D. 206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e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东亚金融危机, 见亚洲金融危机
 East Europ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东欧, 共产主义的解体 54, 55, 69, 165,

- 180
- e-banking 电子银行 123
- Eckholm, Erik 222
- economic activity 经济活动 24
-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ETOO) 经济贸易办公室 102, 131
- economic de-nationalization 经济的去民族国家化 15
- economic deregulation 经济的去规制化 165
- economic expansion 经济扩张
see also capitalism; market economy 另见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effect on economic expansion 对经济扩张的影响 62
 marketization and 市场化和 4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的政治后果 66
 political interests 政治利益 63-65
 social results 社会结果 165
- economic integration 经济一体化 39
- economic reform 经济改革
see also financial reform 另见金融改革
 banking system 银行体系 121-123
 challenges 挑战 56
 democratization calls 民主化呼吁 163
 focus on decentralization 集中在分权 83
 income disparities 收入差距 142
 initiated 原始的 54-55
 Maoism 毛主义 182
 new left response to 新左派的回应 177
 political resistance to 政治对抗 70
 private economy accepted 私有经济被接受 80
 private property and 私有财产权和 173
 Zhu's 朱镕基的 102-106
- Economy, Elizabeth 经济, 伊丽莎白 203, 209
- elites 精英
 as result of Westernization 作为西化的结果 37
 recruitment by the CCP 由中国共产党录用 35
- Engels, F. 恩格斯 60, 205, 212
- Enlightenment Chinese (May Fourth Movement) 启蒙, 中国的(五四运动) 47, 163
- entrepreneurs 企业主 74, 75-78
- Epstein, Edward J. 爱泼斯坦, 爱德华 230, 231
- equal opportunity 机会平等 168
- equity 平等 168
- European nationalism 欧洲民族主义 48
- European states, expansion of 欧洲国家, 扩张 27
- Evans, Peter B. 伊文斯, 彼得 14, 16, 23, 204, 205, 206, 208
- Everbright Bank 光大银行 122
- expansionism 扩张主义 27
- expenditures 支出 116
- "expert" recruitment "专家"录用 35
- export-led strategy 出口导向战略 176
- exports 出口 4, 175-176
- external threats 外部威胁 43
- Fairbank, John King 费正清 211
- Falun Gong (FLG) movement 法轮功 140, 141, 196
- farmers and peasants 农民
 CCP's nation-state ideas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国家理想 50
 class position 阶级地位 160
 income 收入 144
 protests against taxation reforms 抵抗税收改革 149-155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50
- federalism and fiscal reform 联邦主义与财政改革 117-118
- fen shuizhi* system 分税制 117
- Feng Guifen 冯桂芬 47
- fenzhao chifan* tax system 分灶吃饭税制 113
- financial reform 金融改革
see also taxation 另见税收
 Central Bank Law 中央银行法 125, 128
- centralization 集权 123
- central-local relations 中央地方关系 112-117, 124-125
- decentralization 分权 109-117, 127
- federalism 联邦主义 109-118
- liberalization 自由化 119-128
- market economy and 市场经济与 127-128
-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131-134
- financial sector 金融部门 121-123
- Findlay, Christopher 203

- fines 罚款 149
 "first-in-command-corruption" "第一把手腐败" 197
 fiscal reform, *see* financial reform 财政改革, 见金融改革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外国直接投资 4, 15, 126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外汇储备 6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外资企业 4
 foreign trade 对外贸易 2, 6
 foreigners, sentiments against, *see* xenophobia 外国人, 情感对抗, 见排外
 freedom, individual 自由, 个人 169
 French nationalism 法国民族主义 48
 Friedman, Milton 弗里德曼, 弥尔顿 213
 Frolic, B. Michael 214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 12
 Fukuyama, Francis 弗朗西斯, 福山 28, 207

 Gan Yang 甘阳 183, 229
 Gang of Four 四人帮 80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16
 Giles, Herbert A. 翟理斯 46
 Gilpin, Robert 吉尔平, 罗伯特 24, 206
 Gini coefficient 基尼系数 142, 144
 globalism 全球主义
 as a mindset 作为一种心态 39-40, 53, 187
 as selective importation 作为有选择的输入 40-41
 definition 定义 40, 41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与 41-50
 new liberals' view of 新自由派的观点 168-169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see also Westernization 另见西化
 as myth 作为神话 23
 Chinese state as agent of 中国国家作为行为体 31-36
 definition 定义 25, 197
 effect of the state on 对国家的影响 22-24
 facilitates liberalism 有利于自由主义 170
 impact on the state 对国家的作用 14-17
 importation 输入 36-38
 Marx and Engels on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 60
 national strategy 民族战略 38
 new left resistance 新左派的反抗 174-177
 of the state 国家的 27-30
 process 过程 2-3
 state transformation and 国家转型与 38
 weakens the Chinese state 削弱中国国家 9-14
 Glodblatt, David 205, 206, 207
 Goldman, Merle 211, 212, 215, 226
 governance structure 治理结构 187-188
 see also rule of law 另见法治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 123, 179
 Grewlich, K. W. 221
 Grindle, Merilees. 格林德尔, 梅里利 33, 208
 Grossman, L. K. 221
 Groves, Theodore 224
 growth-based legitimacy 以增长为基础的合法性 53-56
 Gu, Edward Xin 顾昕 224, 225
 Gu, Qingyang 顾清扬 223
 Gu Yuanyang 谷源祥 60, 212
 Guan Chajia 观察家 218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GITIC)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27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省 12, 119, 157, 198
 Guizhou (province) 贵州省 150
 Guo Dingping 郭定平 227
 Guo Shichang 郭世昌 78

 H shares H股 129
 Habermas, Jurgen 哈贝马斯, 尤尔根 221
 Hainan Development Bank 海南发展银行 127
 Hainan (province) 海南省 107
 Hall, David L. 232
 Han Wenwei 韩文伟 216
 Han Yuhai 韩毓海 166
 "hard budget constraint" "预算硬约束" 131
 Harding, Susan 哈丁, 苏珊 138, 220

- Harris, Stuart 203
 Hass, Ernst B. 208
 Hayek, F. A. 哈耶克 189, 230
 Hayes, Carlton J. H. 209
 He Qinglian 何清涟 226
 He Shengming 何盛明 217
 He Zengke 何增科 172
 Hebei (province) 河北省 78, 157
 Heilongjiang (province) 黑龙江省 146, 157
 Held, David 赫尔德, 戴维 25, 205, 206, 207
 Henan (province) 河南省 107
 Hill, Kevin A. 220
 Hirschman, Albert O. 赫希曼, 阿尔伯特 61, 212, 213
 Hirst, P. 赫斯特, 保罗 206
 Hobsbawn, Eric J. 205
 Holmes, David 220
 Holmes, Stephen 182, 229
 homogenization 同质化 28
 Hong Kong 香港 56, 64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香港证券交易所 129
 Hong, Yongmiao 224
 Horsman, Mathew 霍斯曼, 马修 14, 205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户籍制 68
 Howell, Jude 214
 Hu Angang 胡鞍钢 181, 204, 214, 218, 221, 224, 229
 Hu Jintao 胡锦涛 101
 Hu Wei 胡伟 226—228
 Hua Guofeng 华国锋 80
 Huang Yanxin 黄延信 223
 Huaxia Bank 华夏银行 122
 Hughes, John E. 220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 157
 Hunt, Michael H. 211
 Huntington, Samuel S. 亨廷顿, 萨缪尔 28, 206, 207, 230
- identity, national 认同, 民族 27, 41—45
 identity politics 认同政治 22
 ideology 意识形态
 constrains bureaucratic reform 限制了官僚机构改革 106
 decline of 衰落 72, 195
 reducing the role of 弱化作用 35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43, 44—45, 49
- importation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的输入 36—38
 importation of Western state products 西方国家产品的输入 45—50
 see also selectiv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state products 另见有选择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
 income disparities 收入差距 55, 116, 142—146, 165, 168, 173
 regional 地区的 146
 rural areas 农村的 144
 urban areas 城市的 144
 urban-rural 城乡的 145
 income distribution 收入分配 142—146, 166, 173
 individual freedom 个人自由 169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201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29, 126, 162, 165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CBC) 中国工商银行 121
 industrial reform 工业改革 2
 inflation 通货膨胀 12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7—8, 13, 140—142
 innovation 创新 56—59, 179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制度拜物教 177—180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制度整合 39
 Insurance Law 保险法 122
 insurance, unemployment 保险, 失业 160
 integration 一体化 39
 intellectual discourse 知识分子话语 162, 169
 interest-based political order 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 75—82
 interest-based social order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effect on political order 对政治秩序的影响 70—74
 justifying 正当性的证明 61—63
 political consequences 政治后果 82
 rise of 兴起 66—69
 interest defined 可确定的利益 62
 international civil societies 国际公民社会 17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国际公司 24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国际公约 192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9, 121

-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46
internationalization, *see* globalization 国际化, 见全球化
Internet 因特网 7, 13, 140-142
investment 投资 4, 125, 126
- Jacobson, Harold K. 209
Japan 日本 24, 46, 47, 50, 64, 131
Ji Haiqing 季海勤 232
Ji Weidong 季卫东 173, 227
Jia Ting 贾铤 214
Jiang Nanyang 姜南洋 214
Jiang Ping 江平 193, 231
Jiang Shixue 江时学 228
Jiang Zemin 江泽民 53, 55, 78, 81, 101, 197-200, 216, 219, 232
jiang zhengzhi campaign 讲政治 198
Jiangsu (province) 江苏省 118, 157
Jilin (province) 吉林省 157
Jin, Hehui 223
Jing Tiankuai 景天魁 214
Jing Yuejing 景跃进 171, 227
Johnson, Chalmers A. 约翰逊, 查默斯 211
- Kahkonen, Satu 209
Kasza, Gregory J. 213
Kennedy, Paul 肯尼迪, 保罗 211
Keohane, Robert O. 基欧汉, 罗伯特 16, 40, 205, 209
Khalilzad, Zalmay M. 203
Kim, Samuel S. 209
Klintworth, Gary 203
KMT, *see* Kuomintang (KMT) 国民党, 见中国国民党
Kohli, Atul 208, 220, 231
Kohn, Hans 209
Korea 29, *see also* South Korea 韩国, 另见南朝鲜
Kosovo War 科索沃战争 164
Krasner, Stephen 206, 207
Kraus, Richard 214
Kuomintang (KMT) 国民党
 nation-building 国家建构 50
 national sovereignty 国家主权 44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42, 47-48
- labor laws 劳动法 159
labor movements and protests 劳工运动与抗议 155-159
- Lai, Harry Hongyi 赖洪义 203
land fees 土地税 149
Lardy, Nicholas R. 拉迪, 尼古拉斯 128, 209, 218, 219
Latin America 拉美 165
law-making 立法 193
Law Year Book of China, Editorial Office 中国法律年鉴, 编辑办公室 230
laws 189-192, *see also* rule of law 法律 189-192, 另见法治
layoffs 解雇 157-159
leadership 领导人
 banking sector reforms 银行部门改革 121, 124, 126, 128
 commitment to market economy 对市场经济的认可 93
 composition 构成 34
 faced with regime collapse 面对体制崩溃 53-56
 globalism mindset 全球主义心态 187
 justification of capitalism 资本主义的正当性证明 60, 63, 65, 81
 legal system development 法制发展 191
 nationalism and reform 民族主义与改革 57-58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expansion 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 66
 political reform 政治改革 52-53
 private enterprise 私营企业主 70
 reform policies 改革政策 2-3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应对全球化 41
 response to social movements 应对社会运动 140
 role 角色 31
 rule-based state governance 以法治为基础的
 国家治理 195-197
 Westernization and 西化与 36-38
- Lee, Ching Kwan 224, 225
Lee, Hong Yong 208
Lee Siew Hua 230
Lee Tenghui 李登辉 164
left, *see* new left 左派, 见新左派
legal system 法制 189-192
legitimacy 合法性 50-56, 72
Leninist state 列宁主义式国家 36, 52
Levenson, Joseph L. 列文森, 约瑟夫 L. 210
Li, Cheng 李成 208, 230

- Li, Clara 232
 Li, David D. 224
li gai shui tax system 利改税的税制 110
 Li Jianxin 李建兴 218
 Li Junru 李君如 78
 Li Lin 李林 228
 Li Ming 李明 232
 Li Peng 李鹏 84, 89—93, 97, 102, 106, 219
 Li Qiang 李强 214
 Li Shenzhi 李慎之 169, 170, 226
li shui fen liu tax system 利税分流的税制 111
 Li Tieying 李铁映 97
 Li Wei 李伟 224
 Li Xiangang 李先刚 222
 Li Xun 223
 Li Zhou 李周 227
 Liang Qichao 梁启超 43
 Liao Jinying 廖金莹 222, 223
 Liao, Kuang-sheng 廖广生 210
 Liaoning (province) 辽宁省 116, 157
 liberalism, *see* new liberals 自由主义, 见新自由派
 Lieberthal, Kenneth 208, 219
 Lin Qingsong 林青松 203
 Lin Yanzhi 林炎志 76—77, 215
 Lin Yifu 林毅夫 174, 227
 Lin Zhiyuan 林志远 218
 Lindblom, Charles 林德布洛姆, 查尔斯 230
 Lipset, Seymour M. 李普塞特, 西蒙 187, 230
 Liu Ji 刘吉 200
 Liu Jibin 刘积斌 100
 Liu Jun 刘俊 228
 Liu Junning 刘军宁 166, 167—168, 173, 226, 227
 Liu Liqun 刘力群 176, 228
 Liu, William T. 221
 Liu Xinwu 刘心武 169, 226
 Liu Zhiqiang 刘志强 218
 Lo Vai Io 225
 local government revenue 地方政府税收 152—155
 localism 地方主义 111
 Lu Ding 陆丁 204
 Lu Pinyue 鲁品越 227
 Lu Sishan 陆思山 224
 Lü, Xiaobo 刘晓波 213, 222, 223
 Lu Xueyi 陆学艺 214, 222, 223, 225
 Lubman, Stanley 230
 Luo Gan 罗岗 216
 Luo Rongqu 罗荣渠 226
 Ma Rong 马戎 203
 Ma Xia 230
 McAdam, Doug 迈克亚当, 道格 137, 138, 220
 Macao, return of 澳门, 回归 56
 McCarthy, John D. 麦卡锡, 约翰 137, 220
 McGrew, Anthony 麦克格鲁, 安东尼 205, 206, 207
 McMillan, John 麦克米伦, 约翰 224
 Malaysia 马来西亚 126, 165
 Mallee, Hein 214
 managerial reform 管理改革 15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宣言 60
 Mann, Michael 曼, 米歇尔 22, 205, 206, 207
 Mao Zedong 毛泽东
 catching-up and surpassing strategy 赶超战略 175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82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商谈民主 184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46
 political experiments 政治试验 63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140
 state structure under 治下的国家结构 34
 view of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观 44
 writings by 著作 210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demilitarization 去军队化 100—101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发展需求 83, 84
 development under Zhu Rongji 朱镕基治下的发展 93—101
 financial reform and 金融改革和 127
 leaders' disparate perceptions of 领导人的不同感知 65
 legitimized 合法化的 54
 need for state planning 需要国家计划 134
 official confirmation 官方承认 81

- “public interest” “公共利益” 63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与国家的关
系 181
- market rationality 市场理性 177
- Marshall, Andrew 马修, 安德鲁 14,
205
- Marshall, T. H. 207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14, 60, 205,
212
- Marxism 46, *see also* new left 马克思主
义 46, 另见新左派
- “mass democracy” “大众民主” 184
-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ese
Enlightenment) 五四运动 47, 163
- Meier, Gerald M. 208
- Meyer, John W. 梅耶, 约翰 28, 207
- Miao Zhuang 苗壮 229
- middle class (bourgeoisie) 中间阶级 (资
产阶级) 60, 76—77, 185
- Migdal, Joel S. 米格达尔, 琼 33, 207,
208, 220
- military 军事
links with business 与商业连接 100
—101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49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人民解放军
100—101
- Millman, Arye L. 223
- Mini-State Council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小型国务院 (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84, 93, 102—
106
- ministries, restructuring 部门, 重组
85, 90, 97
- Ministry of Commerce 商业部 88
- Ministry of Energy 能源部 90
- 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 100
- Ministry of Machinery and Electrical
Industry 机械电子工业部 93
- Ministry of Materials 原料部 88
- Minsheng Bank 民生银行 122
- Mirror Post Editorial Department 《镜报》
编辑部 231
- missile testing 导弹试验 164
- Mo, Y. J. 204
- mobile phones 移动电话 7
- mobilization, political 动员, 政治的 41
—45
-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 China as 其他
国家的典型, 中国作为 58
- modern states 现代国家 25—26
definition 定义 25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形成与
发展 26
homogenization 同质化 28
importing 进口 37
-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 121
- Mong Xiong 228
- Moore, Barrington, Jr 摩尔, 柏灵顿
207, 230
- Moore, Thomas G. 摩尔, 托马斯 203,
209
- moral decay 道德衰退 146
- moral values 道德价值 57, 198, 199—
200
- morale 民心 147
- Munro, Ross H. 203
- Myers, Charles A. 梅耶, 查尔斯 207
- Nshares 129
- Nathan, Andrew J. 211
- nation-building, *see* state-building 民族建
构, 见国家建构
- nation-states, *see* state 民族国家, 见国家
- national convergence 民族融合 28, 29—
30, 31
- national divergence 民族纷争 28, 30,
31, 32
- “national essence” “民族精华” 45
- national identity 民族认同 27, 41—45
-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 85
- national unification 回归 56
- national unity 国家统一 44, 52, 56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990s 20世纪90年代 164
causes of 原因 32
Chinese chauvinism 中国的沙文主义
169
Confucianism and 儒家与 47
definition 定义 41, 42
economic 经济的 134—135
globalism and 全球主义与 41—50
imported from Europe 从欧洲进口 48
inequality cause of 不平等的根源 24
nature of 的本质 42
new liberals' view of 新左派的观点
169
reviving 复兴 44, 51

- selectiv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state products 有选择地进口西方国家产品 56—58
- westernization and 西化与 45
- Nationalist Party, *see* Kuomintang KMT 国民党
- Naughton Barry 213, 214, 216, 224
- Negotiable, Instrument Law 票据法 122
- neo-authoritarianism 新权威主义 177
- neo-liberalism, *see* new liberals 新自由主义, 见新自由派
- neo-Marxism, *see* new left 新马克思主义, 见新左派
- "net police" "网络警察" 142
- new collectivism 新集体主义 162—166, 183—185, 227
- new left 新左派
-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 182—183
- compared to new liberals 与新自由派相比 185—186
-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主义 173
- democracy 民主 183—184
- discourse 话语 174—184, 185, 227
-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state 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 14
-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制度拜物教 177—180
- resists globalization 反全球化 174—177
- new left (*cont.*)
- rise of 兴起 162—166
- statism 国家主义 180—182
- new liberals 新自由主义
- compared to new left 与新左派的比较 185—186
- constitutionalism 宪政主义 172—173
- democracy 民主 170—171
- discourse 话语 163, 165, 167—174
- globalism 全球主义 168—169
-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state 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 14
-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哲学基础 167—168
- rise of 的形成 162—166, 183—185, 227
- role of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的作用 171—172
- New Life Movement 新生活运动 50, 200
-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纽约股票交易所 129
- nomenklatura system 任命体系 124
- nongmin fudan* 农民负担 149
- Northern Expedition 北伐 44
- Nye, Joseph S. 奈, 约瑟夫 16, 40, 205, 209
- OECD 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 经合组织公共管理服务中心 205
- off-post workers 下岗工人 105, 156
- Ohmae, Kenichi 大前研一 14, 205
- Oi, Jean 223
- Oksenberg, Michel 203, 208, 209
- Olson, Mancur 奥尔森, 曼瑟尔 36, 209
- Olympic bid 申办奥运 164
- open-door policy 开放政策 2, 56
- opposition parties 反对党 79
- Pang Zhongying 庞中英 218
- Park, Albert 223
- party-state 党领导下的国家 64
- patriotism, *see* nationalism 爱国主义, 见民族主义
- "peaceful evolution" "和平演变" 171
- peasants, *see* farmers and peasants
- Peasants Daily* Editorial Office of 《农民日报》编辑部 222
- Pederson, F. H. 221
-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中国人民银行 120—125, 128
- People's Daily* 《人民日报》 220
-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人民解放军 100—101
- periodical publishing 期刊出版 163, 166
- Perkins, F. C. 224
- Perraton, Jonathan 205, 206, 207
- Perry, Elizabeth J. 213, 214, 220, 223, 225
- Petracca, Mark P. 228
- planned rationality 计划理性 177
- pluralism 多元主义 77
- Poggi, G. 207
- policies and policy-making 政策与政策制定 33—35
- political interests in economic expansion 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利益 63—65
- political legitimacy 政治合法性 50—56, 72
- political mobilization 政治动员 41—45
- political order 政治秩序 70—74, 75—82

- political reform, *see* reforms 政治改革, 见改革
- Pomfret, John 215, 216
- popular protest, *see* protest 大众抗议, 见抗议
- population movement 人口流动 69
- Potter, D. 207
- Potter, Pitman B. 231
- power 权力
 decline of 的衰落 17, 22—24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和 43
 “premier-select” “候任总理” 84
 private property 私有财产 132, 168, 173, 179
 private sector 私营部门 67—69, 70, 73—74, 75—78, 81
 privatization 私有化 132, 156, 173, 182
 pro-democracy movements 支持民主运动
 as consequence of loosening control 为放松政治控制的后果 53
 attempts to form opposition parties 组建反对党的尝试 79
 government crackdown 政府的压制 52, 53, 140, 163
 rejected by intellectuals 遭到知识分子的拒绝 165
 repercussions for globalization 对全球化的不利反响 3
 production 生产 24
 property, private 财产, 私有的 132, 168, 173, 179
 prosperity 繁荣 43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159
 protest 抵抗
 against Westernization 反对西化 37
 integral part of state rebuilding 国家建构的内在组成部分 140
 labor 劳工 155—159
 rise of 的形成 148—149
 provincial governments' role in revenue 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作用 112—117, 118
 Putman, Robert D. 普特南, 罗伯特 D. 220
- Qian, Yingyi 钱颖一 223
- Qin Hui 秦晖 166, 169, 226
- Qing Shaoxiang 秦少相 214
- Qing dynasty 秦朝 47
- Qinghua University 清华大学 166
- Qiu Zeqi 邱泽奇 217, 230
- Ramirez, Francisco O. 207
- recentralization 重新集权 135
- recruitment policy 招募政策 35
- “Red Chips” enterprises “红筹股”企业 129
- “red” recruitment 注重“红”的录用政策 35
- reforms 改革
 agricultural 农业 2
 economic, *see* economic reform 经济, 见经济改革
 failure of 的失败 52—53
 industrial 工业 2
 lack of under Deng 邓小平时期的缺少 54
 political legitimacy 政治合法性 51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回应全球化 40
 selectiv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state products 有选择地进口西方国家产品 50—56
 religious movements 宗教运动 141, 196
 Ren, Changqing 223
 Ren Zhongping 任仲平 136
 renminbi 人民币 126
 Republic Revolution 辛亥革命(1911) 49
 restoration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复兴 46
 restructuring, *see* bureaucratic restructuring 重组, 见官僚机构重组
 retail sector 零售部门 67
 revenue, *see* financial reform; taxation 税收, 见财政改革; 税制
 revenue-division system 税收分成 117
 revenue-sharing system 分税制 153
 revolution, avoiding 革命, 避免 37
 Rheingold, Howard 220
 rights 权利 182
 Rodrik, Dani 17, 205
 Rosenau, James N. 罗西瑙, 詹姆斯 N. 16, 205
 Rosow, Stephen 213
 Rozelle, Scott 223
 Ru Xin 汝信 222, 225
 Rueschemeyer, Dietrich 208, 230
 Ruigrok, W. 206
 rule by virtue 以德治国 198—200
 rule of law 法治

- definition 定义 189
 foreign to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化中的“舶来品” 194
 obstacles to 的障碍 201
 overview 概述 189-192
 popular perception of 的公众看法 146-147
 state governance 国家治理 195-197
 vs. rule by virtue 与法制 197
 vs. the Party 与党 192-195
 rural incomes 农民收入 144-145
 rural industry 农村工业 182
 Russia 俄罗斯 50, 165, *see also* Soviet Union 50, 165, 另见苏联
- san ge dai biao* theory 三个代表思想 81
 Schiffrin, Harold Z. 210
 Schuler, D. 221
 Schurmann, Franz 63, 213
 Schwartz, Benjamin I. 史华慈, 本杰明 210
 Scott, James 225
 “second thought liberation” “第二次思想解放” 178
 securities industry 证券业 127
 Selden, Mark 213, 220, 225
 selectiv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state products 选择性地输入西方国家产品
 globalism and 全球主义和 40-41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和 56-59
 reforms 改革 50-56
 separ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33
 Shanxi (province) 山西(省) 157
 Shambaugh, David 208
 Shan Tianlun 单天伦 222, 225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省 118, 137, 157, 196
 Shang Xiaoyuan 尚晓原 214
 Shanghai 上海 123
 Shanghai (city) 上海(市) 116, 118, 157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上海社会科学院 199
 Shen Ruji 沈骥如 171, 227
 Sheng Huaren 盛华仁 101
 Shenzhen (city) 深圳(市) 122
 Shi Zhong 石中 175, 228
 Shieh, Milton J. T. 210
 Shinn, James 203
 Shirk, Susan 212, 216
 Shue, Vivienne 徐维恩 64, 208, 213, 220
shuishuo fanhuan system 税收返还制度 118
 Sichuan (province) 四川(省) 116, 150, 157
 Singapore 新加坡 64
 Sino-Japanese war 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49
 Skinner, Q. 斯金纳, 昆廷 207
 Skocpol, Theda 斯科波尔, 赛达 33, 208
 Smith, Adam 斯密, 亚当 63, 213
 Smith, Anthony D. 209
 social insurance 社会保险 17
 social movements 社会运动
 crackdown 压制 140
 effect on state rebuilding 对国家建构的影响 160-161
 impact of the state on 国家的影响力 138-146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ed by 运用信息技术 141
 protest movements, *see* protest 抗议运动, 见抗议
 rise of 的兴起 139
 social order, interest-based, *see* interest-based social order 社会秩序, 利益为基础的, 见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social protest, *see* protest 社会抗议, 见抗议运动
 society-centered theory 社会中心论 32
 South Korea 南朝鲜 24, 64, 105, 109-119, 126, 131, 133, 165
 sovereignty 主权
 loss of 的丧失 23
 modern state 现代国家 25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和 43
 Soviet Union
 see also Russia 苏联, 另见俄罗斯
 collapse of 的崩溃 54, 55, 69, 164, 165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经济特区 3
 stability 稳定 52, 55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水平 65, 158
 state 国家
 Chinese, *see* Chinese state 中国, 见中国国家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on 全球化的影响 22-24

- focal point of rule 核心规则 27
 future role under globalization 全球化时代的未来角色 14-17
 globalization of 的全球化 27
 modern, *see* modern states 现代, 见现代国家
 power, *see* power 权力, 见权力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rket 与市场的联系 181
 survival struggle 争取生存的斗争 23
 transformation of 的转型 25, 30-38, 188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国家工商总局 4
 state-building 国家建构
 by the Kuomintang 国民党的 50
 consequences 后果 160
 definition 定义 137, 150
 economic nationalism 经济国家主义 134
 impact on social movements 对社会运动的影响 138-139
 rebuilding 重建 139-148
 Russian model 俄罗斯模式 50
 "state capacity" thesis "国家能力"议题 182
 state-centered theory 国家中心论 32
 State Commission for Economic System Restructuring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88, 97
 State Commission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84
 State Commiss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for National Defense (SCSTIND)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100
 State Compensation Law 国家赔偿法 192
 State Council 国务院 84, 85, 216, 221
 State Counci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22
 State Development Bank of China 中国国家发展银行 122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97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SETC)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84, 93, 102-106
 State Economic Commission (SEC) 国家经济委员会 85, 89, 90
 "state in society" theory "国家在社会中"理论 33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国有企业 4, 96, 103-106, 110-112, 129-134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SPC) 国家计划委员会 90, 97, 218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国家统计局 219, 221
 State Tax Bureau 国家税务局 218
 "stationary bandit" vs. "roving bandit" "惯匪"对"流窜犯" 193
 statism 国家主义 138, 170, 180-182
 Stephens, Evelyne H. 230
 Stephens, John D. 230
 Storge, Susan 斯特兰奇, 苏珊 15, 16, 205
 strikes 罢工 158
 Study Group on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Revenue in the National Income 金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研究组 217
 Su Shangyao 苏尚尧 216
 Su Xiaokang 苏晓康 226
 subsidies, agricultural 补贴, 农业的 110
 Suleiman, Ezra 208
 Sun, Yan 213
 Sun Yat-sen 孙中山
 building a democratic state 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49-50
 on nationalism 关于民族主义 42, 43-44
 restoration nationalism 恢复民族主义 45
 writings by 著作 210, 211, 214
 Sunstein, Cass 桑斯坦, 卡斯 182, 229
 Su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 苏州大学课题组 223
 Swaine, Michael D. 203
 Taiwan 台湾 24, 64
 Taiwan Strait crisis 台海危机 164
 "talk about politics" campaign "讲政治" 198
 Tambini, D. 221
 Tanner, Murray Scot 特纳, 穆瑞·斯科特 193, 231
 Tarrow, Sidney 塔罗, 西德尼 138, 139, 220

- tax bureaux 税务局 118
 "tax for fee" system 费改税制度 160
 "tax for profit" system 利改税制度 110
 "tax plus profit" system 税加利制度 111
 tax-sharing arrangement 分税制 153
 taxation 税收
 farmers' protests against 农民的抗议 149-155
 private sector 私人部门 67-68
 reforms 改革 109-118
 technocratic movement 技术专家治国运动 34-35
 telecom infrastructure 电信设施 7
 Teng, Ssu-yu 211
 Thailand 泰国 29-38, 109-118, 126, 165
 Thomas, George M. 205, 207, 208
 Thomas, John W. 33, 208
 Thompson, G. 206
 "three represents" theory "三个代表"理论 81
 "three talks" campaign "三讲"运动 198
 Tian, Xiaowen 田晓文 224
 Tianjin (city) 天津市 116, 141
 Tilly, Charles 蒂利, 查尔斯 138, 139, 207, 220
 Tocqueville, Alexis de 托克维尔 138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63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乡镇企业 2, 129
 township taxes 所得税 149
 trade 贸易 15
 trade barriers 贸易壁垒 17
 trade unions 工会 158
 traditional cultures attacked by intellectuals 传统文化受到知识分子攻击 16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跨国公司 15
 "triangular debt" "三角债" 130
 trust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 (TICs) 信托投资公司 122
 Tsagarousianou, R. 221
 Tsou, Tang 邹谠 213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二十一世纪(期刊) 166
 Tyau Min-Shien 210
 unemployment 失业 105, 144, 155-159, 160
 Unger, Jonathan 209
 unification of China 中国的统一 52, 56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see Soviet Union 苏联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171
 unity, national 统一, 民族 44, 52, 56
 urban incomes 城市收入 144
 van Tulder, R. 206
 vice premiers, number of 副总理, 数量 85
 village taxes 农村税收 149
 Vincent, Andrew 文森特, 安德鲁 208
 virtue, rule by 德治 198-200
 Vogel, Ezra F. 203
 Wade, Robert 韦德, 罗伯特 24, 206
 Walder, Andrew 223, 225
 Wallerstein, Immanuel 沃勒斯坦, 伊曼努尔 14, 205
 Wan Yan Shu 万言书 215
 Wan Baosen 王宝森 196
 Wang Chunguang 王春光 148, 222
 Wang Ding Ding 汪丁丁 173, 227
 Wang Gungwu 王赓武 42, 46-47, 58, 209, 210, 211, 212, 213
 Wang Hongying 王红缨 218, 219
 Wang Hui 汪晖 166
 Wang Huning 王沪宁 219
 Wang Luxiang 王鲁湘 226
 Wang Shaofei 王绍飞 217
 Wang Shaoguang 王绍光 9, 134, 144, 166, 181, 204, 217, 218, 219, 221, 229
 Wang Yijiang 王一江 224
 Wang Ying 王颖 214, 229
 Wang Zhongyu 王忠禹 101, 103
 war 战争 43
 Watson, Andrew 华生, 安德鲁 203
 wealth distribution 财富分配 142-146, 165, 173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25, 207
 websites 网站 141
 Wei Jianxing 尉健行 101
 Wei Yi 魏沂 232
 Weigast, Barry R. 223
 Weiss, Linda 韦斯, 琳达 24, 206
 Weizman, Martin L. 韦兹曼, 马丁 203
 Wen Jiabao 温家宝 101, 127
 Western cultures, intellectuals' response to 西方文化, 知识分子的反应 163,

- 164,170
- Western state products, importation of 西方国家产品,进口 45-50
- Western states, *see* modern states 西方国家,见现代国家
- westernization 西化
see also importation of Western state products 另见西方国家产品的进口
- causes of 根源 30-31
-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制度拜物教 177-180
-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与 46
- White, Gordon 怀特,戈登 214
- White, Lynn 208
- Whitney, Joseph B. R. 211
- Williamson, John 威廉姆森,约翰 205
-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 (WAP) 无线应用协议(WAP) 7
- Wong, Christine P. W. 223
- Wong, John 黄朝翰 203,204,214,218,221
- work unit system 单位制 64
- workers 工人
see also farmers and peasants 另见农民
- class position 阶级地位 160
- protests 抗议 148-159
- unemployed 失业 105,155-159,160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21,217,218,219,221,224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世界贸易组织 1,16
- Wriston, Water B. 205
- Wu Guoguang 吴国光 212,231
- Wu, Harry X. 203
- Wu Yuetao 吴越涛 228
- xenophobia 排外 42
- xia gang* workers 下岗工人 105,156
- sihai* movement 下海运动 70,78
- Xiang Jinqun 217
- Xiao Gongqing 萧功秦 215
- xiao-kang* 小康 65
- Xin Xiangyang 辛向阳 217
- Xinhua News Agency 新华社 216,219,221,231
- Xu, Chenggang 许成刚 203
- Xu Jilin 许纪霖 225
- Xu Yi 许毅 217
- Yang Aihua 杨爱华 224
- Yang, Mu 杨沐 203
- Yang Yiyong 杨宜勇 224
- Yao Yilin 姚依林 90,97
- Yin Baoyun 尹保云 228
- Young, Susan 208
- Youth League 共青团 74
- Yu Xiaoping 余小平 218
- Yu Youyu 徐友渔 166
- Yuan Zhiming 远志明 226-228
-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42,164,181
- Zald, Mayer N. 扎尔德,迈耶 137,220
- Zeng Peiyan 曾培炎 101
- Zhang Bing 张斌 222
- Zhang Dejiang 张德江 215
- Zhang Haitao 张海涛 227,228
- Zhang Qian 张前 232
- Zhang Wannian 张万年 101
- Zhang Weiyong 张维迎 173,227
- Zhang Yuanhong 张元红 223
- Zhang Zhenlong 张振龙 216
- Zhang Zhidong 张之洞 47
- Zhang Ziyang 53
- Zhao, Suisheng 赵穗生 210,223
- Zhao Yang 赵阳 222
- Zhao Ziyang 赵紫阳 84,85-89,96,97
-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60,68,77,109-118,157
- Zheng, Shiping 郑世平 206
- Zheng Yongnian 郑永年 204,206,210,211,212,215,216,217,230,231
- Zhou Feizhou 周飞舟 222,223
- Zhu Guanglei 朱光磊 214
- Zhu Min 朱民 218
- Zhu Rongji 朱镕基
 attempts to control corruption 试图控制腐败 197
 becomes Premier 成为总理 106-108
 deals with corruption 应对腐败 12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机构重组 83
 market-building institutions under 领导下的市场导向的机构建设 93-101
 placed in charge of economic reforms 负责经济改革 102-105
 President of the PBOC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25
 SETC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84,93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国有企业 131-133

Zhu Xueqin 朱学勤 166
Zhuada fangxiao strategy 抓大放小战略
131,133

Zou, Keyuan 邹克渊 204,215
Zweig, David 203,209